

教师必读文库
《外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译
总主编 冯克诚



(第二辑·第十卷)

[苏]娜·康·克鲁普斯卡娅
(Н·К·Крупская 1869 - 1939)

国民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
学苑音像出版社 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二辑/北京师联教育科学
研究所主编.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5. 11

ISBN 7 - 80135 - 733 - 7

I. 外... II. 北... III. 教育名著 - 作品集 - 世界文
学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422 号

外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二辑
克鲁普斯卡娅国民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译

总主编 冯克诚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学苑音像出版社

★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200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1/32 印张: 180 字数: 4677千字

ISBN 7 - 80135 - 733 - 7

全二十册定价 526.00 元(册均26.30元)

(ADD 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 10 号信箱)

P. C. 100024 Tel 010 - 65477339 010 - 65740218(带 Fax)

E - mail webmaster@BTE - book.com Http ://www. BTE - book. com

教师必读文库
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出版说明

教师职业化、专业化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教师职业素质素养达到基本要求和提高,是当前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急迫要求。为此,我们组织相关专家重新系统地、较完整地遍选、编译、评注了这套适合中小学教师职业阅读的《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其编选原则和方针是:

1. 从古至今,各时代、各地区和国家有代表性,和对当代及后世教育发生直接影响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品、经典论述。教育家的教育实践风范和教育思想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影响,同时,对现实教师的成长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作为职业教师,总听说、总涉及但在学校图书馆里总缺乏的那些著作是我们这次系统编选的重点。

2. 全套分中国卷 100 种、外国卷 100 种,每二十种为一辑,共十辑,约 200 种,同时出齐。每种含教育家的生平、教育事迹、教育成就、教育思想评析和经典教育论著选读及注解解读导读两部分。这对于全面深刻和原原本本地了解学习、运用教育家的思想和著作是十分有益的。

编者
2005 年 11 月

目 录 外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第二辑·第十卷

克鲁普斯卡娅国民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上 篇

克鲁普斯卡娅教育活动和国民教育思想

- 克鲁普斯卡娅生平教育活动和著作 (1)
-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与《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导读 ... (2)
- 克鲁普斯卡娅学前教育思想 (16)
- (一)关于学前儿童个性全面发展 (17)
- (二)关于学前儿童年龄特征 (20)

下 篇

克鲁普斯卡娅教育论著选读

- 《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选读 (25)
- 初版序言 (25)
- 三版序言 (27)
- 四版序言 (28)
-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对生产劳动在国民教育中所起的
 作用的想法 (30)
- 工人阶级对生产劳动在国民教育工作中的作用的见解 (74)

读书学校及其巩固的原因	(81)
作为时代标志的学徒制的瓦解	(85)
技术的进步。技术方面的新趋势	(88)
职业教育及其发展职业教育性质的改变	(90)
读书学校之转变为劳动学校。这种转变的必然性	(98)
论社会主义学校问题	(109)
论自由学校问题	(118)
是否应教男孩做“女人家的事”？	(123)
教育管理工作的两种方法	(124)
无产阶级的儿童	(130)
家庭与学校	(131)
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	(140)
综合技术教育学校	(147)
关于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提纲	(149)
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151)
论妇女职业教育问题	(156)
论学校建设	(157)
(一)原则性部分	(157)
(二)实际部分	(159)
论青年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160)
一级学校的任务	(165)
谈教学大纲问题	(173)
组织自学	(181)
学习材料的选择	(183)
如何学习必要的材料	(186)
节约时间和精力	(197)
与流浪儿现象作斗争	(204)
浅论教师	(207)

改革教师培养工作	(209)
论道德缺陷儿童问题	(212)
论儿童之家问题	(214)
学校和少先队运动	(219)
苏维埃学校(在全苏第一次教师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224)
农民和劳动学校	(225)
居民对教师的态度	(226)
苏维埃学校是劳动学校	(227)
国家学术委员会教学大纲	(228)
少先队运动	(231)
学校的社会工作	(232)
关于学校网点	(233)
超龄生学校	(233)
改革二级学校	(234)
互助委员会和学校	(234)
谈谈教师的社会工作	(235)
教师的轮训和培养	(235)
教师和报刊	(236)
少先队运动(在党的国民教育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	(237)
论普及教育	(241)
少先队运动和学校(在学校少先队工作人员现场参 观会议上的报告)	(243)
国民教育的十年	(253)
论综合技术教育	(256)
论中学(全苏党的国民教育会议提纲)	(262)
(一)中学的一般状况	(262)
(二)改进中等学校的若干措施	(265)

上 篇

克鲁普斯卡娅教育活动 和国民教育思想



克鲁普斯卡娅生平教育活动和著作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Н·К·Крупская, 1869 - 1939年)是苏联杰出的教育家。她于1869年2月26日诞生在俄国彼得堡一个激进知识分子的家庭里。她母亲当过家庭教师,因而她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十一岁在乡间结识了一位乡村女教师季菲伊卡,并接受她的影响而对教学工作发生兴趣。十四岁时父亲病逝,家中经济困难,她曾去当家庭教师。她在1887年中学毕业后于1889年进彼得堡高等女子学校数学系学习。1890年初参加了革命的大学生小组并开始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及其他著作。正是在这个时期,她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走上革命的道路。从1891年秋天到1896年被捕为止,她担任彼得堡城郊斯摩棱斯克工人夜校的教师,于是有机会接触工人,了解工人,并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同时,也在夜校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教育工作经验。

1893年列宁来到彼得堡。她认识了列宁并加入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在列宁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1895年底列宁被捕,经请求才允许她同列宁流放在一起。从此,他们共同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生活与斗争在一起。

流放期满后,她侨居国外,曾任《火星报》编辑部的秘书。她在国外考察了当时德国、法国、英国的国民教育,并且详细地研究了夸美纽斯、卢梭、裴斯泰洛齐、欧文等人的教育著作。1915年,她把自己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写成教育名著《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1917年二月革命后4月3日,她随列宁从国外回到彼得堡并在党中央书记处工作。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她任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从1929至1939年,她一直担任该部副部长。她是苏联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代表和委员。1931年,她被选为苏联科学院名誉院士,并被授予苏联第一个教育科学博士学位。曾荣获一枚列宁勋章和一枚劳动红旗勋章。她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为建设苏维埃新教育作出巨大的贡献。1939年2月27日逝世。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与 《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导读

克鲁普斯卡娅编写《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时,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为了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她才写了这部著作。她曾经说过:“当时要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进行准备,要为教育战线进行准备。这一工作成为刻不容缓的工作;当战争爆发之后,必须认真地从事这项工作。”

在这里,我们要说明的是,《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原来的书名是《国民教育和工人阶级》,在俄国二月革命前付印为了“逃避检查”,她才用《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作为书名的。在这部著作中,她有系统地阐述了卢梭、裴斯泰洛齐、欧文等人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观点,也探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学说,并且论述了现代“读书学校”向“劳动学校”转变的原理。同时,她还对资本主义教育进行了批判。可以说,《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是教育史上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阐述教育学和教育史问题的一本名著。1916年2月,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中谈到这部著作时说:“作者研究教育学已有20多年了。书中既有她亲身考察

的结果,也有关于欧美新学校的材料。您从目录中可以看到,该书前半部还写了民主主义观点的历史概要。……第2节和第12节可以作为范例。现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学校中的变化是根据最近几年的材料叙述的,同时还对俄国的民主主义作了很有意思的说明。”^①可见,列宁这封信高度地评价了这部著作。

下面,我们简述克鲁普斯卡娅在《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的前半部分对卢梭等人关于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进行创造性探索的宝贵意见。

1. 关于让·雅克·卢梭的劳动教育思想问题

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卢梭十分重视劳动教育。她援引卢梭《爱弥儿》中的一段话说:“劳动是社会上每个人应尽的责任。一切游手好闲的人,不论他是穷的富的,强的弱的,都是骗子。”^②据此,“教育必须教学生学会劳动。”而爱弥儿是擅长农业劳动的,他学习了多种手工业。

克鲁普斯卡娅说明,“卢梭也把手工劳动看作发展儿童智力的手段。”^③因为,手工劳动有助于儿童双手灵巧性的发展,同时,生产劳动实践能培养儿童的创造精神。特别重要的是,卢梭要求教师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把知识教给学生,使他能评价每一种知识”。

2. 关于裴斯泰洛齐的教育与手工业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问题

克鲁普斯卡娅指出,裴斯泰洛齐关于教育与手工工场的劳动相结合的思想的产生,与当时瑞士的经济状况是相适应的。裴氏想尽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77页。

② 克鲁普斯卡娅:《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克鲁普斯卡娅教育文选》),卫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164页。

③ 克鲁普斯卡娅:《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克鲁普斯卡娅教育文选》),卫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166页。

力帮助农民,使他们能过幸福的生活。针对这一点,她说:“裴斯泰洛齐所主张的教育是与劳动人民的要求紧密联系着的,是从劳动人民中产生的,这种教育就是发展全面的劳动能力。”^①有了这种能力,农民就能提高农业的产量,生活得好一些。她分析了裴斯泰洛齐《林哈德和葛笃德》这部教育小说的中心思想,指出:裴斯泰洛齐是通过葛笃德的家庭教育来展示实行教育与手工业相结合的思想的,所以,“纺车、织布机等等就成了格吕菲(教育小说《林哈德和葛笃德》中的人物——作者)的第一批教科书”。^②而在学校里,实行教育与手工业生产相结合的目的在于使儿童学好“手艺”,以便从事手工业生产,达到改善自己的生活的目的。于是,格吕菲力图使穷苦农民的子女受到全面的教育与手工艺的训练。

据此,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学生们的生活技能,因此,学校要把生产劳动作为教育的中心。在这一点上,克鲁普斯卡娅指明了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的实质。

克鲁普斯卡娅进一步对裴斯泰洛齐所倡导的“生产劳动是学校教育的中心”的思想进行具体分析,她说:裴斯泰洛齐之所以把生产劳动看作是教育的中心,原因在于:儿童能在劳动实践中获得知识,因此,要授予儿童的知识,就必须围绕着他们的劳动;生产劳动可以形成一个人的智慧和性格,让儿童参加生产实践,能培养与发展他们的劳动能力,这种能力对于儿童走向生活是十分重要的。

克鲁普斯卡娅指出,特别重要的是,裴斯泰洛齐从当时的实际生活出发,已经认识到十八世纪末期在工业生产中广泛使用“童工”对于儿童的成长的影响。实际上,儿童是受剥削的。她说明,1782年,

^① 克鲁普斯卡娅:《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克鲁普斯卡娅教育文选》),卫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173页。

^② 克鲁普斯卡娅:《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克鲁普斯卡娅教育文选》),卫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175—176页。

裴斯泰洛齐在《瑞士之叶》的第十篇文章“论农民”中说过：“凡是农民耕种要使人畜都受折磨的地方，就是只关心自己工厂的利润这一件事的企业主的乐土。他在这里找到一些人，这些人常常把自己五六岁的孩子打得遍体鳞伤，要他们纺线，赚得几文钱”。^①可见，工厂主对贫苦农民及其子女的奴役这一点裴斯泰洛齐是有所了解的。

3. 关于费林别尔格的教育与农业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问题

克鲁普斯卡娅说明了裴斯泰洛齐的教育观点与瑞士教育家费林别尔格的教育见解的根本区别。她明确地指出，裴斯泰洛齐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实施教育与手工业、农业相结合是为了把农民的子女培养成为能独立生活的人，是要发展人的智力与体力，是想使人们都能过自由、平等的生活。而费林别尔格是一个贵族，他倡导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想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学校农业。组织儿童参加生产劳动，是为了用他们的劳动收入来支付他们的日常生活费用，其目的是通过教育这个手段来维护与巩固等级制度。问题很清楚，费林别尔格根据社会各阶层不同的经济地位，把学校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为下层社会的孩子即穷人的孩子设立的学校，叫做贫民学校。在这种学校里，是把农业和生产技术结合起来的。

第二、为中层社会的孩子设立的学校，是适合他们的要求的实科学校。

第三、对富豪权贵人家的孩子，进行的是特殊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仅注意儿童智力的发展，而且注意宗教教育。同时，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注意到广泛的综合技术教育与训练。

很清楚，费林别尔格的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尽力维护与巩固等级

^① 克鲁普斯卡娅：《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克鲁普斯卡娅教育文选》），卫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180页。

制度。他所说的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实际上是让儿童服“工役”,以便支付他们的生活费用。这样,他就迫使“儿童从早上六点到晚上七八点同自己的教师在田里干活”。根据这样的事实,克鲁普斯卡娅指出,不能从提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句话来判断一个教育家的主张,而应该看他们所实施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具体内容及其政治目的。只有这样,才能分清是非,了解问题的实质。

4. 关于欧文的教育与现代工业生产相结合的思想问题

克鲁普斯卡娅说明,在欧文生活的时代,大工业在英国已经出现,存在着现代的工业体系,所以,欧文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与裴斯泰洛齐相比,是前进一步了。她阐释说,欧文所提出的教育与现代工业生产相结合的思想,与英国当时的工业生产是相适应的。他在纽拉纳克所管理的工厂里为5—10岁的儿童设立学校,让他们在学校里学习,效果非常好。而欧文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贫穷和犯罪是不合理的社会关系的后果,并非人的本性。如果能建立合理的社会关系,就可以消除贫穷和犯罪现象。”^①基于这种认识,欧文为儿童创办学校,让他们学习读、写、算的普通知识,并且把教学与现代工业生产结合起来。

克鲁普斯卡娅在《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第5节中,详细地谈到欧文接受贝勒斯(1654—1725)的教育思想的影响问题。她提到欧文的好友弗兰西·普兰斯于1817年在清理自己的图书馆时找出了贝勒斯写的《关于建立工业学校的建议书》。他就把这本小册子递给在场的欧文,并说:“我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瞧,这本书在一百五十年前就提出了你的社会理论。”于是,欧文了解了贝勒的见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克鲁普斯卡娅在论述贝勒斯关于建立

^① 克鲁普斯卡娅:《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克鲁普斯卡娅教育文选》),卫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194页。

工业学校的意见时,特别重视贝勒斯关于教学要与体力劳动密切联系的思想。她援引贝勒斯的话说,“不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学略胜于不学。”“人需要从事体力劳动,就象他需要吃饭一样。人的生活好象是一盏灯,思想就是灯光,体力劳动好象灯油一样,没有油,灯光——思想——就会熄灭的。”^①

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她在分析贝勒斯关于建立工业学校的建议中强调,通过工业学校实施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相比较有以下六个优点:

(1)在这种学校里,年龄不同、能力不同的人可以从事各种活动,学会使用各种生产工具。

(2)各种语言(和知识)将通过与各民族(工人)代表的交往而学会,工人们将要象教自己的子女那样来教育青年学习他的本族语。

(3)当成人和孩子们看见别的人也遵守规定和法律时,他自己也就比较容易去遵守了。

(4)儿童的成长不与生活和人们脱离,而与人们密切来往。

(5)儿童经常受到成人的照料。

(6)这种学校里有图书馆、研究植物的实验园地以及制药的化验室。^②

很清楚,克鲁普斯卡娅实际上综述了贝勒斯关于建立工业学校的建议的宝贵意见。这一点,对于研究和正确地评价贝勒斯的教育思想以及阐述劳动教育思想的历史发展有重大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克鲁普斯卡娅提出:贝勒斯十分重视通过让儿童参加手工劳动来发展儿童的智力。她在论述这个问题时,说明了青年

① 克鲁普斯卡娅:《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克鲁普斯卡娅教育文选》),卫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199页。

② 克鲁普斯卡娅:《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克鲁普斯卡娅教育文选》),卫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199页。

可以在学习施工等“手艺”的实践中,掌握生产技术并发展自己的智力。同时,她论证说,手工劳动可以使人变得有智慧,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可以巩固人的良知。

从上所述可见,克鲁普斯卡娅有系统地论述了卢梭、裴斯泰洛齐、欧文、贝勒斯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正如她在《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初版序言中所说的:“作者撰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探求在民主主义环境中认为在国民教育上必须使生产劳动同智力发展相结合的观点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①而她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提出:在教育史上,最早提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的人是贝勒斯。

从历史的事实来看,贝勒斯的主张在法国受到卢梭的拥护。在瑞士,裴斯泰洛齐不仅赞同这种见解,而且以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全部财产在国民教育方面实际地施行教育与手工业、农业生产相结合的实验。至于欧文,则在自己管理的工厂里实施教育与现代工业生产相结合,从而在教育史上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为了深刻地领会克鲁普斯卡娅对民主主义教育家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的论述,我们还要注意以下两点:

一是克鲁普斯卡娅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个问题的。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我试图在本书内阐明提出劳动学校这一问题的经过情况,并且说明这一思想的内容是随着一般经济条件的变化和企图实现劳动学校的究竟是哪一个社会阶级而改变的。”^②这一点,她在论述卢梭的教育思想时是说得清清楚楚的。当她谈到卢梭把人们参加生产劳动看作是每一个人的社会义务的思想时,指出:“工人阶级怀着感激的心情继承了卢梭的遗产。”然

^① 克鲁普斯卡娅:《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克鲁普斯卡娅教育文选》),卫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154页。

^② (同上书),第157页。

而,她谈到现代资产阶级对待卢梭的教育思想的态度时,就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的祖先还没有把他们的阶级利益跟人民的事业分开来而颂扬过卢梭,现在的资产阶级冷淡地、轻蔑地对待卢梭,虽然他们按照传统称他为‘伟大的’,但经常要加上‘空想家’的字眼,而且他们所说的空想不仅是指卢梭著作中确实是空想的部分,并且指他的民主主义和他尊敬‘人’和尊重‘劳动’的感情。”^①

二是克鲁普斯卡娅联系有关国民教育问题的论述,大力宣传工人阶级必须进行革命、夺取政权的思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他说过:“当教育组织没有掌握在工人民主主义者(工人阶级)手里的时候,劳动学校就会成为反对工人阶级利益的工具。只有工人民主主义者才能使劳动学校成为‘改造现代化社会的工具’。”^②这样,就使《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明确这一点,对于我们研究和评价克鲁普斯卡娅的教育著作是十分重要的。

克鲁普斯卡娅在综述了卢梭、裴斯泰洛齐、贝勒斯、欧文等人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的基础上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生产劳动在国民教育工作中的作用的见解,是继承了上述教育家的观点的。但是,她强调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与上述那些教育家的观点都有本质区别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建立共产主义的理想出发来阐述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原理的。他俩说明了实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于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对于儿童品德的形成,对于人的智力发展的意义。她在阐释这些问题时说过:“大工业本身的性质要求全面发展的工人,这种工人要具有全面的劳动能力,受过综合技术训练,能操作任何一种机器,懂得各种劳动过程。”^③这就是克鲁普斯卡娅对全面发展的新人的要求。

① (同上书)第170页。

② (同上书)第157页。

③ (同上书)第215—216页。

她还进一步说明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思想 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 也就夺取了教育权。而掌握了教育权的无产阶级必须对旧的教育进行根本改造 其中极其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同时 她在谈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童工制”的问题时 就明确地指出 马克思说明 实行“童工制”剥夺了儿童受教育的机会 其结果是引起儿童“智力”荒废 把“未成熟的人变为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显然 她在分析这个问题时 论证了儿童“智力”发展的社会制约性。这一点 对于我们探索儿童智力发展问题也有重大意义。

应该指出 在《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中 、“工人阶级对生产劳动在国民教育工作中的作用的见解”这一节是十分重要的。正是在这一节中 克鲁普斯卡娅有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说。她在介绍这一教育思想体系时可贵之处在于联系了俄国教育的实际 因此 我们应着重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 克鲁普斯卡娅根据马克思关于教育是由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所决定的这一原理 说明了教育的阶级性 并且指出：“只要学校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 那末劳动学校就是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一种工具。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使劳动学校成为‘改造现代化社会的工具’。”^①

第二 克鲁普斯卡娅根据马克思关于劳动者应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的思想 说明了培养一个人的全面工作能力的重要性 并且把人所具有的全面工作能力与提高社会生产力联系起来。1920年国内战争结束后 在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时期 她就强调提高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性。实际上 这时她已经把教育、培养苏维埃新人、发展社会生产以及巩固苏维埃政权结合起来 这一点 是克鲁普斯卡娅在教育理论方面的创新。

^①（同上书）第249页。

第三,克鲁普斯卡娅根据马克思关于把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就能够使工人阶级大大超过中、上层阶级的水平的思想,特别重视对青年进行劳动教育与综合技术训练。在二十年代,苏联学校一直重视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培养他们热爱劳动的习惯。因为,马克思说过,“体力劳动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消毒剂。”在对儿童进行综合技术教育方面,克鲁普斯卡娅十分重视把这种教育与普通学校的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教学相结合。同时,她说明,对青年学生进行综合技术训练,这是使他们适应现代工业生产中工人经常变换职业的需要。这种见解是正确的、深刻的。

以上事实说明,克鲁普斯卡娅在《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中有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学说,特别是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她用这种无产阶级的教育观来武装广大教育工作者,推动教育改革,这就是《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的历史价值。

在《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后半部分中,克鲁普斯卡娅阐述了以下二个问题:

第一、从读书学校向劳动学校的转变是现代国民学校发展的必然趋势。克鲁普斯卡娅在“读书学校及其巩固的原因”和“读书学校转变为劳动学校,这种转变的必然性”等节中分析了现代学校的发展过程。她认为,现代学校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读书学校和劳动学校阶段。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要求生产者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于是“第一次提出了国民教育的问题”。^①这样,读书学校就适应社会生产的需要在欧洲各国发展起来。在读书学校里,教给学生读、写、算及其他一些基本知识。克鲁普斯卡娅写道:“……十九世纪欧洲各国所处的时期是工业发展时期,科学的工艺学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不过,最初机器只是把

^① (同上书)第161页。

人的劳动简化到去完成一些复杂的操作,使每个人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它,那时机器还没有使人的劳动成为不必要的,只不过把工人由独立的工作者变成了机器的附属品”。^①事实上,当时资产阶级需要的不是能干的、理解整个生产过程并具有独立精神的人,他们所需要的工人是,“不要求他有手艺,只求他能遵守时间有自制力,忍耐性和刻苦耐劳的习惯”。而读书学校培养的正是这样的人。

那么,读书学校的特征是什么呢?克鲁普斯卡娅在记述这样学校的真实情况时这样写道:“在这种学校里,学生们规规矩矩地坐在书桌跟前,听教员在讲台上讲课。除了书本的知识(这种知识与实际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之外,这种学校里什么也不讲,学生的个性受到多方面的摧残,并且由于严格的外表纪律而使他们变成了一种无休止地接受传授给他们的知识的机器”。^②师生的关系十分不好。“某些教师把整个一堂课都变成了一种同学生进行的无休止的战斗:侮辱,斥责,赶出教室。”^③而从教学方面来看,“教学的机械性使人吃惊,使人受到压制。”学生只是呆读死记。而这种训练的目的在于,使学生顺从,成为资产阶级的奴仆。

克鲁普斯卡娅指出,随着现代工业主产的发展,廿世纪开始后,由于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机器劳动被提到了首位,于是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技术发展的结果总是使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被淘汰”。社会生产要求受过技术训练的工人。这种要求反映在教育上,就是要求改革读书学校,加强对受过教育的人进行技术训练,所以,读书学校就必然要转变为劳动学校。由此看来,所谓“劳动学校”,是指学校在向学生传授科学基础知识的同时,要对他们实施技术训练的学校。克鲁普斯卡娅根据自己考察北美和德国所

① (同上书)第222页。

② (同上书)第218页。

③ (同上书)第219页。

得的材料指出：“增加有知识的、受过技术教育的工人的这种要求，在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尤其是在那些近来在技术上取得重大成就的国家里，如北美和德国这些最近的例子，表现得非常明显。”^①显然，在她看来，现代学校这种变化是必然的。在这里，她对社会生产与技术进步同教育的相互关系分析了现代学校变化的原因，并说明了由于现代的技术进步运用于生产过程对教育提出的要求。她说：“一般说来是工业上的特别是军事上的这种对受过全面训练的、具有知识的工人的需求，使得各资本主义国家对技术教育的组织特别重视，并因此对改组整个国民教育工作（把读书学校变为劳动学校）非常重视。”^②显然，她根据英国、德国、美国当时教育改革的事实，揭示了现代学校的发展趋势。她对美国和德国的教育进行具体分析后说：“随着对具有劳动技能的工人需要的增长，他们就想把技术教育变为普通教育，开始让技术教育同初等教育联系起来，为此就对国民教育进行了改革。在美国，以及最近又在德国，一般的读书学校正被所谓的劳动学校（Arbeitsschule）所代替。”^③

克鲁普斯卡娅说明，劳动学校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劳动学校加强了物理、化学等学科的教学，注意各门学科的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并实施技术训练，以便使学生掌握科学原理，操作机器。

二是劳动学校是自由的学校，重视发展学生的个性。“劳动学校要求教科书能发展独立精神，发展学生的个性”。因为，学生的个性受压制，劳动纪律流于表面，就很难适应劳动学校所提出的任务。劳动学校要培养的是具有创造精神的人。

三是劳动学校的教师也必须具有创造精神，能以生气勃勃的态

①（同上书）第227页。

②（同上书）第228页。

③（同上书）第156页。

度去对待工作。那些“惯于墨守成规而且一举一动都要听命于上司的教师已经不适合这种学校的要求了”。在她看来,苏维埃学校也应当是劳动学校,所以,当她于1920年12月在《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的“三版序言”中谈到苏维埃新教育的建设对教师提出的要求时指出:“现在还必须对教师进行巨人的工作,这样他们今后才能成为劳动学校的真正领导者。在一般的读书学校任教的人不需要知道太多的东西:上课,‘由这里读到那里’,然后就万事大吉。可是劳动学校不同,这些学校的教师本人应该知道许多东西,会做很多事情。学习、学习、再学习,这就是目前俄国教师的任务。”^①可见,劳动学校是一种新型的学校,现代生产需要这种学校。

然而,克鲁普斯卡娅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为指导,分析了现代资产阶级对待劳动学校的态度及其矛盾。从现代工业生产来看,需要通过劳动学校来训练技术工人,美国和德国都重视对工人进行技术训练。可是,问题在于:“随着对有技能的工人的需要量日益增加,受过技术训练的工人就越来越多,于是技术教育就从一种特权变成大家都能享受得到的东西了。技术教育提高了工人阶级的一般知识水平,而变为把现行制度改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工具了。”^②很清楚,她明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教育存在的矛盾。这种矛盾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在教育领域中的反映。因此,她说明,资产阶级并不完全喜欢劳动学校,他们采取各种措施使劳动学校能为自己服务。

十月革命胜利后,她力求把旧学校改造为劳动学校。因此,她倡导在普通学校中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并实施综合技术教育。从教育实践来看,当时着重强调要让青年学生参加体力劳动。在二十年代,由于缺乏经验,在改造旧学校时,对于在普通学校中要对儿

^① (同上书),第157页。

^② (同上书),第236页。

童进行智力教育这一点是注意不够的。对于这个问题,她曾经严肃认真地作过自我批评。她于1923年11月总结6年来的教育工作经验时坦率地说:“革命给我们提出了极其巨大的教育任务。为了完成它,我们曾不得不去找一条新的道路,不断摸索前进,也犯过不少错误。……在极其艰巨的任务面前,每前进一步都跌过跤。”^①

为了纠正忽视普通学校的智力教育这一缺点,联共(布)在三十年代关于学校教育的许多决议中,特别是在《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定》中强调了加强科学知识教学的重要性。而她是为实现联共(布)的决议而努力的。这一点,说明她在工作实践中是认真地纠正了自己的缺点的。所以,我们不能以《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中在论述劳动学校问题时存在着忽视智力教育这个问题而贬低这部著作的历史价值。

第二、帝国主义教育的木质。克鲁普斯卡娅在《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中对帝国主义教育进行了批判。她指出了德国国民学校的阶级性。因为,进入这种学校学习的都是劳动人民的子女。资产阶级的目的在于把他们培养成为雇佣劳动力。事实上,德国的中等学校才是为“有钱人的子弟开设的”,这种学校的目的是训练“唯命是从的官吏”。从思想上来看,德国“补习学校”对学生所进行的教育,是为了引导青年学生和工人离开工人运动的轨道,甘当“顺民”。针对这一点,克鲁普斯卡娅说,“学校的目的主要是给猛烈地在青年中发展的社会民主运动作‘解毒剂’”。十分清楚,她指明:德国补习学校对青年进行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削弱无产阶级的斗志,解除他们的思想武装,以达到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的目的。正因为如此,她才指出,在德国,凯兴斯泰纳被任命为慕尼黑国民学校校长是“时代”的标志。因为,当时凯兴斯泰纳“对资产阶级国家非常崇拜,异常坚决

^① 维拉·德里佐:《克鲁普斯卡娅》,程江等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57页。

地保全资产阶级的利益。”^①显然,她对当时德国教育的批判,有助于教育工作者认清帝国主义教育的本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她还对当时英国、法国、德国所创办的“新学校”进行了说明。她在论述“新学校”在这些国家的建立与教学情况时指出,无论是英国的阿波特斯霍姆这种学校,还是德国的“农村寄宿学校”,都是“要培养从事‘高级知识职业的人’”。针对这个问题,她写道:“新学校的目的就是满足国家对受过教育的、有知识的、有首创精神的高等公务人员的需要,满足资产阶级对工业企业能干的领导者的需要,迅速发展的帝国主义需要这种选拔出来的人物。”^②这种人物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官僚。

综上所述,克鲁普斯卡娅的《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是教育史上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著作。这部著作作为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新教育的建设作了理论上的准备。由于这部著作对卢梭、裴斯泰洛齐、欧文等人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因而对于建立科学的教育史的学科体系有重大的意义。同时,这部著作有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原理,这对于苏维埃教师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有巨大的作用。克鲁普斯卡娅是苏维埃新教育的开拓者之一,她为苏联的文化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

克鲁普斯卡娅学前教育思想

苏联学前教育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是同克鲁普斯卡娅的名字密切联系着的。她始终把社会主义的学前教育看作是“自己心上的事

^① (同上书),第248页。

^② (同上书),第244—245页。

业”并为苏联学前教育的创建,呕心沥血,做出了重大贡献。克鲁普斯卡娅关于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关于学前儿童个性全面发展

历史上许多经典教育家对儿童的早期教育和个性发展都从不同角度提出过积极的要求。克鲁普斯卡娅认为,他们提出的这些目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克鲁普斯卡娅站在为未来共产主义建设培养新人的角度,提出了对儿童实施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她指出:社会主义个性全面发展的要求是培养能够“建设合的、有内容的美好社会生活的人”,这种全面发展的人应是“具有自觉和社会组织本领……,具有从事各种体力和脑力劳动的理论和实践修养的人”。学前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儿童具备那些我们希望在成人身上见到的那些品质”。克鲁普斯卡娅把儿童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看作是苏联学前教育的“共产主义特征的保证”。

克鲁普斯卡娅从学前儿童年龄特征出发,提出了对他们进行德、智、体、美诸方面全面发展教育的任务和具体要求。

(1)她首先把学前儿童的体育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合理地组织幼儿体育“可以保证培养出健康的一代,能继承父业的一代”。在她亲自拟定的《幼儿园规程》中,把关怀儿童的健康,发展儿童的体力看作是幼儿园全部工作的基础。为了新一代幼苗的健康成长和发育,她提出“要为了保护儿童的健康而斗争”。

克鲁普斯卡娅根据幼儿年龄特征,提出了幼儿园保教结合的体育方针。要求在幼儿园的儿童除了进行户外活动、体操、游戏外,还应保证幼儿的睡眠、休息,注意儿童营养、居住条件和必要的保健措施,以及形成有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文明卫生习惯。

(2)克鲁普斯卡娅十分关怀儿童道德品质的培养,要求教育工作者善于从儿童时起就培养他们具有社会活动的的能力,培养他们的

集体主义情感,培养他们的坚定意志和对劳动、学习,对周围生活的正确态度和兴趣。

克鲁普斯卡娅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对儿童的集体主义教育。这一思想不仅是对学前儿童进行道德教育的核心,也是克鲁普斯卡娅的整个儿童教育体系中所贯穿着的一条红线。她认为培养和发展儿童的集体主义习惯,是一切社会主义教育机关的首要任务,也是社会主义教育区别于资本主义教育的鲜明的特征。在谈到幼儿园中集体主义教育的任务时,克鲁普斯卡娅提出,要使幼儿园的生活组织起来,“要让全体儿童无一例外地参加工作、劳动以及建设自己的儿童生活”。在这种共同生活中使儿童集体产生这样一种气氛:“善于集体感受,集体活动,集体工作”,使儿童“善于从共同的利益出发去处理每一个问题”,培养儿童善于将自己的意愿服从于集体意志。克鲁普斯卡娅十分珍视孩提时期这种友爱的共同生活,这种集体主义的感受,将会成为他们的将来集体主义的社会观念的基础。

克鲁普斯卡娅尖锐批判资产阶级的学前教育体系中把儿童看作是脱离集体影响的、好象集体会压抑儿童个性发展的错误观点。她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个性与集体发展的关系和相互影响,论述了个性发展的同集体教育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她指出:只有在集体的影响下,个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集体并非没有个性,相反,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更完全、更鲜明地显露和发展每个儿童的个性”。她要求每个教养员要学会“善于发展集体,同时善于在集体的条件下提供儿童个性全面发展的可能”。

(3)克鲁普斯卡娅把学前儿童的劳动教育看作是同道德教育密切联系的一个问题,重视劳动和劳动组织的教育作用。认为热爱劳动是儿童道德品质的表现,也是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她说,“如果我们要把儿童培养成为未来新社会的建设者,就要从小教会他们劳动。”克鲁普斯卡娅根据儿童年龄特征,提出学前儿童劳动教育内容和组织形式的特点。她说,“儿童的劳动这不是成人的

劳动。在这里儿童的劳动和游戏之间的界限是不明显的。”她提出，学前儿童劳动的重要形式是儿童的自我服务性的活动。并且在《幼儿园规程》中规定了培养学前儿童自我服务性劳动能力和形成劳动习惯的具体要求。克鲁普斯卡娅注意到劳动对儿童智力发展的重要作用。她提出，在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需要“生活中及其它一切工作中的巧手。”要求培养学前儿童对科技的兴趣，吸引儿童参加他们年龄条件允许的更为复杂的活动，以便为将来学校中的综合技术教育打下必要的基础。克鲁普斯卡娅还制定了对劳动组织领导的具体要求：“1. 劳动应使儿童感到兴趣，才能使他们不受拘束；2. 劳动应有利于儿童掌握知识和技能；3. 儿童应该能时常了解和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这些要求是实现劳动的教育作用的保证。

(4)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学前阶段是儿童智育发展的重要时期。如何来安排这个启蒙阶段的智育？克鲁普斯卡娅根据学前儿童生理、心理的发展水平，并且从儿童的外部影响直接通过内部条件，通过其积极性去实现的思想出发，确认学前儿童智育的出发点是发展儿童的感官，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培养他们的认识能力。并认为，学前儿童智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感知教育。她要求为发展儿童的感觉器官，为培养他们的认识能力提供必要的条件。为了通过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唤起儿童的求知欲和锻炼他们的感官，克鲁普斯卡娅把认识周围生活看作是儿童智育的基础。提出“学前儿童受教育的权力——这就是认识周围生活的权利。她尖锐批评当时有些幼儿园儿童生活贫乏，给他们的知识面太窄等缺点。她提出要让孩子进入生活，去观察生动的大自然，观察人们的劳动。要扩大儿童的眼界，而不能把他们”关在玻璃罩子里”。

克鲁普斯卡娅把儿童认识活动中观察力的发展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他认为，一方面“发展观察力，善于用观察到的东西去分析和检验其它的事物，把它们记录下来，使儿童寻找各种现象的原因”。这样观察就为儿童的智力发展提供了食粮，扩大了视野，提高了认识

能力,它是进一步掌握知识的前提。另一方面,她认为观察还具有思想教育的意义,它为儿童唯物主义世界观萌芽的建立创造了基础。因此,克鲁普斯卡娅多次强调,不应单纯去追求知识的数量,而应首先着眼于发展儿童的感官和认识能力。克鲁普斯卡娅关于智育的论述,是苏联幼儿教育中教学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5)克鲁普斯卡娅十分重视学前儿童的美育。认为美育不仅包括培养认识美的能力,更重要的还要让儿童参加力所能及的创造美的能力,更重要的还要让儿童参加力所能及的创造美的活动。因此要求幼儿园注意组织多种形式的有表现力活动:唱歌、绘画、舞蹈、朗诵等。美育不仅能丰富儿童的生活,克鲁普斯卡娅还认识到美育是同全面发展中其他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手段。在学前儿童教育中应该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以培养精神丰富、情操高尚、体格健美的新一代。

(二)关于学前儿童年龄特征

克鲁普斯卡娅指出,工厂进行生产要研究他们加工的原料,教育工作者怎么能不研究与他们工作相关的儿童的年龄特征呢?她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提醒教养员,“应该仔细地研究儿童年龄特征”,要从儿童的兴趣和可能出发去安排他们的游戏、劳动和学习。这个要求也是克鲁普斯卡娅确定学前儿童教育体系的重要依据。

克鲁普斯卡娅从生理和心理科学成果出发,亲自研究了从学前儿童直到少年儿童阶段的年龄特征。在学前儿童的心理特征方面,克鲁普斯卡娅曾研究了儿童知觉、思维、行动和周围环境的关系。指出儿童感知世界的具体性和形象性的特点,她说,“你们观察儿童就可以发现儿童多么需要具体性:一切要去试一试,看一看,摸一摸。……如果不认识这点就是不了解儿童”。但克鲁普斯卡娅并不是把儿童的这种心理特征看成是静止不变的。她提出了“变化着的儿童”的观点。从这一观点出发,她

认为,不同年龄儿童感知事物具体性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对于早期学前儿童来说,只有那些能摸得到、嗅得到的东西才是具体的,对于年龄稍大的孩子,那些能使他们产生一定形象的材料、生动的故事、图画等也是具体的,对于再大一些年龄的孩子,具体性只能从生动的现实材料中得到。”另一方面,克鲁普斯卡娅还注意到儿童这种感知特点的发展变化,还同教育的影响,同儿童的活动范围、生活经验的生长密切的有关。这也是克鲁普斯卡娅要求在学前教育中使儿童更多地熟悉周围生活,不断丰富儿童经验的依据。

克鲁普斯卡娅认为模仿性是学前儿童表现积极性的一个特点。由于善于模仿,学前儿童可以多次重要地听取讲述童话,并通过成人的讲述能准确记住故事的具体情节。为促进儿童心理的发展,克鲁普斯卡娅要求教养员爱护儿童这种积极性,并注意把这种积极性发展为儿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克鲁普斯卡娅批评三十年代初期苏联学前教育工作中不考虑儿童的特点,幼儿园脱离生活,活动组织得机械呆板以及儿童负担过重等倾向。她说:“活生生的儿童和他们的兴趣从学前教育家的视野中消失了”。她提醒学前教育工作者不能用成人的口味来评断儿童的需要,也不能用学校的标准来衡量学前儿童。要求他们去观察儿童,深刻了解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她形象地说:“要站在儿童的位置上,并且‘钻到儿童的肺腑里去’”。她认为只有在熟悉儿童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建立学前教育体系。这样组织的幼儿园的生活,才能给学前儿童带来幸福。

克鲁普斯卡娅在强调要研究儿童年龄特征的同时,严肃地批评有些教育学者将研究儿童年龄特征歪曲为儿童学的企图。她指出:“我们批驳儿童学是正确的,他们刻板地形式地对待儿童,他们不考虑如何帮助儿童的发展和教育,而是按百分比把儿童分为有能力的和无能力的”,然而就在批判儿童学的反科学性质的同时,她还是提醒教育工作者,不应降低对儿童年龄特征的研究。

下 篇

克鲁普斯卡娅教育论著
选 读



《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选读

初版序言

作者撰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探索在民主主义条件下国民教育必须使生产劳动同智力发展相结合的观点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这一观点产生于大工业开始大规模利用和剥削儿童劳动的时期。最先指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是十七世纪的英国作家约翰·贝勒斯。

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这种主张不仅在英国有人拥护,而且在欧洲大陆也有人支持。卢梭就积极赞成这一主张,而他对这一问题的见解在法国、瑞士和德国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法国,国民公会力图通过立法方式来实现这一主张,在瑞士,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裴斯泰洛齐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全部财产来说明应该怎样在国民教育工作中实际进行生产劳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工人民主主义者在十九世纪50年代以及晚后一些时期又提出了这一主张,发展并科学地论述了这一主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指出,由于技术本身的发展,就需要具有高度水平和全面劳动技能并且受过综合技术教育的工人。

但是,十八世纪末叶一些活动家所宣扬的关于脑力发展与体力发展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张以及他们在这方面所做的种种试验,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十九世纪的前七十五年,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是需要工人从事没有什么技巧的简单劳动,而这种劳动既不要求工人具有首倡精神和机敏性,也不要求工人灵活敏

捷和掌握知识,所以一些民主主义者关于使国民能受到全面教育(以广泛的脑力发展与准备从事各种体力劳动相结合为基础)要求的呼声就没有引起任何反响。诚然,国民学校的数量有所增加,但这些学校是读书学校,只教学生读、写、算,不教学生从事任何体力劳动。而且这种学校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俯首贴耳、驯服恭顺的工人。但是,进入二十世纪后,由于技术的巨大进步,从而有力地把现代工艺学的新趋向——机器劳动提到了首要的地位。机器劳动需要全面发展的、有技术能力的工人,这种工人能很快地适应经常变化和改进的机器与生产过程。当然,这种新趋向首先是在两个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即美国和德国表现出来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重视培养有全面劳动技能的工人,为此而开办各种专业学校和夜校等等。随着对具有劳动技能的工人的需要的增长,他们打算把技术教育变为普及教育,开始使技术教育同初等教育联系起来;为此对国民学校进行了改革。在美国,以及最近又在德国,一般的读书学校正被所谓的劳动学校(Arbeitsschule)所代替。但是,劳动学校不能建立在贯彻读书学校的那些原则的基础上。劳动学校要求教科书能培养独立精神,要求发展学生的个性。那种学生的个性受压抑,劳动纪律流于表面的情况,是很难适应劳动学校所提出的任务的。新的方法要求完全不同的教学人员。惯于墨守陈规而且处处唯命是从的教师已经不能适合这种学校的要求了。劳动学校要求教学人员以生气勃勃的姿态去对待工作,要求教学人员有个性。旧的考查形式已经无能为力了。需要学生互相之间的考查,群众的考查。新的学校不仅需要群众的考查,而且要与群众保持最广泛的合作。劳动学校是以教育与生产相结合为前提的,而如果它不吸引代表工人群众的工人组织来参与其事,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把一般的读书学校改革为劳动学校,但是如果不改组国民教育工作的全部组织,这种改革也就不可能实现。

写于1917年

三版序言

本书著于 1915 年。初版于 1917 年由《生活与知识》出版社印行。本书早在二月革命以前即已付印。正因为如此,所以本书写得比较含蓄,而且用语也略为隐晦——旨在逃避检查。为了逃避检查,本书的书名我没有用《国民教育和工人阶级》,而用了《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本书已印行两版(每版两万册),现在再来更换书名,也就无此必要了。

我试图在本书里阐明劳动学校这一问题提出的经过情形。并且说明这一思想的内容是随着一般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说明企图实现劳动学校的究竟是哪一个社会阶级。我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当教育组织没有掌握在工人民主义者(工人阶级)手里的时候,劳动学校就会成为反对工人阶级的利益的工具。只有工人民主义者才能使劳动学校成为“改造现代社会的工具”。

本书脱稿已经五年了。这是变化多么大的五年呵!在这五年里,旧世界已经失去了它的基础,在这五年里,对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在重新作出评价。

在俄国,当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就把旧时学校改造成为劳动学校。劳动学校已列入了共产党党纲。

但是,俄国经济上的落后状况及其低下的文化水平在国民教育上比在别的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实现劳动学校的任务只好由旧时学校的教师来做,这些教师是由过去的国民蒙蔽部从最落后的人中专门挑选出来的,他们大部分被弃置在僻远的乡村,本身也是半愚昧无知的,他们对于不自觉地见到的以及使他们惊惧惶恐的那一伟大变革感到格格不入。现在还必须对教师进行巨大的工作,这样他们今后才能成为劳动学校的真正领导者。在一般的读书学校任教的人

不需要知道太多的东西,上课“从这里读到那里”,然后就万事大吉。可是劳动学校却不同,这些学校的教师本人应该知道很多东西,会做很多事情。学习、学习、再学习,这就是目前俄国教师的任务。

正确实现劳动学校的另一个障碍,就是劳动学校在乡村(那里至今还是小私有制占统治地位)和城市都被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所包围。只有使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得到改造,才能大规模地建立劳动学校。当前学校与群众的联系还只是在工人区和各个工厂里,在那里,已经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给学校打上了一定的烙印。

现在,办理得很完善的劳动学校却寥寥无几。

但这是否说我们就应该回到一般的读书学校的路上去呢?当然不能。一般的读书学校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学生经受过革命的洗礼,类似伊洛瓦依斯基编的旧教科书在现代学校里已经不适用,教师(至少是一些先进的教师)这三年来学到了很多東西。

随着经济破坏现象的消除、饥荒程度的逐渐减轻以及教师的改造和进步,劳动学校也将有所改进而成为合乎要求的学校。

不久以前,大家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国内战争上;随着战争的结束,大家就会日益关心文化问题,组织劳动学校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学校正在不断吸取新的力量而使自己成为“改造现代社会的工具”。

写于1920年12月

四版序言

十五年前(1915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本书作者当时侨居国外。本书的写作提纲曾与列宁一起讨论过。全书脱稿后,列宁又通读了一遍,他并且写信给高尔基谈过这本书的问题。

凡是研究过列宁著作的人,都知道列宁一直是非常重视国民教

教育工作的。早在 1897 年,列宁就在评论谢·尼·尤沙柯夫所著《教育问题》一书而写的《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一文中,捍卫了马克思对国民教育工作的观点。这篇文章发表至今,已经过去了三十三个头了,现在,四年制普及义务教育行将实现,七年制义务教育的问题又认真地提出来,因此列宁的这篇文章至今还有特殊的意义。列宁在这篇文章里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什么是等级学校,什么是阶级学校。他还谈到了统一的学校,谈到资产阶级各国的普及免费学校仍然是只为有钱人服务的阶级学校,谈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谈到大家都要参加生产劳动,谈到为了建立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必须消除城乡之间的对立状况。1913 年,当国家杜马讨论 1913 年国民教育部的经费预算报告时,列宁为巴达也夫草拟了一篇讲演稿。列宁的这篇讲演稿流露出一种愤懑的情绪,写的慷慨激昂,使人看了之后一点也不会怀疑他对国民教育工作的见解的正确性,并且使人看出他是多么重视这一工作。讲演稿是以下面这段话为结尾的:“工人阶级在 1905 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还能够再一次证明,而且将以更大的说服力和更大的威力,更加严肃认真地证明自己有能力和争取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而不是卡索的也不是贵族的)国民教育而进行革命的斗争!”。

当时要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进行准备,要为教育战线进行准备。这一工作成了刻不容缓之举,本当认真抓好,但战争突然爆发了。

本书脱稿于 1915 年,当时出版商不肯出版,以致拖到 1917 年才问世。关于统一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问题从教育人民委员部一成立就提出来了。

在我党党纲中曾经谈到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问题。

近几年来,我国已经出版了大量有关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和职业教育问题的书籍。但是由于《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是从历史的观点写成的,所以它目前还有一定意义。

不久前,列宁的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把我过去写的一封关于

《教育辞典》的信交给我。这封信是 1916 年写给打算出版《教育辞典》的出版商的。列宁把这封信转寄给家里的人,请他们去找出版商。但是没有找到出版的人,这封信就和书一样遭到了相同的命运。我现将此信收入本书附录中。

我们在国民教育上所做的工作还非常不够。旧的影响还很强烈,可以说是无孔不入。然而迅速发展的工业和农村的集体化已经给实现综合技术教育创造了崭新的条件。如果本书的再版对实现综合技术教育能有些微帮助的话,作者就感到欣慰了。

写于 1930 年 4 月 18 日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对生产劳动 在国民教育中所起的作用的看法

在每个民族的历史上,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时期,那时由于生产方式根本改变的影响,整个民族的生活开始沿着崭新的轨道前进;习用已久的旧尺度完全不适用于新的经济关系、家庭的关系和法的关系;这些关系完全不属于旧的社会形态。这些旧尺度与新的生活条件不适应的情况表现得特别明显。于是就开始对旧的东西进行无情的批判。最先进的哲人看到了建立新形式的社会关系必然性。

在这个时期,民族生活中的一切问题都被广泛地、原则地提出来了,而且提得很直接和实际。

大家知道,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和临近革命爆发的一段时期,对于欧洲说来就是这样一个时期。大工业与旧的行会制度、习惯和法规相矛盾;货币经济根本改变了封建关系而使农民的生活变得比牛马还不如;由封建领主控制的法律在新的形势下成了可怕的专横手段;从前无人闻问、过着牛马一样生活的人民群众开始走上舞台,——他们的贫困和无知是大家都清楚的。人们开始常常讲起“人民”来了。第一次提出了必须使人民群众受教育的问题,第一次

提出了国民教育的问题。在此以前,学校仅仅是为上等和中等阶层的子女设立的;为下等阶层的子女设立的学校只是极个别的,而且这种学校还怀有特殊的目的。关于国民教育的这一新问题当时引起了热烈、广泛的讨论,并且与国民福利和国家法令上的一般问题联系起来。正因为这一问题提出的范围是如此广泛、而且涉及当时现实生活中的若干重要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一问题当时是怎样提出来的。这有助于我们从新的方面、根据新的说明来发现国民教育上的许多迫切问题。

例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许多人以为综合技术教育的问题只是不久前在美国和德国提出的。可是,实际上这个问题不仅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就曾热烈地、全面地讨论过,而且当时许多活动家还力图实现综合技术教育,并且进行了试验。

裴斯泰洛齐就曾在瑞士设立了一所学校,试图在这所学校里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另一个瑞士人费林别尔格也在自己的领地霍夫维尔设立了类似的学校。随后,欧文也在纽兰纳克设立了这样的学校。孔多塞、洛姆,加任费拉特茨企图通过立法来实现自己的主张。

这些试验具有重大的意义。大多数试验都失败了,这就使一些目光短浅、因循守旧的人抓住把柄大肆叫嚣,说这种主张是乌托邦。但是,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由于经济发展的进程又异常迫切地把这些问题重新提了出来,这说明这种主张里有很多值得重视的东西。

进一步研究这种主张,把它与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情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观察,探究清楚它在当时的情形下所进行的种种试验没有成功,而且不能成功的原因何在?了解一下为了实现这种主张中值得重视的、本质的东西需要具备哪些条件,这样做是极有益的。

让·雅克·卢梭

我们首先讲一讲卢梭,从他的名著《爱弥儿》谈起。这本书出版

于 1761 年 ,它对整个教育思想的动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卢梭对当时教育方法的猛烈批判深深震动了思想界。他指出当时的教育内容空虚贫乏 ,存在着狭隘的等级制和违反自然。社会思潮也趋向于他这方面。不久前那些毫不引人注目 ,看来完全正常的东西 ,现在遭到了反对 ,人们想改变现存的制度。

当然 ,由于一般社会条件的不同 ,各国对卢梭的理解也各异。对于贯穿在《爱弥儿》一书中的思想 ,每个思想家都是根据自己所持的世界观去理解的。

在当时经济和政治上比较落后的德国形成了一个新的教育流派——“泛爱派” ,为首的是巴兹朵夫、卡门别、托里茨曼、古特斯姆特。泛爱派特别重视卢梭关于必须回到大自然去的主张。他们不把自己的学校设在城市 ,而设在野外大自然的怀抱里。他们非常重视健康、锻炼、旅行以及户外游戏。根据扎里茨曼的意见(见《Etwas über Erziehung》《教育概论》) ,在儿童必须学会对答的第一次问答中 ,应该提出许多有关健康的问题 ,如怎样才能最有效地预防牙疼 ,怎样保持视力 ,等等。在泛爱学校中 ,学生衣着很朴素 ,食物也很简单。巴兹朵夫于 1774 年在德萨设立了第一所泛爱学校 ,这所学校实现卢梭的主张 ,就是不应该教育儿童去适应某种一定的制度。实行所谓“随意日” ,把日常生活完全颠倒过来 ,例如 ,学生整夜不睡觉 ,入夜前不吃任何东西 ,等等。

德国作家让·波尔·里赫杰尔(他是教育著作《列瓦那》一书的作者)称巴兹朵夫是“卢梭思想的精神上的解说者和传导者”。他之所以这样说 ,实在是由于他对卢梭的理解太肤浅 ,有时甚至很可笑。一般说来 ,这些泛爱派们与贯穿在《爱弥儿》一书中的深厚的民主思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他们不了解该书中所谈到的对劳动、对劳动人民的尊敬。

例如 ,扎里茨曼为人民写了一本小说——《康纳德·基菲尔》 ,他在该书中企图用小说的形式说明如何把卢梭的思想灌输到农民生

活里去。但是他取之于卢梭的只是一些在当时的德国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可以实现的东西,而把问题的社会方面、把构成《爱弥儿》一书中的“精神”的一切东西都抛弃了。正是这些东西使该书能对当时的人产生如此重大影响。

泛爱派们对《爱弥儿》的理解只是表面字句,完全忽视了它的精神实质。

例如在《爱弥儿》一书中,卢梭使自己的学生出身于富有的家庭。他为什么这样做呢?他的目的是要说明一般地应该怎样去教育一个人^①,为此他就需要一些特殊的条件。能为儿子创造这种条件的只有富人,而不可能是穷人。

可是巴兹朵夫把这种选择曲解为只应当注意教育富人的子弟,这与卢梭著作总的精神完全是南辕北辙的。巴兹朵夫说:“我的建议和教育著作只是为富裕阶层服务的,从王子开始到商人和艺术家的子弟为止,都包括在内。这一庞大的、可贵的阶层的世俗教育无可争辩地应该具有符合这一阶层的需要的实际性质。这种知识是最起码的知识,但应努力从上层阶层所有的全部知识中去挑选。”

卢梭说的是教育“人”,而巴兹朵夫却谈的是培养特权阶层的子弟。

在巴兹朵夫的学校里,特权阶层的子弟可以把别的学生当作仆役来使唤,给他们擦皮鞋,收拾床铺。从这里就可看出巴兹朵夫对卢梭的理解是多么肤浅。特权阶层的子弟受处分就让他们当仆役学生,并且要做粗活。这种工作被认为是一种卑贱的工作,只有下等阶层的人才适合去做。虽然泛爱学校也进行体力劳动,但只是把它当作娱乐,

^① 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说:“至于我,我要给他一个他怎样也不会失掉的地位,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使他引以为荣的地位,我要把他教养成人,不管你怎样说,他得到这种地位的机会将会比你能给予他一切地位的机会少得多。”(卢梭:《爱弥儿》,李平沅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以下引文均出自此译本。——译者)

当作锻炼体力的手段,而把真正的生产劳动看作卑贱的事儿。

然而卢梭对问题的看法却不同:

“处在社会之外与世隔离的人,对任何人都没有债务,所以他爱怎样生活就可以怎样生活;但在社会之中,他必然要借他人之力而生活,他应该用劳动来向他们偿付他生活的费用,这是任何人都不能例外的。所以,劳动是社会的人不可或免的责任。任何一个公民,无论他是贫或是富,是强或是弱,只要不干活,就是一个流氓。”(《爱弥儿》中译本,第262页)

“在人类所有一切可以谋生的职业中,最能使人接近自然状态的职业是手工劳动;在所有一切有身分的人当中,最不受命运和他人的影响的,是手工业者。手工业者所依靠的是他的手艺;他是自由的,他所享受的自由恰好同农民遭受的奴役形成对照,因为后者束缚于他的土地,而土地的产物完全凭他人的支配。敌人、贵族、有势力的邻居或一场官司,都可以夺去他的土地;人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利用他的土地去折磨他;然而,不论在什么地方,谁要是想折磨手工业者的话,他马上就捆起行李走掉了。可是农业是人类所从事的历史最悠久的职业,它是最诚实,最有益于人,因而也就是人类所能从事的最高尚的职业。我没有向爱弥儿说:“你去学一学农活吧!”因为他懂得农活。所有的庄稼活儿他都是很熟悉的,他起初就是从庄稼活儿学起,而且还不断地干这种活儿。因此,我要对他说:“你现耕种你祖上留下来的土地。但如果你失去了继承权,或者根本就没有继承权的时候,又怎样办呢?所以,你还得学一门手艺。””(同上书,第262—263页)

多么天真的话啊!现在只有伪善的人才能说出这种话。我们现在都知道一个除了自己的双手之外什么都没有的手工业者的自由值几个钱。但是,150年前,工业刚刚兴起,资本主义的黑暗面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那时说出这种话,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这些话里充满了对劳动的崇高敬意,充满了对建立在特权基础上、划分为等

级的社会的强烈的反抗情绪。泛爱派对此却置若罔闻,凡此种种都是他们所不能理解的。

然而,卢梭教育思想中的社会方面却在瑞士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瑞士和法国一样,正处在革命的前夕),不过范围略有不同。裴斯泰洛齐就是瑞士思想家中受《爱弥儿》影响很深的一个。他在《天鹅之歌》一书中写到《爱弥儿》对他的影响时说:“当他著的《爱弥儿》一出版之后,我的非常不实际的、充满幻想的思想在这本同样非常不实际的、充满幻想的书的影响下,也洋溢着热情。我曾经把我在家里从母亲那儿受到的教育以及后来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与卢梭对爱弥儿的教育加以比较。我开始觉得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在各个阶层都完全是一种摧残毒化。我觉得,只有从卢梭的崇高的思想中才可能找到一种共同的解毒剂。卢梭从思想上为自由制度打下了基础并且使它变得充满生气,这种自由制度更加加强了 my 充满幻想的愿望:为了人民的利益去广泛地、有效地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Pestalozzi,“Schwanengesang”,bei Seyffarth xlv,200)(裴斯泰洛齐著:《天鹅之歌》)

我们知道,卢梭认为劳动是每个人的社会义务。由此应该得出结论,教育必须教学生学会劳动。爱弥儿增长农业劳动,他学习了许多门手艺。

卢梭也把手工劳动看作发展儿童智力的手段。

“读者诸君,不要只是呆在这里看我们的学生练他的身体和练他的手艺,也请你们考虑一下我们把幼稚的好奇心是引向哪个方向发展的,考虑一下他所获得的常识,他所培养的发明精神和深远的目光,考虑一下我们将训练他具备什么样的头脑。他无论看见什么或做什么,都要把它彻底地弄个明白,懂得其中的道理,他要从一种工具到另一种工具,追溯到当初使用的第一个工具,他绝不凭想象行事,他对一样东西如果事先没有一点知识,他就不去学它,如果他看见人家做弹簧,他就想知道钢铁是怎样从矿石中炼出来的,如果他看

见别人把木板钉成箱子,他就想知道树木是怎样砍伐的;当他自己工作的时候,他拿到他所用的每一样工具时都要这样说:“如果我没有这样的工具,我怎样才能做一个同它相似的东西来用,或者怎样想办法不用这种工具?”(《爱弥儿》中译本,第251—252页)

卢梭认为,儿童从事劳动的目的,不在于这种劳动的结果,而在于它对儿童的教育意义。不要进行机械性的劳动,而要进行可以达到一定目的的劳动,具有思想意义的劳动。

卢梭虽然认为他的学生应该学习某种手艺,但是他最重视的并非职业教育,而是综合技术教育,不是准备从事某门专业,而是准备进行一般的劳动。

“我们在这里也许太强调选择一门职业的重要性了。既然问题只是在于一门手艺,则这种选择对爱弥儿来说就是毫不费事的,通过我们迄今给他的种种锻炼,他学徒的期限已经是过了一半多了。你要他干哪种活儿呢?他什么都会:他已经会使铲子和铁锹,会使车床、锤子、刨子和锉刀,各种手艺的工具他都是很熟习的。问题只是在于怎样把这些工具当中的某一种工具用得更熟练,以便努一把力赶上善于使用那种工具的工人,在这一点上,他有一个比谁都优越的条件,那就是他的身子灵便、手脚灵活,能毫无困难地做各种各样的姿势,即使长久地做什么动作,他也不觉得费劲的。此外,他的一切器官都是很健全的,而且还受过良好的锻炼,他已经懂得各种技术的机械原理。为了要成为一个干活的能手,他所欠缺的只是经验,而经验总只要有时间就能获得的。”(《爱弥儿》中译本,第269页)。

卢梭还认为综合技术教育是使学生正确理解各种社会关系的手段。

“你要极其小心的是,不能使你的学生接触到社会关系的一切概念,因为这不是他的智力所能理解的;但是,当知识的锁链使你不能不向他讲到人类的互相依赖时,你就不要从道德方面向他讲解,而必须首先使他的注意力放在使人和人都互相有用的工业和机械技术上。当你带着他从这个工场走到那个工场的时候,就不能让他看见

什么工作都袖手旁观,不能让他走出工场以后对里面的情形一点也不明白,你至少要使他对他所看到的東西有一个了解。为此,你就要亲自动手去工作,处处给他做一个模范:为了使他成为师傅,你就要到处都做徒弟,你要知道,他从一小时工作中学到的东西,比听你讲一整天学到的东西还多。”(同上书,第247页)

这时,“教师的艺术是绝不要让学生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无关紧要的琐碎的事情上,而要不断地使他接触他将来必须知道的重大的关系,以便使他能够正确地判断人类社会中的善恶。”(同上书,第254页)

由此可见,在卢梭看来,综合技术教育要使学生能够判断人类社会的真正价值。劳动关系应该成为判断社会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否公平合理的标准。为了恰如其分地评价这种劳动关系,学生不应该只是消极地观察这种关系,而应积极地参与其事。只有亲自参加劳动,根据经验了解了它的全部复杂性、艰巨性等等,学生今后才能判断某一生产部门的社会意义。在这里,卢梭认为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不要把每种手工业、每种生产只当作一种手艺去研究,而且还要当作一种社会关系去研究。

“可惜的是,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时间全都用在工场里。我们不仅仅要学习做工人,我们还要学习做人,后者的学徒生活比前者苦得多和长得多。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像你跟舞蹈老师学习那样每天跟刨木板的师傅学习一个小时吗?不,我们不是学徒,而是弟子,我们所抱的志愿不在于学木匠的手艺,而在于把我们提拔到木匠的身分。因此,我主张每个星期至少到师傅家里去学一个或两个整天,在他起床的时候我们也起床,我们要在他的眼前工作,要在他的家里吃饭,要照他的吩咐去做,在荣幸地同他一家人吃过晚饭之后,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就回到自己家里的硬床上去睡觉。我们要一下就学会几种职业,而且要在学做手工活的同时又不忽略其他的学习,就必须采取这样的办法。”(《爱弥儿》中译本,第272页)

“积累这种虽然狭隘却是正确的知识的另一优点,就是从这些

知识的相互联系中把知识教给学生,使他能评价每一种知识,防止估计过高的倾向(大多数人对那些自学的天才往往产生这种倾向),防止对其他人估计不足的倾向。凡是能够洞悉整个制度的人,就能了解每个部分的位置;凡是能够洞悉一个部分,并且对它了解得很深入的人,可能成为一个博学的人,能够进行判断的人是第一流的人,你们要记得,我们的目的与其说是授予学生知识,毋宁说是授予他们判断力。”

由此可见,卢梭之所以重视综合技术教育,并且把它摆在职业教育之上,是因为:(1)它可以使学生受到从事任何职业的训练;(2)它可以扩大学生的智力眼界,使他既能胸怀全局并且又能正确判断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3)它为评价在劳动中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提供了正确的标准;(4)它使真正了解现存的社会制度有了可能。卢梭希望他的学生“能像农民那样劳动,像哲学家那样思考。”(《爱弥儿》中译本第274页)

这就是卢梭在150年前对于体力劳动在教育中的作用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思想。

他没有把这种思想具体化,没有打算实现这些思想,他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可能正是由于这类问题是泛泛的问题,卢梭的思想才具有如此普遍的意义,他只给各国的活动家指出一条道路、一个方向,而使他们有充分的可能把这些思想在他们国家的特殊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下加以实现。

这些思想在150年后的今天还很有意义,尽管社会情况完全不同了,社会大大向前发展了。在目前非常盛行的农村寄宿学校(Landerziehungsheime)里,学生都是富裕人家的子弟,那里和泛爱学校一样,体力生产劳动的作用被缩小为只具有卫生学上的和狭隘教育学的目的。卢梭的气魄完全不同。他把体力劳动看作一种社会义务,看作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人的一种手段,看作获得广泛的智力视野和正确理解各种社会关系的一种手段。这种见解是非常民主的,

因此工人阶级怀着感激的心情继承了卢梭的遗产。但是这种遗产为现代冷酷无情的资产阶级背弃了。资产阶级的祖先还没有把他们的阶级利益跟人民的事业分开来而颂扬过卢梭,现在的资产阶级冷淡地、轻蔑地对待卢梭,虽然他们按照传统称他为“伟大的”,但经常要加上“空想家”的字眼,而且他们所说的空想不仅指卢梭著作中确实是空想的部分,并且指他的民主主义和他尊敬“人”和尊重“劳动”的感情。

裴斯泰洛齐

十八世纪末叶,瑞士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渗透到农业的瑞士来了,并且开始动摇旧的宗法制的基石。农民处在一种分化的状态。裴斯泰洛齐在他所写的《林哈德和葛笃德》这本小说里,把农民经济划分为三类:1. 富裕的经济,有许多牲口和牧场,劳动沿袭过去的旧章法进行,非常紧张;力戒奢侈,厉行节约;宗法式的严守纪律的家庭,严肃的风尚;没有债务;只从事农业;2. 中等的经济,负有债务——力图通过各种手段保住土地,追求各种收入,在工厂里作工,动荡不安;家庭的性质发生变化,不够巩固团结;3. 最后,完全破产的经济,依靠在工厂里当零工维持生活;让五、六岁的小孩子整天纺线,赚一点零钱,穷愁潦倒,把钱全用于酗酒。

瑞士破产了的群众的贫困、散漫、软弱无力表现得非常明显,非常令人不安,并且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一些最敏感的、具有同情心的青年很自然地就产生了一种要帮助人民的愿望。但是他们很快就弄清楚了,原来这些受苦受难的群众是特权阶级全然不了解的陌生人。于是青年们就努力去接近人民,熟悉人民的生活情况。

1765年,波得米尔教授写信给祖里茨尔谈起瑞士的青年时说:“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许多优秀的大学生都沉醉在与他(布烈斯)一起耕种农田的这一幻想里。为了学会这件事,他们已经做了一些

试验——帮助农民收割 , 考验自己能否经受得起日晒雨淋和疲劳的折磨。”

裴斯泰洛齐住在乡下祖父家里 , 并且参加各种农活。裴斯泰洛齐的朋友布龙奇里谈到裴斯泰洛齐的时候曾说 : “ 这个人整天同农民在一起收割庄稼。他左手的五个指头几乎全割破了 , 可怜的人 ! ”

这些都是俄国读者非常熟悉的民粹主义思想的体现。

裴斯泰洛齐力图与人民接近 , 他过着“清苦的生活” , 整天在田里劳动。他在《林哈德和葛笃德》这本小说里 , 谈到他这几年来在人民中所过的生活时曾说 : “ 由于我自己生活也很贫困 , 我就学习更加深入地了解人民的贫困和贫困的来源。我对贫困理解得很深刻 , 而任何生活幸福的人都是不可能理解得这样深刻的。我经受了人民所经受的痛苦 , 并且体察了真实的民情 , 这是谁也没有体察过的。不顾人们对我的嘲笑 , 不顾他们厉声的斥责 : ‘ 倒霉的人 , 你比最潦倒的短工还不会帮助自己 , 你以为你能帮助人民吗 ? ’ ——我不顾人们说的这些话 , 从内心涌出的巨流仍然推动我奔向唯一的目的 : 铲除使人民和我自己遭受苦难的根源。”

裴斯泰洛齐感叹地说 : “ 啊 , 可爱的人民 ! 我看到你所处的低下的地位 , 非常低下的地位 , 我一定要帮助你提高你的地位 ! ”

裴斯泰洛齐肩负的任务是不轻的 , 他意识到了这点 , 但这并没有阻碍他。

“ 问题不在于我帮助人民是难是易 , 而在于我作为一个人来说 , 能否允许目前的情况继续存在下去。”裴斯泰洛齐通过自己杰出的小说《林哈德和葛笃德》中的一个可爱的主角说出了这句话。

裴斯泰洛齐大部分的作品都在探讨如何铲除使人民遭受苦难的根源问题。裴斯泰洛齐不是从书本上 , 而是从自己对人民生活的观察中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本书不拟对裴斯泰洛齐这些著作加以分析 , 也不想对他的总的世界观有所阐述。我只想指出 , 他的全部著作充满对人民的热爱 , 并且体现出非凡的观察能力以及深刻而又独到

的见解。其中有很多天真的想法。历史表明,裴斯泰洛齐的许多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谁要是至今还不明了使人民遭受苦难的根源何在并且不知道如何铲除这一根源的话,他趁早别想从裴斯泰洛齐那里去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在120-130年以前,资本主义刚刚形成,封建势力还很强大,还看不到发展的道路,因此当时还未形成这样一股力量,其历史使命是彻底铲除使人民遭受苦难的主要根源^①。

裴斯泰洛齐是他那一时代的儿子,当时人们对阶级斗争问题还无认识,大家还在期待着救世主:受过教育的君王,关怀民众疾苦的封建领主,贤明聪颖的立法者,乐善好施的工厂主。裴斯泰洛齐所生活的时代是这样的时代,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们天真地认为,通过勤劳节俭以及其他一些善行美德就可以发家致富。

在那个时代,像罗伯特·欧文这种具有大智大慧、同时生活在生产极其发达的英国的人,还一直致书当时的富豪权贵,希望他们资助他实现自己的计划。

所以,不能指望从裴斯泰洛齐那里得到许多重大问题的答案。不过,对于想了解民主思想史的人来说,裴斯泰洛齐的作品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裴斯泰洛齐说(见1782年8月8日《周报》第32期):“我觉得,首先应使人民很好地了解自己和自己的地位。”

为此,裴斯泰洛齐于1781年为人民撰写了三卷本的小说《林哈德和葛笃德》一书^②。他在这本小说里描写了农村贫困的生活,描写了一贫如洗、无依无靠、愚昧无知的农村居民。一个好心的地主想通过法律和管理以及对青年的合理教育来使居民成为幸福的人。这本小说篇幅冗长,艺术成就不高,充满长篇的议论和伤感的情节,但却洋溢着

① 隐喻工人阶级,以避免沙皇检查官检查。——译注

② 此书有多种版本,也有分为四卷本的。中译本见《裴斯泰洛齐教育文选》第1卷(上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译注

生气勃勃的民主思想和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地主、牧师和教师并非实有其人,而是具有美德的模特儿。作者塑造这些人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他们的嘴来告诉人民,使他们遭受苦难的根源何在,并且怎样铲除这一根源。作者的目的是不是想让读者相信地主和牧师是具有美德的人,而是要说明人民怎样并且用什么来帮助自己。

裴斯泰洛齐认为,能使人民成为不依靠财富和善心的人的主要手段是教育。

裴斯泰洛齐所主张的教育是与劳动人民的要求紧密联系着的,是从劳动人民中产生的,这种教育就是培养全面的劳动能力,它与生活保持着密切联系,从中可以获得发展体力和智力的手段,这种教育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费用、贵重的设备、受过专门训练的教师,在这方面人民可以自己帮助自己;人民中间优秀的人可以帮助落后的人提高。

裴斯泰洛齐在他的小说《林哈德和葛笃德》一书中,详尽地论述了这些观点。人民本身对学校有什么要求?学校应该满足什么要求?这就是裴斯泰洛齐首先提出来的问题。教师格吕菲(小说《林哈德和葛笃德》中的人物)去了解村民对学校的看法和要求。他访问了一个殷富的农民、泥水匠的妻子和一个贫农出身的工厂主。

那个富裕的农民不很重视学校,他甚至反对设立学校。

他认为,“对于农民的子弟说来,真正的学校就是农民的耕地、牧场、牛栏和田野。书本知识会使他们想入非非,而把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塞到脑子里去”。农民的子弟看起来很健壮,外表与工人很少有什么不同,但实际上非常不开化,以至无法和他们交谈。格吕菲得出结论说,对于这些儿童说来,只有设立这样一种学校才有益处,这种学校所授予他们的东西,并不是代替从事农业所给予他们的东西,而要超过这种东西。

工厂主,或者确切些说,企业主迈耶尔常给一些棉花让农民在家里纺线,他认为“不会读书写字在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危险”;他的眼界更广,他说:“大量流通的货币可以改变人民的生活条件和他们工

资的性质。通过增加货币和把产品提价一倍减少了私人的财产。大多数人已经不是靠农业维持生活,十个人中未必有一个人能从地里得到一切必需品。大多数人为了生活都得找外快。要想使这种外快确有保证,那么就得比一个农夫更高明、更灵活在目前的情况下,一个人要知道得更多些,能力更强些,这样他才能使自己吃得好些、穿得好些、生活得好些,好像世界上的人减少了一半,土地和粮食便宜了一半一样。”为了使生活条件的变化不致使居民走投无路,迈耶尔希望建立这样一种学校,这种学校“要让儿童整天远远地离开他们那些脱离常轨的糊涂的父母,教儿童坚强、守纪律(这种现象在一个好家庭里是常见的),教他们一切应该知道和应该学会的东西,以便在家里和工厂工作,并且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为自己创造很好的家庭生活条件。”(《林哈德和葛笃德》,第154页)。

地主和教师花了一整夜时间去讨论这个“意义深刻的计划,但是要想让这些不开化的人把他们的子女交出去一整天,并且在学校里对这些儿童进行适合于他们今后生活的家庭教育,对他们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泥水匠林哈德的妻子葛笃德使他们找到了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他们观察了她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情形。她的孩子为了赚钱维持生活而不得不纺线。葛笃德教他们认真地干活,教他们学习各种活计,但是她也注意在他们双手工作的时候,让他们的脑子也工作。她教他们在工作的时候读、算,对他们讲基督的生平,等等。“他们做的是日工,但他们心里不觉得是做日工。”格吕菲在乡村里设立了一所学校。“他发现,那些土地很多、但债务也很多的少数农民的孩子以及那些没有土地、没有什么更多的财产的农民的孩子,一般说来在很多方面所要求的是完全不同的教育。于是他就把他们分成三个不同的班,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施教。”(《林哈德和葛笃德》,第199页)

……后面这一班学生(他们的父母既没有土地,也没有更多的财产)主要由他教。他对学校里的工作的安排,完全是从穷人

孩子的利益出发,这些孩子既未得到财产上的好处,也没有合理的家庭教育,所以他的教育完全是摹仿贤淑的葛笃德的家庭教育。少尉(格吕菲)和她的看法一样,认为学校的全部制度应该以儿童一开始就能自己赚钱谋生为出发点。否则就不可能为穷人大规模地创办农村学校以及一般的任何学校。这是一切事情的基础,它还会给今后实现最终的目的指出道路。这样一来,纺车、织布机等等就成了格吕菲的第一批教科书,他把这些东西放在地主拨给他的一栋旧屋子(在学校旁边)里的三个大房间里,他首先就把这些东西交给儿童。他们从早到晚坐在那里,由玛格丽指导他们(这是葛笃德介绍她这样做的)去做他们自己选择好了的工作,或者他们的父母选择好了的工作,以此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同时,他们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每天每时都可以接触别的工作,了解它的特性,弄清楚它的好处和坏处、难处和益处,这样就可以使许多穷苦的儿童不会终生被束缚在自己的纺车或织布机上,过着一种非常单调死板的生活。儿童完成了自己每天的工作以后,还可以从事他所喜欢的工作……此外,为了让儿童熟悉小农业生产(格吕菲认为把它与家庭工业联系起来是非常重要的),他在校园内拨出一块地给他们耕种。每一个学生都有三垄地,他愿意种什么就种什么,凡是蔬菜种得最多最好的人,都可以得到奖金……在学校里,举凡富贵家庭所有的东西儿童都有,他们还学会了怎样莳弄这些东西。他们养猪、养家禽、养兔(都在校园角上)还养羊(村里的牧童把它与村里的羊赶在一起,在牧场上放牧)。他们学过怎样种麻(从播种到变为大麻和麻布为止),怎样用麻布做衣服。他们也会处理羊毛,从剪羊毛开始到把羊毛织成呢绒为止。

“这一切格吕菲都得到了玛格丽的帮助,因为格吕菲最初对这些东西都不懂。玛格丽很会做家务,如果班上某个人什么事情没有做好,她立刻就能察觉出来。当哪个儿童没有线了或者什么别的原因使他停工的时候,她立即去帮助他,直到他重新开始工作为止。在

校园里也是同样的情形。她对每样作物都照顾得非常周到,就像在班上照顾每个儿童一样;儿童们不管怎样努力,自己垄上的东西总没有她的长得好。她是受过贫困熬煎的人,所以谁也不会像她那样能教儿童学会充分利用各种东西。她教他们把嫩绿的树叶阴干,做成柔软而舒适的褥子,因为穷人不可能搞到羽毛。她教他们把沟里和枯朽树洞的泥土挖出来做肥料,把草地、沼泽地、小河里的植物弄来做饲料。她教他们把泥土烧焦,告诉他们火可以使石灰石变成石灰。她就这样使贫穷的孩子们在他们的拮据环境下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办法来把生活安排得更舒适一点,而这是一些愚蠢的有钱的农民花掉他们全部的钱财也做不到的。

“……格吕菲力图使穷人的孩子受到全面的教育而成为一个不依靠有钱的农民的独立自主的、能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的人。”(《林哈德和葛笃德》,第202页)

在坡那镇(葛笃德的住所以及格吕菲的学校的所在地)住着一个从邻镇来的妇女,那个镇里的居民文化水平比较高些,她在自己菜园里种了各种鲜嫩的蔬菜,种了各种果树和鲜花,已经有二十年了。从前,村里的小孩不是偷她菜园里的东西,就是逼着要,同时还嘲弄她。格吕菲的学生向她请教,问她是怎么耕作的,她愉快地教他们怎么去做,并且送给他们一些种子。

坡那镇还有一个钟表匠。学生们请他允许他们去看看他怎样工作,这个钟表匠发现他们都聚精会神地看他干活,不久他们自己也会干了,这时他就开始教他们学习自己这行手艺。

“凡是迟早对儿童有用的东西,格吕菲都把它纳入自己的学校教育里去。教室里往往每到晚上就堆满了各种工具和刨花,好像一个工场。当儿童做完了挣工资的工作之后,没有到菜园去或者由于天气不好而不能去的话,他们可以在教室里做他们爱做的任何工作,只要不游手好闲就行。格吕菲常常和他们一起刨、锯、旋。他常常用蜡给学生做些人像和动物、头和手,有时又用木头做房子、磨房、锯木厂、船只

以及一切他们想做的东西。”(《林哈德和葛笃德》,第 241 页)

格吕菲常常和自己的学生一起坐在胡桃树下。“从这里可以看到整个河谷和小溪,几乎可以一直看到那银色的湖面。在树下,孩子们围着他,他给他们讲村子里从前发生的事情,说是一百年前村里房子还很少,村里的居民比现在还穷,还不懂事,现在整个生活情况已经在各方面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变化。随后,当孩子们在家里谈起的时候,他们的父母都不明白,孩子们对过去的情况怎么会了解得这样清楚。”(《林哈德和葛笃德》,第 241 页)

摘引暂时到这里为止。

裴斯泰洛齐认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格吕菲一开始就了解了村民对学校的看法),学校应该满足居民的要求。必须研究这种要求,必须研究人民的生活条件,这样才能创立合乎人民要求、受人民爱戴的学校。

我们试回忆一下列夫·托尔斯泰在他所写的教育论文中对这个问题所发表的见解。他也和裴斯泰洛齐一样,问农民对学校有什么要求,有什么看法。他发现当时设立的读书学校完全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使他们感到格格不入。他对这种和人民格格不入的学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他说:“人民渴望知识,一如大旱之盼雨露,可是我们给他们吃的不是面包,而是石头。”我们常常矫枉过正,把小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泼了出去……

现代学校力图尽量去满足工业和国家提出的要求,而不去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这两种要求只是部分地吻合,而裴斯泰洛齐的理想——建立能满足人民要求的学校——仍然只是一种民主思想。

居民的要求并非一成不变的,这种要求是各种各样的,要认真加以研究。学校不是一个死的东西,它应该克服老一套的工作作风,而能适应所处的各种各样的条件。我们知道,格吕菲曾经把自己的学校分为三个班,每个班的教学都适合该班学生的那一阶层的生活条件。

现代学校由于对整个学校工作的管理过于集中,现在比过去任

什么时候都离裴斯泰洛齐的进行个别教学的愿望远了。美国在最近一段时期的做法可能是最接近裴斯泰洛齐的这一要求的,而欧洲为了管理方便起见,主要是尽量保持清一色的作法。但如果裴斯泰洛齐的这一主张完全被人抛弃了,这当然不能说这一主张是不对的。企图改革现代学校的人仍然时常想起他的主张。

上面那些从《林哈德和葛笃德》摘引出来的关于格吕菲的学校的材料说明,根据裴斯泰洛齐的意见,学校应该与生活保持极其密切的联系。学校应该培养学生去生活,应该关心这种生活,从各方面去说明它,这样它才能成为改造这种生活的有力武器,成为裴斯泰洛齐所理想的学校。而且学校还应该从生活本身吸取教育方法。《林哈德和葛笃德》一书中有一章的题词是“生活的教育”。裴斯泰洛齐想通过被那镇的学校例子来说明,应该怎样使学校与生活联系起来,怎样通过生活来教育学生今后去生活。劳动是人民生活的中心,因此裴斯泰洛齐把生产劳动当作学校教育的中心。裴斯泰洛齐在《瑞士之叶》附录二中说:“一个人必须从他经常从事的劳动中找寻自己世界观的基础……他应该尽力独立地、主要从自己的劳动活动中得到知识……因而授予每个儿童的知识应该围绕着他的劳动活动。”劳动可以形成一个人的智慧和性格。裴斯泰洛齐指出,凡是土地须要花大力翻耕的地方,那里的农民也就很粗野,喜欢喝酒;土地比较肥沃的地方,那里的农民性格就比较柔和;大的牧畜者比小私有者粗野,雇农与农场主的性格不同。单调的、机械的工厂工作会使人变得迟钝,使他失去意志力。于是裴斯泰洛齐很自然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劳动条件对儿童也会产生影响。在十八世纪末,农业和家庭工业中都广泛地采用了童工。儿童怎样受剥削,他们的工作条件怎样恶劣,这种工作对他们产生了多么沉重的影响,——这一点裴斯泰洛齐非常了解。1782年,在《瑞士之叶》的第九篇文章《论农民》一文中,裴斯泰洛齐说:“凡是农民耕种要使人畜都受折磨的地方,就是只关心自己工厂的利润达一件事的企业主的乐土。他在这里找到一

些人,这些人常常把自己五、六岁的孩子打得遍体鳞伤,要他们纺线,赚得几文钱。凡是农业收入少的地方,凡是农民牧地少的地方,凡是负债或因为某种原因而破产的地方,还有农村里每个人都乐于推却自己多余的负担的地方,我们都可看到这种现象。”

根据裴斯泰洛齐的意见,学校是防止儿童被这种单调的劳动弄愚蠢的一种工具。学校应该仔细考虑儿童的劳动,使它成为发展儿童全面劳动能力的手段,教儿童学会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动。我们看到,格吕菲在自己的学校里尽力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从现在的观点看来,在裴斯泰洛齐的学校里授予儿童的综合技术的知识范围是很有限的,它带有明显的小生产(这种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满足自己的需要)的烙印。当时也只能如此。但是裴斯泰洛齐的必须了解整个生产、了解人的全部劳动活动(同时这种了解不是书本上的了解,而是实际的、真正的了解)的思想表现得已经非常明显了。

1790年,他写了一份报告书给贵族卡尔·庆陈道尔夫伯爵(当时奥地利的国务活动家,地位很高,曾与卢梭、伏尔泰、爱尔维修有书信往来),其中发挥了这样的思想:必须建立一些学校,使贫苦人民的子弟能通过学习多种工业形式而受到全面的劳动训练,学会各种形式的劳动。他指出了三种主要的劳动:农业、家务和加工工业。在学校里学习这三种劳动应该实际地进行,与儿童的生产劳动紧密地联系起来。

裴斯泰洛齐想写一本《劳动入门》,其中将指出如何循序渐进地进行各种初步劳动活动,如:抛、搬、推、摇、转,等等。儿童如果做完了这些练习,就能发展自己的体力,并能养成动作的机敏性,运用自己各种官能的灵活性,而这是从事任何工作所不可缺少的素质。

在工业发展的时代,由于这种发展破坏了旧的国民经济的形式,使社会上每个人的生存变得不安定起来,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因此他很自然地产生了这样一种思想,就是必须准备进行一般的劳动,进行各种形式的劳动,而不是准备从事某种一定的职业。一个人今天

从事农业,明天他失去了土地,就得上工厂。工厂倒闭后,他只好改做别的工作。十八世纪末叶,除了农业之外就不知道任何别的劳动的居民,特别感到工资来源太不固定。农业的凋敝把人变成了无依无靠的流浪汉,因为他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条件,只好去过一种忍饥挨饿的可怜生活。卢梭和裴斯泰洛齐都主张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因为受了这种教育之后就不怕劳动条件发生变化。

裴斯泰洛齐希望不仅把生产劳动,而且把儿童的工资与教育联系起来,这无疑是错误的。儿童的工资是与剥削儿童劳动、与消耗儿童精力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读到对格吕菲的学校的描写时,就已觉察到那里并非一切都是无可指摘的。一方面,儿童“从早上到深夜”地纺线;另一方面,还要学园艺、其它的生产以及修理钟表,等等。在纸上,即在小说中,还能勉强搪塞过去。如果不正视儿童的“工资”是建立在剥削儿童劳力的基础上的,那末只要一接触现实,就会把一切幻想变成泡影。当裴斯泰洛齐想实际地建立他在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学校时,事实也正是如此。1769年,他在自己的领地新庄,用自己个人的财产为穷人开办了一所学校。他的学生大多数都是些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没有一点生活资料,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不会工作也不想工作,粗野,凶狠,往往是一些半病态的小野兽。裴斯泰洛齐对他们爱抚备至,并且开始按自己的方法去教育他们。

儿童在开设的农场里进行生产劳动。在农场里,裴斯泰洛齐开办了一个干酪制造所和一个纺纱厂。冬天,儿童就纺纱织布。几个很有经验的工人来教他们。教学工作是根据裴斯泰洛齐的精神进行的,他竭力想实现自己把生产劳动与读、写、算的教学以及一般地与总的发展联系起来的主张。当然,根本谈不到儿童劳动受剥削的事。从教育的观点看来,效果是很好的:儿童工作起来很努力,学会了独立思考,获得了许多知识等等,但是学校本身维持不下去了:主持者是一个不会理财、不会精打细算的裴斯泰洛齐,他不会做生意(虽然他常常亲自去出售儿童的劳动产品)。不过问题还不在于裴斯泰洛

齐不会当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儿童的工资一般说来只够维持一部分生活费用。依靠工资,他们只能过一种半饥半饱的生活,即使这样,还得是儿童的全部劳动力和全部时间都完全归企业主支配才行,至少在限制童工劳动时间的“工厂法”颁布以前是如此。裴斯泰洛齐在世时,占主要地位的是资本主义家庭工业生产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劳动被剥削的程度达到了极点。要想在这种情况下使儿童的劳动能够完全维持生活,甚至于还有一些剩余,那纯粹是空想。事实上,裴斯泰洛齐的学生的大部分费用都是靠他本人的财产来支付的,而他本人的钱并不多。1755年,裴斯泰洛齐不得不“请求友人资助这所旨在使贫苦的农民子弟得到教育和工作的学校”。结果募集到了1400法郎。这点钱当然不能维持很久。于是裴斯泰洛齐只好把一切可以典、出卖的东西都典当出卖了。但是,到了1780年他不得不把孤儿院解散,因为他既无法养活自己的学生,也无法养活自己的家庭。

裴斯泰洛齐的试验失败了。一些看问题很肤浅的人就得出结论说,儿童的生产劳动一般地不能与教育相结合,而欣然认为读书学校比劳动学校好。

裴斯泰洛齐本人对他自己失败的原因估计得更正确些。1782年,他在第32期“周报”附刊的首页上曾谈起这个问题。他认为自己主要的错误是,他力图把儿童的生产劳动跟商业结合起来,换句话说,他主持的是工业企业,而使自己教育企业的成败取决于工业企业的成败。不应当使劳动的目的变成生产物品出卖,而应当生产一些物品来满足本身的需要。

裴斯泰洛齐认为不能把教育企业的成败系于市场的条件,他这话完全正确。但是他认为儿童的生产劳动只应该局限于生产一些物品来满足本身的需要,这就不对了。如果照这样去做,那么这种学校就会成为一个脱离国内总的经济生活的闭塞的小经济单位。这样它就会脱离现实生活,而这是裴斯泰洛齐所竭力反对的。此外,所谈的

还不只是一个学校,而是成千上万的学校。这些闭塞的学校小生产团体将要散布于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而与它发生尖锐的矛盾。要想使这种独立的生产单位在一般说来发展比较迅猛的资本主义组织(它建立在互相竞争的基础上,对一切都要求进行资本主义交换)的核心中存在下去,这只不过是一种空想。就像希望儿童给企业主做工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并且同时还能使这一工作成为教育活动的中心一样。

裴斯泰洛齐大力提倡的根本主张,即生产劳动应该成为教育活动的中心,是完全正确的,也完全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目前经济发展本身的进程也提出了这一要求。裴斯泰洛齐的错误只是,他把这种生产劳动理解成了他当时所进行的那种劳动:要么就是给企业主干活,要么就是以不合时宜的方式为本身的需要而干活。

裴斯泰洛齐梦想设立这样的学校,这种学校要能满足人民大众的需要,为他们所欢迎,并且在颇大程度上要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

但是怎样能说服愚昧贫穷的人民把孩子送到学校里去呢?当时在瑞士还谈不上义务教育的问题。裴斯泰洛齐生活在人民中间,他知道,贫穷破产的农民认为与其把他六岁的孩子送到学校念书,还不如让这孩子从早到晚在家纺线为他挣点钱。当时在瑞士也谈不上通过颁布“工厂法”来限制父母对孩子的剥削。裴斯泰洛齐认为,让儿童在学校里为企业主工作可以成为一种手段来使群众感到学校的好处,并使他们愿意把子女送来,因为这样家长仍然可以得到孩子的工资,甚至于得到的还要多些,因为学校可以提高儿童的劳动能力。

裴斯泰洛齐想得到外援的希望很小。他认为只有自己负担开支的学校才能做到这一点。儿童的工资要能够支付学校的开支。教师应该从人民中聘请,他应和儿童们一起工作。所有的教学方法都应该简单化。教师也需要指导。必须编一本书,这本书能谈到家务工作、农业和工业的一切原理在穷人生活中的运用。我们发现,裴斯泰洛齐对儿童工资的盘算落空了。

当时已经出现了另一种国民学校,即读书学校,这种学校的设立与其说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工业和特权阶层的利益。大工业把成千上万的人吸引到城市和工业中心来了。管理这批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此外,他们的愚昧无知和粗暴脾气也使人吃惊。从前认为农民的愚昧无知是一种完全正常的现象,而现在自由资产阶级却提出必须给人民一些起码的知识,向他们灌输一些宗教道理。这是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所要求的。于是在当时最大的工业国——英国——就出现了一种兰喀斯特学校。这种学校是为群众设立的。在一个大的厅堂里坐着600—1 000个儿童,他们由一个教师采用互教的方法学习着。这种学校是工厂,或者确切些说,是手工工场的精确模型。教学工作非常机械,而且分为许多相隔很长的阶段。一切都以分工为基础。认识三个字母的儿童可以教一个字母也不认识的儿童,认识五个字母的儿童可以教认识三个字母的儿童,等等。所有这些都根据一个教师的哨音和手势去做。这种学校收费非常低廉,所传授的知识当然也非常之少。这种学校对儿童劳动毫不挑剔,不过在培尔—兰喀斯特制度中,儿童劳动不是教育的手段,而是减少学校开支的手段。1814年签订和约之后,兰喀斯特学校在当时另一个工业国家——法国——也出现了。在法国,这种学校遭到了主教协会的激烈反对。主教协会把这种学校看作对“圣兄弟教团的威胁和教团基础的动摇”。于是在这方面就展开了斗争:反动分子反对培尔—兰喀斯特学校,自由主义者拥护这种学校。问题从国民学校应该是怎样的学校变成了国民教育工作是应该由国家掌握还是由僧侣掌握。

裴斯泰洛齐非常反对兰喀斯特学校,称它为“藏污纳垢之地”。他希望为人民设立另外一些完全不同的学校,这种学校能使儿童得到全面的发展,能为他将来的生活和劳动作一些准备。他不可能不看到,那种只是教学生死背祈祷文以及教学生认识一些起码的字的学校完全不是人民所需要的学校。因此他反对培尔—兰喀斯特制度。

兰喀斯特学校在规模上缩小了一些,互教制瓦解了,它那种初级大手工工场性质有所改变,但是这种学校的精神仍然存在:它们只是授予人民一点点起码的知识。背诵祈祷文和圣经占去了大部分时间。读书学校在欧洲逐渐确立了。

费林别尔格

费林别尔格是裴斯泰洛齐的同时代人,是瑞士的另一个活动家。他企图通过实践证明,儿童的生产劳动可以与教育结合,并且可以支付儿童的生活费用。如果我们不谈谈费林别尔格的这种想法,那么我们对裴斯泰洛齐的必须把生产劳动作为教育中心这一观点的阐述就是不全面的。

一般说来,费林别尔格和裴斯泰洛齐的观点是完全不一致的。裴斯泰洛齐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费林别尔格是一个贵族,对各种解放运动毫不同情。他是一个大地主,田连阡陌,非常富有。

他与裴斯泰洛齐唯一共同之处,就是他们两人都把教育看作使祖国复兴的工具,看作把祖国“从严重的经济凋敝的困境中”拯救出来的工具。

瑞士优秀的教育史家奥·龚茨凯尔对费林别尔格的计划曾作如是评述:费林别尔格希望:(1)通过建立一系列各种不同的、有机地分开但又彼此密切联系的各阶级居民的学校,来做出(起先在霍夫维尔)一个进行真正的民族教育的范例;(2)借助于建立(通过恰当地摹仿霍夫维尔范例的方法)这种遍于地球各地的“学校国家”,使它们相互间的作用以及与起点的联系有助于逐渐对世界各文明国家的紊乱的社会情况进行根本改造。由于这种逐渐产生的、包罗万象的教育影响,人类社会就可以从自己堕落的深渊里走出来,对劳动的热爱,高尚的习俗和美德将再一次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社会肢体里的每一根动脉里,将流着真诚积极的基督教的血液,一句话,人类将日益接近神造的原形。这样一来,不仅目前就会恢复那种安宁昌盛、人

人满足的景象以及对上帝的信仰,而且,由于消除了各种不满的根源,将来也就根本不会有任何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危险尝试。

完善的霍夫维尔学校的制度是包括需要受教育的各种不同年龄(从幼年起)的儿童。由于给学生提供了相当的活动场所,这种教育就有可能去萌发还未觉醒的精神生活方面的幼芽。在儿童学校之上,还要为年龄比较大的人建立另外一些学校,根据社会的主要阶层而分为三部分,有如三个柱石:

“(1)为下层社会的孩子即穷人的孩子设立的学校,应该是把农业和技术结合起来的工业学校,或者叫做贫民学校;

(2)为中层社会的孩子设立的学校,应该是适合他们的要求的实科学校;

(3)对富豪权贵人家的孩子,应该进行特殊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仅要注意智力发展,而且要注意宗教道德的培养,能在精神上提高他们,并把它与广泛的政治教育联系起来。

把这些纯教育机关联系起来共同环节,就是合理安排的农业;不仅贫民学校的学生为了自己的教育应当在农业上找到主要的活动场所,而且上层社会的孩子也要如此,因为他们熟悉了农业之后,将来就能够以人道的、适合他们高贵身分的方法来对穷人施恩于惠。

所以,除这些学校外,还必须关心建立模范的和实验的农场,并且还要建立必要的农具制造改进工场,对于那些受过普通教育之后愿意专门研究农业的学生,还可以专门设立一种农业学校。所有这些农业教育机关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设立教师讲习班,主要是为了国民学校的教师,这些教师要能理解在霍夫维尔所想达到的目的,能掌握那里采用的活动方法,并能学会摹仿霍夫维尔的良好模样。”(龚茨凯尔:《裴斯泰洛齐和费林别尔格》第27页)

从这一计划中,我们可以看出,费林别尔格的理想是在广阔的领地上建立有等级隔阂的国家。

龚茨凯尔也指出了贫民学校的等级性质。

他说：“费林别尔格的理想是使全人类都受到教育。不过这种教育对于不同阶层的人是各不相同的，它应该适合他们的要求。虽然费林别尔格在个别情况下也非常慷慨地帮助下层社会出身的能干的人脱离他所出身的那一阶层，而让他受到上层社会的教育，——虽然如此，他认为每个人受的教育应该适合他出身的那一阶层的要求才好。”

这样一来，为穷人子弟设立的保育院就成了所有教育机关中。必要的一环，甚至是最必要的一环，但它无论何时都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机关。根据费林别尔格的主张，这种保育院绝不应成为进入其他学校的阶梯。

裴斯泰洛齐的理想也是使全人类都受到教育。这种共同的教育首先是通过根自然的方式，即基本教育来实现的。但是由于这种基本教育是以人的自然特性为根据的，所以它对所有的人都是一致的，不因等级不同有所改变，而是适应每个人的。但是重要的是穷人的教育，因为：第一，他们为数最多；第二，他们没有受过不好的教育，因而是进行普及基本教育试验的最好对象。为穷人（他们深受裴斯泰洛齐的敬重）建立独立的保育院的内在原因就在于此，而且仅仅在于此，——尽管也是由于裴斯泰洛齐本人对贫弱者的同情。裴斯泰洛齐进行这种实际试验的最终目的和出发点并不是专门对穷人的孩子进行教育，而是把它与整个人类（不分阶级）的教育融合在一起，这是在这些为穷人设立的保育院对普通教育任务产生了良好影响并能实现这些任务之后的事情”。（龚茨凯尔；《裴斯泰洛齐和费林别尔格》第40页）

等级教育与裴斯泰洛齐思想中的整个民主体系是完全对立的。

下面这段有关他生活中的插曲很有意思。

裴斯泰洛齐已是垂暮之年了。过去有一段时期，当裴斯泰洛齐的处境非常困难并且强烈地感到自己在实际工作中孤立无援的时候，费林别尔格提议让他在自己的领地霍夫维尔来领导贫民学校。

费林别尔格自己把全部实际工作都担当下来,并且给他一些极有利的条件而让裴斯泰洛齐放手办学。裴斯泰洛齐的朋友告诉他,只好走这条路了。裴斯泰洛齐动摇了,他原本要同意的,但最后却不辞而别。他给费林别尔格写了一封信,说不能与他共事,因为彼此的宗旨不一样。从裴斯泰洛齐生活中的这段插曲可以看出,他一忽儿表现得性格软弱,一忽儿又担心与费林别尔格相处不好,受他约束。其实裴斯泰洛齐不愿与费林别尔格共事的原因是很清楚的:民主主义者裴斯泰洛齐的宗旨与贵族费林别尔格的宗旨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想尽力使大家都自由、平等、友爱;另一个则是想巩固等级划分,通过各种教育来强化。

费林别尔格是一个意志顽强。精力充沛的人,能不屈不挠地为达到既定目的而奋斗。同时他也是一个讲求实际、小心谨慎的人,很懂人情世故,并且善于利用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此外,他也是一位大富翁。

如果说到霍夫维尔的“学校国家”,那他几乎是完全实现了自己既定的计划。这个领地的辽阔的田地是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采用了机器和改良的生产方法。处处精打细算,制度极其严密。农活由雇农担任(在霍夫维尔所在的别恩州,当时破产的农民为数极多,农业无产者的人数很多,他们的生活极其困难),收益巨大。费林别尔格把领导霍夫维尔的农事看作自己的文明天职,看作用具体事例进行宣传的一种手段。他尽量让更多的人了解内情。他在自己的领地上组织了几次农业展览会和庆祝会,他得到过政府委员会的委任状,这说明他领地上的农事搞得很出色。

费林别尔格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学校系统。

霍夫维尔获得了世界声誉。欧洲各地有许多人来参观费林别尔格的“学校国家”。特别引起人们重视的是他的贫民“工业学校”。

在这个学校执教23年(从1810年至1833年)的威尔里,曾在自传中详细地叙述这所学校的发展史。

由于缺乏合适的教员,费林别尔格的“贫民工业学校”长期未能成立。根据他的意见,这个学校的教师应该出身于贫寒之家,能胜任繁重的体力劳动,能像雇农一样,从早到晚和儿童们在田里或工场里干活。这种人应该是没有奢望的人,能安于穷困,不曾结婚,并且信奉神灵,未曾沾染过自由解放的思想。同时他还要能够理解费林别尔格给自己的工业学校提出的种种任务,并能忠心耿耿地去完成这些任务。此外,他还应该是一个热爱科学的人,品德高尚,堪为师表。

年轻的威尔里完全具备这些条件,他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知识、一颗热情慈爱的心以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了培养霍夫维尔工业学校的穷人孩子的教育工作上了。没有他,这个学校是不可能有任何成就的。

裴斯泰洛齐在新庄自己的学校里只主要注意了生产劳动的教育影响,把农业生产放在第二位,而费林别尔格在霍夫维尔却是把农业生产摆在首要地位。儿童的劳动安排得很紧。费林别尔格认为,儿童只有紧张地劳动,并且在学校里一直工作到21岁,这样才能补偿他们自己的全部生活费用。除了星期日之外,儿童每天从早上六点到晚上七、八点要同自己的教师在田里干活,甚至霍夫维尔过节时,孩子们和威尔里也要干活。最常干的活就是除草。大家知道,这种活非常单调,不能使人有所提高,因而使人感到沉重,并且渐渐变得迟钝起来。教师同时还要当监工。一时照顾不到,或者儿童干活时稍一松懈,费林别尔格就指责威尔里,有时非常粗暴。只有晚上或午饭后的休息时间才能学习,一天不过两三个小时。虽然工作如此繁重,但是威尔里和儿童们的伙食却很差,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一点肉。吃饭地点在厨房。穿的衣服是用自织的麻布做的。其生活之艰苦是可想而知的。威尔里曾经几次想离开霍夫维尔(他的工资长期以来都很微薄)。但是精通人情世故的费林别尔格知道怎样控制威尔里。他对威尔里谈起崇高的天职,再给他一点甜头吃吃,于是威尔里就打消了辞意。在干活的时候,威尔里教儿童们算术,给他们讲故

事,同他们一起唱歌,告诉他们动植物的生长情况,教他们几何学。在学习的时候,他们就写字,或者学习一些在干活时绝对不许学习的东西。由于威尔里具有非凡的教育才干,加上自己能埋头苦干,因而在教学上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费林别尔格当着来宾发表演说,借以博取声誉,同时也指出威尔里对工作忠心耿耿所起的作用,并发了若干奖金。

总之,“贫民工业学校”达到了费林别尔格预定的目的,它用儿童的劳动补偿了一切开支。它培养了一批既健康、又有知识的农业工人。当然,这种农业工人只是当时的大资本主义农业所需要的农业工人,而不是裴斯泰洛齐想在自己的学校里培养的那种全面发展的人材。不过这种区别当时很难看到。

随后又出现了一些与霍夫维尔的“贫民工业学校”类似的学校:在马依基尔、布留弗兹荷夫(在苏黎世州),在卡拉什(在日内瓦附近),在格拉罗斯州(林特移民区),在阿平车尔(在特隆郡之舒尔坦),在巴泽尔等地,都建立了这种学校。

这些学校大多数与霍夫维尔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威尔里经常给这些学校的教师一些帮助,提出种种建议。其中有些学校(特别是那里的教师是威尔里的学生的学校)的工作搞得很出色,但总的说来“贫民工业学校”未能普遍推广。这种学校未能推广的原因和裴斯泰洛齐的学校未能推广的原因一样。它需要一种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特殊的农业组织。

* * *

最后,我们想谈谈霍夫维尔“贫民工业学校”的一段有趣的插曲。

教育人的不只是学校,还有生活。霍夫维尔的有钱人家的子弟是绝不到贫民学校来的。贫民学校的学生要除草,他们穿麻布衣服,赤着脚,从早上六点一直干到晚上七点,可是为中层和上层社会设立的学校里的有钱人的子弟,却跑跑跳跳,做游戏,学习……

有一天,工业学校的高年级学生发生了一次暴动。这次暴动不

是为了反对头脑简单的教师威尔里,因为他也和他們一样干着雇农的活,而是反对地主费林别尔格,因为在他們看来,费林别尔格剥削了他們。威尔里认为这次暴动之所以发生,是由于高年级学生受了与他們一起在工场和地里干活的雇农的不良影响。非常明显,雇农们本身的反抗行为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地主和雇农双方利益上的对立。学生们早就有了这种看法,霍夫维尔“学校国家”的整个气氛也使这种看法更加坚定。学生们不可能不感觉到,费林别尔格是把他們当“贱民”看待的。

这次暴动之后,两个学生被撵出了霍夫维尔,而其余的人则根据自己的倡议组织了一个学校共和国,它负责管理农业工作:安排各人的劳动,进行相互之间同志式的监督,主持同志审判会,等等。“工业学校”共和国与大多数学校共和国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人为产生的,而是由生活所要求产生的:学生们认识到必须取消那种侮辱人格的“农事”监督,希望他們的行动得到公平地评价。

过去曾有人打算组织学校共和国(例如马尔丁·布兰泰在1761年就在自己的中学里组织过学校共和国),不过其性质纯粹是教育方面的。例如马尔丁·布兰泰就打算通过模仿罗马共和国的机构而把学生培养成英勇的公民。同时,这也是历史的一种“生动的教育”。

在读书学校里,学校共和国总是具有人为的性质。儿童和青年对各种人为的作法总是感到格格不入,虽然他們很喜欢搞“共和国把戏”,但是很难让他們认识到学校共和国的严肃性质。

在劳动学校里,学校共和国的性质完全不同,它是由劳动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工作需要劳动组织和内在纪律。每个人都必须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衡量力量的最好标准是工作本身,做工作不允许粗枝大叶的作风。很多事情要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办得到。

霍夫维尔学校共和国的目的,正是在学校公社内部正确地组织劳动,并且维护由于劳动的要求而产生的纪律。

费林别尔格对各种“共和国”都不喜欢,但是他知道为了使“工

业学校”得到蓬勃的发展,就需要有这种组织,因此他不仅不反对这一新措施,而且还加以支持。

而威尔里对学生倡导的这一新制度赞不绝口,因为他们使他不再担任那个他非常苦恼的监工职务了。

罗伯特·欧文

大工业在英国的出现,要比在瑞士早得多,到十八世纪末,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发展阶段。那里的儿童往往从五、六岁起主要就不在家里干活,而在工厂工作。妇女的劳动得到了极广泛的利用,而且逐渐代替了男子的劳动。残酷的剥削还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家庭迅速解体了。人民处于一种极端贫困和愚昧无知的境地。自然,当时也有人在考虑如何帮人民摆脱这种困境。罗伯特·欧文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主要思想可以归结如下:“人是环境的产物,贫穷和犯罪是不合理的社会关系的后果,并非人的本性。如果能建立合理的社会关系,就可以消除贫穷和犯罪现象。所以应该促进这种关系的建立。这对所有的人都是有利的,因为现在大家都无一例外地受着目前这种制度的折磨。所有的人都有权过安宁的生活。所以,对于社会说来,重要的是使全体儿童尽可能受到完善的教育,使目前的阶级划分以及阶级统治让位于这样一种组织,这种组织能使社会上的每一个成员都同样能参加社会工作,并且能过一种人过的生活。为了做到这一点,土地就应该成为公有的财产。租金和资本主义剥削应该由建立在同志友爱原则上的生产所代替。社会分为若干“家庭区”(“Home Colonies”),由许多包括500—2,500人的协会组成。它建立在公社的原则上,负责农业和工业生产,防止城乡之间那种极端有害的矛盾;它有自己的自治机构,由代表组成中央管理处,负责调整各区的生产和需求,并与建立在同样原则上的其它单位保持联系。这就是一般情况”(《罗伯特·欧文》第19页)。

把欧文的观点与裴斯泰洛齐的观点加以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他

们两人都发现,现存的境况与人的本性是不符合的。他们两人都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不过裴斯泰洛齐主要注意的是,人是劳动条件的产物,而欧文对问题的提法却比较广泛些:人一般地是社会条件的产物,包括劳动条件在内。因此裴斯泰洛齐认为,帮助人民的方法主要是改变儿童的劳动条件(即用他所理解的教育)。罗伯特·欧文认为,要想帮助人民,只有改变总的社会关系,包括改革教育(他认为教育应该成为社会这所大厦的基础)在内。

由于瑞士的资本主义关系当时还处在萌芽状态,裴斯泰洛齐未能对资本主义剥削作出任何结论。诚然,他了解这种剥削的事实,但是他认为剥削是某些人丧尽天良的结果。至于这种剥削是与一定的生产形式联系在一起,这点他也不怀疑。他认为人分为善人和恶人,分为各种等级的人。人应该善良,不应滥用本阶层的特权。至于社会发展的思想,一种生产方式被另一种所代替的思想,他是一点也没有的。所以他使自己的全部教育理论适应于当时的实际条件。儿童们整天弯着腰为企业主纺线,他还使自己的学校去适应这种儿童劳动的条件,认为它是不可改变的。而罗伯特·欧文由于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比较发达的国家里,所以就能把资本主义剥削的现象加以概括。他谈到资本家阶级,谈到这个阶级的统治。他力图改变当时的条件。他看清了残酷剥削儿童劳动的事实,主张用“工厂法”来限制这种剥削。他想根本改变这种社会关系,拟订了一个建立更美好的社会的计划。

裴斯泰洛齐在新庄的试验是为了说明应该怎样进行教育工作。罗伯特·欧文在纽兰纳克的试验是为了说明应该怎样合理地安排人们的生活。裴斯泰洛齐在自己的作品中曾不止一次地指出,发放工资的新情况对家庭产生了解体作用。但是他只看到了这种解体现象的萌芽。当时,在瑞士占统治地位的主要是家庭形式的资本主义工业。它改变了家庭生活的性质,但并没有彻底破坏这种性质,如像妇女和儿童在工厂里劳动所引起的那样。所以,裴斯泰洛齐只是把家

庭解体看作一种偶然现象,表面现象,而不像欧文那样把它看作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所以裴斯泰洛齐在自己的教育工作中对家庭的作用估计很高。有些人(如阿布拉莫夫,见他写的裴斯泰洛齐传,巴甫连柯夫版)甚至认为,裴斯泰洛齐想用家庭教育来代替社会教育,用母亲的教育来代替国民学校。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首先,当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因为国民学校还非常之少。其次,我们在裴斯泰洛齐的作品里看到了完全相反的现象。在《林哈德与葛笃德》一书中对教育观点进行一般总结的地方曾说:“但是明显的事实不久就使他相信,在人民的农业知识和耕种方法都很落后的情况下,儿童如果留在家里,那么今后每一代都会仍然像现在这样既无能力,又无学识,所以就必须通过设立类似的学校来为他们的教育打下一个基础。他发现了监督、管理以及改进工作的愿望所具有的优点(这些优点在这种学校里表现出来了),并且相信,只有一个民族在其发展和手工艺上取得了显著成效的时候,家庭教育的条件才能赶得上社会教育的优点”。(《林哈德和葛笃德》,第300页)

裴斯泰洛齐始终对当时和未来的家庭寄予很大希望,而罗伯特·欧文由于看到了英国旧的家庭制度正在迅速崩溃,对家庭也就不存任何幻想了。他希望对儿童进行社会教育,而且是从年纪最小的时候开始。

1816年,欧文在纽兰纳克为幼儿创办了第一批托儿所。由于创办了托儿所,母亲们虽然在工厂整天忙于工作,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听天由命了,而是把他们安置在一个适合他们智力和体力发展的良好环境里。设立托儿所完全是时代要求的结果,这从下面的事实中就可看出:起初在英国和苏格兰,后来在法国和荷兰很快都设立了托儿所(这得归功于欧文),尽管宗教界提出了种种理由来反对这一纯洁无辜的机关。不管信仰如何,凡是愿意把孩子送到托儿所来的,欧文都收纳。这就引起了天主教的强烈不满,教皇葛里高里十六咒骂托儿所是违反神意、破坏家庭原则的机关。

欧文不像裴斯泰洛齐那样,幻想儿童的收入可以完全支付他们的全部生活费用。工厂主德里的试验告诉他这种主张完全是幻想。

德里是一个大纺织企业家,是纽兰纳克一个工厂的厂长,他后来成了欧文的女婿。他和当时其他的工厂主一样,也利用儿童的劳动。他从苏格兰的工人之家要了500名儿童,同时提出一个条件,只要6-7岁左右的孩子。

德里非常关心在他工厂干活的孩子。他专门给他们修建了一所房子,供他们吃和穿,还让他们念书。德里毫不吝惜自己的金钱。房间宽敞清洁,通风良好,食物丰富而有营养,衣服干净而简朴。宿舍里还有一个医生。担任教学工作的都是一些名师。但是德里认为,开支应该补偿。所以,儿童必须从早上六点钟一直到晚上七点钟都在机器旁边干活才行;工作完毕后才学习。儿童感到工作非常累,很吃力,因此很多人都跑了。什么东西也没有学到。儿童在智力和体力上都未得到发展,没有什么提高。到18-15岁时,他们的学习结束了,他们必须独立生活,可是他们完全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不了解生活,一无所长。不能一边在机器旁边做工,一边给他们讲历史、教算术,而最主要的,还是儿童的力量不能长期的去从事一种单调的劳动。

当欧文接手管理德里的工厂时,他不用10岁以下的儿童做工。5—10岁的儿童在一所特设的学校里学习,在这种学校里,教学工作要进行得使儿童感到满意、舒适。效果非常之好。

罗伯特·欧文看到工厂工作对儿童有不利的影响,因此就想通过立法来禁止未满一定年龄的儿童到工厂工作。

这当然不是说罗伯特·欧文不同意儿童从事生产劳动。恰恰相反,他完全同意著名的教友派信徒约翰·贝勒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约翰·贝勒斯生活在十七世纪末叶(1654-1725)。在研究国民经济方面的问题时,贝勒斯(马克思称他为一个真正非凡的人物)出于一种人道的愿望,想帮助那些流浪街头的失业贫民。他曾经详细地谈到了怎样帮助失业者的问题。他的《关于建立工业学校以研究目

前工农业各部门的建议书》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提出来的。这种工业学校“应该使富人有利可图,使穷人能过一种丰衣足食的生活,使青年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贝勒斯之所以谈到富人的利益,是由于他认为“富人只有利用别人的劳动才能生活;地主要靠佃户的劳动生活,商人和实业家要靠工人的劳动生活”。只有有收入的企业才能站得住脚。“对于一个生财有道的企业说来,赚一千英镑比花一百英镑做慈善事业要容易”。

贝勒斯的工业学校只收 30 人,它是工业和知识的发源地,它要把农业活动和工业劳动联系在一起来进行,为合理地利用妇女和儿童劳动创造条件。

“起初要注意选择一些熟悉业务的和有经验的工人——他们能成为良好的榜样;其余的成员都是学生”。

“24 岁以内的男子、21 岁以内的女子是‘学生’,满 24 岁或 21 岁后,他们离开学校去结婚。”

工业学校可以招收富人的子女,享受社会教育的福利,但是他们要缴费。

在工业学校里,教学与体力劳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不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学略胜于不学”。“人需要从事体力劳动,就像他需要吃饭一样。人的生命好像是一盏灯,思想就是灯光,体力劳动有如灯油,没有灯油,灯光(思想)就会熄灭”。

在这种学校进行的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相比,有以下六个优点:

(1)在这种学校里,年龄不同、能力不同的人可以从事各种活动,学会使用各种生产工具。

(2)各种语言(和知识)将通过与各民族(工人)代表的交往而学会,工人们将像教自己的子女那样来教青年学习他的本族语。

(3)当成人和孩子看见别的人也遵守规定和法律时,他自己也就比较容易去遵守了。

(4)儿童的成长不与生活和人们脱离,而与人们密切来往。

(5)儿童经常受到成人的照料。

(6)这种学校里有图书馆、研究植物的实验园地以及制药的化验室。

划船等等将成为一种体育训练。总之,学校应该成为一个世界的缩影,把各种有益的生产包括进去。

“男女儿童从四岁或五岁开始,除了学习阅读之外,还要学习编织、纺线等等,年龄比较大的儿童要学习施工手艺等等,到了青年时期,他们将成为一些优秀的工人,这样,即使从事轻便的工作,他们也会用(真理的)生动的论据来发展自己的智力,然而愚蠢的儿童活动却只能使儿童的智力变得愚蠢。”

“手工劳动是有好处的,它使人变得有智慧,可以锻炼意志,保持人的良知”。

“儿童们在工业学校里将要学习各种有益的东西。儿童看见别人如何工作和爱惜时间,他自己也就不会贪玩而去研究某种生产,他们不会感到劳动比游戏难;他看见别人工作,自己也就去摹仿,而这种摹仿能像游戏一样给他带来满足。他们也比成年人容易养成劳动习惯。许多美满的家庭,因为没有劳动习惯而遭受毁灭……。”

由此可见,由于英国工业的发展,贝勒斯在十七世纪末叶就理解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性;他认为这种劳动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把工业学校当作为贫民设立的特殊机构,而把它看作一个示范学校,富人的子弟也可以到这种学校里来分享它的优越性。同样值得注意的,就是贝勒斯的这种学校并非专为儿童设立的学校,在那里,儿童与成人一起学习和工作。实质上,这种学校是一种合理安排的生活,是为儿童表现其积极性提供必要条件的经常劳动。

罗伯特·欧文在他的自传中曾经谈起下面这件事。1817年,佛兰西斯·普兰斯清理自己的图书馆,把一些过时了的用不着的书挑了出来,他无意间找出了贝勒斯写的《关于建立工业学校的建议

书》。他把它递给当时在场的欧文说：“我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瞧，这本书在一百五十年前就提出了您的社会理论”。欧文请普兰斯把书给他，还说他打算把它印几千册来发行，并指出最初奠定这种思想的功劳属于该书作者。欧文又补充说，虽然“我产生这种思想是我观察事实、分析事实并加以研究（因为它可用于日常生活中）的结果”。

罗伯特·欧文认为，阅读和书写不过是获得知识的一种工具。人民所需要知道的东西要多得多。“要么就是让穷人受到合理的和有益的教育，要么就别奚落他们愚昧无知、贫穷不幸，只让他们了解他们深深的不幸。所以——从同情备受苦难的人类出发——，要么就让穷人处于完全愚昧无知的境地（如果您还能做到这一点的话），让他们尽量过一种禽兽般的生活，要么就干脆把他们教育成有智慧的人，成为国家有用的、有生产能力的一员”。（罗伯特·欧文：《人格教育》）

国民公会

卢梭、裴斯泰洛齐、费林别尔格、欧文等人都力图根据切身的经验来说明广泛实施为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的综合技术教育是必要的，也是可以行得通的。

国民公会想通过法律来实行这种教育。

1791年8月5日，制宪会议在宣布保障人权之后，紧接着又宣布实行全体公民的普及公共教育，让每个人免费受到必需的教育。要根据国家行政区域的划分平均设置学校。

但是，制宪会议没有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做任何工作。诚然，塔列兰（他过去是主教，后来成了执政内阁、拿破仑执政、第二帝制时期的有名的大臣）曾在制宪会议上提出了一个详尽周密的国民教育草案。但是他的这一计划谁都感到不满意，因为根据他的主张，教育工作仍然掌握在僧侣手里，不管在教学大纲方面，或在工作的安排上，塔

列兰都未作任何根本的改变。他的草案转交给了立法会议。但是立法会议根本没有讨论塔列兰的草案,它组织了“社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孔多塞提出了一个新的国民教育计划。这个计划在立法会议上未能通过,而转交给了下届的立法会议,即国民公会。

我们顺便提一提立法会议的一个著名的命令。1792年8月26日,立法会议决定授予裴斯泰洛齐以法兰西共和国公民的称号。命令中说:“凡将自己的作品和英勇精神献给人类自由解放事业的人,法国均视其为自己的同胞”。

必须通过相当的教育去培养人民群众进行生产劳动的思想,在国民公会所通过的无数有关国民教育的草案中,像一根红线似的贯穿着。国民公众对国民教育工作非常热情,为它展开了多次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发表了许多正确、深刻的思想,大胆地、广泛地提出了许多问题。国民公会的议员的主张是很好的,但是历次的讨论说明,他们一般说来不太能够解决国民教育中的问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有关人民群众教育的问题是第一次提出来,既无任何经验,又无任何实践。没有任何标准可以判断什么是可以做到的,什么是不能做到的。所以我们发现,国民公会的议员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接二连三地通过了一些前后矛盾的草案。举例来说:

1795年6月13日,国民公会热烈地通过了由罗们斯比尔在国民公会上代读的雷佩尔提的草案。

雷佩尔提主张,不要只在口头上说进行国民教育,而要在实际上使共和国的公民受到这种教育。他问到:“至于说到一无所有的阶级,对他们将采取什么办法呢?你们提议要让穷苦儿童受教育,但是首先要给他们面包。他们的爱好劳动的父亲为了他们而失去了自己的一片面包。其余的部分必须由他们自己去挣来。他们的时间都被劳动占去了,因为他们不劳动就活不下去。难道你们主张,他们在田里工作了一整天之后,又打起精神,到可能离家几公里的学校去休息吗?你们想通过法令强制他们的父亲送孩子进小学,这只不过是妄

想,因为他每天没有自己的孩子(他们从八岁、九岁、十岁就要做些事情维持生活)帮忙就不行。每周去几小时,他还可能当作牺牲而答应下来,多了就不行。由此可见,设立你们主张的那种学校,说老实话,只是对那些不愁吃穿、不知贫困的少数公民有利。他们的子女才能享受教育的果实,而穷人只可能得到一点果皮。”(摘自若列士《法国革命史》)因此,这种学校不能减少而只会增加不平等的现象。所以雷佩尔提主张,“要颁布一条法令,所有5岁至12岁的男孩和5岁至11岁的女孩都没有任何区别和无一例外地一起受教育,由共和国供给经费,并使所有的人能根据平等的法律得到同样的衣服、同样的食品、同样的教育、同样的待遇”(同前书)。儿童将要学习读、写、算,学习“自然道德”和家政。学校要进行手工劳动,儿童要学习种地,必须进行体力劳动。如果校内没有耕地,就让儿童去修路。儿童的教育和生活费用都一律免交。这种费用主要向富人征收,部分开支由儿童劳动挣钱支付。每一个学校应设立家长委员会,对学校的教学工作进行监督。

另一个雅各宾党人圣一优斯特也持有这种见解,他在“共和机构”一书中发挥了这种思想。

雷佩尔提法案的远景是使全体人民的新一代得到公共的劳动教育、有营养的食品和良好的生活条件,这一远景颇使国民公会向往,因此他的法案就被热烈地通过了。

可是过了不久,这个国民公会又通过了布基埃的草案。这个草案是以自由竞争的原则作基础的。草案认为不可创办拥有从属于国家的教师的国立学校。凡是持有政府所发的共和国信任证明书的人都可以任教。不需要任何材料来证明他是否胜任教师工作。优秀的教师自然能吸引绝大多数的学生。国家将个别地为每个学生付钱。布基埃草案的拥护人江衣曾说:“人们想把新一代幽禁于其中的四万个城堡(这里谈的已经不是雷佩尔提的草案,而是指的建立初级学校),是维护专制的最后一点希望并使之死灰复燃的最好工具”。

国民公会通过了布基埃的草案,当然,不久又用新的草案来代替了它。

国民公会想取缔旧的教育制度,让人民都能受到教育的决心是很坚定的,但是怎样能更好地做到这一点,它是不清楚的。

我们不打算把国民公会讨论和通过的草案拿来一一加以研究,——这不是我们的任务。

我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国民公会所接受的各个草案都把准备从事劳动当作国民教育的一个任务。

雷佩尔提在阐述自己的计划时说:“除了力量和健康之外,社会机关应该保证使每人取得的还有另一技能,这就是劳动的习惯。我在这里没有说准备从事某种工业,而是说的一般的劳动能力,担当艰巨工作的勇气,完成这一工作的毅力,达到目的的顽强精神和贯彻始终的决心,这些品质是一个热爱劳动的人所固有的”。(比松:《教育辞典》第387页)

雷佩尔提在谈到共和国设立的教育之家的经费时指出:“儿童的劳动产品可以减少教育之家的开支”。(同上)

在以“热月法规”(共和国二年)著名的洛姆草案中,却主张儿童要学会使用圆规、水准仪、度量衡器具、杠杆、滑车,会测定时间。要常常领他们去参观农活和工场里的工作,在那里,他们要量力参加一些劳动(同前书,第395页)。

国民公会于1794年11月17日通过的拉卡纳尔的草案最接近布基埃的草案,第9节内容是:“要时常把他们(儿童)领到制造日用品的工场去,以便了解其生产过程而使他们多少认识到一些工业的优越性,并唤起他们对有益劳动的兴趣”。

第10节指出:“部分教学时间将用去从事各种有益的、一般的手工劳动”。(同上)

但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国民公会1793年9月15日通过的一个草案。

这个草案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的。

国民公会的议员、化学家加任费拉特茨就是这个草案的鼓吹者。他出版了一本题为《对公共教育的一般看法》的书。他在这本小册子里坚持必须对人民群众进行工业教育。

加任费拉特茨说：“共和国可能组织的最好的典礼，就是组织手工业和职业知识的讲授，这种讲授可以推动民族工业，加强工厂的活动，振兴我国的商业，并且永远消灭专制、倾轧和散播在我们之间的不和的种子”。（同前书，第384—385页）

加任费拉特茨到处宣传这一思想。

1793年7月5日，他和另外几个议员一起，向国民公会递了一份请愿书，吁请立法的议员们必须“研究能够促进民族工业的社会教育形式”。7月10日，加任费拉特茨根据这一请愿书在“手工艺委员会常会”（他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发表演说，告诉它必须在这方面采取若干措施。结果决定出版关于人民必需的教育计划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撰写工作委托给著名的化学家拉瓦锡担任。他所撰写的报告是一项极有意义的作品。现在摘引数段如下：

“手工艺（工业）在儿童本身的器官（即自然的工具）之外，又给他提供了一些新的工具，有了这些工具，他才能取得某些新的成效：使用锤、刀、斧、锯。他利用这些工具，就可以了解制材艺术的初步原理，人们教他学习加工金属品，学会使用铁匠和钳工的各种工具。以农业为基础的各项原则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太复杂的思想。显然，把实践几何学的知识授予儿童也并不比这难。在初等教育的计划中必须列入实验物理学。植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也是适宜于儿童学习的科学”。至于说到阅读和书写，拉瓦锡认为：“它们也是工业（手工艺）的工具，每一个人（不管他是哪个阶层的）都必须会使用这种工具。它是把不同年龄、不同国籍的人联系起来的工具，它是预防偏见的产生和滥用职权现象的产生的工具，它是自由的首要保证。此外，还有各种其他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儿童会书写之前是很难传授给他们的，

如四则运算,它是初等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前书,第987页)。至于地区学校(高等小学 *écol de district*),拉瓦锡认为:“图画是一种可以感觉到的语言,它应该成为立志从事工业活动的人首先要学习的一门课程,全体工人(手工业者)一律要参加这种学习”。“今后工业将分为两大部分:机械生产和化学生产。机械生产需要投入强壮的体力并且必须利用机械工具,在这些教学部门中,教师将教给儿童初等图形几何学的知识,并且从中导出透视、雕刻、建筑艺术的规则;另一方面,为了把机器拆开以便把它分为许多简单的机械工具,教师应该讲授理论力学(它可以计算各种力)和实践力学——‘这门科学还没有,或者至少是在过去没有从教学上简要地讲解过。’化学生产和机械生产不同,它不需要强壮的体力,也不使用机械工具;与化学生产有关的课程开始时应当研究生产过程中所采用的自然机体,然后‘教师可以告诉学生,生产过程中所采用的一些化学上的手段也能像机器一样加以分类和划分为若干部分,所有这些手段分为‘燃烧、焦化、溶解、结晶、分解和发酵。他应该从适用于大多数生产过程的一般原理讲起,最后才讲需要进行专门分析的生产过程’。最后,还有许多综合性的生产,其中既采用机械工具,同时也采用化学过程。教师们可以互相商量一下应该怎样讲授。此外,在这种地区学校里还要讲‘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商业学’等课程。这些课程的教员同时要讲解一般的语法原则并且教自己的学生会‘用文字清楚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地区学校也招收女生’”。(同前书,第988页)

这就是这位伟大的化学家所描绘的可以作为自由的保证的“合乎理性的”教育。

他所拟定的普及教育计划是从那些不得不终身从事体力劳动的广大居民群众的利益出发的。这是这一计划与塔列兰计划截然不同之处。塔列兰的计划是1789年在制宪会议上提出的,其中谈到要教舞蹈和希腊语,但是一点也没有涉及从事工业活动和劳动的问题。

拉瓦锡所拟定的国民教育计划,实际上是说的怎样从童年起就广泛地进行综合技术教育的问题,如何使综合技术教育与工业、与各部门社会科学联系起来的问题。由于加任费拉特茨和拉瓦锡的观点密切涉及群众的利益,他们两人的草案在国民教育上是一致的,它受到了工人阶级的拥护。

巴黎地区的人民决定为此事向国民公会是递请愿书。巴黎公社参加了这次请愿。照章成立的各部也决定支持请愿活动。“人民协会”(sociétés populaires)也持同样态度。集会地点定在雅各宾党人的俱乐部 9 月 15 日上午 10 时在那里隆重地宣读了请愿书,其中说:“我们不希望教育成为长期享有特权的富人阶级的独占财富,我们希望教育成为全体同胞的财产。我们号召所有无财无产的人,我们要帮助他们从他们的地下室里走到人世之间来,从他们暗无天日的阁楼走下来,享受教育的成果”。(同前书,第 391 页)

“旧的学校是培养祭司的小学,我们要求关闭这种学校而设立新的中学(在这种学校里,共和国的青年可以获得各种手工业和生产部门所必需的知识),设立新的专科学校(在这种学校里,他们可以研究各种精密科学和语言的基本原理),设立新的高等学校(在这里,他们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天才)”。(同前书,第 391 页)

请愿书在隆重宣读之后被通过了,以便给国民公会施加压力。

国民公会虽然有很多急事要处理,但是当天仍然接读了请愿书,并且根据请愿书的精神颁布了一项命令。

命令第一条的内容是:在国民公会所设立的小学之外,共和国还将设立三级连贯的学校:第一级学校,传授手工业者和各种工人所必需的知识;第二级学校,传授打算从事另一些社会职业所必需的进一步知识;第三级学校,研究并非每人都能学习的那些课程。

第二条:上述学校课程的设置和讲授应遵照本命令中的指示进行。

第三条:至于说到执行办法,则授权巴黎地区和市政当局与“国民公会国民教育委员会”达成协议,使上述学校在今年 11 月 1 日开

学。而现存的高等学校及神学系、医药系、艺术系和法学系在全国内一律停办。

命令中的第一项指示的标题是：“培养手工业者和各种工人的第二级学校的教育工作”。教学科目中必须包括描写几何学，以便把它实际应用到石头和木材的加工、绘画中的投影、透视、配景、简单的和主要的机器的几何绘图上去；还必须包括物理学和化学（通过实验学习）；了解简单的机器。每一个学校必须有两个教员：一个教制图，另一个教物理。

第二项和第三项指示几乎全是抄录孔多塞主持下的第一届社会教育委员会所拟定的草案。

国民公会的一个名叫库培的议员第二天要求重新审查已通过的命令，理由是通过这项命令时很多议员都不在场。

这项已经通过的命令遭到了同国民公会通过的大多数有关国民教育的命令同样的命运，这一命令未能实现。

但是加任费拉特茨的演说，拉瓦锡的小册子，9月15日的请愿书以及同日由国民公会通过的命令，都说明当时的民主人士中有很多人已经认识到必须对工人进行广泛的教育，这种教育一方面要与劳动紧密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也要与精确科学的材料紧密联系起来。

在共和国三年（公元1794年）的宪法（由国民公会制定的）中也反映了把体力劳动看作每个公民的义务的观点。这个宪法的第16条的内容是：“凡是不会读书写字，不了解某种体力职业的年轻人，不能算作公民。农业劳动是属于体力职业之列的。这项规定从共和国建国十二周年起生效”。

下面就是比松编的《教育辞典冲》中“手工劳动”词条的作者就这一问题发表的看法：

“无论如何，即使法国革命大胆地确立了这一原则（每人必须从事体力劳动），它也无法贯彻执行。不能只是从政治的变化（它使政权由理论家的手里落到阴谋家和统帅们的手里）中去寻求这种原

因 这个原因很深远。要想使全体人都参加体力劳动 ,只有在这样一种社会里才有可能 ;在这种社会里 ,一方面 ,非常完善的劳动工具可以使教育变为了解若干一般原则 ;另一方面 ,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要服从科学要求 ,并要建立在协作的原则上。由此可见 ,革命所确定的每人必须从事体力劳动的规定是完全不适合目前法国这种社会制度的。根据这种见解而拟定的教育大纲 ,一般说来 ,只能在同时产生的经济发展过程终止之后才能行得通”。(“ Travail manuel ” ,diét. Buisson ,第 1206 页)(比松编《教育辞典》:“手工劳动” ,第 1206 页)

工人阶级对生产劳动在国民教育 工作中的作用的见解

贝勒斯、卢梭、裴斯泰洛齐、欧文、拉瓦锡对生产劳动在国民教育工作中的作用的见解的直接继承者是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从这些见解中吸取了一切健康的、重要的东西 ,并且把它加以发展和补充。但是工人阶级的主要功绩还在于他指出了这些见解与工业发展要求的密切联系 ,指出了这种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教育与儿童的全面生产劳动的必要结合 ,以及这种结合将为消除社会上目前还存在的劳动分工做好准备工作。

马克思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极其全面的研究。同马克思持有同样观点的还有恩格斯。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机器和大工业》这一章里 ,都描绘了儿童劳动在家庭工业和工厂中受剥削的可怕情况。这些描绘使人完全打消了这一劳动对儿童有良好效果的幻想。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 :“议会童工调查委员会早在 1840 年就已经成立了。该委员会 1842 年的报告 ,用纳·威·西尼耳的话来说 ,

‘对资本家和父母的贪婪、自私和残酷，对儿童和少年的困苦、堕落和遭受摧残，展示出一幅从未见过的极为可怕的图景……这份报告 1842 年二十年来竟无人过问，在这期间，当年的儿童已长大成人，他们对我们称为道德的东西，对学校教育、宗教和自然的家庭之爱毫无所知，但我们竟然又让这些儿童成了现在这一代孩子的父母’。

委员会要求通过立法来调整儿童在工厂的劳动。委员会在报告里写道：法律“会保护正在发育的一代，使他们免于在幼年从事毁坏体质和引起早衰的过度紧张的劳动；最后，它还会为至少 13 岁以下的儿童提供接受初等教育的机会，从而结束那种难以置信的愚昧无知状态，这种状态在委员会的报告里曾得到如实的描写，使人看了不能不十分痛心，深感民族受到了侮辱。”

马克思说：“把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就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这和自然的无知完全不同，后者把智力闲置起来，并没有损害它的发展能力、它的自然肥力，——这种智力的荒废甚至使英国议会最后不得不宣布，在一切受工厂法约束的工业中，受初等教育是‘在生产上’使用 14 岁以下儿童的法定条件。”

尽管工厂法的教育条款整个说来是不足道的，但还是把初等教育宣布为劳动的强制性条件。这一条款的成就第一次证明了智育和体育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可能性，从而也证明了体力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可能性。工厂视察员从教师的证词中就发现：虽然工厂儿童上课的时间要比正规的日校学生少一半，但学到的东西一样多，而且往往更多。

‘道理很简单。他们只是半天在学校里，所以总是精力充沛，几乎随时都适于并愿意学功课。半工半读的制度使得两种活动互为休息和调剂，因此，对儿童来说，这种制度比不间断地从事其中一种活动要合适得多。一个从清晨就坐在学校里的儿童，特别在暑天，不可能同一个从劳动中来的活泼愉快的儿童相比。’

“关于这一点，从西尼耳于 1863 年在爱丁堡举行的社会学家大

会的演说中也可以找到进一步的例证。他在这篇演说中还指出,上层阶级和中间阶级的孩子们的片面的、不生产的和漫长的学习日,只是白白地增加教师的劳动;同时,不仅无益地并且是绝对有害地浪费着儿童的时间、健康和精力。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定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不过马克思和欧文一样,对家庭在教育中的良好作用并未寄予任何希望。

“但是事实的力量终于迫使人们承认,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不得不为儿童的权利来呼吁了。1866年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最后报告说:

‘不幸的是,所有的证词都表明:男、女儿童在自己的父母面前比在任何别人面前都更需要保护。’对一般儿童劳动,特别是对家庭劳动进行无限度剥削的制度之所以能维持,是由于父母对自己的年幼顺从的儿女滥用权力,任意虐待,而不受任何约束或监督……父母不应当享有为每周取得一点工资而把自己的孩子变成单纯机器的权力……儿童和少年有权为防止父母权力的滥用而取得立法方面的保护,这种滥用会过早地毁坏他们的体力,并且使他们道德堕落,智力衰退’。

“然而,不是父母权力的滥用造成了资本对未成熟劳动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剥削,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通过消灭与父母权力相适应的经济基础,造成了父母权力的滥用。不论旧家庭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解体表现得多么可怕和可厌,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

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当然,把基督教日耳曼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就像古罗马家庭形式、古希腊家庭形式和东方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一样,都是荒谬的,这些形式依次构成一个历史的发展序列。同样很明白,由各种年龄的男女组成的结合工人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那种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

于是,马克思通过对儿童劳动的资本主义吓人的剥削以及旧家庭形态被破坏现象的分析,实际上已经把吸引儿童(以及妇女)参加社会生产看作一种进步的现象,这种现象将促进高级家庭形态的建立,并且成为人的个性发展的源泉。

正如机器是进步的要素一样(尽管机器的使用给工人阶级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同样的,儿童劳动也是一个进步的事实(尽管资本主义式的利用儿童劳动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应该与之进行斗争的,不是吸引儿童参加生产劳动这件事,而是对这一劳动进行的资本主义剥削。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另一个地方,即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就非常明确地谈到了。马克思在“禁止童工”这一条内说:“这里绝对必须指出年龄界限”。

普遍禁止童工是和大工业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这是空洞的虔诚的愿望。

实行这一措施,——如果可能的话——是反动的,因为在按照各种年龄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早在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他们杰出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中表述了这一思想。根据宣言的这两位作者的意见,无产阶级在夺得了政权之后,就应该立即采取许多旨在改善社会福利的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

“对一切儿童实行社会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工厂童工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宣言中谈到:“也许你们责备我们,说我们要消灭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吧?我们承认这种罪状。

但是,你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

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是由……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教育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

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愈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愈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简单的买卖对象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愈是令人作呕。”

又说:“正如消灭阶级的所有制在资产者看来是消灭生产本身一样,消灭阶级的教育在他们看来就等于消灭一切教育。

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罢了”。

马克思把必须根据上述方针(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改变现代教育与必须消灭社会上现存的劳动分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生产者的活动是形形色色的。

在手工业和手工工场成了主要生产形态的时期,个别的生产部门还没有独立分化出来。生产者的活动形式比较单纯,都已专门化了。每一种手工业根据多年的经验形成了一套适合本行特点的技术形态,改进很缓慢,世代相传,没有什么大变化。生产分化为个别的、独立的部门,就引起并且巩固了社会上的劳动分工。一直到十八世纪,手工业还被称为秘诀。这一名称说明,一个未得真传的人想探究手工业的秘密是多么困难;同时也说明个别生产部门之间存在着许

多深的隔阂。大工业打破了这种隔阂。大规模的生产为了尽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尽量在作坊内进行分工,把每一生产过程分为若干组成部分。要完成个别生产部分的工作,已经不需要专门的职业训练。生产过程分为若干组成部分就使科学的工艺学的创造成为可能。科学的工艺学对生产的全部过程都运用科学的材料,从而使这些过程统一起来,并且经常改变其形式。

“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

由此可见,大工业本身的性质要求全面发展的工人,这种工人要具有全面的劳动能力,受过综合技术训练,能操作任何一种机器,懂得各种劳动过程。

同时,旧的劳动分工在社会上还继续存在。工人往往只是去完成某一细小的工作。这对他们的影响极其重大。大工业中常有的生产过程的不断变化,使工人每分钟都受着失业的威胁。旧的机器被新的机器替换之后,只会从事某一细小工作的工人就不合用了,于是他们就流浪街头,补充到失业大军的队伍里去了。对于工人来说,如果他没有全面的工作能力、没有受过综合技术训练,不能从事任何一项工作,那末他就要受到饥饿和贫困的威胁,而对社会来说,这又是无上境的,无意义的浪费人力……

“……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

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工艺学校和农业学校是这种变革过程在大工业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一个要素；职业学校是另一个要素，在这种学校里，工人的子女受到一些有关工艺和各种生产工具的实际操作的教育。如果说，工厂法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那末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表述的这一思想，在他为第一国际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于1866年在日内瓦举行）所写的决议中也有了发展。当时第一国际是年轻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的组织中心和智慧中心，对工人运动中一般问题的兴趣非常浓厚。“关于妇女和儿童的劳动”这一条在那次日内瓦会议的讨论中占了很大的位置。这个看来纯粹是经济方面的问题涉及的面非常广泛，它与新一代的教育问题有联系，因而它既成了猛烈抨击当时教育制度的根据，又成了阐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缘由。会上通过了马克思草拟的决议。这一决议的内容如下：

“我们认为，现代工业吸引男女儿童和少年来参加伟大的社会生产事业，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和合乎规律的趋势，虽然在资本主

^① 马克思在这一段注解上说：

“政治经济学史上一个真正非凡的人物约翰·贝勒斯，早在十七世纪末就非常清楚地懂得，必须结束现行的教育和分工，因为这种教育和分工按照相反的方向在社会的两极上造成一端肥胖，一端枯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5页）——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注

义制度下它是畸形的。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每个儿童从9岁起都应当像每个有劳动能力的成人那样成为生产工作者,应当服从普遍的自然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为了吃饭,他必须劳动,不仅用脑劳动,而且用双手劳动。”

……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说,如果不把儿童和少年的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那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父母和企业主使用这种劳动。

我们把教育理解为以下三件事:

第一:智育。

第二:体育,即体育学校和军事训练所教授的那种东西。

第三:技术教育,这种教育要使儿童和少年了解生产各个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各种生产的最简单的工具的技能。

对儿童和少年工人应当按不同的年龄循序渐进地授以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课程。技术学校的部分开支应当靠出售这些学校的产品来补偿。

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就会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贵族和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

读书学校及其巩固的原因

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轰动一时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很快就被人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仅仅到了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人们才重新谈起这一问题。

那时,学校成了读书学校的同义词。在这种学校里,学生们规规矩矩地坐在书桌跟前,听教员在讲台上讲课。除了书本的知识(这种知识与实际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之外,这种学校里什么也不讲,学生的个性备受摧残,并且由于严格的外表纪律而使他们变成了一部机器,无休止地接受传授给他们的知识。

有关读书学校的问题已经写了很多文章,这种学校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所以这里也就没有必要来详细论述其缺点了。

本书作者曾于1908年访问了日内瓦的一所模范国民学校。这所学校的校舍富丽堂皇,拥有宽敞的教室和礼堂,四壁挂有《红帽子》一书中的图画,校内各处都很清洁,还有浴室和体育馆。这是一所八年制学校,此外还有为幼童设的两个预备班,教科书都是用精美的纸张印刷的,附有插图,男女教师都是本门业务的能手。他们擅长绘画,讲话声音洪亮清楚。每一课书全班学生都合乎要求地准备得很好,并且学得很透。作者在四天的时间内听了各种各样的课,拜访了各个教师。这所模范学校给我留下了一种沉重压抑的印象。尽管学校的外表很好,它仍然是一所典型的读书学校。教学的机械性使人吃惊,使人受到压抑。教师通过一些巧妙的问题和无休止的复习,使全班学生把所读过的东西逐字逐句复习一遍,然而这种全班的集体死记不过是最普通的训练而已。最使人触目惊心的就是学生的个性受到非常厉害的压抑,以致不能把班上能力较强、水平较高的学生和能力较差、天资较笨的学生区别开来。不同之点只是回答得是否及时。没有一个问题是要学生动脑筋思考的,没有一点生动的思想。此外还有纪律,压抑人的纪律。某些教师把整个一堂课都变成了一种同学生进行的无休止的战斗,侮辱,斥责,赶出教室。当然,并非瑞士所有的学校,甚至并非日内瓦所有的学校都和作者所见到的这所模范学校一样。但是这所学校的设备如此之好,并且专门供外人参观,好让参观者由此了解到日内瓦教育工作的斐然成就,其作法尚且如此,那末这一事实也就说明上述情况并非可悲的例外,而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了。

当然,瑞士在这方面还并不是欧洲家庭的一个丑儿。不是的,日内瓦的学校只不过是一个十分典型的读书学校而已。

教学是机械的,但整个学校机构还要机械。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教育工作是高度集中的。上级组织制定教学大纲,分配教学时数,确定教学方法。比如说,法国人对于全国各国民学校一定的班级小学

生在一天的其一小时都在听写同一个内容一事,感到非常骄傲。这种机械做法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让那些想象力丰富的人去想象吧。教师的个性受这一制度的压抑程度并不次于学生,于是整个学校机构就好似一个庞大的工厂或作坊。

这个好似工厂的学校机构的工作情况,在罗歇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布鲁塞尔博览会上的初等教育》,载1910年9月号的《教育评论》)中谈得很生动。罗歇在谈到比利时这一部分时说,根据比利时国民教育部大臣的意见,1910年的博览会应该用图例说明,并遵照统一规定的教学大纲来把根据某一原因必须授予学生的思想加以宣传。这一思想应像一根红线似的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应在各个年级(从幼儿园开始到成人学习班)的课堂上得到发挥。

布鲁塞尔博览会具体表明了比利时教育大臣的这一意见是如何付诸实践的。为了发展殖民生活,教育部向教师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培养儿童对旅游的兴趣、探险的爱好,发扬他们的独立进取精神。教师们随即采取措施,纷纷修改了自己的教案。他们在每一次讲课时都加进去一些事例,以便实现教育部提出的口号,使这一口号变为学生的实际行动。同时还采取相应的办法改变了听写的内容。布鲁塞尔博览会上展出了教师的大量教案,它们充分显示了比利时教师雷厉风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当然,会上没有展示也不可能展示这种教学的效果。这样就无从判断:由于修改教案,学生的独立进取精神究竟有多大的发扬。而只有这种效果才能证明这种工厂生产式的机械教学所取得的成效。

罗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人,他对法国教育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中央集权的做法习以为常,因而对比利时教育界这种明快的工作作风大为赞赏,对比利时教师的工作态度倍感钦佩。

但是,读书学校也产生了非常可悲的后果。关于这个问题,瑞士民族会议的议员谢克里在他所著的《未来的学校》一书中谈得极其精辟透彻。

谢克里是文捷尔吐尔中等技术学校的教师,他亲眼见到过数百个在国民学校毕业的学生。他根据亲身的观察,确认在学校里念过八、九年书、在所谓高级国民学校(Sekundarschule)毕业的学生,竟然令人惊奇的一点也不会简明扼要地表达最简单的思想,毫无观察能力,也不会独立思考。这一缺点在学习自然科学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学生们不能根据最简单的实验得出结论,不理解实验的不同阶段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能找出并且确定有关现象的规律。

谢克里对于现代学校的缺点在实际生活中有何反映这一问题很感兴趣,他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访问了农民、工人和商人等等。根据这些调查,他说:“年轻人离开学校到工厂或作坊去之后,连最简单的工具都不会使用,只好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去从头学习每一种最简单的操作方法。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因为儿童如果能注意观察成人的行动,摹仿他们的动作,就能很容易地学会任何一种操作方法。”

“在办公地点说的话和在工厂与作坊说的话是一样的。年轻人往往连一封最简单的信也不会写。诚然,他们能够机械地根据某一公式计算,但要他们动脑筋思考就做不到。在农村里,曾在城里学习过的青年成了农民抱怨的对象:他们甚至不会使用任何一种劳动工具,更不用说干什么活儿了”。

“这还是在裴斯泰洛齐的国家里呢!”——作者不禁大为感慨。

弗里布尔格中等技术学校的校长列昂·惹奴他他所著的《职业教育(Enseignement professionnel)》一书中也指出了他访问学校后所得到的同样印象:

“小学的标准级学大纲偏离了教育目的。这个大纲过于理论化和抽象,于是青年显然就失去了对手工劳动和体力活动的爱好”。(第408页)

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学校教育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同样情况。教育工作没有根据裴斯泰洛齐、欧文、拉瓦锡、加任费拉特茨以及

其他一些人所指出的道路前进,而是沿着机械地教学生读、写和其他一些基本知识的贝尔-兰喀斯特制度的道路走下去,其原因何在呢?

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十九世纪欧洲各国所处的时期是工业发展时期,科学的工艺学使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不过,最初机器只是把人的劳动简化到去完成一些不复杂的操作,使每个人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它,那时机器还没有把人的劳动淘汰掉,只不过把工人由独立的工作者变成了机器的附属品。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工业的技术对具有技能的劳动的需要已缩小(手工业者的劳动就是这种劳动),而对普通的、没有技能的劳动的需要却增加了。当时需要的不是能干的、理解整个劳动过程并且具有独立主动精神的工人,需要的是绝对顺从的、没有受过教育的粗工,对于这种工人,既不要求他有特殊的体力,也不要求他机智灵敏,不要求他有手艺,只要求他能遵守时间,克己自制、有耐心和能吃苦耐劳。

读书学校所培养的正是这种工人,既严守时间,又绝对顺从。处于欧洲十九世纪所经历的那一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这种学校,与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并无矛盾,尽管与工人的利益是矛盾的。但是当时的工人的组织还很不健全,力量还非常薄弱,所以不能给自己创立一个他们所需要的学校,而且他们的斗争当时在这方面还不尖锐。

作为时代标志的学徒制的瓦解

读书学校没有发展儿童的一般劳动能力,而学生在校外就更难获得作为从事一个有技能的工人的复杂劳动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

从前,一般的劳动技巧是由家庭传授的。家庭生活与广泛多样的劳动活动保持着联系,儿童从小就观察家里的人所做的工作,而且自己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与这一工作。现在,家庭生活的性质和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工作不是在家里进行的,父亲到什么作坊或工厂去工作,一去就是一整天,有时母亲也外出工作。

从前,大部分儿童是在自己父亲作坊里学习父亲的手艺,并且由父亲言传身教。如果一个少年想学习另外一种手艺,那末他就要到师傅那里去学习,好像成了师傅家里的一员。行会只注意师傅教徒弟是否正确无误,并且一般地去调整师徒之间的关系。

现在,一切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厂里招收进来的都是一些什么也不会做的少年。这些少年在工厂或作坊里用很短的时间学习要他去从事的某种不复杂的劳动:用机器装订,把断了的线接上,等等。学习这种简单的操作法不能叫做职业教育,而且一般地也不能叫做劳动活动的训练,因为这种机械的工作不能培养一般的工作能力,而且也不能使少年儿童受到任何专门训练。这样一来,儿童可以不必事先受教育就能赚钱谋生,因此大多数做父母的人都热衷此道,尽管这对家庭的收入增加得并不多。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做三四年学徒来学习某种职业的,只是一小部分家境较好的工人。

而且拜师学艺的性质本身也有了改变。手工业的情况改变了,不太稳定了。手工业者因为和大工业竞争而陷于窘境,于是就不得不延长工作日,整天忙碌,疲于奔命,而且还要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他们有时所以还能招架得住大工业的竞争,那也仅仅是依靠剥削学徒的劳动,强使学徒从事某种纯粹机械性的工作(这种工作与工厂的工作没有什么区别)或者把他们当杂工使唤,从事家庭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学徒们学不到什么东西。

在很多生产部门,手工业的性质也改变了。手工业者所制造的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東西,而只是其中的某一部分,或者只是从事收集,或把用机器做好的各个部件进行最后的加工。工作变得死板得多了,其性质已经接近作坊的工作了。

这样一来,职业教育的范围就大大缩小了,更加专门化了。但是即使没有这些缺点,拜师学艺最多也不过是准备将来在小作坊工作而已。何况手工业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小。大多数学徒以后都要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在工厂里去工作,而在手工业者作坊里做的工

作对于到大工厂去工作所做的准备是很有限的。

从前,学得一门手艺就可以保证学徒将来不愁没有饭吃。现在,受过教育的工人的地位同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的境况一样不稳定。新机器的发明和新的工作方法的使用等等,可以使整个一行职业成为不必要的,而花了很多年时间去受某门职业训练的工人,就不得不去寻找另一种他完全不熟悉的职业了。

科恩基在他所写的《学徒》一文中说:“学徒的危机成了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事实。”

“……调查(这里指的是1902年法国‘最高劳动会议常委会’和‘劳动管理处’同时进行的调查)表明了学徒制的瓦解以及作为这种瓦解的证明的学徒职业训练水平的降低是实际情况。在某些工业部门已经没有学徒了:工人一般的都是从临时工的队伍里征集来的。另一方面,即使在那些还有学徒的工业部门里,他们也不是真正的学徒了,也就是说,不是那种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全面充分的职业训练的学徒了”。

“……促使学徒制瓦解的许多原因是大家都知道的。儿童及其父母想迅速获得工资的愿望,使师傅不能再教学徒的那种大工业的发展,机械化,工作的专门化(它把工作分成许多个别的任务,分成许多动作,这些动作非常简单,只须用几星期的时间就可以学会操作机器,从事能使他获得工资的一部分手艺)——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就必然会引起学徒制的进步性的丧失和瓦解。学徒制在许许多多行业的消失目前已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学徒制的瓦解是工人技术训练水平降低的表现,由于这个原因,整个工人的前途都将恶化”。

拉法格在《大百科全书(Grande Encyclopédie)》中说:

“目前,学徒制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家庭性质,并且几乎完全失去了它的有益的方面。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学徒还在‘学习’。如果学徒不是工具的必然后备和机器的附属品,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当作杂工使用”。

技术的进步。技术方面的新趋势

读书学校和学徒制的瓦解都在一个方面发生了影响——降低了工人的一般劳动能力和一般技术训练水平。

这种情况要继续下去,直到工业上需要大量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受过技术劳动训练的工人时为止。但是近来技术产生了巨大的成效。而技术的进步又反映在对劳动力的需要的性质上。在采用了最完善的机器、使用最完善的生产过程的那些工业部门,对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的需要量就少些,而对受过综合技术训练的、具有独立主动精神的工人的需要量就大些。关于工业发展中的这一新的趋势,奥托·卡敏尔在他所写的一本很有意思的著作中曾详细地谈到过(见他所著的《试论技术成就对生产之影响》):“在十九世纪头五十年,机器在技术上还不够完善,往往要人从事很多手工劳动。十九世纪后五十年,机器就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发展:不仅力图使机器的主要动作成为独立的(不需要手工劳动),而且还要使附加的、辅助性的动作成为独立的,因为至今还有许多辅助性的手工劳动。”(第413页)

在提高工资和罢工的压力之下,“近十年来(卡敏尔的著作出版于1910年),机器制造工业发展的特点就是全力制造那种只需要为数不多的、但是有知识的、工资高的劳动力去操纵的机器”。(第413—415页)

卡敏尔指出了许多已经实现了这一过程的生产部门(主要是重工业方面的),同时引证了每一个生产部门具体的材料,来说明采用了某一机器之后对有知识的工人的需要量增加了多少,对辅助工人的需要量减少了多少。

许多工业部门还未被这一趋势所波及,过程虽然刚刚开始,但是,毫无疑问,它已经开始了。

“技术发展的结果总是使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被淘汰。这

种发展过程提出了机器技术的一个基本思想：不是把人力当作肉体机器来使用，而是当作有思想的生物。实现这一思想的主要手段是“电力配备”。（同前书，第424页）

“熟悉最新的机器技术发展情况，就得承认最近所取得的成就的最本质的特点，是在电力配备的情况下，尽量把机器加以改进，使它不仅能够完成自己最基本的任务——加速运动或运转工具，而且本身还能完成力所能及的和辅助的运动。因而，发展情形并不表现在通常所认为的吸引越来越多的工人从事机器工作这件事情上。其实恰好相反，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一天天地从工业部门被排挤出来，他们的位置为少数更有能力的工人所占据，这些工人掌握了必要的知识并且受过专门的教育，而这又是了解完善的机器并且正确操纵这些机器所必不可少的”。

“如果说最初在某一部门多余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由于生产的扩大还可能在另一工业部门找到工作的话，那末将来接受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的岗位会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对受过教育的工人的需要是经常不断的，而且这种需要量还将增加。所以，将来培养有技能的工人就比预防衰老病死有更重大的意义，因为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就像一个病人一样没有多大用处。国家如果不用这种或那种方法去关心新一代接受专门训练，将来就会陷于这样一种狼狈的处境，这种狼狈处境就像是派遣装有土炮的木船去跟拥有速射武器的铁甲主力舰作战一样”。（同前书，第425页）

增加有知识的、受过技术教育的工人的这种要求，在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尤其是在那些近来在技术上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国家里，如北美和德国这些最近的例子，表现得非常明显。

最近，政府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来培养具有广泛技术能力的工人干部。

军国主义化的要求也推动着政府这样去做。

巴·尼·米留柯夫在他所著的《武装的世界和军备限制》一书

中就是这样描绘现代战争的：“战争是工业的、资本主义的企业”。（第 16 页）“军事技术需要有很多贵重的设备，这些设备经常由于新的发明的出现而改变”。（第 17 页）

“战争本身是从属于这一总的改变过程的。目前，军队的领导人、武器发明人和军火制造商主宰着与普通的知识职业稍有不同的生活。战争的胜利不是取决于武士的品德，而是取决于计算的精确性和科学性，取决于多年来事先进行的辛勤努力。这样一来，战争就失去了从前那种吸引人的浪漫性而成了一种最现实的职业”。（第 159 页）

世界大战非常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真理。这次大战表明，技术、完善的武器、工业组织、为数众多的受过良好训练的技术人员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一般说来，工业上特别是军事上对受过全面训练的、具有知识的工人的需求，使得各资本主义国家对技术教育的组织特别重视，并因此对改组整个国民教育工作（把读书学校变为劳动学校）非常重视。

职业教育及其发展 职业教育性质的改变

学徒制的瓦解对于许多工业部门（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全部卷入大工业而带有半手工业、半手工业性质的工业部门）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例如法国 1902 年进行的调查，就用文件具体地说明了学徒制的瓦解对一系列的生产部门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学徒制过去在法国起着重大的作用，因为法国之所以能在世界市场上取得胜利，主要是依靠产品的精美和艺术加工。

这种现象在其它各国也有。为了扶持民族工业，政府和私人开始设置许多工业学校和手工业学校，授予学生职业教育（从前学生是在手工业者作坊受到这种教育的）。这些学校的目的往往直接就是扶持小生产。

例如奥地利在十九世纪 40 年代曾经组织了“民族工业者联盟”。这个联盟在 1847 年曾把学校里学生的作品拿来举行了第一次展览会。这次展览会的章程说：“每一个想使自己的前途有所依托的年轻人，都应该利用自己的学徒时期去踏踏实实地学习手工业，这样才能在小生产进行的斗争中站稳脚跟，并在手工业和机器工业之间、民族工业和外国工业之间的竞争中保持自己的地位，——这一斗争今后将日益残酷”。（惹奴著：《职业教育(L'enseignement professionnel)》，1901 年第 12 页）

手工业型的职业学校遭到了独立的手工业者的反对，有时还遭到受过专门训练的临时工人的反对。他们把职业学校的学生看作未来的竞争者。有时，手工业者甚至想关闭职业学校，比如说，里昂的布德尔钟表职业学校就曾碰到过这种事情；凡是关闭学校不可能的地方，就不让职业学校出卖学生的劳动产品。在法国，这一传统已牢固地固定下来；甚至于职业学校学生所做的新产品，不管质量怎样好，或者是全被毁坏，或者是成年累月地堆放在地下室里，听其坏损。在瑞士，职业学校出售学生的产品，但是售价很高，以免和独立的手工业者竞争。职工联合会对职业学校也抱否定态度，并且千方百计地反对设立这种学校。他们一般都力图限制学习手艺的门路，以便减少受过教育的工人对劳动力的供给，并且严格控制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人数。我们发现，美国的工会联合会对当时美国设立的商业学校(Trade Schools)也抱着同样的否定态度。

但是，适应生产要求而建立起来的职业学校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性质。它们不再是单纯地向手工艺匠学习的场所了。由于线图、造型、机械以及其它理论课程进行得很好，从而使教学提到了很高的水平。学生在学校所学的东西，是在小作坊里向手工艺匠学不到的。美国的实业学校(Industrial Schools)、法国的市立职业学校和民族职业学校以及德国、奥地利、瑞士的许多专业学校都属于这种类型。

拉法格在《大百科全书(Grande Encyclopédie)》一书中曾经谈到

这种类型的职业学校，“在手艺匠领导下的作坊的学徒制被职业学校所代替，这种学校的数量日益增加，校内设有奖学金、助学金，并且为了学习的目的组织优秀的学生到各工业城市去旅行。这样一来，有一段时间受同业工会监督，随后又由私人管辖的学徒制，现在就失去了它的私人性质而力求变为社会机关，在一些得到社会当局直接公认的教师和教授领导下进行活动”。

这种职业学校所培养的已经不是独立的手艺匠，而是从事大生产的“受过教育的”工人、技师、监工、助理工程师等等。

但是这种职业学校还远远不够理想。这种学校多半脱离生产，这使它们打上了一定的烙印。在这种学校里，因循守旧之风往往很浓。例如法国很多职业学校至今使用的机器还只是法国出产的，而法国有关的工业部门早已使用德国和美国出产的比较完善的机器了。

大多数职业学校都设有作坊，但是这些作坊的设备往往不好。美国的实业学校虽然例外，但它们也未能利用一切新的技术成果。有些国家（如奥地利、瑞士、英国）的技术博物馆在这方面常常给些帮助，但是做得不够。

工人都很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新型的职业学校里去。当然，能够这样做的只是一些收入较多的工人，因为他们可以在几年当中需要子女赚钱养活他们，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新型职业学校里去的还有小资产阶级。

日前，由于工业上非常不需要在职业学校毕业的受过技术训练的工人，工厂主对这种工人就非常重视。他们不仅付给这种工人优厚的工资，不仅使他们享受特权，而且，还通过参与分得利润以及其他一些方法来使这种工人的利益同工业企业的利益联系起来。这样一来，这种工人大多数都养成一种资产阶级心理。他们的利益往往与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相矛盾。他们是一群工人贵族，在很多方面颇与参加职工联合会的英国工人贵族相似。这一群受过技术训练、具有技术能力的工人在德国、瑞士、奥地利约占全体工厂工人的四分

之一,在法国为数稍少。现代的工人贵族在很多方面不同于旧的工联主义。旧的工联主义多少是一个闭塞的组织,它一方面既与资本家有矛盾;另一方面又与其他的工人群众有矛盾,可是现代的工人贵族既不与前者有矛盾,又不与后者有矛盾。在组织上,它属于一般的工人组织;在思想上,它从不把工人阶级的利益跟资本家的利益分开。工人贵族的代表人物由于自己的知识稍为丰富一些,由于多受到一些教育,由于一般的具有比较优越的条件,因此他们往往是工人组织的领导人物和负责人,于是他们就把自己所特有的妥协精神和机会主义的精神带到这些组织里来了。战争极其生动地揭露了这一现象,例如,德国工会联合会的领袖就完全同资本家一个鼻孔出气了。分而治之是资产阶级的拿手好戏。

从工人阶级的利益来看,产生一群特殊的工人贵族当然是不好的现象,工人阶级希望提高整个工人阶级的一般技术教育水平,而不是工人阶级中部分人的一般技术教育水平。

最近十年来,资本家对受过教育的工人的需要量大大增加,尤其是那些在经济上发展得很迅速的国家(如德国),资产阶级和政府当局也都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来提高整个工人阶级的技术水平。在这方面,可以作为特征的是到处都设置了一些技术夜校。

在法国、英国、美国,进入这种学校学习是自愿的,并不强迫,在英国甚至还要缴学费。夜校符合许多工人想从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队伍进入技术水平较高的工人队伍的愿望。

在法国,夜校具有普通教育的性质,尽管在这种学校里绘图是主要的课程。在进行技术教学的地方,所追求的是狭隘的职业目的。夜校取得了成绩,但是到年终时学生人数却少了一半多。这就说明白天进行了紧张的劳动之后,再到夜校去学习是多么困难。

英国的情况更为有趣。那里有所谓国民中等技术学校。现在伦敦的每一个区都设有这种中等技术学校。这些学校总数大约十个。这简直是一些宫殿。在一条洛金街上,中等技术学校一周开设五百

多种课程,学生将近一万五千人。

“每一所中等技术学校都包括工业学校、音乐学校、朗读班、商业学校、职业学校(至少有十五种不同的职业)、家政学校、缝纫剪裁学校等等的教学大纲和课程。同时,这种学校也是一个俱乐部,经常组织盛大的联欢会,演出戏剧,举办音乐会,每周至少一次,中等技术学校里都有宽大的礼堂、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富丽堂皇的阅览室、体育馆、游泳池、游艺室、吸烟室以及价廉物美的食堂等等”(惹奴著:《职业教育》(L'enseignement professionnel),第150页)。每个人都可以学任何一种课程,只要付出一小笔费用。

美国的补习学校(Continuation Schools)具有更多的技术性质。这种学校的理论和实践的教学工作进行得很好,校内附设有很好的教学工厂,拥有最新式的机器,等等。

在奥地利和德国,进补习学校是义务的。

在德国,补习学校(Fortbildungsschule)最初具有普通教育的性质。学校里的教学充满了爱国主义的精神,学校的目的主要是给开始迅猛地在青年中发展的社会民主运动作“解毒剂”。然而由于迫切需要受过技术训练的工人,于是大家就把注意力日益转向绘画、制图、几何学、计算、商业簿记学、撰写应用文方面去了。当时法国人嘲笑德国补习学校的教学大纲说:“学术味太浓了!厨师不懂代数和三角也能做出甜饼子来。”但是德国的补习学校不是培养某一种狭隘的职业人材,而是给学生打下一般的理论基础,这种基础是每一个受过技术训练的工人所不可缺少的。它力图提高整个工人阶级的一般技术教育水平,因而在这一点上毫无疑问是具有进步性质的。

实际情况很快就表明,补习学校教学工作的缺点就是过于抽象,因此没有达到它原来的目的。于是就开始在补习学校内设置一些小型工厂,把理论讲授和实际操作结合了起来,效果非常良好,德国的补习学校就在这个方面迅速地进行着改造。但是不久就暴露出一个问题:由于学生疲倦已极,因而影响了学习成绩。学生白天在工厂干

了一天活,晚上就不能继续在教学工厂工作下去。于是德国就颁布了一条法令,根据这条法令,每个企业主每周要让学徒停止厂内的工作而到日间补习学校去学习一次。

日间补习学校把德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程度提到了更高的水平,因为这种学校里的理论讲授是与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讲授本身所具有的不是狭隘职业的性质,而是多少接近综合技术的性质。

德国所不足而美国所有的,是外部感情的一般发展以及对劳动的一般训练(在美国,这些东西都由小学授予儿童)。在美国,学生到技术学校去学习时已经具有很强的观察能力和绘画能力,熟悉各项工作的底细并能圆满地完成工作任务。而德国至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读书学校,这种学校不仅不训练儿童去劳动,反而使儿童脱离劳动。德国现代的补习学校就暴露了德国国民学校的这一缺点,因而不得不对它进行改造。

美国从幼儿园开始就经常训练儿童劳动。这种一般的劳动训练是在所谓高级手艺学校(High Manual Training Schools)完成的。这是一种设备完善的小型工厂,青年人在这里可以实际地学习整个生产过程。所学习的不是某种职业,而是许多生产部门,选择一些最重要的、最典型的部门来学。在高级手艺学校里,学生所受到的是真正的、全面的理论和实际的综合技术教育。这种综合技术教育不仅给予学生一般的劳动训练,而且可以扩大学生的智力眼界。

德国的补习学校着重于现代工业发展使技术教育成为全民财富的趋势。

美国的高级手艺学校所着重的是这一发展的另一趋势:扩大职业教育的范围,把职业教育从培养狭隘的职业变为准备进行一般的工业劳动,使学生获得一般的基础,这种基础可以使由于现代技术的进步而引起的职业变更成为可能。

最后,在最近还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学校,这种学校所着重的是现

代工业发展的另一具有特色的趋势,即把技术教育同生产产品的劳动紧密联系起来。

美国大的工厂主非常需要受过教育的、经过良好训练的工人(这种工人可以委托以负责的工作岗位,因为他们曾在补习学校里受过训练),由于这种要求往往不能满足,于是他们就想亲自掌握培养他们所需要的工人的工作。1905年以后的五年内,美国出现了许多工厂学校,其中大多数是日间学校。学生学习时可以不上班,照样领取平日的工资。此外,如果学生能顺利地把一门课程学完,还发给他50-150美元的奖金。学习通常是每周两天,不过学校是全周都上课的,所换的只是学生。学校招收从14岁到18岁的学生,这取决于进入工厂学校是否要求在普通学校或高级中学毕业……工厂学校所讲授的课程有适合生产要求的数学、物理、电学、力学、商业学、制图、绘画,等等。学校的教学计划中没有普通学科。印刷工人和化学生产部门的教学计划稍有不同。

在工厂里,学生在不同的技师监督下工作,并且由使用一种机器转向另一种机器。

1910年,仅仅在铁路公司就有51所这种工厂学校。

除了为学生设立的工厂学校(这种学校只有那些有许多青年人参加工作的大企业才能开设)之外,在美国,一种所谓的“合作教育制度”(cooperative school system)开始得到迅速的发展。这种制度就是一个或几个企业与本地的技术学校订立合同。它们把自己的学生送到学校去(保留他们的工资),让他们用一半时间或部分时间在校内学习(往往是这样安排的:学生一个星期学习,一个星期工作),而学校负责给学生讲授一些为他们的技术教育所必需的课程。

英国的大企业对培养他们所需要的工人的工作也很关心。

“1903年,英国的造船中心苏格兰的工程师和造船家辛迪加和该市技术学校的行政当局拟订了互相合作的基础,这一合作产生了极其良好的后果。参与这一运动的经济力量的意义,可以从下列事

实中看出来 这一运动包罗了 25 个造船商 ,其中仅仅多克斯菲德一人就控制了许多庞大的造船厂 ,以至于他一家一年所承担制造的船只就等于德国所有造船商要制造的船只。苏格兰所实行的主要原则 ,就是学生应该在作坊里向老板学习自己的职业 ,去听技术学校非常适用的科学课程和绘画课程。小学毕业的头两年 ,他们白天都在作坊里 ,晚上有时在学校学习 ,通过竞争考试之后 ,最有能力的学生就得到了奖金 ,这样 ,他们在整个学期就可以不花一个钱而埋头钻研高等技术知识。这种学习可以使他们获得一张专门的文凭 ,而这一纸文凭就可以使他们获得真正的财产”。(“Revue Pédagogique”《教育评论》1914F 年 7 月号 ,第 52 页)

“德国的大工业在培养学徒上采取了特殊的方法 ,目的是培养知识和能力上都能适应现代技术要求的工人。德国设立了许多专门的教学工厂 ,通过经常更换学习内容的方式来向最有天才的人讲授职业的各种秘密。首创者就是普鲁士帝国的铁路行政当局”。

“在为期一年的学徒期 ,年轻人在技师的经常监督和指导下学习如何使用材料和工具。然后依次派他们到工厂的各个部门去工作 ,参加工厂里正在进行的生产 ,并利用一切他们会使用的机器来从事生产 ,从而 ,他们就在最顺利的条件下接受了实际教育”。(惹奴 :《L'enseignement professionnel 职业教育》,第 165 页)

职业补习学校和工厂学校的设立 ,是由于现代大工业需要受过训练的、具有技能的工人。工人阶级在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普及综合技术教育上所受到的好处 ,资产阶级力图通过扩大自己对青年的影响 ,以及它在工人阶级中分化出一批最有才干的工人成为特殊的工人贵族、特权阶层这两种手段来求得补偿。但是随着对有技能的工人的需要量日益增加 ,受过技术训练的工人就越来越多 ,于是技术教育就从一种特权变为大家都能享受得到的东西了。技术教育提高了工人阶级的一般知识水平 ,而成为把现行制度改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工具了。

读书学校之转变为劳动学校。 这种转变的必然性

欧洲各地的国民学校采取的都是读书学校的形式。实施普及义务教育的学校修业年限越长,儿童就变得越加迟钝(如我们所见到的瑞士的情况)。凯兴斯泰纳在他所著的《Begriff der Arbeitsschule》《劳动学校》(第25页)一书中说:“儿童从3岁到14岁占优势的是本能和对手工劳动的爱好”。这段时期儿童大部分是在学校度过的。读书学校不仅不能发展这一自然的欲求,反而扼杀它。

当工业日益需要受过综合技术教育的、有首倡精神的、有知识的工人的时候,当人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扩大工人的技术教育的内容的时候,到处都可以碰到读书学校的悲惨结果。这种情况在同北美进行比较之后就显得更突出了,因为北美的国民学校总是尽一切力量去发展儿童的劳动能力。

美国最先走上这条道路,这是不难理解的。美国在技术进步方面长期以来就在世界各国之先,美国比任何国家更早地、更尖锐地感到缺乏受过技术训练的工人。另一方面,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的美国教育工作的组织机构,排斥任何官僚主义的习气和因循守旧的作风。它给儿童提供了广阔的场所来显露他们每个人的首倡精神。它受居民的监督,因而就使美国的学校变得非常灵活,容易适应生活的各种要求。美国的学校同国家的社会生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劳动在美国学校中占有广泛的地位,也是很自然的。

在美国,从幼儿园开始就教儿童劳动,教儿童学会使用各种材料和工具,通过劳动来教儿童学会观察,独立思考和行动。儿童们会画图画、做装饰、塑造、雕刻、剪贴。国民学校继续幼儿园未做完的工作,只不过所做的活儿更复杂些,要求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忍耐性、坚持性、独立精神。生产劳动像一根红线贯串在高级手工艺学校的全部

课程中,——这种综合技术学校只不过是完成在幼儿园就已开始了的手工劳动的教学工作的地方。各方面的劳动活动可以很早就使儿童的爱好、兴趣和天才显露出来。因此,在美国学校毕业的男女青年选择职业就比欧洲的各国男女青年要容易得多,因为在欧洲选择职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选择职业对于加入劳动大军的青年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从事符合自己兴趣和能力的劳动,比从事违反自己本性的劳动要使人愉快得多。选择适合的职业对于劳动生产率也很有意义,可以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的企业主非常了解这一点,所以在自己的工厂里特别注意“to put the right man on the right place”(“使人各得其所”)。劳动学校比起读书学校来,可使儿童的能力更好地显示出来。此外,在美国学校里还有特别的“就业顾问”。这种顾问对学校里的儿童进行观察,了解儿童的爱好,确定毕业的儿童最适宜于从事哪种职业,从而进行适当的指导。这是欧洲所没有的。当然,不应该过高地估计了选择职业对广大居民的意义。目前,大多数人所从事的职业都不适合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而只是尽可能找到一个工作就行了。现在正在进行着一种一般的劳动训练,这种劳动训练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它可以使人不必一辈子为一种狭小的职业所束缚,而能在必要时改变自己的工作和职业。我们发现美国学校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是结合的,这种结合可以鼓舞体力劳动和丰富脑力活动,为消灭社会分为贵族(从事脑力劳动)和平民(其命运就是从事体力劳动)的现象作准备。对于这种结合要给予更高的评价。

美国在工业劳动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种成绩在较大的程度上使它能够出色地去培养工人。美国所取得的这种成绩也促使欧洲对国民学校改革问题,以及把国民学校由读书学校变成劳动学校问题的议论。对这个问题讨论得最激烈的是德国,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德国最近45年来在工业方面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都发展得快些。关于劳动学校的问题在德国成了一个很迫切的问题。

恩斯特·维柏尔于1912年在德国教师代表会议上做报告,在谈到劳动学校这一问题时说:“世界市场迫使德国人与‘价廉物次’这一过时的方针决裂。新时代不允许按陈旧的工艺流程生产产品。它要求所生产的产品是任何外国工人望尘莫及的。新的时代要求产品式样新、质量好。由此就得出了一个教育学上的结论:既然要学生将来生产某种体现其个性的东西,那么他的个性(尤其是他的意志和志向)就不应经常受到压抑,要表现出个性来。”

“改革不仅应使精神力量平衡,而且也应关心个人活动的积极形式与消极形式的平衡。人们发现,学生过分习惯于模仿,只是一个善于接受事物的人,他们的脑子塞满了教材,以致根本不能消化,这就扼杀了创造性的乐趣。因此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学生不仅应获得知识,还要显示才能;不仅能够接受事物,还要善于行动;不仅会模仿,还要会创造。特别要强调教育必须有利于实际活动,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主动性这条久已存在的原则,虽然口头上经常提及,却由于学习负担过重一直未能实行。现在,这个原则重新提到日程上来了,甚至成了新运动的一项主要要求。独立的观察能力的培养应在教师简要的讲解和学生的复述中占有一定的位置。知识应该变为技能,认识应该产生行动。”

“真正的主动性发自内部,真正的个人创造不能由外部强令产生,真正的主动性源于人的本性的基本特点,源于自由的意志。”

“认识到这一事实就可以弄清自由和强制之间的关系。改革所最应关注的,就是要促进儿童个人创造力的发展。儿童因一时感情冲动而从事的活动,由于出自一种自然的意向,并且是一种直接的动机所促使,因而不应过多干预,恰恰相反,应该积极支持。过去曾经提过这样一个口号:捍卫儿童的自然权力!儿童以教师之所好为自己之所好,这不应成为一个准则,而应以儿童发自内心的喜好为准则。在开展每项教育活动时,在确定某一目标时,以及在选择某种方

式时,教师只应该是儿童的保护人,而不应是他们的统治者。每走一步时,教师都要反躬自问:如果按儿童自己的意愿,他们是否会走这一步。”

“儿童是判定整个教育活动的中心,因而必须进一步了解儿童的个性。现代儿童心理学认为,儿童精神生活的基本特点与成人精神生活毫无共同之处。心理学发现,不同的年龄层次,其类型也截然不同。儿童特别感兴趣的,是那些可以手触目睹的具体的有形事物;儿童把握现实的能力超过他的抽象化的能力;充满具体体验的现实生活比充满科学联想的非物质世界更能吸引儿童的注意力。”

“为了通过适当的方式达到培养儿童个人创造力并适应儿童的本性这一既定目的,就不能忽视儿童这种把握现实的能力,不能忽视他们对具体事物的喜好和自由自在的意愿。”

“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产生一种新的协调形式,即学校与生活的协调。环境、故土乃是一切教学创举的出发点。‘走出去!’这一号召曾在文艺工作者中间起过重大的作用,现在这一号召对学校也有了新的意义。它使自然界也进入了学校生活之中:学校设立了花圃、饲养室、水族馆。某些课程(读、写、算)比过去更多地以实际的日常生活为出发点,并在实际生活中加以运用。同时,人们尽力把学校生活与儿童的游戏结合起来。这样就可以使转变不致太剧烈,因为孩子们过去自由自在惯了,入学后突然强迫他们做这做那,成天提心吊胆,毫无乐趣可言。”

“最后,认识到儿童的天性比较喜欢实际的、具体的世界之后,就会全面地去发展人体的各种器官;就会要求各种感觉器官参与感受,把所感受的东西加以运用和加工。我们就会不只是培养听力和发展言语器官,而且还有两眼和双手。需要训练的也不只是听力和视力,而且还有肌肉感觉。图画课改革了,我国学校开设了手工劳动,教学生学习使用工具和材料,成立了校办工厂。人们期待这种革新能使智育和体育结合起来。人们同时把这看作是教学法的结合,

看作观察、加工和表现能力的结合,看作从精神上、身体上对整个教育工作进行的组织;最后,看成是抽象素养和具体素养的结合。”(《1912年在柏林德国教师代表会议上的报告》Bericht Über die deutsche Lehrerversammlung zn Berlin,1912,第38—41页)

在上面所摘引的这段话里,报告人非常生动地说明了工业生活的新要求怎样动摇了旧的读书学校的整个基石。学校的全部生活方式必须重新改造。把手工劳动包括到教学大纲中去是与改革整个旧的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手工劳动是发展儿童个性的一种手段,是显示儿童的创造愿望的场所,是一种教育方法,是均衡发展的一种手段——德国近年来教育改革运动的优秀代表人物就是这样来理解手工劳动的。

上面指出的恩·维柏尔的几项原则,在美国国民学校里得到了充分的补充。在美国,教育学的一个新学科——目的在于科学地研究儿童本性的实验心理学——得到了特别迅速的发展。

实验心理学对儿童的精神能力进行科学的研究。借助于各种试验和仪器来测量各种知觉的力量和速度,测量记忆的能力和保持的时间等等,这样就能够得到有关儿童能力、甚至儿童发展水平的客观材料。实验教育学就其实质而言是属于精密学科之列的,一如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等。但它是一门比较新的学科,其教学方法还未准确形成,而且由于各种教育学上的偏见,这门学科里有很多东西只是在表面上才具有科学的性质。然而即使在目前,它也已显示出了光辉的远景。它使我们能够研究各种条件对精神能力发展的影响,确定其间的相互关系。比如,已经研究了疲倦对注意力、记忆力和意志的影响;兴趣对集中注意力和加强记忆力的影响,对努力程度的影响。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制定了一些原则,美国的学校就是根据这些原则建立起来的。

杜威得出了下列结论:

儿童的个性是有机体的一定力量和本能总和的产物,这种力量

和本能是力图按照某些冲动而行动的儿童之所以发生这些冲动的原因。这种力量和本能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纳入正轨,但不能加以压抑。儿童对某一事物或活动发生兴趣,这说明这一事物或活动有使儿童感兴趣的地方,说明有某种东西能满足他的正在发育的有机体的一定的要求。如果这些要求得到满足,儿童就会感到满意;当儿童从事他所喜欢和感兴趣的工作时,他就会全力以赴地去做,他的积极性就会充分发挥出来,有机体不需要外界的强制就能加强起来,由于从事感兴趣的工作,儿童的精神力量就能得到发展。教师在研究了儿童的个性和兴趣之后,就可以经常去培养这种兴趣,把它加以发展、深化和改造。如果能照顾到儿童的个性,就能取得巨大的成果。反之,要是压抑儿童的个性,强迫他去做他心里不喜欢去做的事情,就会分散注意力,使儿童疲倦,减低有机体的积极性,削弱意志力。

诚然,夸美纽斯早在十七世纪就曾说过,教学工作应该个别进行,但是,第一,长期以来对个性的理解都不肯定,后来到了资本主义世纪,大部分居民成了机器的简单附属品,工人同商品一样,于是对人的发展和人的个性就很少注意了。如果对成人的个性都没有把它放在眼里,那就很难指望去注意儿童个性的发展。此外,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需要有很多原则,而要比充分地实现这些原则,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有可能。正因为如此,这些原则在美国学校很快就实行了,而在德国学校实行起来就要困难得多。在美国学校里,富贵人家的子弟和普通工人的子弟在一起学习。在德国,学校具有较大的等级的、阶级的性质,——德国有所谓“国民”学校,进这种学校学习的都是劳动阶级的子弟;另外还有中等学校(它不是国民学校的继续,它的低年级与国民学校是平行的),这种学校是为有钱人的子弟开设的,它的宗旨与国民学校不同,——培养“治人”的人。所以当国民学校一般还继续建立在强迫纪律和呆读死记的原则上的时候,中等学校已经采用了美国学校的原则。当然,也并非全都如此。德国和法国大多数学校继续追求着从前的目的——通过教科书培养如巴

乌里辛所说的“唯命是从的官吏的美德”，但是在欧洲各地已经为有钱人的子弟设立了许多学校，这些学校是为那些需要有独立精神和首倡精神的地方培养学生的。英国的“新”学校，阿波特斯霍姆学校是欧洲大陆上很多这类学校的典范，在它们的大纲中曾直言不讳地说，学校的学生以后可以在英国殖民地上获得显要的地位。在什图加特市郊的一位“新”学校的校长卡普弗曾经很详细地说明了这种“新”学校（在德国叫做 Landerziehungsheime 农村寄宿学校）究竟是为谁设立的。

卡普弗说：“‘新’学校一般说来是培养能从事各种职业的人的。根本没有适合工业领导人物（Captains of industry）子弟的并且能给予他们必要训练的中等学校。我们的劳动学校对于未来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其次我们要指出这一事实，就是最新的发展情况在最近创立了许多新的职业，这种职业完全适合于受过教育的人的子弟”。（卡普弗著：《学校》（Die Erziehungsschule），Kapff 第 69 页）

“对于那些有勇气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建设自己的生活的人来说，世界上是有广阔的天地的，同时还不包括医生、教授、人类灵魂工作者的学术职业，更不用说技术性的职业，当然，年轻的德国商人和银行要员遍布于世界各地，汉萨同盟年轻的盟员可以通过自己的亲戚获得优厚的地位，他们很关心用必要的人员补充到落后的空白地区去。但是能使自己获得一定地位的生产职业的种类还不够吗？例如，在目前空前繁荣的阿根廷有很多广阔的土地，这些土地以前都当牧场用，现在却成了耕地，那里完全有条件产生像北美大草原上的农场主阶层，我们的家长知不知道这种情况呢？而且就在欧洲也还有很多地方可供移民之用。于是有经验的人说，如果一些有进取心的、拥有资本的农场主在那里开办一些美国式的果树农场的话，那么就可以把依斯特利亚半岛变为小加利福尼亚”。

“……在上层分子的子弟的面前（在盎格鲁撒克逊各国也一样）

摆着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到别的国家去做德国工商业和德国科学的开路先锋。至今为止没有培养这种人材的相应的中等学校。设立农村寄宿学校的目的就是为填补这个空白”。(同前书,第71页)

所以说,新学校的目的就是满足国家对受过教育的、有知识的、有首倡精神的高等公务员的需要,满足资产阶级对工业企业能干的领导者的需要。迅速发展着的帝国主义需要这种选拔出来的人物。

新学校的目的决定了它的全部精神。目前新学校已经非常多。1899年雷迪博士在英国艾博茨霍姆创办了第一所这种学校,后来在英国的别达尔又设立了一所。根据狄摩林的创议,1899年在法国的“石头”城也设立了一所与艾博茨霍姆的学校相同的“新”学校。这种学校在法国已超过六所。艾博茨霍姆学校过去的教员利茨博士在德国也设立了同一类型的学校,时间比法国早一年。现在他已经设立了三所这样的学校。在瑞士和奥地利也设立了几个同样类型的学校。

“新”学校是一种寄宿学校。每年收学费1,500—2,000法郎。这些学校一般都远离城市,设在郊外风景如画的领地里。设备完善舒适,有浴池、电灯、学生单身宿舍、阅览室等等。描写这种“新”学校的书籍印满了照片,这些照片显示出这些学校的设备富丽堂皇、舒适方便。

它非常注意体育。豪华的通风设备,晨间的淋浴和擦澡、体操、运动、游戏,富有营养的食物,合身的衣裳,长时间安静的睡眠——这一切都是为了增进学生的身体健康。体操中包括在户外小型工厂进行体力劳动。种花、种菜、割干草、修亭子和鸽舍、做船篷——所有这些都对体力发展都非常有益。儿童在这种“新”学校里健康地成长着。

它对脑力发展也特别重视。没有毫无意义的死记硬背。学生的独立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教学中特别注意学生的兴趣,满足学生的积极的创造性的要求。外表纪律和强制现象根本不存在。学校的整个制度照顾到所有的儿童,可以促进儿童的个性全面发展。安

排得很合理的共同工作使学生学会了和别人共同生活和工作。学校的自治使学生养成了组织社会生活的能力。

与一般中学相比,这种“新”学校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但这并非工人阶级理想的学校。这种学校就其目的和它整个的性质来说像是个慈善机关。“新”学校生活的性质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农村寄宿中学的温室的气氛可能是一种沉闷的中学的气氛或者是资产阶级家庭的毫无意义的往往是腐化的气氛,但是这种寄宿学校即使组织得很好也仍然是寄宿学校,也就是说它使学生与现实生活隔离,缩小了学生的社会印象和感受的范围。

体力劳动在农村寄宿学校的作用被缩小到只具有纯粹教育学和卫生学的目的:增强健康,发展机敏性和求知欲。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卢梭对体力劳动所具有的作用的见解。他认为体力劳动是必须完成的社会义务。它可以培养一般劳动能力,这种能力使学生通过可能的体力劳动获得生存的资料。它是了解整个社会生产过程和了解人们相互关系的工具。它是判断社会制度是否公平合理的工具。

“农村寄宿学校”的学生是要培养成从事“高级知识职业的人”的,他们将不靠体力劳动生活,这一点教师和学生都了解,因此他们对待劳动就像对待游戏和运动一样。它也很不重视通过向学生介绍各生产部门的情况,来使学生了解整个社会生产。农村寄宿学校的宗旨不是实行综合技术教育。

由于脱离生活,学生就不能真正地研究各种社会关系。卢梭的学生不仅要学习木匠的手艺,而且要 and 木匠、农民生活在一起。在“新”学校里却不学这些。“新”学校并不把判断现存制度是否公平合理的标准教给学生,而且说老实话,这些 Captain of industry(工业领导人)也乐于没有这种标准。

裴斯泰洛齐、欧文、贝勒斯、拉瓦锡等人希望儿童从幼年时期就参加生产劳动。这样就可以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使

他们严肃地对待生活。在温室中长大的农村寄宿学校的学生也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种菜、种花、修鸽舍等等。但是这里完全谈不上他们是通过劳动来补偿自己的费用,他们所花费的 2,000 法郎是由他们的父母支付的。他们很了解这一点。他们种了一些菜卖给寄宿学校的厨子,这不能培养他们对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团结感情,而认真地参加生产劳动却是可以培养这种感情的。

总而言之,从教育学的观点来看,农村寄宿学校在很多方面是组织得合理的,但是就这种学校的目的和精神来看,它只是满足资产阶级中某些人的特殊要求的学校。工人阶级利用他们的教育经验,但是要按照另外的方法来创办自己的学校。

必须使儿童的个性得到自由的发展,这种新思想欧洲的小学很难接受,读书学校的制度是要培养学生一定的思想方法和一定的感情,它扼杀学生的个性,要学生非常顺从,麻痹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一些知名之士所称颂的正是读书学校的这一方面。可是另一方面,最新发展的技术又迫切需要具有自己“面貌”的工人,这种工人不仅能够根据指示去进行工作,而且能在劳动中表现自己的首倡精神,把“我”放到劳动里去。

这种矛盾在德国特别尖锐。长期以来,那里的人们都在寻求一种妥协的解决办法。企图保留旧的学校制度,而只是把个别手工业的教学当成一门特殊课程列入学习里面去。在法国也进行过这种尝试,但是效果极坏(见萨瓦著:《瑞士的学徒制》(L'apprentissage en Suisse),第 58 页)。在德国,曾经在小学进行过职业教育,但受到了德国教师的坚决反对。1857 年在美茵河上的法兰克福,1882 年在卡塞尔,1889 年在阿乌格斯堡,最后,1900 年在科隆,德国的教师都坚决反对国民学校在教学计划中列入手工劳动课。儿童将来要花很多时间进行体力劳动,不能从普通教育中分出一些时间进行体力劳动,因为普通教育的时间也很不够。这就是当时的主要的借口,虽然这里还牵涉到不愿意把学校的权利和影响让给师傅、技师这些行业的

专家的问题,并且还由于把体力劳动看做一种“低下”的事,进行体力劳动就会有失学校的尊严。由于所谈的是进行纯粹职业教育的问题,因此,教师的意见是正确的。狭隘职业教育仍然具有读书的性质,这样提出问题就确实是为了培养纯粹的技术技巧而缩小普通教育的范围。现已遐迩闻名的慕尼黑国民学校校长凯兴斯泰纳在1889年谈到手工的教育意义时,受到了普遍的嘲笑。但是23年来发生了许多变化。提高工人的技术教育和普通教育水平,使他们在发展上接近美国工人的水平,这已经成了德国生死攸关的问题了。

于是就在德国学校内部引起了震动,对教学方法重新进行了审查等等,这种情况在上面所引的恩斯特·维柏尔的文章中已经谈到了。为了对学校进行一般的改革,就必须把手工劳动当作一种教学方法,当作深入进行普通教育的一种方法。个别教师开始在学校里进行手工劳动,这种劳动由于安排得很妥帖,因而就为发挥儿童的创造精神提供了广阔的园地。怎样进行手工劳动才能使它具有普通教育的意义,对这个问题德国教师花了不少工夫来研究。他们的经验加上美国学校有关的经验,为劳动学校的设立奠定了合法的地位。

凯兴斯泰纳被任命为慕尼黑国民学校校长是时代的旗帜。诚然,凯兴斯泰纳没有引起巴伐利亚政府的戒心,他完全没有任何民主主义的思想。他对资产阶级国家非常崇拜,异常坚决地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且使自己的教育活动吻合这种利益。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精通最新的教学方法,曾经到法国、瑞士、奥地利去考察职业教育情况。但是他希望建立新学校。他想建立一种用新方法达到旧目的的学校。紧闭的活门稍为打开了一点,学生的个性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他把学生的主动性看作一种手段,用以更好地掌握学生注意力,取得学生信任,从而使他们更能接受自己的影响。新教学法在凯兴斯泰纳手里只不过是通过对儿童个性的了解而构成的更完善的工具而已。这种工具可以影响他们的感情和世界观,给他们灌输有关的道德和思想,必须把儿童的主动性纳入一定的轨道,唤起儿童对

技术、对手工劳动的兴趣,把他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这上面。同时,这还会使他们不去注意伤脑筋的政治问题,而又给大工业提供必需的有知识的、有首创精神的工人。

只要学校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那末劳动学校就是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一种工具。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使劳动学校成为“改造现代社会的工具”。

论社会主义学校问题

在资产阶级国家(无论是君主国抑或是共和国都一样),学校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精神奴役的工具。

在这种国家里,学校的宗旨不是为了学生的利益,而是为了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这两者的利益往往很不一致。

但是学校的宗旨决定着整个学校工作的组织、学校生活的全部制度以及学校教育和教学的全部内容。

如果我们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那么学校的宗旨将根据学校为哪一阶层的居民服务而有所不同。

如果学校是为统治阶级的子弟服务的,它的宗旨就是把他们培养成会享乐和统治的人。这类学校的典型就是所谓“农村古典中学”,亦即“新式学校”。现在欧洲各国几乎都设立了这种学校,财阀和上层知识分子都把自己的子弟送到这里来受教育。农村古典中学收费昂贵。这种中学一般都设在富人的领地里,设备十分舒适,采用了最新的科学成就。儿童在这种古典中学里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他们十分自由,实行自治,受到教师的信任。一批博学多才的教师向他们揭示大自然和艺术的美妙之处,把他们引入神圣的科学之宫。这种学校特别重视身体的健康和动作的敏捷。同时尽量发展

儿童的意志力,培养他们达到既定目标的顽强精神、实事求是的作风和管理自己与别人的能力。此外,教师还尽力为学生打下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牢固基础,并从历史学、伦理学和哲学上对这种世界观加以论述。由于农村古典中学的儿童脱离实际生活,不了解生活中的痛苦、矛盾和斗争,因此这样做起来很容易,工人的家庭由于失业而离散,因此工人的孩子绝对不可能成为在农村寄宿学校受教育的儿童的同学。向这些儿童灌输的对私有财产的观点,不会因为他们的奶娘所讲的故事而有所动摇。他们的奶娘知道他们的要求,会讲一些很有趣的故事,说是农村里的一件喜事就是听说附近某处一辆装茶叶的车翻了,于是所有的人都拼命去抢茶叶。童年时代的印象使他不会去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

如果学校是为小资产阶级的子弟服务的,它的宗旨就是培养官僚政治的干部、“知识分子化”的干部,他们将会为了分得一杯羹而去帮助统治阶级统治人民。这就是大多数培养各级官吏,即培养资产阶级的有本事的奴仆的中等和高等学校的宗旨。在这种学校里,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办事能力、一丝不苟的作风和勤勉奋发的精神,但却压抑了学生独立思考、观察和作出结论的能力。学生所学的知识大都是一些抽象的书本知识。这种学校不教学生从事体力劳动,只是把他们培养成为俯首贴耳的奴仆。这种人唯主子之命是从,他吃统治阶级的饭,听统治阶级的话。书本上学来的科学知识脱离了生活,它使中等和高等学校的学生不能与广大劳动人民打成一片,而是与群众格格不入。这些学校特别注意培养它们的学生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崇拜。

至于说到国民学校,资产阶级力图把无产阶级孩子的教育工作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企图对青年一代施加自己特殊的影响。因此,资产阶级也实行义务教育。

国民学校直到最近一直是读书学校。它授予学生一些起码的知识,因为对识字的群众容易统治,而对看不懂内部规章制度或政府法

令的人,对既不会写自己的姓名、又不会最简单的算术的人却难于驾驭。国家在工业方面越发达,对工人和农民所要求的知识范围就越广。学校授予学生这些知识,但是这都是糖衣炮弹,因为学校传授这些知识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学校向学生灌输的是这个资产阶级制度是上帝亲自建立的,它是最公平合理、值得称颂的制度;一些大权在握的头面人物都是优秀分子,必须绝对服从他们。在学校里,无时无刻不在教学生顺从听话、尊敬长者。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培养学生崇拜金钱权势,崇拜资产阶级教育。本族语、地理、历史课都是培养儿童最凶恶的沙文主义的工具。学校力图扼杀学生的友好团结感情。奖惩和记分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在学生之间开展比赛和“竞争”。总之,国民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资产阶级道德观点,麻痹他们的阶级觉悟,把他们培养成易于统治的恭顺的奴仆。

当然,随着国家工业发展和历史发展程度的不同,阶级学校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在先进的国家里,学校比较完善,方法比较细致,教学大纲的范围比较广泛,学校的目的比较隐蔽,但是本质仍然不变。举例说,工人的子弟可以受到中等教育。我们俄国不久前还不允许“厨子的孩子”上中学。在德国,上中学虽然没有直接的阻碍,却存在间接的困难:小学和中学的教学大纲不衔接,使小学毕业的学生在有几门课程上可以升入中学四年级,而在另几门课程上却只能升入补习学校,因此小学毕业生要想升入中学,就得多花两三年时间。在英国,由小学升入中学完全没有阻碍。相反,英国还设立了许多奖学金来资助小学里天资聪颖、顺从听话的学生升入中学和高等学校。英国的资产阶级认为,中学的目的就是培养资产阶级国家有知识的仆从。工人阶级都是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它不可能把自己的子弟送到脱离体力劳动的学校去学习,因此升入中学的只有少数出类拔萃的儿童,他们由此就脱离了自己的阶级而走到国家职员这一特权阶级里去了。才华出众的人离开了工人阶级,这只能对资产阶级有利。工人阶级失去了自己的领导人,力量削弱,无人闻问,而

国家仆从的力量却加强了。他们就是这样解决升入中学的问题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各有千秋,而问题的实质却到处都是一样:广大居民不能升入中学,因而知识仍然是阶级的特权。

我们俄国的资产阶级经常谈起普及教育和教育改革的问题,而且不止于谈论,还为实现这种改革做了一些工作。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非常了解,资产阶级的学校办理得越完善,那么这种学校就越能成为更好地奴役人民群众的工具。如果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宗旨不改变,中学和高等学校纯知识的、脱离生活的性质不消除,在这种学校里不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那末学校的阶级性质就不可能改变。

工农政府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应该彻底改变学校的阶级性质,应该使全体居民能进入各级学校学习,而且不仅在口头上说,还要实际去做。只要学校的宗旨不改变,教育就将一直成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权。居民所关心的是小学、中学和高等学校的目标一致;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种人要具有自觉的、组织的社会本能,具有严正的、成熟的世界观,能清楚地了解周围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种人能从理论上认识并在实践中从事各种劳动(既有脑力劳动,又有体力劳动),能建设合理的、内容丰富多彩而又愉快快乐的生活。社会主义社会需要这种人,没有这种人就不能完全实现社会主义。

什么样的学校才能培养这种人呢?

首先,这种学校应尽一切可能搞好青年一代的身体健康。学校要使学生的伙食富有营养,保证学生睡眠充足,衣著舒适而且暖和,养成卫生习惯,能呼吸新鲜空气,积极开展体育运动。统治阶级使他们自己的子弟能享受这一切,而我们必须使全体儿童(不管他们父母的经济地位如何)也能享受这一切。夏天,学校应该迁到农村去。学校应该从儿童的幼年就开始就增强和发展他们的外部感觉:视觉、听觉、触觉等等,因为这些都是人们用以认识外部世界的器官。理解的

力量和多样化取决于上述器官的敏锐、完善和发展程度。一些教育学家(尤其是福祿培尔)很早以前就曾指出,必须从儿童幼年起就让他们获得足够的听觉、视觉、肌肉感觉等训练,使这种感觉训练系统化,要给儿童以机会,让他们去训练自己的这种外部感觉。儿童很早就想进行观察。应该教儿童学会做到这一点。玛丽亚·蒙台梭利的游戏体系正是通过玩具的选择(而不是口头上讲讲)来使幼童学会观察和训练自己的外部感觉的。儿童也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尽量用各种方法(如动作、语言、面部表情)来表达自己所获得的印象。要使儿童能够扩大表现自己所形成的形象的范围。应该给他们一些材料,做塑像的粘土,铅笔,纸张,各种建筑材料等等;要教儿童学会如何使用这些材料。用物质材料来表现所形成的形象是检查和丰富这些形象的最好手段。不管儿童的创造是通过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的,都应大力予以鼓励。艺术和语言是使人们互相亲近的有力工具,是了解自己和别人的工具。

大多数居民的家庭环境都不能促进儿童外部感觉的发展和儿童的创造力。所以必须开办足够数量的幼儿园,以便把所有的孩子都吸收进来。这种幼儿园要能使每个儿童的个性都得到发展,而不应成为幼儿的兵营,让幼儿随着哨音下操,按教师的指示做动作(一个法国女工在回答儿童在母育学校里学些什么东西这一问题时说:“只是盲目的摹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子弟进的幼儿园常常成了这种兵营,然而社会主义制度下却不容许这种兵营存在。

当儿童学习怎样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时候,他们也关心别人的思想和感情的表达。在这一发展时期(大约是7—12岁,虽然个别人可能出入较大),儿童最感兴趣的东西就是别的人。在这一发展时期,儿童的摹仿力特别强,这种摹仿力往往是一种特殊的创造形式——再现别人的思想和感情。在这段时期,儿童的社会本能开始迅速发展,同时人们的生活和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成了儿童注意的中心。学校应该巩固儿童觉醒了的社会本能并使之深化,让他们

了解劳动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基础,体会创造性的生产劳动的乐趣,感到自己是社会共同生活中的一个部分,是社会的有益成员。摹仿能力的提高有助于获得各种劳动技巧,应该让儿童获得这种技巧,教他们学会干活。特别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干的活具有集体的性质,因为这样就可以培养他们共同工作和生活的能力。通过干活,使儿童能够恰当地估计自己的力量,既不估计过高,也不估计不足。共同的劳动,与同年龄的小朋友共同游戏,通过各种形式参加劳动和成人的生活,这些都可以为形成儿童的共同伦理提供丰富的材料。

在儿童的这一发展时期,学校继续幼儿园未做完的工作,它要让儿童养成一种愿望,即直接参加为别人所需要的生产劳动。它应该授予学生共同的劳动技巧,使他们能够广泛地观察各种社会关系,使他们学会与别人一起生活,互相帮助,同甘共苦。7岁到12岁这一时期相当于儿童上小学的时期。小学能让儿童学到什么呢?读、写、算的能力,掌握许多陌生的、机械地记住的思想。它不能使学生养成劳动的习惯,它既不能给孩子们劳动材料,也没有给他们必要的指示和时间。现代学校是读书学校,而不是劳动学校。现代学校压抑儿童的社会本能,而不能发展这种本能;毫不注意儿童的游戏,不注意他们的集体活动,不注意让他们参加劳动和成人的生活。学校使儿童脱离生活,脱离成人,缩小了他们的视野,使儿童脱离组织。它对儿童的一言一行都加以干涉。一般普及的小学当然应该具有实际的性质,应该广泛采取劳动原则并增强儿童的社会本能。

二级学校的学生正处在一个把已经获得的印象加以深化、改造,系统化的年龄时期。这是学习的时期。男女青年开始研究自己,研究社会,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在这段时期,批判性的思想表现得很突出。这是一个人的成熟时期。在这段时期让儿童获得大量的印象和事实是极为重要的。这些事实可以激发他的一定的理想,使他产生全面阐述这些事实的要求。这是世界观形成的时期。这个时期特别重要的是授予学生方法,使他们掌握把已获得的知识连贯起来的要领。

在这段时期,学生有某些意志薄弱的表现,学生的个性已完全形成,他的外部生活正按既定轨道进行。在这段时期,特别重要的是让男女青年养成牢固的劳动习惯和集体生活习惯。在这段时期,创造性地表现自我有所削弱,因此应该去掌握各个生产部门的劳动机器本身。

这几年的学校生活是在中学度过的,而目前中学完全不注意学生的个性,不注意必须由他们独立进行检验已获得的经验。从事生产劳动和发展社会本能在现代中学里所起的作用简直微不足道;中学里和小学里一样,占主导地位的是学习;中学也同样压抑学生的个性,呆读死记,脱离社会生活。

高等学校的宗旨是培养专业人材,就其实质而言它不可能是普及的,所以此处暂不涉及。

总之,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所有这些都是总的发展阶段上的几个密切相联的环节。社会主义学校与目前学校的主要区别在于,它的唯一目的是使学生得到充分而又全面的发展;它不会压抑学生的个性,而是有助于个性的形成。社会主义学校是自由的学校,在这种学校里,刻板的训练、机械的教育、呆读死记的风气没有容身之地。

但是,学校在帮助学生形成个性的时候,应该使他能公益劳动中表现这种个性。因此社会主义学校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广泛地开展儿童生产劳动。现在人们常常谈起劳动教学法,但是在社会主义学校里不仅应该采用劳动教学法,而且应该组织儿童的生产劳动。社会主义者反对剥削童工,但是他们主张儿童从事力所能及的、有助于全面发展的劳动。生产劳动不仅可以把儿童培养成未来社会有益的成员,而且可以使他们成为现代社会有益的成员。儿童认识到这一点,是有着重大教育意义的。在如何组织儿童的生产劳动上,资产阶级想出了许多花样;组织菜园劳动队,帮助生产部门做一些统计工作,帮助分送信件,为士兵缝制防寒衣。美国学生还打扫街道,制作食物,进行计算工作,鉴定产品的真伪,张贴广告,分送书籍,制造教具等等。这些组织生产劳动的经验应该加以收集补充,使之系统化

而趋于完善。在这里,各级工会组织、合作社、农村组织都应该帮助教师。这项工作很重要,完全能完成,因此应该立即着手进行这一工作。当然,组织儿童进行生产劳动的学校与目前的读书学校很少有相同之处,但它与生活 and 现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学校里进行的儿童生产劳动与教学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可以使教学有百倍的生命力,使教学更加深刻。这种学校将要培养受过全面劳动训练的人,他们能从事各种工作,操纵各种机器,适应各种生产条件。他们也能从事智力劳动,而这种劳动至今还是少数特权阶层所独占的。居民本身也应该能够从事这种劳动,这样才能从官僚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为生活的主人。

社会主义学校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建立,因为使它成为社会主义学校的原因并不在于这种学校的领导人是社会主义者,而在于这种学校的宗旨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要求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偶而也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学校,这种学校的宗旨也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使之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非常发达的社会本能,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学校是很个别的,而且生命力不强。在这种学校里受过教育的青年,离开学校之后,就进入了这么一种环境,这种环境很快就把教育效果化为乌有。在那种把人分为贵族和平民、分为“智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社会里,青年只能选择一种劳动,因而他从事“多方面”劳动的能力就减退了。同时究竟选择哪种劳动并不取决于他本人,而是取决于他的经济地位,取决于他的社会关系。贫穷的、只同工人有“关系”的人,不管他的生活情况如何,都只有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为伍。而一经进入这个队伍,他就得干出卖自己劳动力的重活。在这里,他的十分鲜明的个性只不过是一种妨碍而已,使他的单调的、不自由的劳动更为沉重、更难忍受。强烈发展的社会本能只有在青年人具有一个战士的本性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而在其他的情况下,这种社会本能只不过是受苦受难的源泉而已。在资本主义社会

里,社会主义性质的学校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能培养出这种战士,因为战士必须在生活中受过严格的训练,而附着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学校只可能是一种不合国情的舶来品,只可能是一个脱离生活的机构。由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学校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为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机构,它至多不过是一个有趣的教育实验而已。它只能是一个私人企业,而不是一个国家企业,因为国立学校的面貌已经由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决定了,而这个阶级所提出来的学校宗旨完全不同。资产阶级在安排学校的工作时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是从必须保证自己的阶级统治权的观点出发的,而不是从每个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出发的。

只有人民政府在办学时才能兼顾个人和社会的利益。但是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理解,则要根据人民政府取得政权的时间而有所不同。如果人民政府是在资本主义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取得政权的,那么人民政府所关心的只是尽可能建立民主的学校。学校的民主化使知识也民主化起来了,并使知识不再成为统治阶级独占的财富。在美国就有这种民主化的学校,这种学校是在美国南北战争中获胜的政府所创办的。

但是,当人民政府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强大时期取得政权时,那么,它根据个人和社会的利益,就会摧毁旧时的阶级学校(这种学校的不公平令人发指)而建立符合当时要求的学校。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培养适应这一制度的人。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是大量地浪费劳动力,是一部分人拼命劳动而另一部分人只是吃喝玩乐,而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就是合理地、有计划地、最恰当地进行人与人之间的分工,把强制的劳动变为自觉自愿的劳动。为此就需要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这种人要能适应经常发生变化的生产条件,能在自己的工作中表现出个性特点。生产的性质不言而喻地会用这种精神去培养人,去在这方面对他们进行根本的改造。但是,由强制的劳动转向自觉的劳动,由单调的、狭隘专业的劳动转

向多方面的劳动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最初非常困难(特别是在俄国这种普通教育水平非常低的不文明的国家里),而只有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培养出来的青年一代才能改造整个社会。社会主义学校肩负的任务就是培养这样的未来一代。

论自由学校问题

当前对自由学校的问题讨论极其热烈,或撰写文章,或发表谈话,参与者甚众。但文章和谈话涉及此类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者多,谈到如何组织这种学校者少,而任何一所自由学校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它的组织工作。新型学校的教师所具备的组织才能应当大大超过其教学才能。他要善于组织儿童的共同活动,使这一活动能做到统一协调,具有一致的思想;否则,自由学校就会变成儿童们不是在此学习独立工作,而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指望大家为他效劳,让他尽情享乐这样一个场所。

当然,自由学校的组织工作与其说是理论研究的对象,毋宁说是实际试验的问题,但这并不妨碍在报刊上对此问题进行讨论。

本文,我只想谈谈儿童自己在自由学校组织工作中所起的作用。

现代学校把学生仅仅当作一种原始材料,当作一堆粘土用以塑造这种或那种人物:手工业者,政府官员,优秀公民,社会活动家。诚然,这时也常常谈到学生的个性问题,谈到必须考虑个性问题。但这是指什么呢?这是指必须了解你用以塑造人物的那种粘土的性质。而对儿童自己鲜明的个性,以及他精神领域深处的那一复杂的内在生活,却完全未加注意,不够认真研究儿童的个性,不够尊重儿童的个性。

儿童以探求的眼光注视着周围的生活,他们在观察,在思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与儿童有接触的那些人之间的关系,在儿童的脑子里引起了成千上万的问题,唤醒了儿童的心灵里的喜怒哀乐的情感;只不过他们不能用成人能理解的方式来陈述、来表露而已。“孩子不哭不喊,母亲就不管不问。”成人往往认为儿童比实际情况要稚气得多(如果可以这么表述的话)。儿童置身于幼儿园和学校的热忱气氛中,人为地脱离了他想投入的生活。

我知道,支持自由学校的人在理论上是重视儿童的这种人的个性的,但是正如法国谚语所说:“le mort saisit le vif”(死人牵着活人的鼻子走),在教育学上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无疑会对支持自由学校的人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这些人并不关心把青年一代(从10—12岁开始)吸引到自己一边来。

不能因为儿童不会对他周围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现象表述自己的观点,就认为不应对他谈起这些现象。他们不能表述自己的观点,并不说明他没有考虑这些现象。当然,如果儿童毫无意义地重述他们从大人那儿听来的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和事实的评论(儿童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还不能独立地进行这种评论),是完全不合适的。这显然是一种极不健康的现象。但我认为,应该给10—12岁的儿童讲述以下这种思想:“现在人们的生活很苦,谁想做一个有益于人们的人,就应该勤于思考,努力学习,会做工作。”自由学校的任务就是要把自己的学生培养成这样的人:他们不仅自己生活幸福,而且处处显得朝气蓬勃、知识丰富、热爱劳动。但是,如果儿童本人不在这方面下功夫,如果他们不努力获取知识并且善于运用这种知识,如果他们不去帮助自己的同学和其他一切他们能够帮助的儿童做到这一点,只是依靠自由学校的教师,是不可能完成上述任务的。

我认为,这种思想应该像一根红线似的贯穿于新型学校的全部生活之中,把新型学校团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里,学生和教师都为同一个共同的理想所鼓舞,都从事一个共同的事业。当然,凡此种

种,皆取决于教师的热忱。如果他对自己的工作怀有信念,热爱自己的工作,那么他的这种坚定信心和执著情感定会潜移默化地使学生受到影响和感染。

但仅仅这样还不够。还必须教学生学会去实现这一理想。在这方面,采取广泛的措施吸引学生参加教学工作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每个学生应该既是学生,同时又是教师。

凡对儿童进行过观察的人都知道,儿童具有强烈的愿望要把自己的知识与别人分享。一个小孩刚刚背会一段课文,就急于去教自己的弟弟和妹妹,教自己不识字的同伴、佣人。促使儿童这样做的动力,是他的一种天赋的积极性:希望把所获得的知识用于实际工作。在这里起作用的还有儿童的一种社会本能:希望成为一个有益于别人的人,还可能有一种检验自己的模糊要求在起作用。

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儿童都很想扮演教师的角色。应该说,儿童也具备扮演这一角色的素质。他对刚刚掌握的知识津津乐道,他还深切地感到,由于获得了这一知识,他的视野如何扩大了,他还会情不自禁地以自己的这一乐趣来感染他的同学,——儿童是喜欢模仿的。

此外,从心理学方面看,儿童对别的儿童总是比对成人更亲近:他往往很详细地告诉自己的同伴一件事情,而对教师却绝口不提此事。

自由学校的教师应该充分利用儿童想教别人的这种愿望,调动他的这种积极性并将它引上正轨。

这个思想本身并不新颖。英国学校广泛采用了这种办法,学校的教师经常依靠高年级学生的帮助来进行教学工作,而在教育工作中利用此种帮助的时候更多。拉利姆写的《根据儿童心理进行的教育》这本饶有兴味的著作里,坚持了这种思想。他说:“要让儿童互相提问,互相检查对功课的理解和掌握程度。这样一来每个学生依次都可起到教师的作用。”(第181页)他接着写道:“如果我对一个学生提问后,发现他对某一问题或某一历史时期掌握、理解得很好,我就让他对别的同学就这个问题进行辅导:‘这个问题你理解很深,

可以帮助别的同学。如果他们中间谁有什么疑问或遗忘的地方,不必来找我,可以问你。你完全可以代替我做这件事。’只要教师能让 学生代替自己,自己可以不去起一个教师的作用的时候,他都要这样去做。这种做法大有好处,不妨一试。”(第 183 页)

我认为,吸引儿童本身参加教学工作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

现代学校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个糟糕透了的教育机构,因为它不仅不去发展儿童的社会本能,反而千方百计地扼杀这种本能。

我不想多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谈得很多了。在研究教育问题的人中,未必会有人怀疑。现代学校盛行的评分奖惩制度将使卑劣的利己主义得以发展,儿童团结一致、互相关怀的情感受到摧残,那种最起码的正义感将被扼杀。

在儿童既学习、又教别人的学校里,他们不再感到自己是必须绝对服从在他们看来极为无理的要求的奴隶,也不是教师必须殷勤照顾的来宾,而是一个小团体的有益成员。这个团体需要他们,他们也离不了这个团体。

儿童感到自己是社会不可缺少的成员,他做的是大家需要的事情,必须充分评价儿童的这种意识情感所具有的教育意义。它可以培养他们的自尊心、对事对己的认真态度,也可以避免产生内部的争吵、精神的空虚和不满的情绪。

儿童迫切要求成为一个有益的人。这种要求在家庭里多少还可以得到满足,而在现代学校里,这种要求就无声无息,没有引起任何重视。在自由学校里,教师应教育儿童成为有益的人,教育他们自己的力量为别人谋利益。他应该告诉儿童,怎样去帮助那些水平比自己差的,应予以某种帮助的同学或小朋友,以及用什么方法去帮助他们。

我认为,应该尽量满足儿童想成为有益的人的这一要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举例说,可以让一所中学与某一所条件很差的农村学校建立联系,让孩子们在教学用具方面为农村学校服务。在进行这

项工作时,只消给孩子们一些指导就行了。例如,可以告诉他们如何利用旧的画报(如《涅瓦》画刊)编地理、历史小册子以及童话故事的插图集,等等。了解一下儿童所表现的主动精神和毅力,看看这项活动如何密切师生关系并促进儿童个性的发展。这样一来,既可以满足儿童的创作要求,同时也可以满足他们成为一个有益于他人的人的要求,而且正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去成为有益的人。

为了同样的目的,也可以让学校与某个幼儿园建立联系,教育学生为幼儿园的小朋友缝衣服、做玩具,有时还可以让他们去照顾这些小朋友,一起做游戏。

当然,所有这些事情都很复杂,都需要进行组织、加以引导,使这一切都做得很有生气。舍此还有别的办法吗?

回头再谈互教互学问题。吸引儿童参加教学工作还具有另一方面的教育意义。“教学相长”,这是众所周知的教育学真理。从事教学工作的人都知道,教学是进行自我检验的最佳手段。你刚一张口向别人讲述某个似乎已经明白了的问题,却突然发现知识上的缺陷。所以,儿童临时充当教师,就会明白自己知识不足之处,感到必须加以补充。经常进行自我检验、自我评价,这在教育上是至关重要的。

吸引儿童参加教学工作,同时还能培养他们的自制力、忍耐心,培养对他人的关怀以及对同学所取得的成就所感到的喜悦之情。

吸引儿童参加教学工作,必然会使学生很早就来讨论教育学的某些问题和某门学科的教学法问题。目前,只有中学高年级才讲教育学,而由于教育学与儿童息息相关,所以孩子们早就对教育学感兴趣。孩子们经常互相讨论教学方法,以及自己教师采用的各种教育方式。而且他们在进行这种讨论时,表现出相当的观察能力。教师们为何不积极参加儿童们的这种讨论并将其引上正轨呢?这样做可以大大密切教师与儿童的关系,加深他们的相互了

解,使儿童关心自由学校的组织工作和自由教育。他们可以为这一工作做出更多新的贡献!

常常有人说:“新型学校所需要的教师与目前的教师完全不同。他应该十分关心教育问题,具备超群出众的组织才干、渊博深厚的知识基础、敏锐犀利的洞察能力以及主动精神和细致作风。这些教师从哪儿来?”如果自由学校能吸引本校儿童参加教学工作,如果它一开始就能吸引儿童参加本校的组织工作,并用自己的教育思想来激励教师,向他们展示实际运用这种思想所取得的成果,那么,自由学校就会造就出一批必要的新型教师。

而那些参与了别的活动的学生(这种学生自然总是占大多数),将永远对教育问题怀有浓厚的兴趣,懂得这些问题的意义并千方百计地促使自由学校思想的实现。

与此同时,吸引儿童自己参加教学工作还可以解决一个对许多人说来似乎不能解决的问题:为了发展学生的个性,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要从个性出发来对学生进行教学工作,而在现行教学制度下,一个教师就只能教有限的学生。这样一来,自由学校(其教学工作完全由教师负担)就会成为一个收费昂贵的机构,入学的人数就会微乎其微。但是,如果学校成了某种劳动场所,每个学生在这儿起的作用时而是学生,时而又教师,那么它所需要的教师人数就会少些,因而收费就低廉得多,广大居民就能把自己的子女送来学习。

是否应教男孩做“女人家的事”?

在《圣彼得堡国民教育委员会1908年工作总结》中,一位教员在评论手工教学时说:“谈到手工,我极感欣慰的是,几乎在所有男

女合校的学校里,从事手工的不仅有女孩,而且有男孩。这些男孩非常喜爱这种活动。在有些学校里,他们的成绩(例如缝纫和编织的成绩)甚至还超过了女孩子。”

这段话摘自上述总结,载于去年12月号《教育通报》新闻记事栏内。该栏编辑对教男孩学习缝纫是否有益甚表怀疑。

我想对此问题略抒浅见。

首先我想一般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有一些至今认为只应由妇女来干的活(如缝纫、做饭、洗衣、照看小孩,等等)是否应教男孩去做?

在现代社会中,家庭生活是与操持家务有关的许多琐事联系在一起的(大概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这样)。将来,生产改革和社会生活条件改善之后,这种情况也就会有很大改变,但目前的家庭生活还是与做饭、烧菜、收拾房间、缝补衣裳、养育子女等联系在一起的。所有这些工作全都落在妇女身上。

在收入较多的家庭里,这种劳动就落到女仆——厨娘、使女、保姆身上去了。富裕的妇女之所以可以不必从事劳动,是因为她把这种劳动转嫁到另外一些没有条件摆脱这种劳动的妇女身上了。但是不管是哪种情况,整个家务总是完全落在妇女身上。在工人家庭里,丈夫有时也帮助妻子料理家务,这是由于家庭贫困家的事”的轻视态度。

当然,指望教男孩做“女人家的事”而能取得巨大的成果,这是可笑的,但这是树立学校里的集体精神而值得注意的小事情之一。

教育管理工作的两种方法

法国教育杂志《Reve Pédagogique》(《教育评论》)1910年9月号刊载了Roger(罗歇)所写《布鲁塞尔博览会上的初等教育》一文。罗

歇在谈到比利时这一部分时说 根据比利时国民教育部大臣的意见 , 1910 年的博览会应该根据既定的统一的教学大纲 , 尽可能做到用图例来说明问题 , 同时对学生宣传根据某一原因必须向他们灌输的思想。这一思想应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 应在各个年级 (从幼儿园开始到成人学习班) 的课堂上得到发扬。

布鲁塞尔博览会表明了比利时大臣的这一意见是如何付诸实践的。为了发展殖民生活 , 教育部里向教师们提出了一个口号 : 培养学生对旅游的兴趣、探险的爱好发扬他们的独立进取精神。教师们随即采取措施 , 纷纷修改了自己的教案。布鲁塞尔博览会上展出了教师们的大量教案 , 充分显示了比利时教育界雷厉风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当然 , 博览会上没有展示也不可能展示这种教学的效果。这样就不可能作出估计 : 由于修改教案 , 学生的独立进取精神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发扬。而只有这种效果才能证明这位比利时大臣的主张正确无误。

罗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人 , 他对法国教育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中央集权的做法习以为常 , 因而对比利时教育界这种明快的工作作风大为赞赏 , 对比利时教师这种严格执行命令的精神大为推崇。

培养活生生的人 , 所根据的是某一死板模式 , 对儿童的心灵和智慧进行大量的机械加工。上面下达一项任务 : 在某一时间、为了某种需要 (这次是为了殖民地生活的需要)、生产多少商品。于是大批教育工作者就立即采取行动……

教师本人、教师的观点 , 教师的教育经验和信念置于何地 ? 教师同仁置于何地 ? 居民置于何地 ? 居民怎样参予学校工作 , 促进学校工作的开展 ? 父母的意见置于何地 ? 所有这些问题都一字不提。

从罗歇的文章判定 , 比利时国民教育工作的景况是极为凄凉的。我们不禁要把它与美国的国民教育工作的景况作一比较。美国

的居民对欧洲官僚主义的作风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他们认为官僚主义会窒息任何有朝气的工作,会扼杀任何个人的首倡精神。

最令欧洲人惊奇的是,美国没有任何一个部来管国民教育工作。美国只有一个“国民教育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没有任何行政权力,它不进行管理,不下达命令,只是召开一些与教育工作有关的会议,出版一些教育统计材料。这些材料载于年度报告和定期出版物上,日报从中摘引一些材料进行讨论。这些材料的内容既涉及美国各州,也与其他国家有关。年度报告书上通常都附有一位政府官员的说明意见。这位官员是教育学专家。他向居民发出某种号召,并向美国各州的公民提出建议,告诉他们如何贯彻执行行之有效的国民教育制度及如何协助全国教育工作的开展。

当然,每个州都有一个专门的官员主管国民教育。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作用仅限于以该州代表的身份参加考试委员会,并负责市定教育统计材料。即使是在他起领导者作用的地方,他起的与其说是政府官员的作用,勿宁说是业务专家的作用。

每个州分为若干学区。每个学区设政府督学一名,其主要职责是担任学区的主考人。他负责对全区各个学校进行监督。一般认为,这种监督的力量极其薄弱。

所以说,美国政府对教育工作不实行集中的管理。

那么,美国学校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制定,以及校内规章制度的拟定由谁负责呢?所有这些都由教育委员会选举产生的督学负责。教育委员会是一个选举机构。从前选举教育委员会(通过平等的普选)只有该地的男性公民才参加,现在妇女和达到一定年龄的女孩子也可参加选举。教育委员会应关心校舍的修建和设备的添置,关心学校教学工具的供应。教育委员会选出督学,批准督学提出的教师名单或直接任命教师。

教育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均公开举行,一切措施均公诸于众。督学和教师的活动既是报刊,也是家长热烈讨论的对象。家长可以时

常去听课,参加各种考试^①和庆祝会,跟教师和校长谈话。

一位致力于美国教育研究的德国教育家说:“一般说来,教师与家长的这种交往很有益处。家长不仅关心自己子女的成绩,他们的兴趣还要广泛:家长开始关心各种教育问题,去完成某些教育任务。这样一来,美国村社学校的影响远远超过德国学校的影响。它使国民受到影响,对成人产生作用,从而成为一个具有广泛民族基础的教育机构。”(威廉·缪勒尔:《美国国民教育的本质》,第12—13页)

最近以来,美国家长大会的规模日益扩大。1904年,波士顿首先出现了这样的组织。1907年,全部学区已有五个举行了家长大会,每次会议平均有三四百人参加。家长组织举办的教育专题学术报告会,同时展开讨论,每次都有八九百位家长参加。1907年在洛杉矶和加利福尼亚成立了六十个家长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代表既积极参加学校的教育委员会的会议,也积极参加各种教育创举活动。

凡是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地方,工作进展就特别顺利,如罗契斯特市就是这样,那里的组织全是由公民们一手创办起来的。罗契斯特市市民的各个阶层都普遍参加了家长组织,其活动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在美国,任何创举几乎都发自居民,而所成立的协会则为这些创举的付诸实践铺平道路。这样产生的协会对国民教育事业很有帮助。近年来开展活动比较多的有两个协会: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al Association),以及公共教育协会(Public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如上所述,美国教育的组织管理工作不由政府负责,而由国民自

^① 在美国,每个准备到某校任教的教师都要接受地方考试委员会的考试,即使他已有几十年教龄也不例外。持有任何证书和文凭亦不能免试。这种考试可能使教师很恼火,但可以促使他注意不断丰富和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作者注

理。政府让国民自愿管理此项工作。另一方面,各州和各市的教育委员会是彼此独立的。由于这个缘故,以及由于各州、市、镇的条件不同,美国教育工作的发展所经历的途程十分不同。全国教育协会使各个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在精神上保持一致。该协会的成员是国内各方面的群众。当然,美国还有一些保护教师职业利益的协会。全国教育协会不以此为目标。在该协会内,各级教师(大学的学者教授与偏远农村的女教师)团结友爱,并肩工作。著名教育家的演说使听众深受鼓舞,并增强了他们的信心:教育事业是伟大的事业,每个人不论能力大小,都应它为作出自己的贡献。

新大陆的学校形形色色,其宗旨也各不相同,尽管如此,教师的共同活动给教学带来了统一的精神。在全国教育协会的年会上,如有需要,就对各种教育问题进行讨论,作出决议。一切大报均刊载有关这些代表大会的详尽材料,并对会上讨论的问题表明一定的立场。通过这种途径,以及依靠地方的分会,这些代表大会的成果就传到了教育委员会,他们往往按大会的指示来指导自己的活动。

全国教育协会完全由各级男女教师组成。至于公共教育协会,其参加者本身虽不执教,却是极其热心国民教育工作的人。有谁比家长(尤其是母亲)更关心青年一代的喜怒哀乐!正因为如此,所以刚开始时协会主要的参加者是妇女,她们纷纷集会,想让学校与家庭保持更密切的联系。

公共教育协会的会员研究儿童的本性和学校立法,讨论教育的目的和方法。他们是教师的积极合作者。与此同时,他们非常关心教师的活动,而且,只要他们觉得是对的,他们也敢于对这种活动进行严厉指责。

现在,我们把上述有关美国教育工作的情况作一总结。美国政府把全部教育工作的组织管理交给国民。国民依靠选举产生的教育委员会管理国民教育的经费和教学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可以在国民教育全国委员会广泛发行的刊物、日报、报告书和教师代表

大会上,找到如何搞好这一工作的指示。这些东西广大的居民阶层也都能得到,这可以使他们能够自觉地对待教育委员会的活动。教育委员会的活动完全公开,大家能对这一活动进行监督,而家长组织和关心教育事业的人所参加的协会组织又为进行这种监督提供了可能。

我们不想详谈这一制度所产生的辉煌成果。美国以自己的学校、教学法、图书馆等引为骄傲。我们只想指出,像比利时那种管理教育的方式,对自由学校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自由学校只有在美国这种制度下才能广泛地发展,因为这种制度与各种琐碎的规章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还有一点意见。目前,德国教师中最先进的分子提出了一个问题(参见肯尼希·舒尔茨不久前出版的著作),认为必须出版全帝国的学校法,根据这一法令,全德国的教学都按一个教学大纲、一个教学计划进行。把所有的学校纳入一个模式,其理由是:工人的孩子经常转学,因为他们的父亲常常到处找工作。这个理由似乎很充足,不过只是乍看起来是如此。主张搞一个全帝国的学校立法的人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他们的标准是现代改革了的学校,在这些学校里,大纲和教师就是一切,而学生的个性则谈不上。当然,如果现在某个学校某个年级只讲算术,而另一个学校相应的年级还讲几何学,还有,如果不知道几个几何概念和术语就经常责备儿童,使他不能和全班同学一起学习,那么,这会使儿童感到苦恼。但是在改革了的学校里,放在首位的是学生和他的一般发展水平,教师和同学会帮助新生很快适应环境并迎头赶上别同学。因为我们所说的是小学,在那里只是学习初步的知识而不是某种专业知识,在那里,学生最重要的是掌握获得知识的方法和劳动的熟巧。因此,为了使工人的孩子在转学时学习不受影响,不应该是使各个学校统一化起来,而是要改革教育工作,向美国的组织管理办法看齐,因为这种类型的组织管理办法能使自由学校巩固发展。

无产阶级的儿童

孩子们,尽情地游乐吧!自由地成长吧!你们有如花似锦的童年……

住在大城市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的孩子的童年并不太幸福。童年的印象非常贫乏,因而根本没有留下什么值得回忆的往事。

莫斯科教育小组想了解一下进入莫斯科各市立学校学习的儿童的智力发展情况。起初调查了 354 个刚入学的八岁以下的儿童,而且这 354 个儿童中,没有一个人的父母是从事自由职业(律师、医生、教师、作家等等)的。通过这次调查,使我们了解了无产阶级儿童的生活情况。

工人的子弟从四、五岁起就帮助家里做事。八岁的时候他们已经担负起成年人的工作。“八岁的儿童不仅要照顾自己的弟妹,而且他们还要洗衣服、擦地板、劈木柴,甚至还要帮着干些手工活”。负担特别重的是女孩,全部家务儿子都由她们操持。

在所调查的儿童中,有 85% 的女孩和 54% 的男孩都要干家务活。家里的人没有时间照顾小孩,因为他们都忙于工作。有半数儿童从来没有听过任何童话,任何故事。所调查的儿童中有 76% 的人从来没有到城郊去玩过,不仅没有到城郊去玩过,而且一般地也没有到附近几条街道以外的地方去过,没有看见过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运河。85% 的儿童没有在冬天到过农村,而几乎半数——40%——的儿童没有在夏天到过农村。

有很多儿童从来没有看见过奶牛、绵羊、鸭子,没有到过森林和田野,从来没有采过浆果和蘑菇……有的儿童连母鸡也没有见过。

那么这些儿童究竟知道些什么呢?

如果你问他们母鸡有几只脚,他们会回答说有三四只。他们不知道是乌鸦多些还是麻雀多些。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做的什么工作,不知道住在哪条街上,也不知道自己住的房子有几层楼……

问他们能不能讲讲自己生活中的某件事情,70%的儿童不会讲。有些儿童干脆回答说,没有什么可讲的,生活中没有发生过什么值得讲的事情,或者是说:“记不起了,我没有看见过什么事情。”

莫斯科贫民的生活情况就是如此。彼得堡的情形也与此不相上下。你们去听听市内一些女教师所讲的情形。她们每个人都会讲起自己学生的生活中的一些令人非常惊讶的现象。

怎么办?首先必须更慎重地对待儿童,对待他们精神上的需要。此外,还要努力改善物质状况,不要让儿童担负力所不能及的劳动。最后,还要在城市里设立许多办得较为完善的幼儿园,使儿童能从三四岁起在那里做游戏,通过游戏来学习,熟悉自然情况,了解广阔的世界。

在这方面我们什么工作也没有做。可是这个工作必须做,因为儿童是我们的未来!应该把他们很好地武装起来,为实现我们的理想而斗争。

家庭与学校

艾伦·凯在他的名著《儿童世纪》一书中写道:“我经常幻想的,就是今后不再开办幼儿园,不再为小孩开办学校,而代之以家庭教育。”

“现在有一种日益严重的趋向,就是把儿童送进托儿所,然后送进幼儿园,接着送进学校,去接受理想的教育计划,我认为这是很大的不幸。每当谈及妇女积极参加社会生活的可能性时,人们都说,这

种计划可以使母亲免去照顾孩子之劳累,而儿童也可以摆脱母亲不周到的照顾,从而使妇女有可能走出家门参加工作。”

“在目前的情况下,许多当母亲的人走出家门参加了工作,她们又不能很好地尽自己照顾子女之责,因而托儿所和幼儿园对许多儿童说来是一种极大的帮助,这无疑是正确的。很可能,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例如儿童没有年龄相当的人一起玩,母亲不愿或不能教育儿童(之所以不能,往往是过于好动、意志过弱或非常抑郁的结果),那么,某种类似幼儿园的机构永远是不可缺少的。”

“在许多场合,梅里·沃里斯通克拉弗特一百年前所表述的下列思想至今还是正确的。他说:‘如果儿童在肉体上没有被十分愚昧无知的母亲弄死,那他们也会在精神上被不善于教育的母亲扼杀。前六年过后,儿童下一步的整个发展过程即已确定,母亲就把他交到女仆手上,然后就是把孩子送进学校。学校应该纠正孩子们的坏习气。对这些坏的习气,母亲们如果警觉一些的话,本来是可以预防其产生的。而学校用以纠正这些坏习气的手段,往往又是各种恶习得以产生的源泉。’尽管这种情况屡见不鲜,许多当母亲的人总是不善于教育孩子,但我们还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大多数妇女不可能成为优秀的教育者,何况随着妇女教养的提高必将提出这一任务。未来的任务就是要培养一代新的母亲,她们将使儿童摆脱幼儿园的体系。”

“从儿童两三岁起,就像看管一群小动物似的把他们看管起来,要他们在房间里走,按同一的计划活动,完成同样的小任务,既无意义,又无益处,声称这就是在教育人,实际上是训练小卒!只要谁童年时在大海之滨、密林深处或宽阔的儿童园地玩过,或者在堆满杂物的阁楼玩过,或者看见过别的孩子在哪儿玩过,他就知道,这种自由自在的游戏对发展精神力量、进取精神和想象能力所具有的意义,要比成人不断安排的游戏和作业所具有的意义高出百倍。这种游戏和作业教儿童不要单独游戏,而要跟大家一起玩,——养成一种精神上贫乏的习惯,同时,孩子们忙于去生产一些谁也不需要的小玩艺,还

冠以‘劳动’这一响亮的称号。教育的任务在于教孩子们不屑于去干这种没完没了的琐事(因为它歪曲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使生活变得如此矫揉造作),教孩子们让生活简单化并发掘它的巨大的益处。而幼儿园体系却是培养那种知识浅薄之徒的最好手段,这种人的‘群体’意识倒是很浓厚的。”

“如果目前甚或将来还不能取消幼儿园,那就让它成为一个可以让孩子们像小猫小狗一样自由游玩的地方,让他们自己找事情做;给他们提供材料,让他们自己去作他们想做的东西,给他们找一些可以做游戏的小伙伴一起玩。在那儿安排一个聪明机灵的妇女,她的任务只是注意不让孩子对自己或别人干出有危险的事来。她不时可以给他们一些帮助,讲个故事,教他们做一个愉快的游戏,其余则一概不管,不过在此同时要不断地观察和发现儿童性格上的特点和他们的爱好,因为这些东西只有在自由自在的游戏时才能显现出来。母亲本人也应该这样观察孩子们的游戏,观察他们对游戏伙伴的态度和他们的爱好,要尽量做到多观察、少干涉。这样长期全面地坚持观察,最终将使母亲比较准确地了解自己的孩子。一个生物未必总是能充分了解另一个生物,即使这个生物给了它生命,每天都给它以新的生活,使它感到母性精神的巨大幸福。儿童的出生是身体成熟的标志,同样,儿童的教育是他心理成熟的表现,这个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缺乏心理学上的见识,大多数家长一生也未达到成熟的程度。一些最伟大的原则,以及克尽义务的急迫意向,我们往往把它与完全盲目地对待儿童的个性、对待他产生某一行为的真正原因、以及对待儿童各种品质的综合等等混淆在一起了。”

“我们试举出一些最荒诞的谬论。例如,小孩子时常长时间地很有兴味地研究镜子里映照出的自己的模样,人们往往把这称之为卖弄风情。儿童由于害怕或心慌不能回答某些刺耳的或不懂的问题,没有听明白它的意思,人们往往把这称之为顽固执拗。儿童对自己所做的许多小事不能说明其原因(大人往往也记不清楚),于是就

说孩子撒谎,而当他还没有形成私有这个概念之前,拿了一件他喜欢的东西,于是就说他偷窃。如果孩子说他自己不好,并且愿意当一个不好的孩子时,就认为他粗鲁无礼、不知上进,而这恰好表明孩子的性格和自觉,本可以因势利导产生良好效果的。如果孩子由于专心思虑而忘记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就说他记性太坏。甚至于儿童真的表现出固执和怠惰,又把这些缺点看作是某种自主的东西,然而这些缺点往往是受某些需要注意纠正的更严重的缺点的影响而产生的,或者这些缺点是受某些好的品质的影响而产生的,如果采用不适当的方法去纠正缺点,可能扼杀那些好的品质。”

“即使有些家长对孩子的态度很明智,但是如果孩子很小就送到幼儿园和学校去了,家长也很难了解他。由于不了解儿童的个性,往往就容易产生一些误解而导致孩子和父母之间的深刻矛盾,这种矛盾造成了今日许多家庭的痛苦。父母只有尊重儿童的个性,并且全面地注意观察这种个性才可以避免产生通常的错误——缘木求鱼。在没有创造材料的地方不可能进行创造,但是应该善于发扬儿童天生的一些特点。对心理学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产生乐观情绪;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下定决心去遵循必然性。这种研究也可以使家长和儿童都同样感到痛苦的许多努力告一结束,因为花在这方面的精力完全是白费的。”

“但是,研究儿童的心理状态;从他出生开始,对他的游戏、劳动、休息,每天进行比较研究,这就要有专门的人。要做到这一点,只能一个人照顾几个孩子。要是照顾一大群孩子,那是做不到的,更何况孩子在群体中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就给观察带来了困难。”

“幼儿园好比一个工厂,把儿童当作原材料来塑造人,就像教孩子们按模型塑造各种东西,而不是给他们粘土让他们按自己的口味做包子一样。儿童在工厂的第一道工序——幼儿园被雕琢一番,然后,为了磨得更加平整光滑,又把他送入下一道工序——学校,于是许许多多庸庸碌碌的人就产生出来了。”

“……在大城市还存在的时候,就应该让贫穷的城市儿童能像农村的孩子一样,用他们周围的材料来做玩具,在完成家庭交给的任务后,能干一点名副其实的‘劳动’,而不是幼儿园里让干的那种看来有用而实际毫无联系的游戏似的‘劳动’。聪明的母亲或教师只汲取幼儿园制度中一点长处,就是教儿童学会对自然界和环境进行观察,使之善于把这一活动与某种有益的宗旨联系起来,把愉快的感情与某种知识联系起来。”

“福禄培尔有一句名言:‘让我们为儿童活着!’这句名言应代之以更有内容的一句话:‘让儿童活着!’”

“而这就是说,让他们忘却印入脑中的知识,忘却各种方法,忘却那些年的群体生活,当时潜移默化的工作是如此重要,有如种子在地里发芽一般。相反,幼儿园制度却像种子在盘子里发芽一样,只不过一时显得非常好看!”

“……无论在哪里,学校以及它的和谐的小团体精神,都使得对社会的良知变得迟钝起来。”

“因此之故,现代社会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把历代的罪恶加以重演,而且常常有一些在个人生活上十分忠诚老实的人参与其事。创立罪恶流派的比较大的罪犯,永远不可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儿童成天学着如何成为听学校话的人,成为对自己的同学非常忠实的人,以及日后如何对大学、对团体、对工作忠诚老实的人。学这些在先,而学如何忠于自己的良知、正义感、自己精神的活动则在后。他学会了不正视自己同学的以及本团体、本国的罪恶,粉饰罪恶,否认这种罪恶。”

“这样一来,世界上就出现了德雷福斯案件、德兰士瓦战争。如果就个人而言,而不着眼于一群人,那就应遵循国家伟人施泰恩的教育纲领:‘要发扬那些可以左右人的内在价值和力量的激励人的因素。’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让儿童从小就能有仅进行自由的选择,学会衡量自己选择的后果,认清自己意志的权利和义务,了解个人经

验的条件和任务。而所有这些都 会不自觉地受到幼儿园的压抑,只有在家庭里才能形成。最好的教育效果是把个人与他的良知直接联系起来。这并不排斥这个人逐渐能感到并要求成为整体中有益的一员(起先是家庭中 的一员,后来是同学中的一员,然后是祖国的一员,最后是世界的一员)的那种幸福。”

“不同之处在于,一种情况下人是建造各种活生生的形式的活生生的细胞,另一种情况下却是建筑物里的一砖一瓦。不仅在个性的发展上,而且在感情的培植上,幼儿园和学校都落后于家庭。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感情可能比较深沉,温情可能得到发展,并表现在家庭生活引起的行动上,而幼儿园以及后来的学校却使儿童摆脱了自然的、个人的义务,只是向他们提出一些全体学生都可以完成的要求。儿童在那里建立的都是一些表面关系,而这种关系也使感情变得非常浅薄,这是过早开始学校生活的最大危险。单纯的家庭生活又会产生另一种危险——感情过于浓厚。在感情正在形成,感情的培植对今后的整个生活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年代,必须要有家庭教育,午后,过了十二岁,就需要真诚的同志情谊。如果不以培植感情为基础,那末,通过最完善的方法获得的智力发展以及各种社会意向都是枉然的。要使头脑清楚,必须胸怀一颗炽热的心。只有那种能为他所爱的少数人而牺牲的人,才能为其他人而很好地活着”(艾伦·凯:《儿童世纪》)。

上面所引的艾伦·凯所著《儿童世纪》一书中,有很多独到的见解、细致的观察、对儿童的热爱,但是基本观点却是错误的。

艾伦·凯认为,未来的家庭教育将延续到十二岁左右。这是因为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更能促进儿童个性的发展。

艾伦·凯批评幼儿园制度和学校扼杀儿童的朝气,他的大多数意见都是正确的。目前的幼儿园和学校办得很不好。必须使之办得更加完善。应该让那些热爱并理解儿童的人去领导在校的儿童。这种人要尊重儿童的个性,具有必要的知识和教育鉴别力。应使学校

成为自由的学校,在那里,儿童不再受到处罚,他们的个性却能得到发展。应使学校给儿童提供劳动的机会,创造的机会,使他们能与别人愉快地交往。应使学校与实际生活、与家庭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是,艾伦·凯虽然批评了现代的幼儿园和学校,却并不想用办理完善的学校去取代现在这种不好的学校,她想用家庭去取代。不过又不是现在这样的家庭。艾伦·凯深知,从教育学的观点看,现在这种家庭是什么家庭。关于这个问题,她在书中谈得很多。她想用未来的理想的家庭教育代替学校教育,在那种家庭里,当母亲的将以十二年的时间用来教育孩子,她将具备必要的素养和坚毅精神,等等。艾伦·凯在这里犯了一个方法论上的错误。如果要把家庭和学校加以比较,那就应该把现实的学校与现实的家庭加以比较,或者把未来应有的学校与未来的家庭加以比较。这种方法论的错误见于整个论述的过程,完全歪曲了整个前景。

艾伦·凯十分惧怕“群体性”。群体性包含两个要素:一是模仿性,一是社会本能。模仿性与智力不健全有关。儿童总是要模仿某一个人:哥哥、比较强壮或聪明的同学、母亲、父亲等等。他往往模仿一些我们认为完全不值得模仿的东西,但儿童却很感兴趣,为之入迷。模仿之于儿童,其必要性一如独立的创造。这里也能体现儿童的个性。对成人说来,模仿往往看起来是一种愚蠢的依样画葫芦的举动,可是对儿童说来,这却是他据以检验自己力量的工作。当然,这不过是一个过渡阶段。随着意识的发展,模仿的愿望就日趋淡漠。如果孩子们在学校里互相模仿,那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置身于同学之间是模仿的原因,因而教育孩子就应该在12岁之前让他远离同学。这也可能影响到他,使他的社会本能退化。这种社会本能是对他人的一种同情的感情和理解的能力。学生们在一起共同体验的印象可以使他们彼此亲近起来。他们共同体验的印象越多样、越深刻,这种精神上的接近就越密切。在适当的条件下,这种社会本能随后就会从狭隘的同学圈子扩大及到广阔的世人范围。深切地感到自己

在精神上与周围的人团结一致,这是一种无比的幸福,也是一股巨大的力量。这种社会本能对儿童的个性毫无害处。家庭对儿童的这种社会本能往往不仅不予以促进,反而加以扼杀。皮耶尔·洛齐在他描述自己童年的一本小说中,有几处写得很有艺术的感染力,他在那里讲了他孩提时代所经历的斗争。一次,他从远处看到滨海城市的一群欢闹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热气腾腾,他情不自禁地走上街头,卷入了这股人流,投身到他们的生活之中。但他是父母的爱子,不愿让母亲伤心,于是他抑止了那种本可使他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本能。他没有成为这种作家。他对大海、对热带国家、对滨海城市和布里塔尼半岛的描述实在是令人拍案叫绝,他还长于表达海员的内心感受,但他对社会问题却不大了解,他笔下的人物无非是贤妻良母,丈夫儿子,或好或坏,只此而已……洛齐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上学很晚,他在学校里感到格格不入。但是家庭未能发展他内心蕴积的力量,而是扼杀了这股力量。

小团体主义是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对社会本能的一种歪曲,是用狭隘的外部圈子对社会本能的一种局限。学校当然也有小团体主义,但它不是学校固有的东西,而是学校不良组织的产物。在这里,我们不能把学校与家庭对立起来,因为我们不应忘记,家庭也是某种有其特殊利益的小团体。家庭的利益往往与别人的利益发生冲突,于是儿童必须作出选择,这时就很难说他对母亲和家人的热爱不会使他做出昧良心的事。儿童的处境往往很不好,他的精神负担很重。如果艾伦·凯认为,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更能促使儿童直接与良知联系起来,那就大错特错了。

艾伦·凯认为,家庭可以使儿童不受同学的欺侮,可以不受同学伦理的约束。实际上,家庭给儿童的压力往往大得多。家庭不能把儿童安排在其他伦理观点对他不产生影响的条件下生活。因为儿童要参与生活,关心家庭的利益。不仅父母要观察儿童,而且儿童在父母休息、劳动、娱乐时也要观察父母,观察他们对别人的态

度,于是很快就了解到父母喜好什么,讨厌什么,父母认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儿童对父母爱得越深,他们就越发以父母的伦理观点指导自己的言行,经常使自己的个性迎合亲人的口味。这种情况常见于感情深厚的家庭,在这种家庭里,儿童由于每时每刻都受到严格的监督而弄得疲惫不堪。在学校里,他觉得自己更自由一些,更像一个人。

艾伦·凯认为,家庭教育中的主要之点在于了解儿童的个性,并根据他的个性来对待他,这也是错误的。了解当然很重要,但在教育上更为重要的,是整个家庭生活方式。如果家庭成员互相关心体贴,都有广泛的社会兴趣,如果劳动把家庭组成一个和谐的集体,那么,家庭就会对儿童产生良好的影响。但是,如果家庭过的是游手好闲的日子,只是追求享乐,如果家庭没有高尚的理想,而是利己主义思想占上风,那么,对儿童的个性进行任何全面的观察了解都无济于事……对家长来说,家庭教育首先是自我教育。对劳动的热爱也是如此。远非所有的家庭都能教儿童学会劳动。富裕的家庭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目前即使是贫困的家庭也不能经常做到这一点。家庭成员的劳动要想对儿童产生教育意义,那他就要当着儿童的面劳动,而且儿童自己也要参加劳动,可是现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由于生产条件的要求都不是在家里干活,不仅父亲是这样,母亲也是这样。此外,家务劳动的范围日益缩小。过去,举凡纺纱织布缝衣均在家里,制皂做烛,饲养家禽,自给自足。现在,城市的家务劳动日益局限于收拾房间,做饭,缝衣。当然,家庭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劳动都应该教儿童学会,但不止于此。劳动学校将给家庭以帮助,它使整个学校结构发生了变化。自由的劳动学校密切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以及学生之间的关系,官样的学校关系被亲密无间的关系所取代。这种学校将为儿童个性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场所,激发他们的创造力,使儿童得以摆脱那种特别强烈的爱抚的控制,摆脱毫无生气的学校的因循守旧之风的影响……然而,这种学校暂时还只

是我理想中的学校而已。

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人民渴望受到教育，有如久旱盼雨。”从那时以来，我国历经了饥荒与战争，发生了一月九日的流血事变和1905年的革命等等一系列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民群众的整个生活制度。人民对知识的渴望无比高涨。工人的这种要求尤为迫切。工厂的工作条件以及大城市的生活环境向他们提出了许多燃眉之急的问题，他们十分希望找到答案。夜校、俱乐部、各种教育团体都有很多工人参加。与工人意见相左的知识界一致指出了“工人们知识的渴求近乎神经质，甚至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工人的觉悟越高，他们对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认识越明确，那么他们对知识评价就越高，他们也就越渴望掌握知识。他们深切地感到：知识就是力量。

对于贵族和资产阶级说来，他们的孩子不仅随时可以受到初等教育，而且也可以受到中等和高等教育，普及教育和国民学校的问题与他们没有什么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是大企业主。也是一些不得不生活在一群愚昧无知的人中间的人。他们经常讨论和争论：是否值得掏钱给人民办教育，多大的规模，用什么办法。对工人和农民来说，这个问题却是与他们休戚相关的，而且也涉及他们的家庭和亲人。

根据1914年国家支出总预算，国民教育部的预算仅为161,629,822卢布这一区区之数，而其中完全用于国民学校的经费仅为总数之半，即8400万卢布。这仅占整个经费的四十六分之一，而根据中央统计局的材料，这却是识字人口仅占21.1%的这么一个国家的教育经费！8400万卢布，可是一次战争下来一年就得八个亿。

一些维护现状的人（如波列日阿耶夫及其所著《六年来》一书）

却欢呼国民教育经费预算逐年有所增长。1907 年为 4590 万卢布，1911 年为 9750 万卢布，1912 年为 11400 万卢布，1913 年为 13670 万卢布，最后，1914 年的预算为 16150 万卢布。但是不应忘记的是，1906 年国家的预算仅为 20 亿，而 1913 年则为 30.020 亿。

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在于，拨给国民教育部这 8400 万卢布如何支配？这笔钱果真能用来提高国民教育水平，改善学校条件和提高群众的知识水平吗？

过去政府曾通过波别多诺斯采夫的嘴露骨地声称：“……大办国民教育无疑是有害之举。”政府当局对知识就是力量的理解不比工人差，因而它全然不会去关心把这一力量让人民群众掌握在手。但是几年来俄国革命的情况表明，对人民群众采取过去那套策略是行不通的。工人和农民决心通过斗争获得知识，而不等待别人的恩赐。因为不上官办的正式学校也可以获得知识，立陶宛和波兰就是很好的例子。拿科文斯克省来说，省内立陶宛人占 68%。政府为了大搞俄罗斯化，禁止该省用本族语教学，因此该省的入学率是最低的，仅高于文盲最多的省之一的唐波夫省。尽管如此，科文斯克省的文化水平还是比较高的。识字人数最多的是彼得堡省，识字的人占 62%，其次就是科文斯克省，识字的人占 54%。波兰的情况也是如此（原因相同，也是因为实行俄罗斯化的政策，使居民不能入学）：入学率低，但识字率高。

从这个例子得出的结论是：只要人民想获得知识，他们不上正规的学校也仍然可以获得。

由此可见，奉行那种不让人民获得起码知识的陈规再也行不通了。

政府决定采用更为现实的、更符合基督精神的政策，即允许少量地增加国民学校，但同时也竭力使学校成为对人民群众进行精神奴役的工具。

童年的印象往往在人的心灵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基督教徒对此非常注意，他们特别注意对青年人的教育。主持国民学校工作的

人可以通过挑选具有一定方向的教师、通过修订大纲和根据这一大纲编写的教科书来影响学生世界观的形成。

国民教育部向第三届杜马提出了《初等学校法令》草案,其中指出了学校应具有的性质,把宗教道德教育摆在首位,强调学生应树立“尊敬父母和长者的观点,热爱祖国,遵守法纪,树立个人财产不可侵犯的观点”。歌咏课应有助于培养爱国主义的和宗教的感情,体育课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等等。

总之,根据国民教育部的法令草案,学校应该成为一种工具,用以宣传那种把人的思想搞乱的思想,而不是让人们认清周围的现实。

《新时代》抓住了国民教育部的这种思想,并且更加突出了这种思想。在第三届杜马讨论有关初等学校的政府法令草案期间,孟什柯夫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只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支持普及教育体系,就是必须绝对保证这种体系是俄罗斯民族的而不是别的体系。能起这种保证作用的不仅有学校的大纲,而且还要对一些极其令人怀疑的机构进行改革,这些机构的任务是监视教工,检查教育著作和刊物。显然,支持人民自由党团的人对政府的目的不大理解。”

第三届杜马的议员米留柯夫1910年10月18日在第三届杜马的发言中说:“在自由运动提出的各种任务中,看来没有一项任务像普及教育问题那样,人们的意见如此一致。如果您把俄国所有政党的党纲(从社会革命党人到各右派政党^⑧的党纲)加以比较,您就会发现,他们对普及教育问题的阐述几乎完全一致,并且都很重视。”

上面摘引的这段谈话只有一点是对的,即各个政党都很重视普及教育问题。

至于米留柯夫提到的各个政党对普及教育问题的阐述“几乎”完全一致云云,只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词句。举例而言,社会民主党人坚决主张学校应是非宗教的,学校完全与教会脱离。大家肯定记得,人民自由党团(如卡拉乌洛夫)在第三届杜马上却坚决主张学校必须进行宗教道德教育,并且希望教会学校所辖范围的劳动者,东正教

信徒到部立学校去 ,那里既教基督教的教义 ,也教与之有关的基督教道德。

米留柯夫本人声称 ,他与“否定宗教在学校里的文化作用的思想相隔甚远”。

可见 ,一方面是要要求学校与教会完全脱离 ,而另一方面却是“承认宗教在学校里的文化作用”。可见 ,两种提法“几乎”完全不同。但上面所引用的米留柯夫讲话中的主要之点在于 ,他完全忽视了在谈及普及教育问题时 ,不同的阶级追求的目的是不同的。

贵族地主想依靠学校让农民尊重神圣的所有制 ,在内心惧怕上帝。

工厂主希望工人的文化水平有一定提高 ,因为有文化的工人劳动生产率高 ,但工厂主最关心的是教育工人尊重私人财产 ,尊重上司。

农民希望得到真正的知识 ,以便了解周围的现实 ,并寻求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

工人们希望得到最广泛、最真实的知识 ,以便通过正确的道路去争取美好的未来。

目的不同 ,因而不能混为一谈。大家都希望进行普及教育。在这一点上 ,大家的要求是一致的。

人民自由党团的支持者爱说什么反对把学校卷入政治。这是一句粉饰现状的空话。政治永远存在于学校之中。我国的政治在于学校具有教会性质 ,学校追求俄罗斯化的目的 ,挑选具有一定观点的教师 ,政治还存在于学校的大纲、教科书中 ,而教师是据此来进行教学的。任何政府都要把政治带到学校 ,使学校成为宣传自己政治思想的机构。

教育工作控制在中央政府手里 ,而不是由建立在民主原则上的地方自治机构实施领导 ,进行监督 ,在这种地方 ,情况都和上面讲的一样。问题只是力量 ,只是看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有多大力量去实施自己对学校的影响。

要想利用学校来宣传自己的思想 ,必须实行高度的集中来管理

国民学校。目前我国有两种类型的学校。一种是教会办的学校,一种是地方自治会办的学校。尽管这两种学校的自治程度还不高,但它们却不完全受国民教育部的影响,学校工作并未完全控制在官僚机构手里,教学工作也不太僵化,学校也还未纳入一个统一的模式,而这些却是很重要的——当然不是指教育而言,是指减少对学校的监督而言。不把学校纳入一定的模式,官僚主义的教育机构就不可能履行正确的职能。

在最为民主的国家(如美国),国民学校不由中央集中管理。与国民学校打交道的中央机关全然不承担监督任务,它所关心的不是日常琐事,而只是编印国民教育的统计资料,撰写工作情况报告,介绍优秀的教学方法。管理工作全由地方自治机构负责。

国民教育部热衷于中央集权,因而在第三届杜马上提出了一个法令草案,要把教会办的学校和地方自治会办的学校改为部立的学校。

但俄国毕竟是俄国。支持教会办学的人不理解政府草案的用意,不理解法令草案把所有的学校都降低到教会办的学校的可怜水平的目的何在。大家知道,如果不同时拨给教会学校一百五十万卢布的话,国家委员会拒绝给学校一千万卢布的拨款。

由中央集中管理学校工作的计划未能完全实现,但是国民教育部还是竭力加强对学校的监督。

(1)国民教育部尽量不让地方自治机构管理学校。当然,只有建立在普遍平等的、不记名投票选举的原则上的这种地方自治机构才可能管理完全符合当地居民需要的学校。它们能让学生穿得暖、吃得热,而这在目前往往由于饥馑和疲劳而无人过问。目前,只有部分教师才能做到给学生供应热早餐。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教师为此必须花费很大的精力,如果他外出或调离,早餐也就供应不上。在其他方面民主组建的自治机构还可以把国民学校提到应有的高度,这是更不用说的,因为它来说,学校工作乃是自己切身的事业。

我国地主的自治会当然与真正的地方自治机构相距千里。

不过在国民教育工作上,地方自治会仍然比暗探密布、宪警充斥的俄国官僚机构略胜一筹。地方自治会关心孩子们有书可读等等事情,因而在各个学校开设了图书馆,尽管图书不多,而且往往还是经过挑选的。

现在国民教育部发布通令,要把图书财产转交给教育当局。

在许多省,这一财产有几万卢布。把图书馆交到教育当局,其目的是把许多书籍从图书馆清除出去,因为这些图书在知识渊博的人看来是很有价值的科学或艺术著作,但国民教育部却害怕人民见到它。

文明国家几乎消灭了文盲。那里的人民都乐于入学学习。各方大力支持开办图书馆。可是我国的所谓国民“教育”部却煞费苦心地采取卑劣的警察手段来阻碍教育事业的发展,阻碍人民去学习!我国的国民教育部在摧毁学校图书馆!!世界上没有一个文明国家还有这种反对图书馆的特别规定,还有这种可卑的书刊检查机构。可是我国除了对报刊进行检查之外,除了采取野蛮手段反对图书馆之外,还制定了一些极严厉的规章来反对国民图书馆!这是令人发指的愚民政策,是地主阶级企图使全国野蛮化的令人发指的政策。有些富人(如巴甫连科夫)花了一些钱开办国民图书馆。现在,野蛮的地主政府却摧毁了这些图书馆。是时候了,那些想帮助俄国教育事业的人应该懂得,钱不应白白地花在国民教育部所属的并且遭到摧毁的图书馆上,而要用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上,因为连这种自由都没有,俄国就会被野蛮的气氛窒息而死。

(2)还有一个有关教师的尖锐问题。国民教育部想通过教师短训班培养一批世界观符合他们要求的教师。教师短训班的情况并不比别的中等学校的好。维特曼文科中学的逮捕事件就充分说明我国的中等学校是什么样的学校,学生在那儿的任何首倡精神都遭到扼杀,任何对知识渴求的愿望都遭到摧残。新颁布的有关私立学校的通告,其目的是让这些学校像公立中学一样服从那种死气沉沉的监督。这个通告最好不过地说明了我国中等学校目前的精神面貌。

教师短训班毕业的年青教师不大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处境十分困难。他们生活穷困,有时工资还不够租一个单独的房间,因此只好与农民一起住在小木房里,连供学习用的一隅之地也没有,冬天还要把奶牛牵到房里来。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教师开始关心起当地居民的疾苦了。他们面临着成千上万的问题。他们在教学工作中得不到任何支持。优秀的教师还渴望学习,但这谈何容易。繁重的劳动使他无暇学习。他们没有钱买书,即使有钱,往往也很难买到。他们渴望上暑期短训班,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他们能参加这种短训班,他们就会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学习上去。短训班有时并无多大效果。如果工作搞得好,短训班又会面临各种困难,甚至会停办。前年夏天彼得堡的短训班就是如此,参加短训班的在头一年就达一千人。

然而教师生活中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们的生活比犯人的生活还要坏。他们一言一行都受到神甫、警察、地方黑帮分子的监视。教师成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搞不好就丢了饭碗,或者调往一个条件更差的地方去工作。总之,往往由于督学想安插另外的人,他们随时可以用各种借口调离教师。

教师没有任何办法保卫自己。他们完全处于警察和督学的控制之中。在别的一些国家,拥有成千上万会员的教师工会对教师说来还不失为一种保护。这些工会保护教师的权益,努力改善教师的劳动条件,讨论各种教育问题。出版自己的杂志,经常召开代表大会。我国禁止教师加入组织。只要教师能被当局完全控制,工作受损失也无所谓。

对国民教育部奉行的这种政策,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不能置之不理。我们认为,国民教育工作要想步入正途,必须做到:

(1)学校脱离教会,成为非宗教学校;

(2)不能由中央集中管理国民学校的工作,而应由地方自治机构管理。这种地方自治机构应该建立在普遍平等的、直接不记名选

举原则的基础之上；

(3)学校要摆脱警察的监视,学校要完全自由(只有在政治自由的国家才能做到此点)

(4)教师有权组织工会,出版自己的报纸,召开大会,等等。

我们认为,如果做不到以上四点,国民教育部在所谓“国民教育”上花的钱,根本不能促进国民教育的发展。

综合技术教育学校

(1)随着我们向共产主义的迈进,国民教育问题将一年比一年更居于首要地位。

(2)共产主义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的合理化,严格的核算,科学上的最新发明在生产上的应用,因此,它需要大批受过综合技术教育的工作干部。

(3)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任务在于培养一代新人,这种新人既是生产部门的工人,又是生产部门名副其实的主人。

(4)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教学大纲一般应与国内经济生活保持紧密联系,特别要与所在地区的经济生活保持紧密联系。

(5)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应该在工业和农业这两个基本的生产领域方面授予学生大量扎实的实际知识和理论知识。

(6)统一的劳动(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第一阶段,由于儿童的年龄关系(7至12岁),只是自觉参加生产的准备阶段。

(7)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第一阶段的任务是:使儿童通过书本能够对人类的思想和生活开始进行接触,教他们学会读、写、算,并且掌握绘图的本领(作为一种劳动手段);通过观察、学习手工和进行自由的创造活动,千方百计地发展儿童的构造设计能力,让他们熟悉周

围的自然环境,学会观察并用实验检查自己的观察结果;了解自然资源和附近地区的生活,了解国内和全世界的生活。

但是,第一阶段最主要的任务是培养集体生活和工作的能力(组织学校生活,组织集体劳动,组织游戏)。这个阶段的活动不应该是繁重的(采集植物,饲养牲畜,投递信件,送发通知,打扫房间等等)。

(8)第二阶段(从12岁到16岁,包括16岁在内)就应该安排参加生产了。

(9)夏季应该参加大农场的劳动。第一年在附近地区的农场,其余两年左右的时间在各种类型的农场(育种农场、专门的畜牧场、专门的经济作物农场等等)。

重要的是,首先要让少年学生在这些农场参加一定的工作;其次是要了解整个国营农场的经济情况;第三是了解这种经济情况要与从理论上研究农业学、畜牧学等等联系起来。

无论城市的少年学生或是农村的少年学生,都应在大农场完成这些工作和任务。

(10)工业领域可以分为化学生产部门和技术生产部门。据此,第二阶段的头一年应该参加化学生产部门的工作,而第二年则参加技术生产部门的工作。城乡少年学生都应参加工业方面的活动,包括理论方面和实际方面。

(11)综合技术学校最后一年用于研究整个国民经济。对以往的经验进行总结。夏天可通过专程旅行去研究经济生活中的某一问题,有的人还可以出国。冬天可以进行核算分配和组织方面的实际工作。

(12)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教学大纲的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应邀请农学家、农业人民委员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技术人员共同制定,并应采取若干具体措施。

(13)不言而喻,基本的大纲应该包括对政治经济学、文化史、社会生活史、革命史等等的研究。艺术也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14)要注意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学习各种语言。

关于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提纲

①最近几十年将是对我国整个工农业进行改造的年代,是使整个生产合理化、机械化的年代,是加强把科学发明应用于生产的时期。

②在目前对整个生产进行革命改造的时期,需要大批受过综合技术教育训练的工作人员,这些人要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能迅速地判断形势,会操纵新的机器,等等。

③根据上述情况,目前在我们俄国发展综合技术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④综合技术教育对13—17岁的少年学生还具有发展他们一般结构设计能力的意义,这种能力对他们今后学习任何专业都大有帮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综合技术教育最能说明少年儿童的身体和智力状况,使他们在16—17岁时就可以自觉地选择专业。

⑤综合技术教育主要应在第二阶段进行,但是,它一方面与第一阶段有着有机的联系,另一方面也与职业学校有着有机的联系。

⑥第一阶段(7—12岁)授予一般的知识,数学和绘图知识,教他们学会把书本、数学、图画当作劳动的手段,教他们学会观察,会做总结,会用实验来对观察、总结的东西进行检验;授予他们主要的自学方法和对周围环境的初步知识(对自然界和社会进行研究)。在第一阶段,通过劳动的方法传授知识,第一阶段的劳动无论如何不应局限于自我服务,第一阶段的劳动应具有集体参加初级形式的社会劳动的性质,并形成初步的劳动熟练技巧。

⑦第一阶段是第二阶段的基础。

⑧第二阶段(13—17岁)学习整个生产。既从理论上学,也从实践上学。学习几个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同时要特别注意对实际活动进行理论上的说明。与此同时,要学习劳动史、阶级斗争史,然后还要学政治史、宗教史、革命史、1917年的革命等等。

⑨冬季的实际活动应具有工业方面的性质,要与大工厂和电站的活动紧密联系起来,夏天应在大国营农场参加生产。

⑩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要与经济方面的人民委员部(农业局、国民经济委员会、劳动局等等)的工作保持紧密的联系,而由工会、农业和技术学校加以协助。

实际措施

⑪必须立即制定一级学校和二级学校的大纲。这些大纲应在专门的会议上与农业、技术方面的专家,与工会进行讨论,应根据各地的情况制定不同的大纲。

⑫必须立即召开农业人民委员部国营农场处和农业实验站站长开会,弄清楚如何组织并在哪些农场组织少年儿童的劳动,什么地方能安排多少人。要派专人负责这项工作。

⑬农业学校应该成为基地,因为农校的学生可以当二级学校的业务指导员。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应与各农业学校联系。

⑭少年学生的活动应集中安排在重点示范企业,要与这些企业的工厂委员会和专家们认真研究,少年儿童可以从事哪些活动。工会应派出专门人员进行指导。

⑮要对各级工会开展有关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宣传。各级工会参加组织青年一代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工作,特别值得珍视。

⑯把综合技术教育的工作完全交给教师是行不通的,必须吸引各级专家参与此事。

⑰通过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可以加强与劳动人民事务上的联系,这有助于培养青年一代并使学生本人得到改造。

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教育问题因教育目的而异。

斯巴达人为了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勇敢无畏、吃苦耐劳、残酷无情、百折不挠的军人，就对孩子们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教育，使他们在身体上受到锻炼，把他们培养成军事专家而别的任何事情一概不懂。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孩子小时就开始灌输一定的观点，让孩子们鄙视和平的生活与享乐的生活，鄙视创造性的劳动，极端仇视一切外国人。

古希腊奴隶主的教育目的在于使生活能尽情享受。体操、游戏、音乐、雕刻以及其他的艺术，都是为了生活上的享受。他们在进行体育和美育的教育时，还培养孩子们一种盲目的道德观念，使他们认为奴隶制的存在是天经地义的事，并以残酷的手段来迫害奴隶。

那么，对奴隶的教育呢？残酷的打骂，要奴隶逆来顺受、绝对服从，干着牛马的活儿，学点手艺……

教会在各个时期提出的教育问题，都是把人变为上帝的奴仆，对世事不敢闻问、不作判断……神甫总是竭力扼杀儿童的独立思想，扼杀他们对生活的热情。有一个专业技术工人，是星期日夜校的学生，他有一次写信对我说：“做人的奴隶这并不可怕，因为问题很清楚，这需要进行斗争，而做上帝的奴仆，却不敢想到斗争的事，因此最糟糕。”

资产阶级从教会那儿学会怎样通过学校培养奴隶。他们自己的孩子是在一些专门设立的学校学习的，这种学校把他们培养成生活的主人，培养成将来作威作福的人。而在工人和农民子弟学习的国民学校里，却是有计划地摧残他们的精神，把孩子们培养成唯资本之命是从的奴仆。

我们不妨看看德国、法国、瑞士等国的情况，看看那儿如何扼杀

孩子们的每一点独立思想,如何向他们灌输资产阶级道德,如何教他们崇拜权势和富豪,如何教他们盲目服从,教他们完成教师的每一道命令。资产阶级深知,光靠武力并不能长久保持其政权,它总是竭力对人民群众进行精神上的奴役。

1917年10月,俄国劳动人民取得政权后,他们才得以按自己的要求来教育青年一代。教育机关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教育任务。由于十月革命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因此就开始消灭社会分化为阶级的现象并把全体居民变成了劳动人民共和国的主人。

不言而喻,在苏维埃共和国不可能存在两种教育制度:一种是培养统治者的,另一种是培养被统治者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第一项法令就是颁布统一的教育制度,即建立免费的“统一学校”,分为两级,扎扎实实地培养学生走向生活、参加劳动。开设先后共九年的两级学校不能是一纸空文,而是要让每个儿童实际上都能上学,这就是苏维埃俄国所面临的第一个教育问题。

由于战祸不断、经济凋敝,使我们至今未能解决这一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二月革命使男女在法律上平等了,而苏维埃政权却尽一切可能使这种法律上的平等(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变为事实上的平等(在生活中的平等)。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教育人民委员部竭力使男女青年都能进入各级学校。男女儿童都能在一个学校学习,由同样的老师,按同一个教学大纲和教科书进行教学。这就是说,在这方面我们已有一个统一的教育制度。

从前,孩子们上学只是学习,而现在,战争使数百万家庭失去了父亲,国家经济遭到破坏,生活迫使许多母亲和姐姐去参加工作,家庭的许多职能发生了变化。苏维埃共和国的学校越来越关心儿童的衣服鞋袜问题,关心他们能有一切日用必需品。由于目前财政拮据、经济凋敝,使学校的建设碰到很大的困难。不过学校提供一顿早饭

并且向学生供应衣服和鞋子已很普遍了。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十分明确：苏维埃政权应通过学校来完全负担全体学生的费用。

日益转嫁到学校上来的其他家庭职能还有：从前，家庭对儿童进行一般的劳动教育，教他干活，现在，由于劳动日益在家庭之外进行，因而这一职能（教儿童劳动）就应由学校来履行。读书学校从经济上看也开始显得很不宜了。这种学校对培养青年一代的劳动能力毫不关心，从而使国家的生产力总量逐渐有所下降。正因为如此，所以即使是美国 and 德国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也非常注意把读书学校变为劳动学校。

共产主义的前提就是有计划地、合理地组织生产。既不应浪费一点人力，也不应埋没任何人才。而要做到合理地利用人力，首先就要有计划地、有效地对人进行教育。培养青年一代从事共产主义生产乃是共产主义教育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所以教育人民委员都给自己提出的一项任务，正是建立这种“统一的劳动学校”。

劳动学校与劳动学校各不相同。有的劳动学校可能具有狭隘的家庭手工业性质，其宗旨是培养儿童爱好劳动的习惯、勤恳工作的作风、忍辱负重的精神，等等。而有的劳动学校则具有综合技术的性质。这种综合技术的性质不应表现为儿童学习某几种手艺（而有的教育家却持这种主张）。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应使学生对国家的整个经济情况有所了解，向学生介绍有关农业工业、开采工业、加工工业的情况，了解几个主要的工业部门的情况，如：金属加工工业、纺织工业、化学工业。向学生作这种介绍时，可以通过如下途径：教科书和图表的讲解，放映电影，参观博物馆、展览会和各种工厂，还可以通过参加生产的途径。后面这一途径尤为重要。只不过学生在从事物质生产时，要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劳动教学法是最为有效的学习方法。学生在劳动过程中可以很好地学习物理、化学、力学原理。在劳动过程中，他可以学会观察并且通过实验来检验观察的结果，可以

学会把书本当作劳动的工具来加以利用,可以学会把科学资料运用于日常劳动。学生只有学会了对物质材料的加工制造,他才能具体地发现劳动过程中所出现的生产问题。对国民经济中每个部门的发展历史进行研究,这对每一个参与这一部门劳动的少年学生来说,有着前所未有的意义。他将会知道每个生产部门的进步表现在什么地方,懂得蒸气、电力在生产中的作用,弄清科学在现代生产中的巨大威力。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任务不是培养狭隘的专家,而是培养明瞭各个生产部门相互之间的关系,知道每个生产部门的作用及其发展趋势的人,培养懂得当时应该做什么及其原因的人,一句话,就是培养名副其实的生产的主人。另一方面,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还应该培养学生积极参加这种生产。它应该使学生具有正确从事每项劳动的能力,具有把理论知识用于实践的能力,以及在工作中迅速走向的能力。综合技术教育学校不提供现成的专家,它只是使学生能更快地、扎实地熟悉所选择的职业,它可以消除狭隘专业比的弊端,使学生比较容易地从一种职业转向另一种职业,而主要的是,它可以使学生获得建设新生活所必须的眼界。

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要培养学生参加劳动。不过,它不是培养学生能参加单独的劳动,而是培养学生能参加集体的劳动,而这里的最重要之点,就是要具备组织这种劳动的能力。在农奴制时期,充当这种劳动组织者的是地主及其管家。在资本主义社会,则是资本家,以及主要是工程师、工厂厂长等人,他们从资本家的利益出发来组织厂内工人的劳动。在我们苏维埃俄国,旧的、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已经瓦解。粉碎了资本桎梏的工人,面临着一项艰巨而又重要的任务,这就是:不仅是在个别工厂,而且要在全国范围内,为了整个共产主义社会的利益而组织劳动。共产党人既已夺取了政权,他们也要担负起组织生产和分配的责任。而我们发现,几乎无处不感到缺乏组织的技巧。只有一些特别能干的人能胜任这一任务,而在实际工作中,处处都显得杂乱无章,不懂得最起码的组织科学方面的知识……

为什么我们俄国官僚主义的作风如此严重？原因究竟何在？原因就在于我们不善于做组织工作。

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会说，既然工人自己毫无组织能力，他们为什么要夺取政权？是的，他们将为科学付出代价。苏维埃俄罗斯的工人要为学会组织工作付出巨大的代价。他们不是在贵族女子寄宿中学学习科学，而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经济凋敝的岁月学习科学，在这种时刻，任何一点疏忽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但是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否则就要永世受资本的奴役。在当前的历史性时刻，组织才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共产主义的基础乃是为了集体的利益而合理地、妥善地组织社会劳动。正因为如此，综合技术教育学校除了培养学生参加劳动之外，还应使他们掌握组织工作的技巧。这就是说，进行劳动教学的环境应能使劳动者的组织工作的首创精神得到发扬。最好按组分配劳动任务，同时每组的人数可以逐渐增加，而劳动任务也可以渐趋复杂。有些游戏也有助于组织技巧的发展。资本主义深知游戏在儿童生活中的意义，因此他们把游戏当作一种工具，来把青年一代培养成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资本的奴仆。童子军运动有助于儿童首倡精神的发扬，使青年的体力和智力得以自由表现，因而为资产阶级制度立下了汗马功劳。它用很隐蔽的手法向儿童灌输沙文主义，让他们崇尚黩武主义、崇尚暴力与权势，用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观点来看待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不过，资产阶级童子军运动的经验也可以借鉴，不过要使这种运动的性质有一个根本的改变，赋予它新的内容，使它成为培养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一种工具。游戏是培养集体行动习惯的重要手段，是发展组织技巧的重要手段，千万不可忽视。

学校自治在这方面也能发挥作用。

苏维埃政权想努力建成的这种学校，可以充分满足民主的要求，因为这种学校对一切人都一视同仁。这种学校可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助于最好地培养生动的、创造性的生产力。这种学校还可以

满足工人阶级在目前这一历史性时刻的最迫切要求：它可以把已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变为生产的主人和集体的组织者。

论妇女职业教育问题

凡是多少了解一点工人运动历史的人都知道，为了追逐暴利横财，资本家早已大批采用童工和女工。自古以来，养家的人主要是父亲，妻子儿女挣的钱则不过是一点额外的补贴。正因为如此，女工的劳动工资很低她们也愿意，因为她们只不过是“挣点外快”。于是工厂主就利用女工没有组织、觉悟不高的情况，付给她们很少一点钱，进行肆无忌惮的剥削。在恩格斯以炽热的笔触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每个人都能读到，他对那些被资本剥削的女工所处的任人凌辱的境况所作的淋漓尽致的描述。

现在，我们苏维埃俄国实行的是男女同工同酬。这当然只是建立妇女在生活中真正的切实的平等地位的第一步。但是，在很多场合下男人挣的工资要比女人多。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男人往往懂得某种专业，他或多或少花了较长时间学习过这种专业，是所谓的专业技术工人。要求专业技术的工作并非总是最难的工作。例如，在机器制造工厂里，制图员的工作算作是要求专业技术的工作，而整天搬运生铁的粗活却不算专业技术的工作，所以制图员的工资就高一些。制图员往往是男人，而搬运沉重的生铁的却是妇女。要当制图员，就得经过学习，而搬运生铁却不需要任何科学知识。因此，几乎各个生产部门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妇女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能成为专业技术工人。

这当然不是由于妇女不能够干专业技术工作（只有那些要求重体力的劳动部门才是如此），可是，许多男人往往也不适应这些部门的

工作) ,而是由于妇女长期为家务负担所累 ,没有参加工厂的劳动的准备 ,她们去工厂干活往往是出于无奈 ,迫于生计 ,只好去当一个没有专业技术的工人。

为了改变这种高强度、低报酬的劳动 ,就必须对女工进行职业教育。目前苏维埃俄国急需专业技术工人。为了振兴工业、发展农业 ,把工农业提到很高的水平 ,需要有能力的劳动力。由于对这种人的需要量很大 ,因此根本谈不上男人和女人在这方面存在什么竞争问题。整个工人阶级关心的是尽可能让更多的男女工人受到职业教育。在组织这种职业教育时 ,要注意不受传统势力的影响 ,使女工能够自由地选择她们至今一直不能选择(不是由于能力不济 ,而是由于旧的偏见作祟)的职业。

战争把妇女推向了許多新的工业部门 ,因而这种偏见许多已经得到纠正。必须在妇女的职业教育方面也肃清这种偏见。现在要教女青年学习的 ,不是编织花边 ,不是给手帕绣花 ,不是制作女人帽子或扎花朵(苏维埃俄国眼下还顾不上搞这些装饰品) ,而是要教她们学习农艺学、畜牧学、卫生学、技术等等。应当教她们学会那些严重缺乏技术工人而使工农共和国受到严重影响的生产部门的劳动技术。

论学校建设

(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提纲)

(一)原则性部分

1. 实行普及教育 ,男女合校 ,保持学校的非宗教性质 ,建立统一的学校(分若干级) ,使每个学生都能受到最高的教育 ,采用从教育

学的观点看来最为有效的劳动教学法——这是共产主义学校的必要前提。一般说来,甚至在资产阶级国家的范围内都可以实现这些前提,因此我们若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在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里建设我们的生活。

注:当然,分为若干级的“统一的学校”,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使教育在各级得以普及。只有国家全部负担学龄儿童(至17岁)的费用时,才有可能真正做到(教育)的普及。

2. 共产主义学校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学校的教学内容上。在由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教学的基本中心应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国内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建设进行研究。学校的劳动性质就体现在这里。这种研究应分四方面进行:1)研究人力和自然资源;2)研究影响这些资源和人力的方法,以达到人们对其加以利用的目的;3)研究生产的主要因素:人,现代社会的成员,以及4)研究对这一社会的组织。

这种研究的出发点应是本地区。必须利用儿童有计划地从一个地区迁往另一地区的一切机会,它具有重大的发展意义。学校不应忽视艺术的作用:艺术应通过各种形象来丰富儿童的精神世界,使他们能在创作中表现自己的感受,——但是不应使艺术成为学校生活的中心;不是培养艺术活动家,而要培养各个生活领域里的新生活建设者。

3. 共产主义学校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单位,而应该与所在地区、与全国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

4. 共产主义学校的教学、劳动和生活应该建立在集体主义的原则上,这将有助于儿童社会本能的发展。此外,组织集体劳动是培养劳动技巧的最好办法。重要的是要让孩子们在这方面尽可能表现出自己的首倡精神和独立精神。

5. 各个学校应很自然地分成若干与一定生产地区有联系的小组。应该大力支持各个学校之间的联系。由于学生将参加该地区的

经济建设,并将与居民的生产小组建立联系。因此,有必要由这些生产小组以及儿童工作有关系的机关派代表参加校务委员会。这样做的结果,将会大大加强居民对教学和教育问题的关心。

(二)实际部分

1. 从苏维埃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已尽可能地实行了男女合校并保持学校的非宗教性质,但采用劳动教学法的情况仍不好。由于战争的影响和经济的普遍凋敝,我们至今未能实现普及教育,未能建立统一的学校,未能由国家负担学生的费用。我国一级学校的数量不足,教师不足,二级学校很少。专业化开始过早,未能在儿童的志趣表现出来之后进行;同时儿童也缺乏相当广泛的普通教育知识。

2. 应竭尽全力开办足够数量的一级学校(四年制),配备足够的教师,供给燃料,照明设备和一切必需品。为此:(1)应吁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知各级工农代表苏维埃,立即召开全体会议,专门讨论学校网点设置问题,供给学校一切必需品问题,以及把未充分利用的房舍改作校舍的问题,等等;(2)应该以法律的形式提出有关供应教师口粮的地方实物税问题。

3. 必须拟定各工厂、发电站、大的国营农场、农业学校附设二级学校的计划,因为这些单位容易找到教师,同时还有相应的生产环境。这些学校还应设置足够的公共宿舍,以便容纳本经济地区一级学校的毕业生。

4. 为了供应学生伙食、服装及一切必需品,应立即统一制定组织学校合作社的原则,并使之付诸实现。

5. 立即按本文原则性部分确定的方针制定一级学校(四年制)的教学大纲。

6. 发动科学研究所、实验站和学校参加这一工作。

7. 编写教学法指导书,提出如何对人力和自然资源进行研究,如何研究影响这些资源的方法以达到人们对其利用的目的,如何研究组织人类社会。每一种方法都应开列详细的图书口录索引,并对所推荐的图书进行评价,指定其中两本为主要参考书。

8. 编写有关这些问题的《Text - book》,供一级学校各班使用。

9. 研究确定这些部门的教材种类。

10. 二级学校亦然,不过这一工作需要更多的时间。

11. 大力宣传劳动教学法。

12. 拟定集体学习和劳动的教学方法。

13. 国民教育处应对本文原则性部分提出的学校建设原则及其实行方法下达指示。

论青年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要想正确地探讨青年共产主义教育的性质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共产党员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明确共产党员应该知道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的方法。

共产党员首先是一个社会的人,他具有非常强烈的社会本能,希望大家生活美好、人人幸福。

共产党员可能出身于社会上的不同阶级,不过共产党员大多数出身于工人。为什么呢?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培养了他们的社会本能。集体的劳动(其成就大小取决于大家努力的程度)、共同的劳动环境、共同的思想感情、为改善人类生存条件而进行的共同斗争,——凡此种种,都使工人彼此亲密无间,使他们被一种阶级的团结感情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再来看看资本家阶级,这个阶级的生活条件完全不同。由于彼此竞争,使得每一个资本家都首先把别的资

本家看作一个应当打垮的敌手 ;工人在资本家眼里只不过是应该为他这个资本家创造利润的“一双干活的手”而已。当然 ,为了共同反对工人阶级 ,资本家也联合起来了 ,但是 ,工人之间不存在利益分配问题 ,因此 ,他们的那种内在的团结 ,他们那种整个集体的融洽无间 ,在资本家阶级中是没有的。资本家的联合不断受到竞争的威胁。因此 ,工人中有强烈社会本能的人所在都是 ,而在资本家中间这种人却是绝无仅有的。

社会本能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常常能帮助我们找到正确的出路 ,帮助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正因为如此 ,俄共在清党时特别注意某一个党员是否工人出身。工人出身的人比较容易纠正错误。我们俄国的知识界看到 ,由于阶级本能的关系 ,工人们很容易明白的东西 ,知识分子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弄明白 ,因而在九十年代末叶以及二十世纪初期(1896—1903年)出现了一种过分夸大阶级本能的意义的倾向。《工人思想》(社会民主党的一份秘密报纸)甚至认为不是工人出身的人就不能成为社会主义者。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是工人 ,《工人思想》就说 :“我们不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流的人 !”

阶级本能(在工人阶级内部 ,它跟社会本能是一致的)是成为共产党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但并非唯一的条件。

共产党员还应该知道很多东西。首先 ,他应该了解周围的动向 ,应该了解现行制度的结构。俄国工人运动刚刚兴起时 ,社会民主主义者首先关心的是在广大群众中传播狄克斯坦^①所著《谁关心什么》、《劳动日》等等一类的小册子。但是只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还不够。共产党员还应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他应该了解

^① 狄克斯坦是波兰社会民主主义者 ,是《谁关心什么》一书的作者。该书揭露了榨取剩余价值的伎俩 ,是当时在各个秘密小组中最受欢迎的一本书。——作者

各种经济形态的发展史、所有制发展史、社会分化为阶级的发展史以及国家形态的发展史。他应该懂得它们之间的互相制约性,知道一定的社会制度怎样产生一定的宗教和道德观念。共产党员既然懂得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就应该清楚社会发展的方向。他不应该把共产主义只是当作一种理想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是把一部分人的幸福建筑在另一部分人的痛苦上);他还应该懂得,共产主义是人类必然要实现的制度。因此,共产党员应该为实现这种制度扫清道路,促使它最快地到来。

在俄国工人运动初期出现的一些工人小组中,往往也学习旨在阐述现代社会结构的政治经济学,学习文化史(文化史跟一般的历史讲述不同,后者往往是各种历史事实的堆砌)。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当时的工人小组中都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919年,在尼日戈罗德省的拉波特卡村,我曾经听到这样一件事。有几位教师告诉我,他们在二级学校讲授政治经济学和文化史,说学生们一致要求在二级学校里开设这两门课。

在伏尔加河畔的一个村子里,所有居民从事的都是伏尔加河流域的小手工业和农业,那里的农村少年怎么会产生这种强烈的学习要求呢?显然,这是由于某一位过去参加过工人小组的工人,在拉波特卡村培养了人们对政治经济学和文化史的兴趣,他给儿童们指出了他们需要掌握什么样的知识。

但是俄国共产党员目前所应知道的东西还不止于此。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俄国创造了最广泛地进行共产主义建设的条件。为了利用这些条件,就必须知道目前应该做些什么才能向共产主义更靠近一步;必须知道目前可以做到的是什么,不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必须知道怎样建设新生活。首先要精通你所担任的那一部分工作;其次还要掌握以共产主义的态度对待工作的方法。举例来说,为了合理地搞好我国的医务工作,首先就要对工作本身有一个了解;其次,还要

知道我们俄国过去进行这一工作的情况以及现在其他国家进行这一工作的情况,最后,第三点,必须以共产主义的态度对待这一工作,即在广大的劳动人民中进行宣传,关心他们,发动他们参加这项工作,依靠劳动人民的努力建立强大的医疗组织。以上这些,不仅必须知道,而且还应做到,还应善于做到。由此可见,共产党员不仅应该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以及为什么共产主义必然要实现,而且还应该很好地掌握自己的业务,要善于对待群众、影响群众、说服群众。

共产党员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中,随时都应以共产主义的利益为准绳。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例如,不管你多么留恋温暖舒适的家庭生活,一旦工作需要,一旦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你就应该抛弃一切而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共产党员就要做到这一点。这就是说,不管任务多么艰巨,责任多么重大,既然这项任务要完成,共产党员就要把它担当起来,并且尽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去做,到前线去,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等等。这就是说,共产党员不应该对周围发生的事情袖手旁观,而要积极地跟一切损害共产主义事业和劳动人民利益的现象作斗争;另一方面,要积极地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把劳动人民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

下面这些人应该清除出党:1. 自私自利之徒和混入党内的分子,即把那些个人利益置于共产主义事业利益之上的人;2. 对共产主义事业极其冷漠,不愿做任何工作来促使共产主义实现的人;以及严重脱离群众,不努力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人;3. 不受群众欢迎的人;4. 态度横蛮、妄自尊大、不忠诚老实的人,等等。

所以,要想做一个共产党员,就必须:1. 了解资本主义的弊端所在以及社会发展的方向;知道怎样促使共产主义制度最快地建立起来;2. 善于把自己的知识用于事业;3. 对劳动人民的利益和共产主义无比忠诚。

现在我们来谈谈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十月革命和整个的革命形势培养了热情澎湃而又富有同情心的

青年对社会生活的兴趣。不仅青年工人如此,青年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也是如此。青年们都向往共产主义。

所以,一定不能压制这种志趣,而要尽一切力量去支持和发扬在革命影响下觉醒了的青年人的社会本能。

怎样去支持呢?首先,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要使每一个团员都有可能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去为共产主义事业工作,做共产主义社会的积极建设者,而不当共产主义建设的消极旁观者。人们为之献身的、包含我的一份力量在内的那一事业,使我们越来越感到特别亲切。当然,为了使每一个人能根据自己的力量和志趣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内找到一项工作,共青团组织就应该非常灵活和充满生气,应该跟国内正在进行的伟大的创造性的建设工作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参加建设还可以获得我们俄罗斯人特别需要的技能和组织技巧。

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可以培养团员的集体工作能力,使他们随时随地都会进行合理的分工,养成对集体的工作责任感和遵守劳动纪律,并且教他们学会以共产主义态度对待建设新生活的工作。这项教育工作能否取得成绩,完全取决于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气魄及其组织机构是否合理,取决于提出所有这些问题的深度和迫切程度。

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既应重视讲演能力的培养,也应同样重视性格的培养和坚忍不拔精神的培养。

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除了要求每个团员积极参加社会工作之外,最好还要他们在某一工厂参加劳动至少一年。美国人和德国人要求每个即将毕业成为工程师的人,要以普通工人的身份在企业从事一年的实际工作,其劳动环境与该企业全体工人完全一样。美国人和德国人认为,一个工程师只有取得了这种工作经历之后,今后才能管理工人、影响工人。对于每一个共青团员来说,更需要有一年社会工作的经历。

在培养性格、社会本能以及实际工作能力的同时，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每个团员还必须努力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在我们俄国，这一工作是跟自学工作交织在一起的。如果说由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偏见、资产阶级观点比西欧青年少得多，因而在这方面处于一种比较有利的情况的话，那么，由于大多数青年工人，特别是大多数青年农民缺乏起码的普通教育知识，这就使我们在这方面碰到很大的困难，因为没有这种知识就不可能掌握马克思主义。我国的青年必须学习，再学习，必须利用每一分钟的闲空时间和每一个机会来填补妨碍他们成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的空白。

还必须通过顽强的学习来获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为了了解周围现实中的各种复杂问题，不致在乍看起来不能理解的局势面前表现得手足无措，这个基础是必不可少的。苏维埃党校、各级党校、领导干部培训班可以帮助一部分青年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有幸到上述单位去学习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将是采取自学的方式，有时只是一个人学习，有时采取分小组学习的形式，共同去获得知识。为了帮助这些自发成立的小组开展学习活动，应该出版图书推荐目录、教学法指导书，告诉他们如何开展小组工作，还要出版各种示范大纲。

必须尽快出版这些材料。

一级学校的任务

要讨论一级学校的任务，首先必须指出学校的教育任务是什么，而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学校的整个精神。

首先，学校应该培养儿童对周围的环境怀有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培养他们研究自然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各种现象和事实的兴趣。

为了做到这一点,学校必须与居民、居民的劳动以及整个经济生活建立密切的联系;在教学中应该依靠儿童周围的现实生活,从儿童熟悉的具体事实出发。对所学的课程要采取研究的方法,这就要把自然和劳动提到首位。

一级学校的第二项教育任务,就是教儿童学会从书本中、从科学中,找出他所关心的问题的答案,让他认识到, he 可以从书本上了解到人类在某些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什么见解。因此,即使是一级学校,也必须使儿童的独立阅读占有较大的比重,必须改变学校教科书的性质,扩大选读材料的挑选范围。

第三项同等重要的任务,就是让儿童养成集体生活、学习和工作的习惯。这就决定了组织学校生活的性质,决定了实行儿童自治和儿童互助,等等。由此也产生了开展活动的方法:对所见所闻进行分析,养成通过集体的力量取得一定成果的习惯,根据能力来分工的本领;由此还产生了学校的劳动性质,除此之外,还有学校劳动的性质——集体的、创造性地组织的劳动;必须大力开展艺术活动,因为艺术可以增加了解,引起共鸣,发展社会本能。

除了这些教育任务之外,学校还面临着一项任务:授予儿童一定的正规知识和熟练技巧,使他们在今后进一步自学,有助于他们参加人类的文化生活,同时也可以满足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这些知识是:1)读和写的能力;2)对事物和现象进行数量测算,知道各种量的相互关系(算术和初等几何);3)知道自然界的基本规律(物理、化学和生物的基本概念);4)懂得人体构造;5)掌握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初步概念;6)对当代各国人民的经济、政治和日常文化生活的了解;7)对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治和日常文化生活的了解;8)对人类过去生活的了解。

一级学校是与8至12岁的儿童打交道,不能指望它可以给儿童形成完整的世界观,或者进行深刻的政治教育或职业训练。

不要热衷此道。一级学校的任务就是授予儿童进入现代文化范

围所需要的知识。之所以要教儿童学会读和写,是因为读书识字的能力可以促进人们的了解,克服人们交往中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障碍,把一己的狭隘经验扩大而为全人类的经验。学校应教儿童学会对事物和现象进行数量测算,知道各种量的相互关系,因为这些知识是人类全部活动的基础,一个人把这些知识掌握得越牢固、准确,那么他在进行核算和制订计划时就感到越容易。必须让学校教儿童知道自然界的基本规律,知道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初步概念,因为这将有助于他们正确地判断周围自然界的情况和弄清产生各种现象的原因。如果不了解人类在这方面的成就,儿童就会受到各种迷信的毒害,陷入中世纪的黑暗无知的境地。世界大战引起了我们对邻国生活情况的关心,红军战士、我们过去被俘的人和曾经在我国当过俘虏的人,纷纷谈起了其他各国的生活情况;应该把他们的讲话加以整理,使之系统化,指出可以借鉴之处。了解各国的经济情况、政治制度和日常生活,可促使我们进行比较,激发对本国的关心。了解本国的生活及其面临的任務,所有这些当然只是最起码的形式,但却是生活于一定政治和经济整体中的每一成员所必需的知识。最后,还要了解我们的现代史——战争、革命、国内战争,它使旧的基础遭到了严重摧毁,这一段往事现代人还记忆犹新。它可以首先使儿童对现代史产生兴趣,以后还可以使他们对远古的历史产生兴趣。儿童必须了解人类发展的主要阶段,为了了解现实,为了了解社会发展的方向,他们必须了解人类发展的主要阶段。周围的生活使儿童对所有这些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们应该把这种兴趣与研究各种现象联系起来。

实现既定任务的办法何在呢?

读书学校是一种自我封闭的学校。这种自我封闭的情况在旧时的住宿学校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贵族女子专科学校、武备学校企图在教育儿童时完全不接触外部环境。人人都指摘这种住宿学校的做法。但是,平心而论,我国的许多幼儿园难道不是使儿童完全

脱离生活的吗？难道我们的学校就与居民的劳动生活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吗？

许多当代的教育家在一定程度上都愿意自我封闭于学校的高墙深院之中而脱离复杂的现代生活，不去正视生活的黑暗面。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当代绝大多数学校都是通常那种自我封闭的学校。学校与周围环境没有任何联系，居民对学校感到陌生不亚于以往。

应该千方百计地建立这种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在于教师要把周围环境当作学校研究的对象，而且要使学校和居民之间建立一定的关系。

学校和居民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外表的（诸如，学校上演戏剧，儿童和教师都参加；或者由学校赠书），而应贯穿于全部学校工作，成为这项工作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学校应该对生活起作用。重要的不在于学校干预生活的好处有多大，而在于学校要正视生活，积极干预生活。

举例而言：

农村里由于对儿童照顾不周而造成死亡。我们为幼儿开办了幼儿园。重要的是让学生关心幼儿园：有时帮助缝补幼儿衣服，有时为幼儿园画一幅图画，有时制作一点玩具。或者是出现了某种害虫，孩子们在学校学过如何消灭这种害虫，那就让他们到某个农场去消灭这种害虫。或者让他们投递邮件、代写书信。年龄大的儿童可以让他们在校内为居民答疑（利用学校的图书馆并在教师的指导下，等等）。

在这里，很难提出一个现存的模式。只不过是教师应利用每一个机会让儿童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些什么，不过要做得很有水平，能激发首倡精神，一点也不勉强。

另一方面，居民也要把学校看作自己切身需要的东西。因此，教师必须向居民介绍自己在学校里的工作情况，使他们了解这项工作。教师应摆出自己的困难，指出解决困难的办法，让居民了解送儿童上学是一件大事，而在学习时期，不要让儿童去饲养母鸡，等等。如果

教师能够做到这一点,居民就会主动帮助学校,既关心烧柴问题,又关心清洁卫生问题。

当然,由于居民以前未碰到过这些问题,因此向他们作宣传解释工作往往不容易。就拿学校早餐来说吧。现在,国家无力供给全体儿童伙食,就应该发动家长来参加这一工作,把他们组织到这一工作里来。如果加强了居民对学校的了解,居民代表参加学校的工作,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就会知道,他们在学校里应做些什么工作,在校外应该为学校做些什么工作。居民代表参加学校工作,可以促使学校由“官办的”学府变为社会性的学校。同样重要的是,要让教师认识到居民代表积极参加学校工作的重要性,这样他就能在这方面采取一切措施加以配合,同时自己也表现出高度的主动精神。

现在谈谈劳动学校的问题:

居民最为欢迎的可能就是劳动学校。早在革命初期,即劳动人民发动革命之时,就曾宣布我们的学校应该是劳动学校。但是,什么是劳动学校?每个人对劳动学校的理解各不相同,现在时隔五年,旧事重提:到底什么是劳动学校。在这方面,我们有教训。现在我们认识得比较清楚了:劳动学校不只是崇尚劳动的学校,也不是从事单一机械劳动的学校,不是只搞冒牌劳动学校常搞的那种自我服务的学校。

那么,到底什么是劳动学校呢?它是不是只是拼命干活的学校?它是不是侧重教学生不要消极地接受知识,而要积极地对所学的知识产生反馈?而且,不管儿童整天在学校里是学戏剧也好,艺术体操也好,或者从事生产劳动也好,都无所谓,是不是这样的呢?

不是。我们至今坚持我国革命时宣告的劳动学校的原则,不过应该慎重地说明,我们所认为的劳动学校这一概念包含的是什么内容。

第一,居民过去和现在的劳动活动而应该是学校学习的中心——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劳动学校对待教学大纲上的一切问题都应从劳动的观点出发(如对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等课程),从生产的观点出发,从劳动人民的观点出发。如果把劳动学校归结为研究声名狼藉的“劳动过程”,那就无异乎抽掉了它的精髓。

第二,在组织学校生活中,儿童的生产劳动应占主导地位。

当然,在这里最主要的是劳动活动的选择。担水劈柴是劳动,采药、画招贴画、举办教育博物馆、给幼儿园的小朋友缝衣服、采集蘑菇和干果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劳动。

在选择劳动的形式时,要考虑到儿童的兴趣以及他们对生产劳动的认识。只能逐渐地使儿童对生产劳动的认识接近成人对生产劳动的认识。

其次,在选择劳动的形式时,必须使这种劳动形式具有集体性质。集体劳动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再有一点,就是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劳动。要让儿童自己提出目的,讨论工作计划,分配工作,决定劳动过程中的互助形式,然后每个人全力以赴地去完成自己分担的任务。这样安排的劳动就会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就能使儿童获得生活组织者的熟练技巧;另一方面,又可以使他们形成一种自觉纪律,这种纪律不是靠命令形成的,不是出于害怕处分形成的,而是集体劳动的本质的体现。这样组织的劳动也有助于儿童正确评价自己的力量。

在选择劳动形式时,还应注意的一点就是,给儿童劳动提出的目的,起初不应太复杂,要使儿童易于接受,以后再逐渐复杂起来。

最后,我们之所以赞成劳动学校,还由于我们认为劳动教学法是最完善的方法。

初起只是让儿童掌握某一事实或思想,然后才转为讲授所布置的功课。下一步就是过渡到直观教学。进行直观教学之后,再采用实验方法,让儿童通过实验检验他所学的知识,最后,当代教育学提出的这种劳动教学法,可以使儿童最全面地研究事物、影响事物。

我国学校应该充分利用上述一切方法。教师要善于简单明了地向儿童讲述各种概念和现象。直观教具在学校里具有很大的作用：图片、模型、标本等等是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学校应该广泛采用参观教学的方法，这种方法是直观教学的一种扩大。应该让学生通过检验性的实验对所学的东西尽可能广泛地进行研究，但是劳动方面的研究（制作模型，创作上的模拟）在学校里应占特殊的地位。在研究物质文明和研究日常生活时，它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总之，劳动乃是教学大纲中研究的中心，劳动是学校生活的组成部分，劳动是一种教学方法！

全面地研究居民的劳动活动是教学大纲的基础。这种对劳动活动的全面研究正是综合技术教育化。人们往往把综合技术教育理解为学习多种手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不应该只是通过手工的形式来学习技术，而应通过各种形式，直至最完善的形式。在学习技术时，也应学习各个阶段的农业技术。还要学习农业与工业的关系。通过学习，要对国民经济有一个了解。

但是，研究的出发点应该是对儿童亲眼所见的劳动活动进行尽可能全面的研究，而且这种劳动活动应该是儿童能够理解并能直接参加的。对儿童能够理解的这种劳动进行具体的研究，这是研究全国经济生活的基础。对于农村学校，对于城市学校，对于工厂学校等等来说，由于学校所处的具体环境不同，其出发点也各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谈学校的某种侧重面。最典型的的就是学校的农业和工业的侧重面。可以通过这种侧重面说明，在某种环境下应该选择周围生活中的哪些现象来研究，并根据这些事例来说明应该怎样对待这项工作。不过，每个学校应该有自己的特点，根据劳动活动特点的不同而采取的独特研究这种活动的方法。

农业和工业方面的侧重面只不过是提出了选择什么东西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

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性质是排斥职业教育这种侧重面的。侧重职业就是专业化,而专业化只能在研究整个劳动活动的基础上进行,只能在研究儿童的力量、爱好、专业兴趣的基础上进行,脱离了这个基础的专业化就会缩小学校的普通教学和普通教育的意义。

学校自治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教育意义。

只不过不要像许多学校那样,把学校自治与学校管理混为一谈。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

学校管理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它既要求对人的了解,也要求对学校任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还要求具备丰富的生活经验。而儿童们当然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

让儿童肩负管理学校的重任,这是对儿童的能力毫不了解,它只能使他们的纪律混乱,使他们或者是自命不凡、目空一切,或者是(对比较好的儿童说来)丧失对自己力量的信心。

当然,可以让儿童多少学习一点这种管理方法,学生代表应该参加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应该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是,在管理学校这件事上,不能由他们说了算。

自治却是另外一回事。它是学校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自治,儿童们学习如何群策群力来探求学校内共同生活和集体劳动的形式。自治是把这种生活和劳动引上一定轨道的一种手段。要学会共同生活,就要学会尊重别人的劳动、知识和爱好,就要学会为他人着想,给别人以方便,与别人同甘共苦。要学会共同工作,就要学会了解自己的和别人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学校自治对上述方面都能给予帮助,这与其说是自治,毋宁说是集体地探求实行这种自治的形式。要使这种自治根植于儿童的经验。例如,一个小孩欺侮别的小孩,不让别的小孩干他喜欢干的活儿,那么,就要制定一个规章制度,禁止互相妨碍、干扰,等等。

从教育的角度看,重要的正是形成自治方式的过程本身。当然,自治本身也很重要,因为它是培养自觉纪律的一种手段,是自愿服从

集体意志的一种风尚。

自治应该是经常进行的,应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儿童的整个生活加以规范。有些教师的做法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是在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学生中有谁惹祸了的紧急情况下才召开儿童大会。他们把这种大会当作审判大会,从而完全降低了自治的教育意义。

一般说来,自治应尽可能接近儿童生活,应从儿童的利益出发。不言而喻,这种自治不同于成人的自治。

在任何情况下,这种自治都不应是成人政治生活的翻版,不能套用民主共和国甚至不能套用苏维埃共和国的作法。

阶级社会的生活组织中行之有效和势在必行的东西,在学校生活里完全不适用。

国家自治是一种统治组织,是利益冲突的各阶级之间斗争的产物。

学校里的自治却是安排集体学习和劳动的一种途径。

要实行自治,只有在劳动学校里才有可能,只有在社会生活极其活跃的学校里才有可能,因为儿童在这种学校里经常为了某种目的而组织起来。

谈教学大纲问题

至今为止,俄罗斯联邦还没有一份各校适用的统一的固定的教学大纲。革命前的旧大纲束缚了教师的手脚,对整个学习过程妨碍甚大,以至革命胜利的初期,新大纲尚未制定,旧大纲即被废弃。但是很快就发现,许多教师本身无力制定符合时代精神的大纲,致使一般教师无所适从,不知怎样办才好。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孩子们在学校里非常积极地参加演剧,画图画,唱歌,制塑像,可是却没

有学习读和写,或者整天忙于自我服务,忙于开会,在学校里甚至连四则运算都不会。虽然这种情况总的说来现在已不多见,但仍然时有发生,而被反对新式学校的人肆意夸大。

因此,从1919年起,教育人民委员部已开始印发个别课程的示范参考大纲。在教育人民委员部进行这一工作的同时,有些省市也在制定大纲。现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库尔斯克、梁赞、土拉、伊凡诺沃——沃兹涅信斯克、叶列茨、西伯利亚等地都有了自已制定的大纲。一年前,教育科学部曾把教育人民委员部早先印发的示范大纲汇总后作了某些补充和修改。这项工作做得很仓促,因为想把这份未定稿在1921—1922学年先行试用。这项工作虽然按时完成了,但是由于印刷条件所限,七年制学校的教学大纲直到1922年才发下去。大纲未定稿清楚地表明,现行大纲非常抽象,很不完整,许多课程还没有大纲(如经济地理,劳动组织,卫生等等),而更主要的是,现行各科大纲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互相脱节。已出版的大纲汇编可能对教师们有参考价值,但大纲还有待进一步修改。

我们把我们的学校称为劳动学校,不仅是由于这种学校在教学上采用劳动教学法,不仅是由于劳动成了学校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还由于劳动、人们的劳动活动应是整个教学大纲的一个轴心。

形形色色互不联系的大纲较少下达到一级学校,因为那里的课程很有限,而且儿童正处在这样一种年龄时期,在这种年龄时期,他们从学习过程本身得到了乐趣,不大注意他们为什么学习这门或那门课程。

但是在二级学校里,儿童们开始感到课程繁多,所学的材料有很大的偶然性,突出地感到所学各部门之间缺乏内在联系。一会儿学这门课,一会儿又学另一门课,会使儿童感到困难,同样,他们也很怕分散注意力,他们会不断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要学习这个?”大纲成了很难消化的东西了。

凡是认真地观察过儿童的教育家都不可能不发现,这样无休止

地变换课程会增加很多困难,因为这些课程必须集中注意力。近来,人们日益强调在一级学校教学时应该采用所谓的综合教学法。但是,如果教师没有掌握判断某一问题重要性的标准并使整个谈话有一个引人入胜的前景,那么这种综合法就会很容易地变成一种单纯的空谈。采用综合教学法并不能解决问题,其原因还在于只有在最初几年的学习中才能运用这种方法。

随着学生学习范围的扩大,就要按不同的学习内容将他们分组。问题在于如何在按课程进行划分时使大纲成为统一而又完整。

要想做到这一点,就要把学习人们的劳动活动当作一级学校和二级学校教学大纲的基础才行。这就可以使每次谈话的题目之间、各门课程之间建立起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是必不可少的,它有助于对整个教学的理解。如果在题目的选择上,在讨论时所持的态度上有一种内在的统一的東西,那么综合教学法就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如果没有这种统一的東西,那么综合教学法也于事无补。

也许人们会问:你们为什么对问题采取这种片面的态度,为什么要把一切都归诸于研究人们的劳动活动?这会不会大大缩小学生的视野呢?

首先,对“研究劳动活动”这个概念,我们是从极广泛的意义上理解的。为了研究人的劳动活动,必须研究这一活动的客体——自然界和自然力;其次必须研究人作用于自然(技术)的方式;最后,还要研究这一活动的主体——人。既要把人当作动物界的一员来研究,又要把他当作人类社会的一员来研究,既要研究他的肉体需要,又要研究他的社会需要。而为了了解社会需要,就必须懂得当代社会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知道当代社会的发生、发展和前进方向。

我们把研究人类劳动活动当作基础,还由于这种劳动活动是整个社会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我们把这种研究作为基础,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应该对这种劳动活动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我们正生活在两种经济制度交替的时期。旧的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

是建筑在竞争和剥削的基础上的,建筑在忽视整体利益、缺乏计划性的基础上的。现在,旧的经济制度已经瓦解。新的经济制度,即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已经诞生。在这种制度下,生产是以一定计划作根据的,并且是为了共同的福利而进行的;在这种制度下,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但是这种新的制度所需要的却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这种人不是单纯地执行别人的命令,而是自觉地参加生产,他们能照顾整体利益,懂得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及其相互关系等等。学校应该为培养这种类型的人材作出贡献,这种人材现在需要,将来也需要。

不同生产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各国的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现在,一个人独居斗室、与世隔绝已不行了,必须懂得自己周围的生活与其余世界的的生活之间的制约关系,应该看到把自己与这一世界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经济和生产方面的关系。

但是,我们把研究人的劳动活动作为教学大纲的基础,并非完全由于上述这种情况,还由于儿童对人在这方面的活动表现了特别浓厚的兴趣。《鲁宾逊漂流记》一直是儿童爱不释手的读物。

我国的教学大纲带有传统的烙印,而且还是一种很不好的传统。过去制定旧的小学教学大纲时,所考虑的是工人和农民不需要有很多知识,他们的任务不是组织生产,而是努力地按时好好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二级学校的大纲是为特权阶层子弟制定的,他们照例不大劳动,空闲时间很多,因此可以学习各种古代语言和一些与现实生活毫无关系的课程。

必须对我国的大纲进行审查、修订。

在修订大纲时,必须把一些最本质、最必需的东西突出出来,形成一个最低限度的大纲。这个最低限度的大纲不仅是示范大纲,而且也是国内所有学校必须执行的大纲。

国家应该授予每个学生最低限度的必要知识。

这个最低限度的大纲应由教育人民委员部制定。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对所有的学校都搞一刀切。

对于必须遵行的大纲应采用什么材料还没有作出最后确定。但从教育学的角度看,要从儿童周围的环境中选取材料,这种材料要很具体,为儿童所理解,是他能观察得到并能产生影响的。所以,大纲中规定的农村中学要讲授的材料,应不同于工业区学校所讲授的材料。彼得格勒省农村中学又不同于沃涅什省农村中学;伊凡诺沃——沃兹涅信斯克工业区学校所学的材料,又不同于顿巴斯或乌拉尔。最低限度的大纲规定要讲授的材料由各个地区确定。

当然,在这方面应有一定的分工。教育人民委员部制定总的大纲,各地根据当地的情况确定师生应该学习和研究的材料。最好能召开一些各生产地区的教师代表大会,邀请当地执行委员会、农业局、最高国民经济会议各处和保健处的代表参加,邀请农业实验站、工业企业等单位的代表参加,讨论学校要学习的生产材料。单个的教师是无力完成这项任务的。这需要用集体的力量才能做到,这个集体应使学校与学校所在地的生产单位建立联系。各生产地区的教师代表大会应指出如何去完成这项任务。

学校集体要把所学的材料进一步具体化:它应该研究学校怎样与某个工厂、与某个国营农场和农业实验站以及火车站等建立联系。毫无疑问,应该发动当地劳动人民参加这一工作。

最低限度的大纲并不意味着只限于学习所指出的最低限度的东西。教育人民委员部要是不制定一个最低限度的大纲,那就错了。那样就会单纯地追求教学大纲的进度,埋头于读书。而有了最低限度的大纲,就可以使工作按部就班地进行,留下充裕的时间让孩子们从事他们感兴趣的活动,使学校得以了解当地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强工作,得以采用需要时间的劳动教学法并且合理地安排学校生活,同时实行学校自治和多方面的劳动。

现在我们谈谈大纲本身:

一级学校的宗旨是授予儿童从事劳动活动和文化生活最必需的

技巧和知识,并使他们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兴趣。

必须培养儿童流利地、连贯地、详细地讲话的熟练技巧,这不是靠传统的转达能做到的,而是靠在学校集体中对一切见闻进行讨论并且自由地表述自己的思想的习惯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合理地安排学校生活,合理地组织学校集体才能做到这一点。

还要关心扩大儿童的词汇量,丰富他们的概念。不充分扩大他们的视野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一级学校的经常任务就是给儿童讲授实用的、有趣的、内容广泛的阅读材料,所讲授的这种材料要写得通俗易懂,要考虑儿童的心理特点。特别重要的是描绘人的劳动活动的材料。一级学校往往完全忽视了社会知识。据说是因为儿童年龄还小,不懂得经济和政治问题。实际上,儿童们无论在家里或街头巷尾都常常听人讲起这些问题,常常考虑这些问题,学校里回避这些问题是错误的。不过,在讲解这些问题时,要考虑到儿童的心理特点,考虑到他们的阅历和兴趣。

自然学科应在一级学校里占较大的比重。与此同时,特别重要的是用研究的方法来研究自然界的各种现象,积极地对材料进行分析。

要记住,语言课和数学课在一级学校只应起辅助作用,一级学校把这两门课当独立的课程来学为时尚早。因此,本族语和数学的学习材料应该适当,要与儿童的观察和活动紧密联系起来。

也不应该用一些纯文学的材料、修辞和语法练习来加重儿童的负担。这个阶段的语法课只具有辅助的、实践的性质。学习语法完全是为了学习拼写法。

绘画、雕塑、唱歌、游戏对于8—12岁的儿童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们这是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获得经验的手段,是组织和表现自己感受的手段,因此应该使它们为教育的目的服务。但是在这方面应留有一定的余地,不能负担过重,一切工作都应纳入正轨。

二级学校第一圆周阶段的教学目的,就是授予学生以认识力和熟练技巧,使他们能妥善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劳动,自觉地对待各种

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现象。

这个圆周阶段是对生活和劳动活动的一个准备。在这个三年为期的圆周阶段结束后,学生们或者是直接参加工作和在工作过程中根据生活实践进行学习,或者是上某个中等技术学校或工厂艺徒学校。

现在我们来谈谈二级学校第一圆周阶段的大纲。

旧的大纲只字不提组织劳动的事,然而无论是组织个人劳动还是组织集体劳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必须对人的劳动活动的基本领域以及这一活动的不同形式进行研究,还要对各种形式之间的联系及其相同关系进行研究。也许后面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初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那时的生产是建筑在竞争的基础上的,但是现在资本主义却碰到了计划生产的必要性问题。当前的时代要求我们理解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彼此的制约关系。学生从理论上和实际上对这方面的知识加以研究,就可以使劳动学校变为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学生必须对社会的劳动组织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为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的结构,也必须指出产品的生产和加工的方式以及相应的劳动组织(经济形态)对社会的阶级组成,对社会的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为了更好地了解现状,必须知道它的发端及以前的发展情况。历史应该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现实。学生们要懂得社会发展的历史,这样他们才能知道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历史教学中,个别的历史事件和事实不应淹没社会发展的趋势。文艺作品是激发人们对社会现象产生感情的强大武器,因而应该广泛利用。但是,文学史应该与语言学习分开,而与历史教学保持联系。这样才可能杜绝这方面教学中的许多有害倾向。

为了激发人们对历史的感情,最好还能用艺术史上的一些事例来讲述历史,让学生了解那一时期的历史作品。

二级学校和一级学校都应讲授艺术,不过性质略有不同。8—12岁的儿童感兴趣的那种简单的技术,它却不能满足12—15岁儿童的

需要了。受这种不满足的感情的影响,他们往往完全放弃了艺术学习。因此在对待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的艺术教学中,需要注意方法的正确。一方面要注意技术,使儿童们掌握一定的技术熟练技巧;另一方面应该更加深刻地理解艺术作品及其任务和宗旨。

至于说到语言学习,那么这种学习应该紧密地结合语言和文字的发展历史。条理清晰的语言和文字史,可以激发儿童对语言形式、讲话结构产生新的兴趣,使他们对能使语言形象、生动并且具有说服力的那些条件产生新的兴趣。这可以把儿童从前感到头疼的语法规则和图表变得生动具体起来。在深入学习本族语的同时,还应学习外语。二级学校一定要讲授新的语种(学生不一定必修),最好从一级学校三年级开始讲起。第一圆周的 language 学习应从一开始起就与学习语言的精神、语言的特点联系起来,还要与学习使用这一语言的民族或国家的生活和历史联系起来。

自然学科的教学在很大程度上要面向人们的劳动活动,要与这一活动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要特别注意卫生课的教学。同时,自然学科整个教学要为学生的世界观打下基础,讲述地球的起源,阐明地球的历史和物种以及人类的起源。

学校里的自然学科教学也不应回避有关性生理方面的问题。讲授这方面的知识可以使学生懂得性生活的规律,使他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在二级学校第一圆周阶段讲授各门课程的时候,必须注意使学生充分掌握各该知识领域的研究方法。

在这里,我们还未讲到教学大纲的分量,而只是讲了大纲的性质。教学大纲的分量应使学生不感到负担过重,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自学,合理地安排学校的集体生活,进行劳动教学,从事体力劳动和由学生积极管理自己的生活。

二级学校第二圆周阶段是为这样一些儿童安排的,这些儿童在第一圆周阶段对某种知识产生了研究的兴趣,希望进一步深入研究

这门知识。

二级学校第二圆周阶段已实行分科制 ,也就是说 ,把主要的兴趣或者放到自然学科及其派生的技术学科上 ,或者放到社会经济学科上。

在第二圆周阶段两年的时间里 ,学生有可能更深入、更全面地熟悉他们所选择的知识领域 ,更好地掌握该门科学的研究方法。在第二圆周阶段应使学生尽可能独立地研究材料、深刻地思考材料 ,并养成对所选择的知识领域的专门兴趣。

这样 ,我们就将建立一个符合生活和时代要求的统一的国民教育体系。

组织自学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劳动人民(工人和农民)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来根据新的原则改造整个生活。工人开始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 ,农民的宿愿也实现了 :他们分得了土地。这使他们渴望参加各种活动 ,他们也感到自己的精力空前充沛。

但是 ,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 ,他们很快就察觉到 ,由于缺乏最起码的知识 ,因而手脚受到束缚。战争打破了农村与世隔绝、闭关自守的局面 ,为农民掀开了生活的帷幕。他们知道了科学成果的伟大作用 ,知道有了知识就可使山河大地改变面貌 ,就可获得巨大的力量和资源。工人认识到这一点要早些。

革命使劳动人民成了生活的主人 ,激发了他们利用科学以实现自己目的的愿望。工人和农民的这一愿望更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没有知识是不行的 ,因而迫切要求掌握知识。

苏维埃政权满足了这种要求学习的愿望。

在沙皇时代,所谓的校外教育十分可怜,并处于一种半合法的状态。苏维埃政权极其重视成人教育工作,不惜为此而拨出巨款。

扫盲工作的步子迈得很快,建立了大约八万个农村阅览室、三万个图书馆以及许许多多苏维埃党校、俱乐部等等。报刊充分发挥了作用,进行了文艺宣传,开展了宣传运动,举办了各种短训班。

苏维埃政权建立五年来,政治教育委员会在居民中广泛地、积极地开展了普及知识的工作。

红军也是一个强大的文化基地。全体男青年都参加红军,他们在红军中这两年并未虚度。各地都开办了红军学校(为不同文化水平的红军战士设置的)图书馆,俱乐部(例如,目前^①已有1200多个红军俱乐部,下设6200个政治、普通教育、农业等等小组,拥有13万多会员)。

各级工会、妇女部、青年团也同样做了大量的教育工作。

为了给工人和农民提供上高等学校的机会,专门制定了优待录取的规章,普遍发放了助学金。工人和农民的子弟上中学也从宽录取。为了培养工人和农民上大学和其他高等学校,还为他们专门开办了工农速成中学。

但是,上述种种还远不能满足劳动人民对知识的迫切要求。自学在长时期内还将在我们俄国起着十分独特的作用。

为了使自学取得很好的效果,必须知道读什么,怎么读,如何最恰当地安排自己的学习。

我们常常看到,工人和农民干完活之后想学习时,却得不到任何帮助。他们不知道从何学起,不知道读什么和怎样读,他们缺乏最起码的知识。有的人识字不多,却立即捧起马克思的《资本论》来读,结果发现自己啃不动。

有些干劲不足、坚持不了的人感到灰心丧气,就只好放下了他们

^① 指1992年。——原注

力所不及的学习。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他们读的是马克思的作品,而又不能掌握作者所讲的材料,结果就成了赤手空拳与猛虎搏斗。

干劲比较足、能坚持学习的人虽然可以达到既定的目的,但是却占去了很多生产劳动时间,往往影响了工作。

现在,我们经常讲起和写文章谈到组织劳动和生产宣传的问题。这主要是指组织生产的问题。

泰罗和其他许多工程师、专家都曾详尽地探讨过如何组织体力劳动的问题。论述企业劳动组织的著作汗牛充栋。还有很多著作谈到车间的机器应如何放置,工具如何发放,劳动怎样分工,命令怎样下达,考核工作怎样进行。探讨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为了避免浪费时间和精力。从合理地组织劳动的角度来看,最优秀的专业技术工人都能做到:一切必要的动作都是合理的、迅速的,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又是最少的。

但是,如果说在体力劳动方面我们还能经常强调合理地组织劳动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观点的话,那么在脑力劳动方面却常常忽视了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然而这个道理对于学生和那些需要通过自学来充实自己知识的人来说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学习材料的选择

人类的知识领域广阔无垠。世代以来,千百万人积累了大量有关社会生活和周围世界的知识,谁也不能全部掌握这些知识,即使把一个人的寿命延长几十倍也不行。不过,一个人也没有必要掌握所有这些知识。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里,他只需要挑选最重要的知识,这些知识能使他变得勇武有力,能驾驭自然界和各种事件,能使他学会如何利用自然力和自然资源,如何改造人类社会的整个生活。应该从大量的知识中挑选那些对现代人最有意义的东西来学习。

我们生活在社会革命时代。旧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土崩瓦解,新的、共产主义制度正在茁壮成长。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剥削与压迫的基础上,建立在祸及全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及其残酷的事实,撕破了资本主义的假面具,使广大群众看透了这种制度的极不公道之处,看透了这种制度的种种黑暗面。劳动人民渴望寻求并建立新的社会生活方式。俄国已经开始建设新生活了,这种建设工作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不言而喻,所有这些情况都将唤起人们对现实问题的浓厚兴趣,而人们也将力图弄清当前的形势并理解其意义。

当然,想弄清当前的形势(这在目前具有重大的意义)就得读报,而象《真理报》这样的报纸,能使他们懂得很多东西。但是,报纸自然只能阐述某一方面的观点,让人们注意一定的事实,指出对待问题的态度,也就是说,实际上只能做到一个有天才的、消息灵通的演说家所能做到的事情,——把人们的思想引向一定的方向,给人们指出远景,提出一些重要的问题,指出处理这些问题的态度。但是,为了弄清问题,除了读报之外,得同时读一些比较有用的书籍。如果不了解资本主义复杂的结构,就不可能明白它整个体系中的个别现象。由此可见,凡是想了解当前形势的人,都应该认真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研究它的整个结构,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了解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弄清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是什么(这种力量是在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和发展的)。这是了解当前形势的关键所在。

另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问题。这是一个极其关键、极为重要的问题。为了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必须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原始文化的历史以浅显易懂的形式说明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所以必须学习原始文化史。但是不能停留在学习原始文化史上,还要研究后来社会是如何发展的,研究后来的历史怎样出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那些规律,这时就

能明白社会发展的方向。

除了社会制度方面的问题之外,还有关于自然现象的问题。人是人类社会的一员,同时也是动物界的一员,对他产生影响的不仅有人,不仅有社会生活,还有自然界及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

因此,我们还应对自然界及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进行研究,对生物界和非生物界的规律进行研究。自然科学有助于我们掌握认识自然现象的一定方法:观察,作结论,用实验来检验这结论。逐步地用这种方法来研究自然现象和自然力,研究科学(人类日积月累的系统经验),这样就获得了有关这一领域的大量重要知识,从而得以为人类的福利而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及自然力。我们必须熟悉人类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积累的知识,因为它可以使我们掌握人类在征服自然界方面的日益增强的措施。

自然科学还有使人感到饶有兴趣的方面。我们在对待社会生活的问题上,是从其发展过程来研究这些问题的,同样,我们也必须以这种态度对待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地球是怎样形成的,地球上的生命是怎样产生的,各种动物和植物是怎样形成的,人是如何形成的——凡是想知道自己在自然界的地位,承认自己是大地之子的人,都应该具备这些知识。当然,重要的不只是了解科学的最终成就,重要的还在于了解如何认识到这一点,怎样去观察、借助什么样的工具、根据什么样的事实来认识这一点。重要的是不仅使人口头上相信,而要懂得实际上的确如此。在远古时代,人类对于地球的起源有过种种传说,对于物种和人的起源也有过种种传说。尽管这种传说已为许多研究成果和事实所驳倒,但至今依旧流行不衰。我们必须掌握这一情况。

现在有一种时髦的说法,书籍是劳动的工具,而非形成世界观的手段。“书的存在是为了从事生产,而不是为了获得知识,不是为了形成‘完满无缺的世界观’,过去的这种说法应该成为我们今日的座右铭。人们主张,要使书本成为锤子和镰刀的奴仆。”

这些话听起来娓娓动听,却没有什麼道理。什麼叫做“书的存在是为了从事生产,而不是为了获得知识”?人们怎麼理解这句话?书本的存在正是为了让人获得知识,使人们把工作搞得更有成效。

再是,说什麼“书的存在是为了从事生产,而不是为了获得知识”是过去的说法。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

世界观是什麼?它是我们对周围生活和自然界各种现象的态度和解决某些基本问题的一种方法。这些基本问题能不能不解决呢?不能,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会一窍不通,就会在生活中四处碰壁,有如无头苍蝇一样。

“完满的”世界观是什麼?是一种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具备了这种世界观,处理一切基本问题都能做到胸有成竹,不仅没有矛盾,而且,协调一致,完满无缺。

如果一个人对一切基本问题都能做到深思熟虑,妥善处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好事,尤其是他能正确解决这些问题时更是如此。这种人懂得他需要什么知识以及為什麼需要这种知识,他将成为我们称之为的“自觉的人”。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一个自觉的人的工作成效,要比那种一问三不知的人的工作成效大得多。然而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关心形成自己正确的世界观是一种过时的、不合法的事情。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坚定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他会感到,具备了唯物主义世界观可以使他的工作和活动搞得更好,也就是说,搞得更有成效。

如何学习必要的材料

对于从事自学的人说来,从什麼地方入手去学,按什麼程序去学,这是一个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问题。当然,所选择的书在文字上和内容上都要适合自己的水平。不言而喻,一个不懂得初等数学的人是啃不动高等数学的;一个不懂得哲学的人,是读不了黑格尔的著

作的。但问题的实质还不在此。如果一个人读的书中所谈的问题是他从未考虑过的,是他从未接触过的,他不知道怎样把这个问题与自己的知识联系起来,不知道怎样把它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阅读这本书就会使他得益甚少。如果书的内容与这个人的思想有关,满足了他的某种需要,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我谈一段自己的往事。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大概有三十年了。当时我虽然已在中学毕业,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当时在这方面也一点不懂)世界上还有一门科学叫政治经济学。有一天,我的一位女友给我带来了一本伊万纽科夫写的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她竭力劝我把这本书读一读。这是一本通俗读物,无论是文字还是内容,我都能看懂。我开始读了起来。我“啃”了很久,勉强弄明白了它的意思,不过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却觉得毫无所得。过了几个月之后,我参加了工人小组的活动,这时我才明白我为什么需要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我阅读马克思的作品,兴致勃勃地读完了《资本论》第一卷,花的时间不长,而收获却很大。对我说来,一本薄薄的通俗读物却比一本厚厚的学术著作还要难。

一个有才华的报告员,一个出色的教师,只有自己对某一事物非常喜爱,他才能使听众和学员对这一事物产生兴趣,才能把他们的思想引向这个方向,激发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往往有的报告并没有什么丰富的内容,也并不十分深奥,但是,如果它能启发听众的思想,使他们产生某种要求,这个报告就是有价值的。过去,一些进步的语文教师经常利用文学来启发学生的思想。有的讲演人员在群众大会上往往也能做到这一点。

与同学们交谈,共同讨论问题,这对提出新的问题、激发新的兴趣很有帮助。正因为如此,所以集体的、班级的或小组的活动很有益处:它可以给人启发和推动。

现在再来比较详尽地谈谈兴趣的问题。

每个人的兴趣各不相同:有的人对社会生活的问题感兴趣,另外

一些人对技术问题感兴趣,还有一些人对艺术问题感兴趣,等等。一个人是被迫学习还是乐于学习(俗话说,带着脑袋去学),其效果是有很大差别的。例如,我们常常见到这种情况,如果儿童的注意力被别的什么东西吸引住了,他们是很难好好学习的。

“哈哈,普希金也得过零分。”

为什么普希金在皇村高等法政学校学习成绩不好?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公子哥儿,成天游手好闲?当然不是。他的学习成绩不好,是因为学非所需,还由于他的兴趣完全放在诗歌上了。

正是普希金,他曾经描写过一个诗人的感受(这位诗人未能表示对诗歌的兴趣,而诗人的内心却已对某一现象产生了兴趣):

诗人尽在怯懦而虚荣地
浸沉于世俗无谓的烦扰;
他的神圣的竖琴喑哑了,
他的灵魂咀嚼着寒冷的梦;
在空虚的儿童世界中间
也许他是最空虚的儿童。

然而,诗人敏锐的耳朵
刚一接触到神的声音,
他的灵魂立刻颤动起来,
像是一只惊醒的鸷鹰。

普希金喻之为“神的声音”的东西,也就是兴趣。

普希金所描写的诗人的心情,对于每一个对某种现象产生了浓厚强烈的兴趣的人来说,也是完全适合的。例如,一个医生沉醉于自己的工作中,可能达到忘我的程度。在日常生活中,他的灵魂往往“咀嚼着寒冷的梦”:他精神不振,对四周的一切表示冷漠,——但是,只要一接触他的专业,他“立刻颤动起来,像是一只惊醒的鸷鹰”。你们不妨对人作一番观察:他们大多有一块自己特别感兴趣

的天地。不过有的人这个天地特别广阔,他的志趣在于改造人类的生活;另一些人则关心火警,还有一些人则只是想到自己的孩子,等等。兴趣往往产生于某种强烈的印象,这种印象有时甚至是很久远以前的。我认识一位消防专家。他十岁的时候,遇上了一次大火灾,这次火灾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为消防工作所吸引。他气喘吁吁地在屋里谈起这件事,绘声绘影,竭力渲染。此后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枯燥无味、度日如年的中学年代,小官吏的宦海浮沉生涯……而他唯一的休息就是在一个小城市的消防队当义务队员。

奶娘讲的故事和长篇的诗歌,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深刻感受,决定了普希金的活动方向。

每当我们对职业兴趣产生的原由进行探究时,我们往往都会上溯到久远的感情经历上,也就是说,这种经历一直控制着一个人的感情。

兴趣可以使人集中注意力。注意力分为随意的和不随意的两种。随意的注意力只能保持短暂的时间,以后还需要再费力气才能复呈。不随意的注意力不需要任何意志力,此外,它要更全面、更深刻得多。如果一个学生对历史毫无兴趣,就很难让他注意听教员讲课,他的思想经常溜号,注意力涣散,因而他必须不断督促自己,为此要费去不少精力。如果一个学生对历史感兴趣,他就会注意听教员讲的每一句话,毫不分心。

一个人对某一事物注意的时间越长,他全面掌握这一事物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个知识贫乏、呆头呆脑的人不可能长时间对某一事物集中注意力,他对这个事物的兴趣很快就会减弱。反之,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学习,依靠对问题的敏感和判断,可以不断巩固自己对某一事物的注意力,“强化”自己的注意力。

我们所注意的事实和事物,往往能记得更牢。著名的科学家巴斯德对一切有关微生物科学的大小事情都记得非常清楚,但他一辈子也没记住每天晚上随他妻子一起念的祈祷词。

请看著名心理学家詹姆士对兴趣的作用所作的论述;

“大多数人都能牢记与他有切身关系的事情。一个有竞技能力的学生,他在学习上可能一窍不通,十分笨拙,但他对有关竞技活动的知识却非常丰富,令你吃惊,他可以成为体育统计数字的活字典。原因在于,他经常想到他所爱好的这门活动,注意收集有关材料并逐一加以分类。这些材料对他说来不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而是自成体系的许多概念(他已牢牢地掌握了这些概念)。”正如商人不会忘了商品的价格一样,政治活动家总能记住自己同僚的演说内容和选举结果,其数量之大,不能不令旁观者惊服,但这种超人的记忆力并不足奇,只要我们留心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各行各业的专家对自己关注的事物总是千思百虑、朝夕不忘。

达尔文和斯宾塞在他们的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超群脱凡的记忆力,很可能只相当于这两位科学家大脑功能的中等水平的作用。如果从一个人的少年时期就向他切实灌输进化论(发展理论。——娜·康·)的思想,那么他就会很快地积累并牢固地掌握有关材料。

各种事实将把它们与理论的关系密切联系起来。科学家的智慧越能把各种事实区别开来,那么他的知识就越广博。然而,有些理论家的记忆力可能很差,所记的东西很不连贯,甚至完全不具备记忆力。一些对于理论家无用的材料,他可能不加注意,或者刚一接触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大百科全书式的博学很可能与那种近乎大百科全书式的无知并存……

兴趣激发了无意的注意力,而注意力又是记忆力的前提。

凡此种种,无不表明兴趣所具有的重大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在选择学习材料时,应该以最感兴趣的、最令人“心神向往”的材料为选择的条件。对有的人说来,感兴趣的是社会现象,对另一些人说来,感兴趣的是技术,而对第三种人说来,感兴趣的是艺术,等等。

但是,主要选择某一领域的知识来学习,这完全不是说,一个人只应把自己的知识囿于某一领域,不必也不应涉猎别的领域。恰恰相反,我们只是说他对其他别的领域应采取什么态度。

比如说,我们面前有一个学生对技术感兴趣,另一个学生对社会科学感兴趣。假如两人都要学习电气化知识,那他们的态度就会不一样。学技术的学生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他的着眼点的于:在俄罗斯联邦实行电气化需要什么技术设备。这是他学习的重点。但是,他在考虑各种必要的设备时,也会关心什么样的社会条件才能有助于电网的顺利建成。对社会科学感兴趣的人首先是从社会方面来看待电气化问题的:电气化是建立苏维埃制度的物质基础所必需的,但要判断俄罗斯联邦的电气化是否可能,他必须弄清楚什么叫电气,电动机如何使用等等。我国出版了一本有关电气化的通俗读物,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教科书。写这本书的人不是一位工程师,而是一个典型的社会活动家伊·伊·斯杰潘诺夫。

通过这个例子使我们看到,兴趣所决定的与其说是所获得的知识的内容,毋宁说是对这种知识所持的态度;兴趣是籍以掌握别的知识的一种基础。

心理学认为,任何新的思想、任何新的知识都应与学生已有的知识和思想联系起来,产生“同化”,或者说,新的东西应该与旧的东西“挂上钩”。

詹姆士认为,最令人感到快慰的,就是善于把新的与旧的联系起来,正视一切完全不同于我们早已形成的概念的新现象,揭露其神秘性,把它归入旧的、早已确定的门类,归入我们所熟知的那些现象的领域。尽力把新的与旧的同化,这是一种科学的求知欲,在这种同化未发生之前,新东西对旧东西的态度是很令人惊奇的。对于那些大大超越了我们的知识能力、我们对它毫不了解的东西,我们反而没有什么好奇心,也不感到惊奇,因为我们不知道把它归于何类,也没有具体衡量的尺度。达尔文有一次说,菲吉群岛的土著居民看见小船时感到很惊奇,看到大军舰时反而无动于衷。只有那些我们多少知道一点的东西,才能使我们产生进一步深究的愿望。“任何新的片断知识都应该与儿童头脑中早已形成的兴趣联系起来,换句话说,就

是要通过某种途径把这个片断知识与从前获得的知识联系起来。这就有了一种好处,就是把久远的、陌生的直接经验与最近的、熟悉的东西加以比较,把未知的与已知的加以比较,可以把所传授的知识与学生个人的经验联系起来。”

比如说,教员想给学生讲地球与太阳的距离这个概念。教员问学生:“如果有人想从太阳上朝您开枪,并且在他开枪时您已发现了,您怎么办?”学生会回答说:“我就躲到一边去。”这时教员可以这样讲:“您不必躲躲藏藏,您可以放心大胆地在房里睡觉,第二天照常起床,无忧无虑地长大成人,学习经商,到了我这样的年纪,子弹才快临近您了,这时您再躲一躲。您看,地球隔太阳是多么远啊!”

把新获得的知识与已有的经验和知识联系起来,并且依靠已有的经验和知识,这乃是选择学习材料时所应遵循的一条原则。问题不在于从各个领域猎取尽可能多的知识,从而成为一本活的百科辞典。问题在于要逐渐使知识深化,使新获得的知识与旧的知识联系起来,这样,从兴趣出发,使知识越来越巩固。

重要的不只是取得知识,而是要很好地把知识组织起来。“教育”一词的涵义正是要围绕一个人已有的概念这个基本核心,培育一些与这一基本核心有密切关系的新概念。

不言而喻,农民获得知识的方式将不同于工人。两者的阅历和知识范围各不相同。我们在制定各种训练班和成人学校的教学大纲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这些大纲很少考虑教育对象的情况。问题不只是在于知识的分量,而在于通过什么方法和形式把这些知识传授给教育对象。

读书是学习各种材料的基础。对于人类现代的生活,对于现代的文化,书本具有重大的意义:“人类文化是世代相传的,并且是建立在经验、知识、发明的积累这一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这种世代相传,如果每一代都不继承这一遗产,一切从头开始,那么人类就会至今过着与原始野人差不多的生活。而经验和知识的传播靠的是书本。世代

相传的大量知识正是在书本中固定化起来的,而又由每一代人予以丰富,使之不断迅速发展,从而加快了人类文化前进的步伐。”

因此必须学会读书。要养成大量、迅速默读的习惯。要使阅读达到完全自动化的境地,不为任何事情分心。

但这还不够。要能弄通所读的东西。这就困难得多了,需要一定的水平,广阔的视野,相当的词汇量和概念。

随着读书的人的水平提高,对所读的东西理解也就更深。但是,要弄清楚哪些地方已经看懂了,尽量把不懂的地方弄明白。最好把不懂的地方再读一遍,看看到底是什么地方不明白:单词,成语,意思。要查阅政治辞典、百科辞典、有关的教科书和有关这一问题的通俗读物,以便把不懂的地方弄明白。弄清楚一个不懂的字的的意思之后,最好把这个句子整个抄下来,记住它,同时考虑几个可以用这个字的类似的句子。要像孩子们碰到这种情况时所采取的那种办法去做。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她第一次听到“刹那间”这个词。在以后的半小时里,她把这个词与不同的词搭配使用了十来次。这个六岁的小女孩是无意间这么做的。青少年或成年人也应该采取这种办法,以便完全掌握以前不认识的单词,而在必要时就能得心应手地使用这个词。只不过要注意准确掌握词的含义和它的细微差别,以免用错了。

当然,这样来弄明白一些不熟悉的成语和单词的意思,可能会使读书的人离开了主要的东西,即掌握书中的基本思想。因此要注意尽快掌握文学语言并能熟练地理解其含义。

还必须学会弄明白所读的东西。最好按一定的程序来做这件事。

首先,读完一本书之后(开始最好是读完每一章之后),要弄清楚作者想讲的是什么东西,他在这本书里要坚持的基本思想是什么,他引用了什么论据来论证这些基本思想。特别重要的是弄清作者的思路。明白无误地掌握所读的东西,这是自觉读书的第一步。

很可能头一遍还不能把握作者所讲的意思,那就把这本书重读

一遍,两遍。当你弄明白了所读东西的意思时,不要去管那些鸡毛蒜皮的地方,不必记住每一个单词——这样做甚至还有害。要找出最本质、最基本的东西。然后再看看其余的材料是怎样充实这些最本质、最基本的东西的。有时,作者为了说明基本思想引用了许多事例,有时又运用了许多推理来论证自己的思想。读书时最好写一个书面的提要。所有这些方法都应认真在实践中采用。

然后应该考虑全书的内容。如果基本思想是用事例阐明的,首先就应看看事例是否正确,其次要看事例是否典型。自己要尽量提出一些类似的事例或者与作者提出的事例相反的事例。当作者运用许多推理来论证自己的思想时,那就应该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可否采取别的办法来论述,并且具体地说是什么办法。然后,把自己考虑的推理与作者的推理加以比较,看看哪种推理比较正确。还应考虑可否从别的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做完了这些工作之后,读书的人就应该得出结论,他是否同意作者的观点,不同意的是什么地方。

全书读完之后,要做笔记,把应该记和想记住的材料,如事件的年代,人名,数字写下来。通常,最好不只是记下数字。而是根据这些数字绘制相应的图表,以便一目了然地掌握实际情况。也可以把自己喜欢的意思和成语记下来。但是,笔记不要过长,否则日后就难于弄清楚书中到底说了什么。只应该用提纲的形式记下最必要的东西,并分为许多部分。要写得清楚了。把书上的东西一连好几遍地抄在笔记本上要花不少时间,而且抄写的人自己也弄不明白这些东西的意思,这种冗长的笔记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如果笔记本记得简明扼要,使人一看就能想起所读过的东西,能弄清数字材料和其他材料,这种笔记本就很有用处。应该学习按这种方式记笔记,一开始不要怕花时间去练习,起初可以从短小的文章做起,逐步掌握用这种经济的办法给自己作笔记的熟巧。

当然,有些情况下最好记得详尽一些。例如,如果这本书特别有趣和重要,那就可以不惜时间多摘录一些,把长的引文完全抄下来。

如果打算用这本书做报告或写文章,那就应该这样做。有的人还未完全掌握书写的技巧,未完全掌握拼写法或文学语言,在这种情况下,笔记最好也记得详细一些。在上述的各种情况下,摘抄都是很有益处的。最好把有趣的和与所读材料有关的东西反复抄几遍,这比抄别的任何东西都有益。但是,一般说来,笔记应该简明扼要,一目了然。

总之,阅读时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弄懂意思,掌握所读的材料。第二项任务就是对所读的东西进行思考。第三项任务就是把要记住的东西做读书笔记。最后,第四项任务,就是看从所读的书中学到了什么新东西,这本书是否讲了一些新知识,这些知识有什么用处和益处,它是否教你学会了某种新的观察方法、工作方法和学习方法,是否激发了你的某种新思想,是否唤起了你的某种特别的情绪和愿望。

这就是我们拟定的读书的程序。

当然,这个程序可以稍加改动,问题提出的办法也可以稍有不同。阅读数学、自然学科等等往往只需要一部分程序。但是,一定得有一个固定的程序,因为这样才能取得最佳的读书效果。

工作的程序有着重大的意义。它往往使一个人能够发现别人未能察觉的东西。例如,拿破仑在检阅时总能看出士兵制服上的一些很小的毛病,而检阅前军官们仔细看过之后也未能发现这些缺点。原来拿破仑在检阅时有一定的程序,而这一程序使他得以发现一切缺点。

我们再来看看不同的专家是怎样对待同一事物的。他们每个人有自己的观察体系。例如,艺术家在观察植物时,他的程序是看色调的配合、鲜明程度,明暗色彩的配置,形式的雅致。艺术家在观察这株植物时,可能完全不注意花里有多少雄蕊以及这些雄蕊的排列法——这个问题全然不在他的观察范围之内。恰恰相反,植物学家首先注意的就是这些雄蕊,叶子的排列等等,而可能全然不去注意当时这朵花的明暗色彩以及它的形状如何。

同样的道理,在阅读时对书本所采取的一定的程序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可以使您发现书中可能被忽略的东西,如果您不有意去注意这个方面的话。这种读书态度逐渐就会变成一种习惯。

我们从书上学习知识,学习别人的经验,但是,如果我们能用自己切身的经验对这种书本知识和别人的经验加以检验的话,我们就能更好地掌握这些知识。我们在书上读到“雷鸣电闪时的大海,景色至为壮观”,这是一回事;我们目睹这一景色,这又是一回事。再比如,我们从书本上知道,机器可以节省生产某种产品所需要的时间,但是,只有那种从前用手工方式干活,后来改用机器操作的人,才能懂得这一事实的全部意义。从书本上知道如何做某种手术(眼睛、耳朵)是一回事,亲自动手去做这种手术是另一回事。正因为如此,所以一个“阅历广博”的人,由于他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懂得各种风俗习惯,往往更能理解生活,而另一种饱学之士可能却不如他,因为这种饱学之士闭门读书,缺少亲身的体验。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特别重视“有经验的”医生,“有经验的”教师等等。中世纪时,存在着一种很有意思、很有教益的风俗。学徒出师之后,还没有当师傅之前,要到各地去闯一闯,到别的城市去跟不同的师傅干活,看看别的地方的手工业同行是怎样生活和工作的。

正因为如此,对自学的人来说特别重要的,就是要尽力把从书本上获得的知识,通过个人的观察或劳动活动来加以检验。

从这种观点出发,参观农业、工业博物馆和展览会、示范农场和企业是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活动。要广泛开展各种参观活动。不过这种活动要搞得有实效,而不要变成一种单纯的娱乐活动。参观时要做笔记,会画画的人还可以画画,然后再写参观的心得。还要利用一切机会到外地旅行,去接触并观察陌生的人和他们的工作、生活。而且,日常生活也提供了丰富的观察材料、学习材料。不过应该弄清楚,你想看什么,目的何在,然后把自己的观察进行到底,并做出相应的结论。

如果使整个集体都来参加这一活动,那么它会搞得更生动些,产生较好的效果。参加活动的人应该交流自己观察的结果。每个人有自己特有的态度:有的人注意到这一面,有的人却注意到另一面。这样一来,就能对这一事物进行全面的研究。集体可以弥补个别观察者可能疏忽的方面。

节约时间和精力

讲求实效的美国人随时随地都说:“要节约时间和精力。”他们出版了许多书(很遗憾,我们俄国人很少听说过),指出应该如何从这一观点出发来安排中等和高等学校的学习,应该如何节省学生的精力以求最快地达到目的。美国青年很懂得这方面的道理。我们也要学会它。

现在,我们不允许浪费时间和精力。我们生活在两种社会制度交替之际:旧的、资本主义制度日趋灭亡,新的、共产主义制度正在成长。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不能像父辈和祖先那样生活。每天都给我们带来某种新东西,而对待这种新东西需要我们亲自观察、亲自判断、亲自决定。但是,若要亲自观察,作出正确判断和决定,并选准道路,就需要具有丰富的知识。整个工人阶级要有知识,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每个成员要有知识。如果慢吞吞、舒舒服服地“躺在沙发上混日子”,我们就没有时间工作。要学会尽可能节约时间。

历史事实是,俄国(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最先举起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旗,并且已把这面旗帜打了五年之久。如果它今后还想继续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地,它就必须加强自己的物质基础。为此它就必须拼命地“毫不停息”地学习,最大限度地节省时间和精力。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的生活方式要求这种节约。工人和农民的劳动占了他们大部分时间。他们只有把业余时间用来自学,而他们的这种时间却很零散。

总之,目前的历史性时刻,俄国的特殊地位,学生中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在学习时要竭力节省时间和精力。

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必须:

- (1)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时间;
- (2)为自己创造最顺利的工作条件;
- (3)掌握读书的必要技巧;
- (4)正确选择学习材料;
- (5)合理分工;
- (6)从节省时间和精力观点出发,拟定集体工作的形式;
- (7)具备必要的参考书和指导书。

先从安排时间谈起。

不言而喻,如果我们想有效地利用时间,我们就要合理地安排时间。我们的时间通常是怎样度过的呢?只有上班或上工厂,我们才是按钟点,其余的时间都是随便度过的:有时是去找好朋友聊天;有时是捧一本无聊的小说躺在床上看,深夜还吵吵闹闹,让时间白白浪费掉,等到拿起一本正经有用的书去看时,却已困倦不堪,只好点燃一根烟,驱赶睡意,这时,书又扔在一边,开始与同事谈话、争论,一直到天亮。第二天早上怎么也起不了床,浑身一点劲也没有,像散了架似的。

外国人比较懂得时间的价值。一些科学家、文学家和教授都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按时睡觉,黎明即起,趁早上头脑清醒时工作,尽量少串门,严格安排时间。他们起床、工作、进餐、休息、就寝都有固定时间,从不更改。这样一来,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持久不衰。

我们看看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和作家是如何支配自己时间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就以列夫·托尔斯泰为例吧。他写了很多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似乎他的写作完全取决于情绪,实际上,他的时间是经过严格安排的。他每天上午写作,工作很紧张,反复修改同一篇作品。作家不可能与世隔绝,他要经常与人接触,观察他们,研究他们。列·托尔

斯泰抽出一定的时间与人交往。然后,还要抽出一定的时间读书,等等。谢尔盖彦科写的《列夫·托尔斯泰生活和工作侧记》一书,很好地反映了列·托尔斯泰这方面的生活情况。

法国作家左拉的工作情况也是如此。左拉写了大量小说,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左拉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他也像托尔斯泰那样,每天上午写作,其余的时间则用来研究他所写的那些社会阶层。

我们再来看看一些伟大的音乐家(例如,贝多芬)的创作生活,我们就会发现,他花了大量时间来弹钢琴,很严格安排自己的时间。

一些在实验室里与微生物打交道或在解剖室工作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医生、科学家,他们安排自己的时间更为严格。您不妨读一读有关爱迪生、路易·巴斯德和其他著名思想家工作情况的书。著名的外科专家柯尔即使到了晚年,也严格支配自己每天的时间,按时就寝,每天抽一定的时间打网球,好让手在做手术时刚劲有力。

这样的例子何止万千。凡是想取得辉煌成就的人,都应该非常珍惜、严格安排自己的时间。

合理地安排工作以免浪费时间和精力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尽可能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

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头脑清醒,不能过度疲劳。疲劳不堪的人工作起来速度既慢,效果也差。最佳工作时间当然是早上。正常的人在早上工作的效果最好。当然,如果要很早去上班,那就很难在早上安排学习。但是,如果工作是上午十点、十一点才开始,那就一定要把早上的时间利用起来。不过有人往往由于睡得太晚而不能早起,那就应该尽量改变这种生活习惯。晚上学习令人感到疲倦,为了驱赶睡意,人们往往喝浓茶、抽烟、展开争辩,结果很快就疲劳过度了,工作效率随之下降。

另一个条件就是要在空气新鲜的环境里工作。要使头脑正常和有效工作,就需要使心脏的工作正常、均衡,为此就需要大量的新鲜

空气。房间里不能太闷或太热。学习前要开气窗或窗户,使室内空气清新、烟雾弥漫的房间对学习的影响极坏。

还有一个良好的条件就是工作时不受外界事物的干扰。周围有人大声喧哗、高谈阔论,随时都有人向你问这问那(尽管这些问题没有什么意义),是很难学习的。要学会照顾别人,让人安宁。当别人学习时,不要吵吵嚷嚷,吹口哨,高声谈话。要使自己养成在图书馆或俱乐部学习的习惯。图书馆里没有什么东西使你学习时分心。此外,在图书馆学习随手可以取用百科全书、参考书、地图册、教科书,这些东西都是认真读书时经常要用到的。

诚然,一个人有时可能是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喧嚣和忙乱中学习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是他所读的书或干的工作使他人着迷,以致他无暇顾及周围的情况。阿基米德是著名的古希腊科学家、几何学家,有一个关于他的流传很广的故事说,他沉醉在他的几何图形里,甚至当敌人进了他的房子,朝他跟前走去时,他还说:“别碰坏了我画的圆。”不是任何人和任何时候都能做到这样全神贯注,不为周围的情况分心的,因此,如果外界没有什么干扰的话,那是再好不过了。同时,为使学习能顺利进行,还必须不受别的影响,别像普希金笔下的欧根·奥涅金那样:

他的两眼盯在书上,
但是思想飞到了天边……

正因为如此,所以说,最好还是早上学习。昨天的印象经过一夜之后已渐淡漠,而新的印象还未产生,暂时还没有什么东西来破坏内心的平静。如果没有必要的平静和学习所必需的情绪,就要尽力为自己创造这种平静,培养这种情绪:或者在房间里快步走几圈,开始哼什么曲子,进行某种回忆,读几页最喜爱的作者的书或者采取其他某种类似的方法。

为使学习顺利进行,还必须掌握一定的技巧,没有这种技巧就无法读书。

这种技巧包括 能读、写、算 会看地图等等。要养成快速大量默读的习惯 养成做简明扼要的笔记的习惯 对书本提出一定要求的习惯。

为什么需要养成上述这些习惯呢？为了不浪费时间和精力。这种习惯可以使人的智慧得到解放而用于思考。动物的大部分动作都是无意识的。人刚生下来时 神经中枢并没有专司无意识动作的现成器官。“但是 成人的无意识器官却很多 而且大部分是通过艰苦劳动形成的。如果我们的行动没有通过训练而完善 而习惯又没有减少神经和肌肉能量的支出 那这种人的处境就是很悲惨的。所以，孟德里说：

‘如果动作经过重复还未变得容易一些 如果每次对这一动作的重复需要意识一再的指引 那么 显然就不可能有任何发育上的进步 而我们整个的日常生活活动就会局限于一两个动作。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整天就只会穿衣脱衣 把自己全部的注意力和精力都集中到穿着上 每次洗手或扣钮扣他都会感到困难 就像小孩子第一次做这种事一样。最后，一些无效的努力使他深为苦恼……’

然而 正如重复的无意识的动作同时会带来一点疲劳一样 意志的自觉努力在这方面近似机械的或基本是无意识的行动 很快也会使我们疲倦”。

我们知道 一字不识的成年人学习把字母连写是多么难 还有，识字不多的人签名是多么难 他要花很长时间、费很大力气才能把名字写上。不消说 当这些事情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时 他是不可能去钻研读物的含意的。他的全部精力都花在克服技术困难上了。正因为如此 所以应当培养一定的技巧 达到熟练的程度。否则就不可能进行认真的阅读。

上面我们已经谈了 从节省时间和精力角度看 选择学习材料具有何等的作用。下面我们把已讲过的话略加重复。

学习要量力而行 所选的书起码文字上要能看得懂 不要选择那种需要相当高的水平才能看得懂的专业书 如果实在需要读这种书 那首

先就得掌握必要的知识。读一本啃不动的书就等于浪费时间和精力。

在浩如烟海的人类知识中,只需要学习那些特别重要的、对理解周围环境和改造这种环境有用的知识。工人和农民没有时间和精力学习各种没有重大意义的知识。

当然,应该按需要研究的问题选择最好的书,因为这种书能全面地、深刻地、正确地讲清这个问题。最后,应该从最感兴趣的问题读起,逐步扩大学习范围,把有关的重要领域纳入,围绕一个基本核心来组织全部新获得的知识。

还要培养自己按预定的计划进行工作的能力。

学习经验不足的人往往漫无目的,一会儿读这本书,一会儿读那本书;一个题目未掌握好,又换了另一个题目。这种学习方法收效甚微,也很不经济。不要乱学一气,要有一定的目的,而且这种目的要很明确具体,不能是遥远的、不着边际的。比如说,有一个人想研究资本主义。这个题目太大。为了达到目的,就要把这个总题目分为许多比较小的题目,然后从中选出一个题目,比如说,现代资本主义。然后还要把这个题目划小。例如,开始研究某一个国家(比如英国)的现代资本主义。进一步再缩小范围,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只有把这个具体的题目弄懂之后,才能转到另一个与之有关的具体题目上去,同样,把这个问题掌握之后,再搞别的问题。这是掌握相当大的题目的一种最经济的办法。当然,要制订出这样的计划,就必须对整个题目的总的概念有一些了解。

美国著名工程师泰罗在谈到劳动组织时指出,应该给每个职员、每个工人一定的具体任务。泰罗说:“水平越低的人,知识越差的人,就越是要给他提出比较简单和比较近期的目标。任何一个教师都不会想到让一个十岁的儿童研究某个问题,学习某本书。他只给儿童布置一些很容易的任务,读哪一页的哪首诗,哪篇故事。一本教科书是分成许多部分去掌握的。”

泰罗的这个意见完全正确。初次读书的人,只能给自己提出力

所能及的、不复杂的、最近期的目标。只有通过这种办法他才能完成总的任务。

要初学者制定学习计划,这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因为他不清楚他所学习的这一材料的分量和这一总题目下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这方面,比较了解总题目的同志应该给初学者以帮助,或者是给予相应的指导和参考书。各个训练班的学员在这方面有一些很有利的条件,就象农民所说的“可以吃现成饭。”他们的学习计划已由训练班的领导拟好了。这当然要省事得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初学者也是很有好处,他可以不走冤枉路。但是,如果一个读者养成了自己定计划的习惯和提出近期任务的习惯,他就比训练班的学员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因为他可以定一个比较适合自己个人情况、符合自己能力和知识水平的计划。

现在再谈谈下面这个问题:怎样学习更有效——是个人学还是小组学?

这就要看小组的学习是如何安排的。如果小组的成员学习很自觉,按时来上课,大家都能完成自己承担的任务,特别是如果小组里有一位经验丰富的领导人时,——这种情况下小组学习就更有效。集体学习可以节省时间。应该从每个人的力量出发而有所分工,经常交换意见有助于大多数人把不明白的地方弄明白。讨论可以提高大家对学习的兴趣,启发大家的思想。此外,集体学习可以加强督促,使学习能稳步前进。正因为这样,我们极其重视小组学习。当然这是指具备了上述条件之后。如果小组的成员经常迟到缺席,在家里也不去看学习材料,只是在小组里夸夸其谈一通,而不认真地进行任何独立作业,那就最好退出这种小组一个人去学。

但是,不管是小组学还是个人学,为了不浪费时间和精力,学习的人都必须准备各种必要的教材和指导书,使学习走上正轨。需要有一本通俗的政治辞典,还需要有一本通俗的百科辞典,参考书目(指出每本书的内容,具有什么水平才能读懂);还要一本学习计划

汇编,把学习各门知识、适应不同程度的人需要的学习计划编入其中。要出版一些学习最重要的知识的指南,这种指南要给独立学习提供较大的余地,指出对某一问题如何进行自学。如果有了这些材料,就会使自学更有成效。

与流浪儿现象作斗争

我们往往不大了解我国流浪儿现象多么严重,不大了解这是多么不幸的一件事。我们对这件事考虑不够,而为了消灭这一现象,我们做得更少。当然,儿童社会政治教育事业管理总局专门有一个处,它与缺陷儿童和犯罪儿童机关一起,大力开展着反对流浪儿现象的斗争。但是,难道这就够了吗?

战争(特别是国内战争)、旧制度的被摧毁以及1921年-1922年间的饥荒,造成大批儿童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单靠一个处的努力,或者靠儿童社会政治教育事业管理总局的努力,甚至靠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努力,也是无济于事的。各条战线都要作出努力来消灭这种现象。要动员全国的力量,把消灭这一灾难变为全体组织起来了的居民的工作,要发动各级苏维埃机构、妇女部、俄国共青团以及一切能对此作出贡献的人参加这一工作。

有些人认为,反对流浪儿现象只需要把流浪儿抓起来,然后送到各个儿童之家去就行了。只要多拨一点钱,用作抓人,用作开办儿童之家,就万事大吉了。

实际情况却是,流浪儿往往逃避登记,而且即使进了儿童之家,他们也经常逃跑,因为儿童之家不掌握他们的心理特点,也没有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参加生活的训练。儿童之家往往无济于事,只不过是—种自我安慰。何况我们又有多少个儿童之家呢?我国登记在册的

流浪儿达七百万(而未登记的又该有多少!),可是儿童之家最多只能收容八十万。其余的人怎么办?

流浪儿之中,有的是儿童,有的是少年,对他们采取的办法又各不相同。

当然,不管对儿童还是对少年,首要的任务是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地方住,有病能治,有人照管。各种委员会(一般的,特别的,中央的,各省的以及其他的委员会往往忘了,每个流浪的少年儿童首先需要的是关怀,是以人道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都于事无补,甚至反而有害。

各个机关都要认真关心流浪儿的吃住问题。自愿帮助流浪儿童要成为自愿支援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形式。

妇女部、共青团、学生和教育工作者,大家都应全力以赴地帮助流浪儿童。重要的不在于成立什么特别委员会,而是要想方设法能找到帮助流浪儿童的途径。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太严重。凡是打算要做一件什么事情,马上就是这么一套搞法:谁负担经费,工资额是多少,设置几个什么样的委员会,办公地点在哪儿去找,而正事却放在一边,不闻不问。所以说,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发动全体居民帮助流浪儿。当然,这并不是说苏维埃机构可以“把无力的双手在冷漠的胸前”一交叉,什么也不管,而光让居民去关心流浪儿的问题。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各级机构都应大力开展帮助流浪儿的工作。

至于说到流浪儿童,只要我们给他们饭吃,给他们地方住,真诚地关怀他们,并且为他们敞开学的大门,那我们就做了或者说几乎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对少年流浪儿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了。这些儿童有强烈的反社会的情绪,不信任任何人,心怀不满,十分孤僻……对他们要采取特别的态度。首先,要让“不信任的冰河”解冻;其次,帮助他们自立;最后,给他们安排一个力所能及、又感兴趣的工作,把他们的旺盛精力和首倡精神引上正轨,同时,要把他们安置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让他

们感到自己所处的环境与自己的反社会情绪是格格不入的。

要消除他们的不信任感,就得让他们感到大家把他们当人看待,而不是把他们看作快进监狱的人,看作人类的渣滓;不要把他们当作不懂事的小孩子,让大人牵着他们的小手,然后往角落里一放,而要以友好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尊重他们的意志和人格。甚至资产阶级都懂得这一点,他们为流浪儿成立了童子军组织(如英国)。难道我们还不懂得这一点吗?难道我们就那么笨,只会对流浪儿说一些挖苦的话:齐步走向儿童之家,那儿去我爹和妈。要知道,他们既无爹妈可找,又无儿童之家可去。

俄国共青团要吸收少年流浪儿加入自己的组织。共青团员应比“哥儿姐妹们”更信任少年流浪儿,不管“哥儿姐妹们”的手段多巧妙。

还有,就是要为流浪儿设置集体宿舍、食堂,为他们敞开俱乐部和学校的大门。迄今为止,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呢?是否吸引流浪儿参加了这项工作呢?思想工作人员在这件事上做了什么工作呢?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英国的童子军运动安排了流浪儿的生活。它使这种生活带上了罗曼蒂克的美妙色彩,它不强制流浪儿的意志,让他们的首倡精神和独立精神充分发挥,扩大他们的视野,使他们的生活充满丰富的内容,大力发展他们的社会本能。

我国有无类似的组织呢?共青团面向18—23岁的青年,他们声称:“我们不是小娃娃。”少先队组织刚刚建立,那儿的活动稚气十足。所以这个迫切的社会问题一直未解决。国外的少年往往通过童子军组织找到了参加劳动生活、参加社会工作的途径。

是的,资产阶级关心的是(他们不这样做也是不可能的)要把所有的儿童培养成资产阶级制度的忠实奴仆,向他们灌输资产阶级道德,培养他们具有资产阶级的观点。当然,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但是,我们也要对少年流浪儿进行社会帮助,让他们参加组织,因为这种组织将向他们展现一个新世界,引导他们走上新路,使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由这种童子军组织向正常的劳动生活过渡,这件事应该尽量使之简化易行。要在保健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合作社、劳动人民委员部等单位的协助下,找出少年参加劳动的适当形式,这种形式不能有任何剥削现象,但是确实是社会所需要的,而且要把这种形式安排得能满足学习和进行组织工作的需要,等等。

组织少年流浪儿参加劳动,这当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就谈不上对他们进行根本的帮助,所以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

在组织少年流浪儿参加劳动的同时,还应积极地为他们设置集体宿舍,开办食堂、俱乐部、学校,——所有这些都是迫在眉睫之事。

浅论教师

在教育工作中也应充分利用专家。不要害怕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习气”。真正优秀的积极的教师不会不跟共产党员走。

《真理报》第61号刊登了莫斯科国民教育局长拉法伊尔同志的文章《是官僚主义还是教育工作的进步》。

这篇文章把情况说成这样:莫斯科国民教育局的工作开展得十分好,而妨碍莫斯科国民教育局有益工作的只有“小资产阶级习气极为严重的”沙茨基和约尔丹斯基一类的人物。

凡是注意到莫斯科国民教育局工作情况的人或是看过该局教学大纲和在社会主义教育部代表大会上听过该局发言的人都知道,莫斯科国民教育局的工作到底搞得是好还是不好。讲这种话要严肃负责,慎之又慎。我在本文里只想谈谈所谓“小资产阶级习气极为严重的”沙茨基和约尔丹斯基一类的人物。

约尔丹斯基不久前还是儿童社会政治教育事业管理总局的局

长,而沙茨基是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最积极的一个成员。

我过去反对延请约尔丹斯基为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委员,不是由于他有什么不对之处,而是由于我认为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全体委员应该一律是共产党员,而且我现在也还是这样主张。但是,只要我们看看约尔丹斯基在儿童社会政治教育事业管理总局担任局长时的工作情况,对他那种无比忠于国民教育事业的态度,对他一贯重视建设普通学校这一问题的态度,我是衷心敬佩的。

我与沙茨基在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共事已快两年了。我对他的首倡精神、积极工作和忠于事业的表现,一向是很佩服的。我还应该指出,我们合作很好,没有任何重大分歧。

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的工作很重要,它的奋斗目标是什么,它坚持什么路线——对此,党员同志都了解,中央宣传部也了解。

是否应该吸收沙茨基和约尔丹斯基参加工作呢?

我认为必须这样做。我们面临着愚昧无知的汪洋大海,而为了消灭这一现象,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力量。

首先应该利用那些对国民教育事业无比忠诚、感情深厚的人。我是十分器重和敬佩这样的工作人员的。我向他们学到了不少东西。这种人才目前还不多,不应浪费。

那对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习气”又怎么办呢?

首先,我坚定不移地相信,并且经常得到证实:凡是忠于教育事业、热爱这一事业的人,就不可能不在这个问题上跟共产党走,因为共产党执行的是一条最重要、最正确的路线,为开展工作创造了广阔的前景。不仅如此,正是共产党员在国民教育工作中所持的立场把许多教育工作者引向了共产主义。这是第一点。第二,凡是十分清楚自己奋斗的目标的人,就再不去胡诌什么“小资产阶级习气”。共产党员大权在握,并且又有道德威望,完全可以广泛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即使这种小资产阶级观点的确存在,而不是那种不会实行自己路线的共产党员所想象的,那这种观点也并不可怕:有可以与之对比

的观点。重要的是善于克服小资产阶级习气,重要的是揭示其实质,让人们加深认识。

共产党员面临着一个繁重的任务,就是要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广大教师。由于大多数教师接近了工农群众,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工农情绪的影响,这项任务现在是能比较好一些完成的。但是要认真对待这一任务,就要恰当选择进行教育的论据并能做到以理服人。

乱扣帽子,说别人有“小资产阶级习气”,这种做法要不得。我认为这是蛊惑人心的手法,是软弱无力的表现。

改革教师培养工作

去年,我们大力总结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在建设新式学校方面所做的工作。在对教育人民委员部所采取的措施、对各地的工作、对个别教师和部分教师创造性的创举进行总结的时候,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确实有可以总结的东西。诚然,由于工作条件极其艰苦,要走出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崭新道路,开垦处女地,同时还要进行一种极可贵的尝试,即为苏维埃工农学校打下基础,我们也做了许多幼稚可笑的事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经过一番努力,我们的学校已初具规模,这种学校一方面是建立在现代教育学的成就上的,另一方面又考虑到我国的实际,它洋溢着共产主义精神,培养着新生活的建设者。

在总结经验的同时,还进行了检查,看看工农苏维埃学校应该授予学生什么知识,并且从共产主义和现代教育学成就的观点对教学大纲进行了审订。省社会教育科代表大会最近通过的教学大纲纲要,抛弃了旧的传统,提出了必须面对现实的方针。

总结经验,确定工农苏维埃学校教学工作的内容,这就为培养这

种学校所需要的教师打下了基础。

全俄各地都传来了消息,教师转变了,他们渴望获得知识,渴望了解现行制度的原理,了解教育学上的新的教学法。“轮训教师”成了一个时髦的口号。在这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令人感到还缺乏一个教育宣传的中心,这个中心能把教师团结在自己周围,并把那些在教育和政治方面逐渐提高的教师组织起来。这个中心不能是国民教育处,因为国民教育处的编制极小,而且它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国民教育工作。只有教育工会才勉强可以作为这种中心,因为它的主要任务是把同行业的教师团结起来,而生产宣传则处于次要地位。

还需要有这样一个机关,国民教育工作可以依靠它,教育工会的生产宣传工作也可以依靠它,——需要建立一个教育实验室。经过改革的高等师范院校应该成为这种实验室,新式学校的思想通过它传播,这种思想在新式学校里得到提炼和探究,并从这里传播到居民和教师中去。高等师范院校应该成为教育宣传的中心,就像高等农业院校应该成为农业宣传的中心一样。

高等师范院校的工作计划应与国民教育处和教育工会地方分会一起商定,应召开专门的代表会议进行讨论,听取教师的修改意见。

高等师范院校的工作计划应包括依靠学生力量按一定提纲对地区教育工作进行的考核,这种考核应成为有计划地进行教育建设的一个基础,应包括组织本地教师的教学法咨询委员会,举办教育问题的讲座和报告会,组织“教育活动周”,举办教育展览会、短训班和召开各种教育代表会议。高等师范院校不仅应关心本校几百名学生的培养工作,而且还应关心本地区广大教师的轮训问题,关心本地区的教育工作水平的提高。

培养大学生参加教育工作,不应该流于抽象空洞和过于烦琐,而应在组织大学生参加教育工作的过程中进行,并且要从理论上论证这一工作,在坚实的共产主义基础上进行这一工作。

高等师范院校的工作计划应包括利用学员的力量为政治教育机

关服务。现在,政治教育工作甚至都未纳入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学大纲。然而这项工作却要求我们投入不少的力量。当然,高等师范院校的学员不应该花时间去举办音乐会和戏剧演出会,邀请演员,筹集资金等等,但是他们能够而且也应该参加扫盲工作,流动图书馆和咨询处的工作,进行谈话等等。这种工作要求具有专业技术的人去做,而高等师范院校的学生正好能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这项工作可以使未来的教师接触群众,了解他们的要求,并且可以使未来的教师学会做居民的工作。这项工作可以启发他们的思想,激起他对社会生活中许多问题的兴趣。只是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还不能造就社会活动家,还必须具备感情方面的先决条件,而深入地进行政治教育就能创造这种条件。当然,为了使学生们高质量地从事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在进行实际工作的同时,对各种社会问题从理论上进行认真的准备。这种准备工作要做得生动活泼,不能搞烦琐哲学。使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起来作居民工作,就能培养出把学校变成文化中心的社会活动家式的教师。

除了政治教育工作以外,大学生还应学会对少年儿童进行校外工作,如:对少先队员,对流浪儿,在儿童游戏场,儿童俱乐部,儿童阅览室和食堂。这有助于大学生普遍地了解现代的少年儿童,从而能正确对待他们。在这里,仍然应该把实际工作与对儿童的理论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与对儿童身体素质、年龄特点的理论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与对环境的影响、游戏的作用以及组织在他们整个生活中的作用的理论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只有做了这些工作之后才能去研究学校工作和教学工作的组织问题。大学生的社会素养和对儿童的知识可以使他自觉地对学校据以建立的原则。这样,他就能理解新的教学大纲,明确知道各级学校的教学内容是什么,掌握新的教学方法、新的儿童工作方法的实质,懂得应该怎样组织儿童在学校的生活,如何使学校充满共产主义精神。同样还应利用高等师范院校大学生的力量进行对成年人的工作和儿童的校外工作,高等师范院校的工作

计划还应包括中小学的工作。

对于未来在二级学校任教的教师来说,还必须做到:研究农业,或者是研究在当地占主导地位的工业领域。每个二级学校的教师都应研究上述两种专业之一。劳动学校要求教师具有哪怕是国民经济一个领域的扎实知识,掌握这个领域的方针,并能把专业知识与一般知识联系起来。否则他就是国民经济领域里的外行,而这将会影响他的专业课(本族语、数学、自然)的教学,因为他不能把握劳动学校的基本课程,研究人的劳动活动和组织劳动的方法。

一些思想僵化的教师和教授会说:“这纯粹是空想,走极端。”他们没有看到,用当代的革命精神对学校进行自下而上的改革和新式学校都要求对整个教师的培养工作进行彻底的改革。

论道德缺陷儿童问题

“道德缺陷”……这个丑恶的资产阶级术语怎么进入了我们苏维埃教育学并且得到了普遍承认呢?

“道德缺陷”这一术语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存在着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道德规范,这种规范在人的意识之外,是由某个人从外部确定的。

这种道德规范在人的心灵之中,凡不懂得这种规范的,就是道德缺陷者。这是哲学唯心主义的观点。资产阶级特别喜欢使用这种道德观念,把它的资产阶级道德描绘成永恒的、不可动摇的道德。

哲学唯心主义遭到马克思主义体无完肤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与哲学唯心主义进行了斗争,他们深知哲学唯心主义是资产阶级手中多么有力的武器。马克思主义对道德及道德的产生有着不同的见解。

马克思主义依靠对历史的研究,断言:道德观念并非某种不可动摇的东西,它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变化着,社会的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念。比如说,不仅野人和现代人对是非善恶的见解完全相反,而且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道德观也截然不同。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道德的阶级实质。马克思主义不仅揭示了不同阶级的道德的阶级实质,它还指出了道德观念是如何在一定的经济、政治、日常生活条件的基础上形成的。恩格斯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极其精辟地阐明了道德观念产生的情况。

马克思和恩格斯多年来一直在与哲学唯心主义作斗争,这当然不是由于这能给他们带来某种满足,就像下象棋消遣一样。他们之所以要与哲学唯心主义作斗争,是因为他们知道把无产阶级从精神上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是多么重要,是因为他们知道宗教只是哲学唯心主义的“群众通俗读物”。

宗教是控制群众的有效手段,是扼杀群众阶级本能的手段,是削弱群众阶级意识的手段。

但是,如果不摧毁宗教的哲学理论基础即唯心主义,就不可能与宗教进行斗争。

对于马克思主义说来,“道德缺陷”这个术语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有受迫害的儿童、凶狠的儿童、受苦的儿童、患病的儿童,但是不存在道德缺陷的儿童。

为什么要用这个术语给苏维埃教育学抹黑呢?

教育那些凶狠的、患病的儿童确非易事,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为了生存而进行凶狠斗争的艰苦条件下,长期生活在极其腐朽的环境中。在作风上需要极其细致,很讲分寸,要对他们进行观察,给予帮助和支持,使他们社会本能的心弦发出更加响亮的声音。我们在哪里能找到适合这项工作的教师呢?世界大战、国内战争、经济凋敝、饥馑丛生,使得无家可归的儿童急剧增加。要想办法安置他们。从

事这项工作的往往是那些不了解儿童、不热爱儿童的人,而是那些需要解决吃住问题的人。“道德缺陷”这个术语可以使他们不负任何责任(无论是内部的抑或外部的);可以使他们不去考虑儿童,不去尊重儿童的人格和个性,不去正确对待儿童;它也可以使他们不去唤起帮助弱者这一最普通的人类良知。“道德缺陷”这一术语使他们以犯罪的态度对待流浪儿童也成了合法的事了。对“道德缺陷”儿童设置单身禁闭室,“隔离室”,使用一些侮辱人格的称呼,——总之,一切能想的办法都想出来了,对这些孩子还是没有法子,因为他们是有“缺陷”的。

“道德缺陷”这个侮辱性的术语使一部分缺乏良心和觉悟的教师为所欲为,因此我们不能再用这个术语。

派去对这些被生活遗弃了的、生活上堕落了的孩子做工作的人,应该是一些朝气蓬勃、非常细心的人,他们要能取得儿童的信任并善于对待儿童。

应该帮助那些备尝生活辛酸的儿童,要帮助他们提高,应该派优秀分子去做这一工作。

反对一切类似“道德缺陷”这种推脱责任的资产阶级术语!

无人照顾的流浪儿童和患病儿童应该成为苏维埃可爱的孩子。

论儿童之家问题

儿童之家应该办成什么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起初,即1917年—1918年间,我们讲过必须进行社会教育,我们以为能够给全体儿童提供住宿、伙食、衣服,授予他们知识和社会生活熟巧。实际生活表明,这是目前条件下国家做不到的,这只是一个要经过漫长的途程才能达到的遥远的目标。

现在,我国有相当多的儿童需要国家抚养和教育;儿童的教育问题是一个极尖锐的问题,而我们却完全不能胜任这一任务。问题全然不在于没有经费,这是明显的事实。问题在于我们没有认真考虑儿童之家的工作方法,我们对儿童之家的的问题没有深入地、扎实地进行过研究,而这个问题却是关于一大批儿童的前途的问题。

儿童之家应该办成什么样?

儿童之家应该是这样一个机构,它能使儿童得到全面的体力发展,获得丰富的知识并能将这些知识用于生活,养成劳动的习惯并能过集体生活、能集体进行工作,能理解生活并在生活中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一员。

可是目前的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就拿体育来说吧。儿童之家的体育活动往往开展得很不好,借口是穷,经费不足。是的,我国的儿童之家的确很穷,但问题并不完全在这里。问题在于我们儿童之家的领导人对如何搞好儿童的身体积极认识不清。大多数教养员知道清洁卫生的重要,尽量把儿童之家搞得干净些,但是他们对新鲜空气、运动、劳动条件和睡眠等等的作用,却理解得很差。

举例说吧。夏天的时候,天气很好,可是孩子们却坐在地板上织袜子,房间里门窗紧闭。儿童之家有阳台、花园,可是却没有儿童可以在户外干活、学习的工场。于是只好在令人窒息的教室里和车间里干活。这并非由于车间里有什么机器和设备,举例说,编织车间所用的唯一工具就是编针,但孩子们却不能到室外去,而是坐在闷热难耐的房间里。当然,冬天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一些:没有厚衣服,但是可以轮流穿嘛。宿舍、教室等处要开窗,这件事在我们儿童之家做得不如预期的普遍。夏天,儿童在户外、在阳台上睡觉是很少有的事情。

再谈谈运动的问题。年龄大的学生经常运动,但往往只限于年龄大的,其余的学生则无人过问。令人深感惊奇的是,比如说,连散步的活动也没有。我不谈远足旅行,这种活动只能偶尔为之。不过

到附近的森林里去散步,到附近的小山上去爬山,这总是可以的吧!因为现在有许多儿童之家的孩子,从来没有走出校门一步。我不禁想起了我母亲给我讲的一件事。她在学院学习了九年,九年间,她们只出去散步过一次。每个人都很惊奇:“当时是有时间的呀!”然而,这种旧时留下来的习气,这种旧时闭门读书学校的作风,至今依然存在。不让孩子们走出校门一步,这就是旧时闭门读书的学校的遗风。

当然,这并不是说孩子们可以到处瞎跑,而是要按班级经常组织他们去散步。

还有一件令人惊奇的事,就是儿童文家很少关心儿童在户外的自由游戏。我说的不是打棒游戏和踢足球,这种游戏往往使人如醉如痴,我指的是自由游戏,这种游戏可以发展儿童的首创精神、集体生活能力,激发他们的想像力。我国的儿童之家很少做自由游戏,甚至于学龄前的儿童之家也很少做这种游戏。要是孩子们在儿童之家能多做一些游戏,那么孩子们的生活就会丰富多彩。当然,应该教孩子们学会如何进行游戏。

儿童之家对擦身、洗澡、游泳也不大重视。很少有哪个儿童之家认真地组织过游泳活动。

所有这些都是生活中不需要花什么钱就能做到的事情。

对睡眠问题更是不关心。往往一张床上睡两三个儿童。这样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能安然入睡,为手淫创造了条件。对睡眠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现在在儿童之家又常常演剧,儿童们也常到少先队俱乐部去玩,因此他们睡觉很晚,睡眠不足。有一次,一个来访的美国人提请我注意我国孩子睡眠时间很少的问题。她很惊奇地发现我国孩子的睡眠时间太少了。她对我说:“我们美国很重视睡眠。”

我们往往也不注意合理的休息,不注意让体弱的孩子白天得到休息,并且尽可能打开窗户。

有时(例如夏天在菜园里干活)完全不注意不要让孩子太疲劳,

超过他们体力。

至于说到智力发展,这方面的情况更糟。孩子们在儿童之家往往什么也不学,或者学得很不好。谁都不管他们的学习。这是很不正常的事情。儿童之家的主任应该负责儿童的知识训练。儿童要到附近的普通学校去上学,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它可以大大减轻儿童之家的负担,而且还可以让孩子们走出儿童之家的大门。在这种情况下,儿童之家的任务就只是安排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学习落后的儿童搞好学习,并组织他们独立读书。我国儿童之家目前书籍奇缺,对读书也不感兴趣。谁也不关心培养并巩固这种兴趣,却说什么:“没钱买书!”没有钱,但是可以从图书馆借书,可以与别的学校和儿童之家交换图书呀!要组织年龄大的孩子系统地读报。在儿童之家往往见不到报纸,没有安排读报活动。儿童之家不抓学习,没有书报,这是令人发指的灾难。对此必须认真注意。

还有一个也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儿童之家的儿童劳动问题。许多儿童之家的唯一劳动就是自我服务,夏天就是到菜园干活。每个儿童之家应该还另外设置一些手工业车间,如缝纫车间,制鞋车间,编织车间,木工车间,装订车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车间即使从手工业的观点看来也是一些很粗糙原始的设施。

当然,自我服务,种菜园,能使用一般的劳动工具,这都是必要的。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安排这种劳动。可以安排得使儿童对整个劳动学习感到是一种负担。也可以通过这些劳动使儿童学会集体地工作,按照科学的劳动组织安排自己的活动,等等。

但是,即使自我服务、种菜园和果园、饲养牲畜、做手工活都安排得很妥帖,即使这些活动使儿童学到很多东西(顺便说说,这种情况很少),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儿童之家如何培养儿童走向生活?培养他们将来干什么?离开儿童之家后的生活出路是什么?儿童之家办得越好,向何处去,干什么这样的问题也就越尖锐。

不久前我参观了一所儿童之家。孩子们都是少先队员和共青团

员。这是一所办得很好的儿童之家。孩子们没有教养,非常活泼,学习抓得很紧,儿童们自己管理事务,把儿童之家和个人的清洁卫生搞得很好,他们做木工活,搞装订,缝衣服和做鞋子,种果园和菜园,开展雕刻、绘画、歌咏活动,而主要的是,教师在这所学校的作用不是很突出的,因为儿童们组织得很好,他们有一种内在的纪律,他们表现很好。但是……这些儿童的生活出路何在呢?他们在严峻的生活将占有什么地位呢?当然,他们并非公子少爷、千金小姐,他们在哪里都可以成为有益的人,他们将以严肃的态度对待生活,但是……儿童越是天真活泼,就越是使人摆脱不了这个问题:今后怎么办?今后每个姑娘、每个小伙子都将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如何为生存而斗争,如何适应工作、怎样才能适应工作——“只有天知道”。

我认为,应该换一种方式来组织年龄大的儿童的劳动。现代生活迫切需要知识分子。也许,现在与其说是需要大学生,毋宁说是需要有很好的文化素养、能深刻认识生活、掌握一门专长并把这项工作做得很好的人。

我们试举几个方面的例子。目前国民饮食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它是否有足够的懂行的工作人员呢?因此,儿童之家就可以开设一个国民食堂,好让孩子们实际学习这门业务,而在学校里则让他们学习卫生学、营养学、会计等等,——总之,学习作为一个有文化素养的国民饮食业工作人员所必须知道的一切。工会要帮助这些孩子,等他们离开儿童之家后就可以吸收他们参加工作。

另一项工作——饲养家禽。儿童之家可以专门从事这项工作。可以让孩子们学习饲养家禽,学习包装和保存蛋品,等等。我们很需要会饲养家禽的人。做这种工作需要大学毕业生吗?不需要。儿童之家就可以培养出一批会饲养家禽的人,他们能像家禽饲养指导员那样做出不少贡献。

还有养蜂。

还有养兔。

还有种菜和管理果园。

目前儿童游戏场和幼儿园似乎发展很快。大量的农村幼儿园没有领导人。儿童之家可以开办幼儿园来培养这种领导人。

要培养年龄大的儿童走向生活。这个问题要细致研究。通过这种办法也许能使儿童之家的物质条件有所改善。

而主要之点在于,生活出路有了着落,就能使流浪儿安心在这些儿童之家呆下去,从而使流浪现象今后少出现一些。

各级工会、经济工作人员、各级执行委员会,一切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和单位,都要尽力协助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学校和少先队运动

教师们正在迅速提高并且日臻成熟,他们用建设新式学校所必需的知识武装自己,深受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熏陶。与此同时,少先队运动从工人阶级内部脱颖而出,这一运动使教师的工作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方面,由于有了少先队运动,教师的工作好做多了;另一方面,却要求教师进一步提高自己。

少年先锋队是一种儿童组织,它有自己的章程、宗旨和工作方法。

在这个组织里,儿童可以培养集体主义的感情,学会集体行动并且服从集体的意志。

成立儿童组织这件事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孩子们能够养成随时随地关心整个集体的利益的习惯,并能把自己的一言一行与集体的言行联系起来。这样,儿童就能形成一定的集体主义心理,这种心理能够对各种本能进行适当的调节,消除软弱无能、孤独无依的感情。儿童越早开始过集体生活,他就越有希望成为一个全心全

意为共同事业而献身的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者。

在正常环境下成长的健康儿童,都渴望参加组织。凡是观察过儿童游戏活动的人都承认这一点。

正因为如此,所以儿童对少年先锋队组织很感兴趣,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少先队的宗旨是协助工人阶级的事业并且为这一事业服务。

有人也许会说:协助工人阶级的事业,帮助无产阶级开展斗争,这个宗旨是儿童们难于理解的。事实果然如此吗?现代的儿童感到这个宗旨是很亲切,很好理解。他们经常听到周围的人讲起不久前的事,讲起当时的斗争目的;他们看到周围生活中百废待举,因此他们就不难理解党和共青团的奋斗目标。他们越早为自己确定目标,越早使自己的行动服从于这一目标,就越能使他们成为更加坚强有力、志向明确的人。

尽早确定目标,开展集体活动,这本身就对儿童的发育成长具有重大的意义。

少先队采用的积极工作方法也能对儿童产生最佳的影响。

正因为如此,所以当儿童看见“红领巾”的整齐队伍时,看见儿童严守纪律的表现以及欢乐明朗的面容时,孩子们一个个都显得精神焕发,朝气蓬勃。

但是,我们通常看到的只是少先队员参加庆祝活动的这一方面的生活情况——看他们表演,听他们演说;然而,最值得注意的还是日常平凡的工作。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要让儿童不断成长,不断进步,使他们的知识日益丰富,对既定目标的理解更加深刻。否则少先队运动就会不景气,过一两年之后就对少先队员失去了吸引力。少先队运动要与学校的学习联系起来,要依靠学校的学习。

再有一点,就是要让儿童在自己的工作中提出正确的具体目标,使它与总的目标密切联系起来,使它非常具体并逐步复杂起来,这也是很重要的。目标的选择具有重大的意义,而这恐怕也是件最为棘

手的事。要使具体的目标合乎社会的需要,既是儿童们力所能及的,又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达到的。要使他们努力所得的结果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小队和中队提出的具体目标要随着儿童觉悟和能力的提高而逐渐变得复杂起来。

学校和儿童运动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有的青年为儿童运动的初步成绩而沾沾自喜,竟然说什么“学校无所谓,儿童运动才是关键。”

这样年问题是不对的。之所以产生这种看法,是因为目前还没有十分尖锐地提出深入、系统地搞好学习的问题,而离开了学习,少先队员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列宁主义者。不把系统的学习与实际的经验结合起来,青年人就不可能形成完整的一无论世界观。具备集体生活和工作的本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而具有远见卓识,能合乎逻辑地思考问题,有一定的预测能力,这是事情的另一面。如果少先队运动竟然提出要“打倒学校!”那么,尽管它旗帜如何鲜明,表现如何进步,它也不可能存在下去,客观上将起着一种反动的作用,而表面的华丽多采不过是用来掩盖旧时的那种精神奴役的一种手段。

苏维埃学校与儿童运动一样,它力图用列宁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一代,力图培养他们能够解决历史向他们提出的任务。苏维埃力图很好地用知识来武装全体儿童,因为只有掌握了知识,他们才能明确认识到自己的任务是什么,知道应该怎样去改造生活和安排生活;只有掌握了知识,他们才能取得胜利。苏维埃学校将教儿童学会把人类积累的知识用于实际工作,教他们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没有知识的人有如瞎子。苏维埃学校要使瞎子重见光明。由此可见,绝不能把少先队运动与学校对立起来,两者之间有着极密切的内在联系。

儿童运动对学校有什么作用呢?

首先,它为学校提供了新的儿童人才。少先队运动大大提高了儿童的人类尊严的意识,激发了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和兴趣,使他们养

成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及高度的纪律性。教师对这种儿童进行工作要容易得多。

教师和少先队运动的领导人即共青团员们,要向儿童们讲清旧的、资产阶级学校和新的、苏维埃学校之间的区别,渗透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学校与洋溢着无产阶级思想的苏维埃学校之间的区别;教师和共青团员们要向儿童讲明白,他们为什么需要掌握大纲的这一部分,他们为什么要探讨这个问题。如果教师能做到这一点,他就会对儿童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惊奇。对于儿童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要知道这件事?”教师将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回答他们说:“这与你没有关系,你不必东问西问,好好学习就行了,大人会知道你该学些什么东西才有用。”而会这样来回回答儿童提出的问题:“你要建设新生活,就得有知识。比如说,如果讲的是历史,你就得知道从前人们是怎样建设自己的生活的,他们之间有过什么样的斗争,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斗争,这样研究历史,你就会懂得什么事情不该做,并且因此也就更清楚地知道什么事情应该做。”如果讲的是地理,教师会说:“你既然希望全世界不再有压迫和奴役,那你怎么能不知道哪个民族住在什么地方,他们生活怎样,工作如何,他们在怎样进行斗争?”如果讲的是物理,教师就会说:“你既然要让人们摆脱沉重的劳动,那你就应该懂得自然规律;只有学习了这些规律,人们才能驾驭自然力,让它为人类服务;只有学习了技术方面的成就,把它应用到生活中去,人们才能摆脱自然界的控制,你应该知道这些成就是什么,否则你就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建设者。”

教学大纲上的各种课程都可以通过这种办法来让儿童理解其意义。教师在激发儿童学习热情的同时,也使自己的教学热情高涨起来,这种热情鼓舞着他的全部教学活动,使这种教学工作搞得生动活泼,使他们能够正确地对待儿童。

每个人都很清楚,由于这种教和学的活动受到远大目标的鼓舞,教师和学生都将得到很大的益处。

如果这样来安排工作 就会使学校与生活很快接近起来。而当教师和学生明白了这种接近的全部意义时 他们就会共同把学校办成新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正如儿童运动早已成为这么一个部分一样。

教师渴望建设新式学校。但是他必须明白 只有与儿童一起他才能做到这一点。

少先队运动对完成这一任务具有极大的帮助。

因此每一位教师都应该帮助少先队运动 帮助少先队的基层组织对全体学生施加自己的影响 帮助它们把全体儿童都吸引到这个具有伟大目标的组织里来。

因此每一位儿童运动的领导人都应该清楚地知道资产阶级学校与苏维埃学校之间的区别 明白现代学校所面临的 任务 都应该告诉少先队员们 他们通过帮助建设苏维埃学校将会对国家作出多大贡献。

现在 苏维埃学校教学内容的问题已基本解决。但还有其他许多问题没有解决。

例如 有关学校自治的问题就完全没有解决。儿童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可以在这方面给予很多帮助。

我国劳动学校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还未解决 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把教学大纲与儿童的实际活动、与他们的劳动结合起来。虽然新学校从 1917 年起就已研究这一问题 但至今未能彻底解决。在这方面 儿童运动的经验也同样可以给予很多帮助。

少先队员要向自己提出(尽管范围有限)社会需要的具体劳动目标。这方面的实践还很薄弱 也未对这一工作进行充分的总结。毫无疑问 儿童工作者在发扬儿童这方面首倡精神的同时 能够更好地创造出新的途径。

而当我们做到了这一点之后 我们提出社会需要的具体劳动目标的本领 就会使我们把学校的工作搞得更好。

考虑到这一目标 现在就应该把少先队活动与学校的教学大纲联系起来。

苏维埃的新式学校和少先队运动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共同的目标照耀着它们前进的道路。深入开展儿童运动离不开学校;儿童运动又为学校创造了新的条件,它在许多问题上不失为学校的一个基地,因此在学校和儿童运动之间应该保持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将有助于苏联青年一代去解决无产阶级世界斗争向他们提出的伟大任务。

苏维埃学校

(在全苏第一次教师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十月革命已将旧学校摧毁。旧学校是为地主和资本家效劳的资产阶级学校,因此人民对它深恶痛绝。

我不禁想起了一件往事。1917年末,布尔什维克刚刚取得政权不久,一位从前线回来的同志对我讲,士兵们有一次在一个学校宿营时,把学校的图书撕得粉碎,物理仪器砸得稀烂,学校遭到了严重破坏。士兵们之所以做出这种事,是因为他们觉得拥有这些图书和仪器的这所学校是敌人的学校,老爷们的学校,是人民群众痛恨已极的统治者的学校。他们认为这种学校所传授的知识,不是为了搞好大家的生活,而是为了培养奴役人民的资本的奴仆。必须建立新式学校。

1918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国民教育代表大会上发表他第一篇有关教育问题的演说就曾讲到,俄国学校从此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控制,学校与挣脱了奴隶枷锁的人民一道,开始了建立在社会主义、平等友爱原则上的新生活。接着,在这篇演说快结束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到了学校所具有的意义:“必须利用全部力量、精力和知识,以便尽可能快地建成我们未来的劳动学校,因为只有这种学

校才能使我们今后免除任何类似今天这种持续四年多的世界冲突和屠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番话对学校评价很高,但当时并未引起人们重视,原因是国内战争不久就爆发了,而且后来越演越烈。

国内战争使我们暂时把学校问题放到一边了。甚至我们共产党人对于列宁给学校所作的这么高的评价都感到很新颖,不过,如果我们仔细体会一下他所讲的意思,我们就会发现,列宁是说学校应该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一代,学校应该帮助青年一代按崭新的方式在社会主义原则上改造整个生活。关于这个问题,弗拉塞米尔·伊里奇曾经说过,我们还面临着严重考验的年代,“我们还来完全渡过所有这些考验阶段。”事实上,学校后来的确经历了极其艰苦的岁月,教师的确经历了艰苦的考验。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前提条件,去建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18年8月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讲的那种来来的学校。

从实际上看,为什么过去这些年来能建成劳动学校呢?首先是同为战祸频繁、经济凋敝,学校没有物质保证。席卷全俄的国内战争对学校的破坏特别严重。现在情况日趋好转,全国进入了经济高涨时期。当然,我们不能作任何特殊的幻想,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一最主要、最根本的困难将有所克服,而以前它一直妨碍着学校建设的进程。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农民对新式学校十分不满。农民对这种学校不理解,他们觉得这种学校有许多旧时贵族老爷的习气。

应该说,各地教师在开始时也不知道如何建立这种新式劳动学校,因而学校的劳动往往局限于自我服务。

农民和劳动学校

农民常常说:“这是怎么搞的,学校里老是干活,就是不学习。我们干了一辈子活,我们不该再干活了,得学点别的什么东西。”另

一方面,当孩子们去远足旅行时,当农民看见孩子们唱歌、塑像、雕刻时,他们就觉得这都是贵族老爷们那一套,而农民们按新的方式建设自己生活所需要的东西以及真正的知识,这种劳动学校却未教给学生。多少年来形成的传统的不信任感情既转向了新式学校,也转向了新的教师。从前,教师只与神甫和富人有来往,而凡是与贫农接触的教师,都认为是不可靠的人。这种把教师看作统治阶级走卒的旧观点,也被农民用来看待新式学校的教师了。

我们看到,今年各校入学的儿童特别多。各地来的同志和全体代表都说,今年有大批儿童涌进学校,以前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没有机会入学的孩子,以及由于农民对学校不信任而未送去入学的孩子,今年都纷纷上学了。

教师同志们都说,现在各班人数很多,一个教师有时要教 150 - 180 人。儿童入学人数剧增,根本原因还是物质条件的改善,但也说明农民对学校的不信任已开始消失。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我曾经说过,过去农民对教师是不信任的,而刚开始时,教师心里也没有数,他的认识也不像现在这样明确,不懂得他应该与工人阶级的事业联系起来,应该与劳动人民的事业联系起来。

居民对教师的态度

最初那几年,教师们有些惊慌失措(当然,这不是他们的罪过,而是他们的不幸),对苏维埃政权没有认识,不知道是应该支持它还是反对它,后来逐渐地通过痛苦的思考、通过长时间的斗争,他们才得出了结论:应该把自己的事业与工人阶级的事业联系起来。

我们看到,最近两年来,教师们已开始参加社会工作。教师参加社会工作,这件事对加强教师与居民的联系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不仅要做到部分教师参加社会工作,而且要做到全体教师都能参加社会工作,因为这是教师与劳动人民建立最密切关系的唯一途径。

我们已经看到了教师参加社会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居民(特别是贫苦阶层的居民)已开始信任教师。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一份材料说,许多地方在这次选举苏维埃时,教师们成了深受信任的社会活动家,而在沃洛格达省卡金柯夫县,乡农民代表会议甚至于给那些以前没有表决权的教师以表决权。这说明居民对教师的信任增长了,而现在教师的影响也比他过去置身事外、与劳动人民格格不入时要大出百倍。

教师在参加这种社会活动的过程中,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他的视野开阔了,他对苏维埃政权的认识也提高了——知道这是劳动人民的政权,也是他自己的政权。教师们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领导着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领导着全国在正确的道路上迈进。教师们的这种认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也有体现,所以说这次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表现了教师和苏维埃政权的密切关系。这次代表大会表明,教师们决心在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工作。

昨天有人告诉我一件小事:有几位巴什基里亚教师问一个过路的人:“同志,请问到教师代表大会怎么走,坐几路电车?”这个过路人看了他们一眼说:“我哪是你们的同志,我是资本家,那才是你们的同志,”他指着一群过路的工人说。这件小事很说明问题,资本家是外人,而他认为教师和工人是同志。

苏维埃学校是劳动学校

影响建立新式学校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不大清楚这种新式学校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共产党人认为,这种学校应该是劳动学校。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为社会的富裕阶层可能不重视劳动,不懂得劳动的作用,那么整天与劳动打交道的工农群众不可能不关心这件事,他们希望全面

地阐明这个问题。苏维埃学校是劳动学校。

早在 1897 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讲到要使学校成为劳动学校,而当时俄国的乌克兰主义者一般说来部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早在 1897 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指出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只有把生产劳动与教育结合起来,才能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能造就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人。

工农取得政权之后,就提出了建立劳动学校这一目标。但是具体去建立这种劳动学校时,却发现经验不足,办法不多,还有好多地方不明确。许多人对劳动学校的理解是,学校应该培养学生爱好劳动,劳动学校要大搞自我服务活动,儿童在劳动学校里应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是经验表明,这样的学校对儿童很少有什么帮助。问题不在于养成儿童爱好劳动的习惯,而且恰巧是对于工农子弟,对于劳动人民的子弟来说,学校不大需要在这方面下功夫,而应该是换个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只有逐渐地在总结实际经验的同时得出结论,特别要紧的是把对劳动问题的理论研究放在首位,说明劳动的意义和劳动的组织,说明发展中的劳动问题。这时就会明白怎样把这个问题与实际的劳动活动联系起来。要注意探求具有前途的劳动形式,不要让学生去学那种旧时手工业的落后的劳动形式,而要让他们去学新的劳动形式,让他们懂得以知识作基础的劳动有助于提高经济,有助于驾驭自然力。

国家学术委员会教学大纲

对劳动学校的这种新认识,在我们多次讨论过的国家学术委员会印发的教学大纲中已有反映。大纲中那一部分就是讲的如何认识劳动的意义,如何讲述发展中的劳动这一问题。这一部分也指出了劳动与社会的联系,一方面指出了劳动如何成为这一社会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劳动如何以及通过什么途径掌握自然力和自然资源。

因此,如果像有的地方所采取的那种办法,在使用大纲时把这一部分去掉的话,那就丢掉了最基本、最重要的东西。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重视教学大纲。他多次讲到要编制新的教学大纲,规定出学校的教学内容。他在俄国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演说中指出,要以批判的态度去学习知识,应当学习那些最有价值、最有用处的东西,以使用改造生活所必需的知识来武装青年。不能把现有的知识都告诉学生,因为这些知识数量太大。但是要从现有的知识中选出最有用的、最重要的来。国家学术委员会的大纲就是试图选出那些从劳动人民观点看来有用的东西,从现实生活看来有用的东西,以及青年一代为了根据新的原则改造生活有用的东西来讲授。当然,这些教学大纲还不够完善。它只是试图选出必要的教材并以一定的形式向学生传授这些教材。

授予学生的知识不应是互不联系的,不应是类似用许多块零头布缝制成的百衲衣。所讲授的知识互相要有联系,也要留有余地。否则这些知识连一半的价值也不会有。

知识的联系不能生拉硬扯,而要合乎生活实际。由此就产生了综合编制的教学大纲问题。最近以来,对这个问题谈得很多,也写了不少文章。有些人把这种综合性大纲对教材的安排搞得神秘莫测,而我们只是希望所传授的知识不要与生活脱节,要有一定的生活联系。只有通过一定的联系传授的知识才能使学生用以自觉地对待环境,才能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这种环境、理解这种环境。

在教学大纲中,我们是从每种现象发展的角度来讲授这种现象的。我们观察社会现象、自然现象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然后从发展的角度来研究这些现象。我们教儿童深刻地理解这些现象,认真地对待这些现象。当然,只有通过教师积累的经验,通过学校对这一大纲的检验,才能看出大纲中哪些地方要改。不过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大纲的实质是正确的。

各地来的同志,大会的代表同志都一致指出,新的教学大纲有助

于儿童的发展,使他们能够自觉地对待环境。这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他们也指出,这一大纲很难与培养熟练技巧联系起来。如果认真探究下一级学校的熟练技巧到底是什么,那就会了解到,这是指的能流畅顺利地阅读,详细地写下自己的思想而没有语法文字上的错误,再就是会算。

当然,农民们要求掌握这种熟练技巧是完全正确的,学校应该传授这些知识。但是这种熟练技巧与国家学术委员会的教学大纲是否水火不相容呢?这是各地同志都很关心的问题。我要说,困难不在于国家学术委员会教学大纲本身,困难在于我们往往没有可供阅读用的教科书。只要能发给学校与国家学术委员会教学大纲有联系的书,从而给儿童提供了生动有趣的学习材料,这就可以使阅读熟练技巧的问题迎刃而解。用儿童感到生动有趣的教材去教他们阅读,这当然比用枯燥无味的教材去教他们容易得多。

书写熟练技巧也是如此。现在这些熟练技巧都大大简化了。凡是革命前上过学的同志都知道,旧的拼写法是多么烦琐。他们一定会说,现在培养学生的书写熟练技巧要比以前容易多了。从前要花很长时间学习字母“Ы。”及其他一些拼写法上的难点。现在学会书写要容易得多,不过要发给教师一本与国家学术委员会教学大纲有联系的基本语法练习手册作参考,以便他们掌握儿童非常需要的正确书写方法。

最后,谈到数学,在这方面的意见比较少。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已经找出了一些办法来把教学大纲安排的教材与数学、与算术联系起来。今后再供应学校一些教科书,也许就有助于教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我要重说一遍,农民所产生的这种要求(会读、写、算)当然是完全正当的,因此,如果教学大纲不利于培养这些熟练技巧,那这种大纲显然是不合适的。

但是教学大纲是合适的。目前的问题不在于修订教学大纲,不在于精简大纲的内容,而在于供给学校相应的教学材料,相应的教科书。

学校物质条件的改善,也许有助于这一教学大纲的贯彻执行。这一大纲要有助于熟练技巧的形成。大纲与熟练技巧之间要有联系。

关于劳动的问题还谈得不够。这个问题在一级学校里很容易解决,在二级学校里则比较复杂,国家学术委员会科教部目前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需要指出(列宁早已指出过)的是,必须发动技术界、职业界的知名人士参加学校的工作。例如,我们现在还经常看到,一部分懂得各种手工活的农民帮助学校,帮助儿童学习钳工、木工和其他手艺活。

学校的物质条件有所改善,农民对学校的态度有所好转,教师的立场有所转变,劳动学校的面貌逐渐明确,所有这些都是在新的原则上建设学校的前提条件。

少先队运动

近来,我们还发现我国学校有一种新气象。我们看到共青团和少先队运动在自发地成长。这一运动在农村也有了发展。起初我们以为,少先队运动会受到居民的强烈的抵制,但是我们估计错了。居民们总的说来是积极支持这一运动的,只有个别地方例外(如顿河省哥萨克的居住地区)。

农民们常常说:“现在是新时代了,没法子!”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一项极重要的任务:加强少先队运动与学校的联系。某些教师感到不满意的是,这一运动是在校外发展起来而独立存在的。许多教师说,教师应该是当然的辅导员。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一运动产生于工厂并且不依附于学校,这正是一个优点,因为必须使全体在校儿童关心自己的学习,提出某种问题和任务,以使用自己的力量加以解决,并通过自己的错误来学习。

在旧时的读书学校,教师与学生是对立的。即使是学识比较渊博的教师,尽管他什么都明白,也是靠自己的权威来压制学生。儿童

们应该在自己的组织里学会集体工作和集体生活。

必须直率指出,自治工作总的说来是搞得不好的。个别地方的自治工作搞得不错,但是就整体而言,有些学校的自治工作没有走上正轨。有的学校大搞什么审判同学的儿童法庭,有的学校的自治工作不过是协助教师搞好纪律。自治工作名不符实,也就是说,不是着眼于通过组织培养新人。

我们说,我国的新式学校是苏维埃学校,是劳动人民即工农的学校。由于我国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以我国的学校不仅应该是劳动人民的学校,而且也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学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国学校不仅应向学生介绍历史和现实的情况,而且还应让他们知道社会发展的方向,向他们指出新的劳动形式。因此,学校要教育儿童们团结一致,提出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任务,并通过共同的努力去完成这一任务。否则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学校。少先队运动给学校带来了新的精神,即集体主义精神。友好团结的气氛和集体行动的习惯培养着一代新人,即具有集体主义思想感情的儿童,他们经常想到的不是“我”而是“我们”。这件事有着重大的意义,所以学校也离不开少先队运动。

如果学校和少先队运动各行其是,那就不对了,因为少先队运动如果不经常学习各种知识,如果儿童不顽强地学习,那他们就不能合乎要求地去工作,就不能正确地给自己提出任务并且很好地完成这些任务。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得有知识。只是依靠演讲、谈话是不行的,要善于组织生活和组织工作,但若没有知识,离开了学校,就达不到这一目的。学校也应像少先队运动一样,要深入生活,而少先队运动恰好能给学校带来新的气象。

学校的社会工作

我国目前的学校已深入到生活里去了。例如,学校通过学生广

泛地开展了卫生教育；一级学校高年级学生经常为不识字的家庭读报并开展扫盲工作。有时还通过学校，通过学生广泛地进行了农业宣传，等等。

正是从学校的社会主义发展观点来看，学校的这种社会工作是特别重要的。这是学校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这一任务是与研究周围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当然，中央制定的教学大纲应尽可能适应各地的具体实际，但各地的情况各不相同。在这里，学校和教师有一个共同的任务，这就是教儿童们学会观察生活，同时还要知道怎样改造这种生活。如果他们能懂得这一点，学校就能做到深入生活和改造生活，这项任务是极其重要的。

关于学校网点

目前已经具备了建立新式学校的前提条件。起初，在1917年至1918年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曾经认为一下子可以取得很大的成果，比如说，可以立即实行普及教育，可以立即给全体儿童供应伙食、衣服和鞋子。但是，长期以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要达到这一目标往往需要经过许多阶段，走完一个阶段再进入另一阶段。因此，我们现在应给我国学校提出一系列实际任务，实现了这些任务，它就向我们理想中的新式学校迈进了一步，这种新式学校能吸引全体儿童并使他们获得应有的知识。

目前我国的学校网点只能容纳一半的儿童入学。我们现在要提出的一个近期目标，就是无论如何不能削减学校网点而要竭尽全力扩大学校网点。扩大学校网点要依靠农民的主动精神。

超龄生学校

除了扩大正常的学校网点之外，还有一个超龄生的问题，这是指

的那些未能入学的儿童而言的。现在常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
一些 14—15 岁的孩子与 8 岁的孩子在一个班上课,他们的发展水平
完全不一样。这给教学工作增加了一些困难,有些地方对这些蜂拥
而来入学的儿童简直有些招架不住。因此我们应该给自己提出一个
任务(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已经谈到过这件事),就是为这些孩
子开办补习学校,让他们哪怕学习认字,学习读、写、算也好,也让他
们掌握读书看报的本事。

改革二级学校

还有许多其他的任务。必须继续发展青年农民学校和工厂学
校,这种学校与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并能授予学生一些能直接提高
这种生产的知识。但是与此同时却不能取消任何一所二级学校,因
为国家目前迫切需要具有中等知识水平的工作人员。只需要把二级
学校第二阶段加以改革就行了。迄今为止,二级学校一直是升入高
等院校的转运站,高等院校往往是旧观念作祟,不受高等教育就没
有出路。因此,一个学生要是没有升入高等院校,那实在是他的一大
悲剧。要改革二级学校,使它立即开辟通向生活的道路,立即帮助学
生掌握某种劳动本领。

互助委员会和学校

还有一项任务要谈谈,就是必须支持贫穷阶层的子弟,使他们有
学习的机会。在这方面,要吸引农民互助委员会参加这项工作。儿
童们不能上学往往是由于他们没钱买鞋子,而这不过只要十五个戈
比。农民互助委员会应该认真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同样地,校促会
在这方面也可以做很多工作。我国有些地方的校促会已经广泛开展了
工作。例如,医生们指出,在儿童就寝的房间里,一定得有通风小

窗。于是校促会就到每家的房间去巡视,如果发现孩子睡觉的房间没有通风小窗,而家长又没有钱安装这种小窗,校促会就负责给安装。这样,他们就帮助了家境比较贫穷的居民。开展活动的方式很多,这不过是其中之一。

谈谈教师的社会工作

现在来谈谈怎样使学校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的问题。我已经说过,首先必须让全体教师参加社会工作,但是要特别注意减轻教师的负担,并且明确到底什么活动才算社会活动。例如,教师是否必须参加戏剧小组的活动呢?这项工作占去了他很多时间,但它并非都能叫作社会工作。当然,这项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我曾不止一次地听鞑靼教师说,在伊斯兰居民中,戏剧有着特殊的作用。原来,按宗教规定,伊斯兰教徒不得出入戏院。如果一个伊斯兰教徒进了戏院,而且还随身带了妻子一同前往,他就会被革除教门。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参加戏剧小组当然就是在进行一种反宗教宣传。这种情况下参加戏剧小组的工作,无疑就是一种社会工作。但这种情况是极个别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参加戏剧小组的工作不过是组织文娱活动,而且还要占去教师很多时间(教师的时间本来就很少)。其他各种技术工作也是同样情况,这种工作往往全压在教师身上,使他没有时间从事本职工作,因此必须减轻教师的负担。此外,还要注意发动当地的医生、农学家、全体农村知识分子去帮助教师。

教师的轮训和培养

下面谈谈用知识武装教师的问题。在发给大会代表的调查表中,第一天由教师们填写的300份这种表格里就有282份希望免费

供应或优待供应教师政治书籍和教育书籍。为了建设新式学校,为了建设居民现在所需要的那种学校,教师本人应当努力学习,精通苏维埃政权的工作,自觉地对待苏维埃政权开展的活动。这就要求对教师进行轮训和认真的培训。这一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也是十分明确的。同时要保证教师能够在工作过程中学习。

儿童社会政治教育事业管理总局提出了各地区的重点学校的计划,要围绕重点学校把教师组织起来,共同学习和检查自己的工作,互相交流教学经验。要让各地区的学校与中等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建立联系,教学法研究会也要与它们建立联系。这样一来,就会使这方面的指导比目前更为恰当合理。大会代表中有很多人要求经常给教师以指导,只要我们积极开展教师的集体工作就能做到这一点。

教师和报刊

除此之外,还要让全体教师明确认识到,教师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参加报刊即《教师报》的工作。大家经常谈到这张报纸的巨大作用。它起着组织作用,它使教师能通过报纸与别的教师交流思想。我们知道,教师的职业很分散,全国各个角落都有。所以,他们积极参加报纸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不打算详细地讲农村学前教育的意义和政治教育工作的意义了,因为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对这个问题已讲了一些意见。无论是学前教育抑或是政治教育工作都有助于完成学校所开创的事业。

我的报告完了,我相信这次代表大会一定能为教师们团结共事打下一个基础,能为建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说的那种学校打下一个基础。同志们,请接受我衷心的祝贺。

少先队运动

(在党的国民教育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1. 少先队运动产生于工厂 ,那里的孩子每天都看到各种组织开展的活动 ,其中包括年纪大的儿童组织即共青团开展的活动。孩子们强烈要求建立组织 ,于是就出现了儿童运动这种形式。

2. 共青团负责帮助少先队安排对孩子们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工作。共青团把少年先锋队队员看作自己的接班人 ,而少先队员也乐于接受年长同志的领导。

3. 但是 ,如果少先队运动只吸收工人子弟参加 ,把它变成了一个纯阶级的组织 ,那就不对了。我们生活在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此时不应把社会分化为若干阶级) ,正在建立新的、集体主义的劳动组织 ,人们应该学会按照新的方式 ,即共产主义的方式生活和工作。儿童运动的宗旨正是要进行这种教育 ,它要把全体儿童组织起来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

4. 儿童运动目前在农村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因为农村里的分散的小农经济造成了小私有者、个人主义的心理。儿童运动应该把这种心理与集体主义心理加以对照。^①

5. 但是 ,儿童运动只有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才能起到它应起的巨大作用。

6. 如果儿童运动追求一些华而不实的表面东西(如操练步法 ,穿上军服 ,召开大会 ,发表演说 ,讲一些少先队的“空话” ,搞什么阅

^① 此提纲写于1925年 ,当时还未开展集体农庄运动 ,占统治地位的是个体经济。——作者注

兵式) ,那对儿童运动将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7. 少先队中队的主要工作应当是为公共利益而开展集体劳动。每个小队经常都要提出某种集体劳动任务并切实完成这一任务,即使这种任务微不足道、非常简单也无所谓。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就讲过这个问题。

8. 不应认为只有具备了设备完善的工场、指导员等等之后,小队才能给自己提出劳动任务。小队应利用一切机会来获得劳动熟练技巧。

9. 集体劳动的熟练技巧、合理安排共同劳动的技能、承担力所能及的任务以及根据小队每个队员的能力和知识水平进行合理分工的技能,还有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少的人力完成既定任务的技能,凡此种种,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10. 由少先队员对自己集体的工作进行合理的考核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

11. 一切苏维埃机关、工会组织和党的组织都应考虑如何帮助少先队员安排社会公益劳动。学校在这方面也应做些工作。

12. 学校和儿童运动之间应建立最密切的联系。共产党努力以求的,是把苏维埃学校变成对青年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工具。儿童运动是儿童独立的社会政治组织,其宗旨是组织儿童的共产主义活动。

总之,苏维埃学校和儿童运动是通过不同的途径走向同一个目标。

13. 学校的基本任务是通过有计划的教学工作授予儿童一定的知识,并培养他们对周围生活进行观察、研究和思考的能力,同时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和有效地对生活产生影响。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得采用最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要关指引起儿童强烈的兴趣和高度的积极性,并且最大限度地节约人力。

14. 儿童运动应协助学校把工作做得更好,为此,少先队运动的

领导人(即共青团员们)和少先队员要尽可能深入地了解苏维埃学校的任务,“前哨”应尽力帮助学校搞好工作。

15. 另一方面,苏维埃学校只有依靠自觉的、有组织的儿童,它才能取得重大的成就。

16. 如果把学校与儿童运动等同起来,那就错了。学校无论何时都不能代替独立的儿童运动,正如学校工作应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人负责,学校的任务不能交由儿童运动去完成一样。但是两者之间要有密切的联系。

17. 学校的教学大纲、课程表都是根据一般的经济任务和一般的政治目的确定的,不能打乱,但是学校和少先队中队的计划和课程表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应互相协调一致。

18. 教师和担任少先队领导工作的共青团员应密切合作。少先队领导人应参加学校的工作,经常与中队的少先队员谈话,以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领导少先队基层组织的工作,并参加校务委员会的工作。教师应该帮助少先队开展活动,参加少先队队部的工作和教学法委员会的工作,经常访问少先队中队和基层组织,帮助他们开展教育、教学法和实际工作,在中队队委会和少先队基层组织的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19. 学校自治一直搞得很不好。少先队运动应该帮助搞好这一工作。

学校自治工作应发动全体学生来搞,而不要只限于一部分选举产生的委员会。相反,应该定期召开全体会议,而不只是在紧急情况下或为了选举才开会,一切重要的、学生关心的问题都要在全体会议上讨论,以便在会上确定学生应承担的社会工作,当场在各班之间分配这项工作,好让每个学生在共同工作中担负一部分任务,并在全体大会上报告自己的工作情况。

“前哨”无论如何不应破坏学校自治这项工作,用少先队组织来代替这项工作,恰恰相反,它应该对实行这种形式的学校自治加以协

助。少先队组织应当成为儿童各种社会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积极参加儿童的各种活动并使儿童在这种活动中养成自觉性和纪律性,使这种活动洋溢着共产主义精神。

20. 不过少先队运动的宗旨不仅是要合理地安排学校的和生活和工作,而且也要合理地安排家庭和周围环境的生活和工作。

少先队运动通过学校学得了知识,并且懂得了如何把这一武器运用到生活中去之后,就应该实际地运用这一武器。

21. 少先队运动与资产阶级沙文主义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它时刻都不应忘记必须培养身体强壮、具有战斗力的青年,他们时刻准备着手执武器去捍卫革命成果。

22. 除此之外,现代战争要求每一个战士善于迅速判明各种情况,善于选择最适当的防卫手段和斗争手段,善于克服各种困难,能够和大家一起有组织、按计划地行动。少先队运动能使青年一代学会这一切,同时它也在培养青年一代学会建设新生活并结束一切战争。

23. 不允许有损害青年一代身体健康的任何负担过重的现象出现。少先队中队应该:

- 1) 严格规定少先队中队和小队每周集会和开展其他活动的时数;
- 2) 注意少先队员在中队里的负担,必要时(身体不好等情况)可免去他们的活动;
- 3) 每个城市各个大区应规定一个统一的少先队中队集会日。

24. 学校应特别注意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研究有关儿童卫生、体质方面的问题,关心校内热早餐的供应情况,关心全校生活的卫生安排和体育活动的开展。

25. 要关心少先队员时间的分配(睡眠、休息和工作时间),关心积极开展体育活动(此项活动应与学校的学习协调起来),还要关心和搞好夏令营生活。

在时间安排上,必须留出一定的时间让少先队员自由支配。

论普及教育

普及教育的问题对我国具有重大的意义。各国的资产阶级无时不在周密地考虑广大居民的读写能力和教育水平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具有的意义。资本主义各国的资产阶级之所以实行普及义务教育,并非出于对劳动人民的关心,也不是由于某些崇高思想的影响,而纯粹是出于生意经。人民群众的愚昧无知会影响工业发展的速度。

我国是一个半文盲国家。这一点我们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只有彻底消灭愚昧无知的现象,只有尽快地实行普及义务教育,才能掌握我们全部的生产力和所有的财富,才能很好地发展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在这里不允许有任何疏忽大意和松懈,也不允许拖拉作风存在。必须在日常劳动中努力完成生活所提出的这一任务。

我们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的另一件事,就是我们之所以必须尽快实行普及教育,还因为我们具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切前提条件,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能建设社会主义,而在这一建设工作中,半文盲状态对我们有很大妨碍。大家只要想一想,我们有苏维埃政权,每一个厨娘都应该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今后苏维埃政权将越来越广泛地吸引工农群众参加管理机关,——必须把整个生活加以改造,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愉快,可是我们是一些半文盲。我们的文化水平越高,我们在合作化道路上的进步就越快。我们整个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获得文化的程度。关于这个问题,列宁最近写了不少文章。可是我们普及教育的工作还是进展得很慢。

我知道,困难是很大的,我们面临着许多困难。我知道,这里牵涉的问题不少,经费不够、房屋和木材缺乏等等情况都对普及教育的

实行有影响。

我又一次想起了我的一个学生(他是一个成年的纺织工人,刚刚摘掉文盲帽子)所写的第一篇文章——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他说:“工人们一天工作十二小时,因此要学习是很困难的。但是必须使我们的‘恩人’不让我们工作十五小时,这是困难的,但一定要做到。”

必须获得文化,必须实行普及教育。

我想谈两个问题。

必须防止陷入老一套的泥坑。计划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制定学校网的计划是必要的。但是必须记住,这些学校网很不完善,因为它很少考虑到当地的日常生活、生产和一般文化条件。所以我认为,还必须通过生活来检验所有这些学校网。请同志们原谅我对学校网的怀疑。当我看到各工业省召开的实行普及教育的会议记录时,我发现不只有一个例子可以证实我的怀疑是正确的。从地图上看,到学校去不到三里路,但那里有沼泽和洼地,必须绕着圈子走,这样就有八里地。——从地图上看,离学校只有一里路,可是过桥时很危险……

所以我建议在安排学校布局的计划时要更多地考虑居民的生活情况和要求。我们还存在着旧时的官僚主义的偏见——轻视居民的主动性,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消除这种偏见。

每一个村子的人都希望本村有一所学校。这当然会把一切学校网都打乱。两里路远的地方有一所很好的学校,可是农民修建一所只能容纳30人的草房子学校;这种草房子学校很简陋,只能维持5—6年。这种做法很不恰当!这是“网”的领导人的看法。可是农民这样认为:村子很穷,儿童没有衣服鞋子穿。冬天室外很冷。让孩子到两里路外去读书不可能;何况幼童根本走不动。走路还要花时间。即或邻近的学校很好,可是儿童仍然是文盲。从目前来看,这是不恰当的。由于后面这种情况,人们就修建了草房子学校……而教育行政部门在一旁看到这种情况就作出决议说:只有那些根据学校网的规定修建起来的学校,才能得到援助;为了预防修建草房子学

校,规定只有在省工程师对修建计划表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开工兴建。农民抱怨不已。他们之所以修建草房子学校,并不是由于愚昧无知,而是由于没有钱。对于每一项创举都要加以支持,而不应以官僚主义的态度轻率地加以禁止。

请原谅我的话说得过于尖刻,但是旧的作风还束缚着我们,妨碍我们去进行生活要求我们进行的工作……

修建校舍、聘请教师、解决经费问题以支付教师工资、起码的供应——所有这些都只是第一步。为了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实际地实行普及教育,还要采取其他一系列的辅助性措施来使居民更积极地参加这一工作。

因此,特别重要的是要有计划地进行普及教育的宣传工作。要在农村文化室、农民之家里报告本省、本县、本乡这一工作的进展情况。每一项创举(如穷苦农民利用公耕地来修建学校)都应该让大家知道,写在红榜上,等等。在这方面,重要的是展开竞赛,重要的是使普及教育的思想成为居民感到很亲切的思想,吸引他们参加这一工作,指出这一工作的必要性。

为了实现普及教育,必须进行集体工作。不是不要群众,而是要和群众一起才能完成这一任务。

少先队运动和学校

(在学校少先队工作人员现场参观会议上的报告)

在少先队运动中,永远要把少先队运动的宗旨放在首位。儿童们往往对运动的宗旨理解不深。在我们偶尔召开的少先队大会上,少先队员讲话时总要说,“我们要把工人阶级的事业进行到底”。甚至在学校里与小朋友谈话时,少先队员们往往也要表示:“我们誓把

列宁的事业进行到底。”乍看起来,似乎对少先队运动的宗旨已经明确了:儿童们组织起来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工人阶级开创的事业,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活每个少先队员都会说,但实际上孩子们往往并不明白“把工人阶级的事业进行到底”的真正含义。他们的热情很高,但认识肤浅,即使就感情而言,我看也是不够深厚的。可是,十一岁至十六岁的少年儿童已经不是不懂事的小孩子了。我们且看一看旧时的革命者的成长情况。这个过程通常是:在少年、青年时代,一个人遇到了一件使他极为愤懑的事,看到工人怎样受到欺侮,军官如何虐待士兵,农民怎样遭到剥削,——于是这件事就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凡是见到过镇压农民起义的人,凡是目睹过国内战争的人,他们都有着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感受,因为他们亲历了所见的事件。

托尔斯泰写过一篇短篇小说《舞会之后》,描写一个青年人为了讨好一个姑娘,就与她的父亲——位将军在舞会上跳马祖卡舞,清早出门一看,一个士兵正在穿过棒阵(帝俄军队的一种残酷折磨士兵的办法,使受罚的士兵穿过用棒打的队形——译注),而下令进行这种处罚的,正是他与之跳马祖卡舞的那位将军。他马上充满了对这位将军的仇恨,同时对他女儿的温情柔意也随之一扫而空。这惨不忍睹的景象使他大为震惊。这是文艺作品中的一个例子。每一个革命者,当他回忆自己的一生时,他同时就会回忆起童年时代使他深受激励并促使他为工人阶级的事业而奋斗的那些事实。有的人可能记不清他何时经历过何事,但是正是这一经历当时曾对他的思想和感情产生了影响。我国儿童现在所处的环境,已使他们看不到过去那种惨无人道、极不合理的现象了。他们看不到穿过棒阵,看不到剥削,看不到资本家如何压榨工人等等,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一切都尽善尽美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说过:“旧事物虽被捣毁,但是还没有消灭。”的确,只要我们放眼一看,就会发现旧的残余还有很多很多。通常我们从农村的每一封来信中都可以发现,一方面,新生活的幼芽

在农村茁壮成长,成立了各种机构,妇女们也组织起来了,新的生活日益巩固,但是另一方面,还有许多旧的残余,还有许多应该与之斗争的东西。举例来说,一位农妇来信说起她所从事的大量组织活动。这位农妇识字不多,但她的信却写得很清楚明白,她谈起她怎样把妇女们组织起来,起初她怎样不愿参加会议,她怎样弄到一本书之后就挨家挨户去宣读;农妇们怎么逐渐产生兴趣,开始聚在一起劳动并听她读书,她如何把她们按十人分组,而在召开会议时,没有一人缺席。这就是新生活的幼芽。在过去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过这么大量的组织工作。可是除此之外,这位农妇也谈到有的丈夫还打妻子,妇女们让她去告诉那些当丈夫的人,苏维埃政权不许丈夫打妻子。那些男人问她:“您在哪儿听说的。”

这使我们不得不经常想到列宁的话:“旧事物虽被捣毁,但是还没有消灭。”要想消灭旧事物,就得在基层开展工作。不管中央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但是,如果不在基层开展大量的组织工作,我们就会长期陷于旧的残余的包围之中。少先队员应该做些什么呢?他们要学会把新旧事物区别开来,要能分辨出什么是旧的残余,什么是新生事物。少先队员口口声声说誓把工人阶级的事业进行到底,而具体行动却不了解,这要怪我们没有向他们讲清楚。如果我们看一看为少先队员写的书,那就会发现这些书写得不大得体。书上讲的都是些大道理。对于成年人说来还可以通过切身的体验来理解,而对十一、二岁的少年儿童(国内战争和革命时期,他们只有两岁,他们只是听别人讲过战争与革命的情况),我们不应该讲大道理,而要运用生动的形象。我们应该发动男女工人来做这件事。

我不知道我们少先队俱乐部是否有邀请老战士到俱乐部来讲历史的这么一个传统习惯。这些老战士在家里倒是经常讲的,他们的孩子可以听得到,可是在俱乐部和开会时往往没有这样做。我们在书本上往往把这一切描写得神乎其神,远远脱离了生活实际。我们笔下的少先队员们都是一些很自觉的人,即使调皮捣蛋,也很有限

度,毫不过分,并且知过即改。不久前有人送我一本书:《同心相连》,写的是少先队员在夏令营的种种活动。书中描写少先队员去夏令营的情况,他们马上看出了一切缺点,发现儿童没有运动场,就拆除了那里的板棚,修建了一个少先队体育场,等等——总而言之,为居民造福不浅。我前不久对一些少先队员讲过:“孩子们,你们下乡时太爱吹牛了,你们想要为农村造福,不是要在那儿演戏,就是要给大家做报告,等等。”你们知道,我们的少先队员往往做有关多区轮作制的报告。不久前有人向我讲了一所青年农民学校的情况:“我们在进行农业宣传,我们走访了十八个乡村。”原来是有两个学生下乡去做了几次报告。可是列宁对共产党员讲的是,他们在农业方面应该多向农民学习,少向农民进行教育。我给《同心相连》一书的作者写信说,他的书并不坏,不过,最好让儿童自己去写他们去夏令营的经过,是否所有的家长都同意孩子们去;如果同意的话,又向他们嘱咐了一些什么话。这样就能看出儿童与家庭的关系,看出儿童经常在家里忙些什么以及少先队员们如何去帮助自己的同学。最后,再让他们描写一下旅途的心情:他们原以为要去的地方有很漂亮的建筑物,然而实际上一切都未安排就绪,只好迁就一下算了。可是书中的儿童却是一些少爷,不知道谁洗食具,谁擦地板,谁把一切安排好的,他们“业已到达,目击一切,取得胜利”。这就使儿童养成了一种讲排场、摆架子的习气。他们可以下乡,可以做报告,可是干活却不是他们的事。这就牵涉到少先队的宗旨了。他们以为,只要他们写了“誓把列宁的事业进行到底”,那就万事大吉了,至于怎样去做到,怎样分辨周围生活中的好与坏,孩子们往往一无所知。对于许多儿童说来,“把工人阶级的事业进行到底”这个口号只不过是一句漂亮话,至于怎样去做,孩子们却一无所知。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觉得,少先队运动的一项任务,就是要通过生动具体的形式,让儿童明确认识工人阶级的奋斗目标,而且不是按照枯燥的政治常识教材去讲,同时还要告诉他们谁曾为此事业而奋斗,这一斗争的经过如

何。如果儿童善于对周围的生活进行观察,并能分辨好坏善恶,那他们也就对此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我想讲一件这方面的事。

我国的儿童总是谈到国际主义精神(他们在这方面似乎是训练有素),他们对中国人深为同情。可是一旦碰到少数民族儿童的问题时,少先队员往往会轻蔑地说出“犹太鬼”,如果这个孩子是犹太人,那他甚至会受到迫害,这种事情已屡见不鲜。国际主义在他们看来是一种遥远的东西,与当前周围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而对周围生活中的楚瓦什人、犹太人、摩尔达维亚人,孩子们往往瞧不起他们,完全忘掉了应该尊重这些过去受压迫的民族。而孩子们现在有很多东西都不懂得!举例说,很多人不懂得沙皇俄国时期的民族压迫。

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负责支援邻近的一个工厂,有一次为这个厂的孩子们放映一场电影。我与克拉夫琴柯同志一起前往观看。电影里演的是对犹太人的蹂躏暴行,可是孩子们过去从未听说过这种事。电影里的暴行正在进行,犹太人遭到毒打,东奔西逃,尘土飞扬,可是孩子们却哈哈大笑,这并非由于他们心地残忍,而是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蹂躏犹太人的暴行,他们感兴趣的只是斗殴打架。这时克拉夫琴柯同志对他们讲,电影里演的是蹂躏犹太人的暴行,沙皇政府是这种暴行的策划人。经她这么一讲,孩子们对电影的看法完全变了,同时全场鼓掌表示对克拉夫琴柯同志的感谢。现在,当他们再看到反犹太人的暴行时,他们就想起了她所讲的活。

在对儿童进行工作时,我们要把一些大道理尽可能变成儿童能懂的话,把这些大道理与某种生动的形象联系起来,否则全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孩子们将来也会变得光讲大话而不干实事。这是关系到宗旨的问题。现在也是关系到组织的问题。

当然,独木难成舟,孤掌不能鸣。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组织起来。但组织是指什么而言的呢?在我批评少先队的时候,我请你们不要见怪,这不是教训少先队,只不过是希望我国的少先队运动搞得“呱呱叫”。我有时可能言过其实,但你们可以纠正。我想谈谈组织

问题。当然,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组织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你到农村走走,首先看到的是什么?新农村与旧农村有何不同?旧农村什么组织也没有,而现在各种组织都有。党支部不一定每个地方都有,但共青团却是各地都有的,少先队每个村都有,还有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农业合作社,等等。还有“扫协”和“儿童之友”。农村的组织很多,因此有人就主张工作中要齐心协力,少先队员就体现了这种精神。但是,光加入组织这还不够,还要使这个组织能正确地开展工作。有时对少先队组织的情况稍微了解一下,就发现各种集会、各种表面的和形式主义的东西压得孩子们喘不过气来。我想向你们谈一下马克思和拉萨尔的一次争论。拉萨尔认为,最重要的是让政府为工人把一切都安排好,拨出一笔钱来进行帮助,等等。马克思不同意拉萨尔的主张,他认为不可能指望资产阶级给予真正的帮助,同时问题不在于帮助,而在于工人的自助,在于发展工人运动。列宁同志是马克思的学生,他也十分重视群众的独立精神。他写过一篇论合作制的文章,他认为,只有那种确实有真正的居民参加的合作社才有意义。马克思与拉萨尔的这一争论也与少先队运动有关,因为我们常常对我国少先队运动中的这种独立精神的意义认识不够。儿童们更多地是注意纪律和列队行进。这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应当使每个少先队员确实参加这一运动并且尽可能充分表现自己的积极性。小队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儿童独立精神的发扬。儿童们在大的集体里难于开展工作,所以建立了小队这一级组织。发扬儿童独立精神的工作总的说来搞得如何呢?我认为还须大力改进才行。我们往往看重表面工作,而没有给予儿童的首倡精神以应有的支持。我当然不是说对儿童可以撒手不管。必须要有领导,但领导不应只着眼于一些琐事,不应只是辅导员才有积极性。

一位老工人曾经描写过他亲眼所见的一件事。辅导员想把少先队带到几俄里外的村子里去帮助农民收割干草。孩子们答应了。他们去了,把活也干完了,农民想留他们吃餐饭,但是辅导员高傲地回

绝了。孩子们都累了,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但是这位辅导员说:“纪律到哪儿去了?原地休息!”接着又让大家继续前进。当然,我们要有纪律,但不应该是这种强制纪律。在这里应该找到一种方法,既有领导,而另一方面却不是强制儿童。而是发扬他们的内在纪律。

1919年,列宁写了《伟大的创举》一书。他在该书中说,纪律有两种:一种是资产阶级的纪律,它是靠外部纪律、扣除工资、处以罚款、开除和采用警察手段来强迫人们做这做那;另一种纪律则不是强制性的,它不强迫人们去做什么,而是他们自己去做该做的事,因为他们认识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社会主义社会正是要建立在这种内在纪律的基础上。少先队是什么性质的组织?它是未来的幼芽。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组织培养未来社会的人,这种人要强壮健康,有坚强的毅力,具有内在纪律,而培养这种内在纪律乃是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少先队运动要千方百计发展这种内在纪律,这是很重要的,不过除了这种内在纪律之外,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少先队培养集体生活和工作的能力。

1918—1919年期间,人们把集体生活理解为,只要大家在一起,这就是集体。这种看法是不对的。集体的前提是一个安排得很妥帖的组织。过去,建党刚刚开始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指出应该如何建党。他说,党好比一部机器,每个党员好比这部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或齿轮。如果这个小螺丝钉不起作用了,整个机器就会停止运转,要使每个部位正常工作,要使每个齿轮咬合密切,全部机器都能运转。我曾经读过一个工人写的回忆文章,谈沙皇时代一座工厂制造机车的情况。工人们为了捉弄工程师,就拔掉了一个小螺丝。到了机车试车的时候,却开不动了。这位工程师急得手足无措,只好把机车拆开检查,然后又重新安装上。但是两周的时间却白白过去了。工人们这段时期工资照拿,他们心里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这位老工人的回忆文章很能说明问题。它使我们认识到,一个小的局部会影响到整个组织。少先队运动也是同样的情况。特别重要

的,就是要使每个儿童认识到,他是少先队组织这个大机器上的一个螺丝或齿轮。在这方面,我们还应大大加强对少先队员的工作。某种能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社会工作,这当然是有的,但他们对此却不重视,他们重视的是红领巾、大操练,等等。有时孩子们还来信说:“我们想成立少先队,可是我们没有红领巾。”我回信对他们说:“问题不在有没有红领巾。”我们俄国人的工作能力很差。老一辈的革命工作者通常都是靠自己的一双手两条腿工作,而组织本身则不够健全。现在的青年应该学会在集体中工作。他们目前还不会有组织地进行工作。要使每个少先队员都有事可做,每个人都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不要三五成伙地游逛,而要一起工作,即使每个人量力而行只干一点工作,但也得去干。

我还想讲的问题是:对于每一项集体工作来说,除了需要知识和能力之外,还要有愿望。往往有这样的情况:能力不强,成效很大。我今天刚好读完我的一位老朋友克利波维奇的传记。她起初是民意党人,后来和我们一起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她是一个受人爱戴的人。她的突出特点是善于与每个同志相处,对任何工作都能积极去干。她很少在大会上发言,所以广大群众不大知道她,但是老一辈的革命工作者都很了解她。为什么印刷厂能开工?因为她在那儿工作。为什么地下书刊的运送很顺利?因为她做了工作,帮了忙。当时这一切都是秘而不宣的,因为干这种工作的唯一奖赏就是进监狱。她总是帮助大家,列宁和其他一些革命者都在她家避过难。她是老一辈久经考验的革命者的楷模典范。今天,当我读到她的传记时,我心里想:最好给青年写一本描绘她一生经历的书,因为她过去对我们大家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她对人体贴入微,关怀备至,每个人与她分手时,都决心加倍努力去工作、去战斗。这样的人,这样的同志,在我们中间是很有影响的。她常常为同志做饭,照顾有病的同志就像照顾自己的儿子一样。她没有架子,有的只是劳动人民的一双灵巧的手。

要想帮助同志,首先自己得有深刻的认识,同时要什么都会干,而

不是依赖别人。在这方面 我们应该向童子军学习。童子军的宗旨是要能从事实际工作 ,他们自己学习做各种事情而不要指导员的帮助 ,可是我国的儿童却是什么都坐等现成 指望别人来指导 来帮忙。

我还想谈谈有关学校的问题。恰好在获得知识和能力方面 ,学校是大有作为的。苏维埃学校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这种世界观是每个少先队员不可缺少的。对旧学校应进行不懈的斗争 ,而新式学校却是对我们有帮助的。

我曾经在一次会议上把新旧学校进行过对比。列宁格勒的几个大学生问我 :“难道一级学校的小孩子也得有世界观吗?”我讲了世界观形成的过程。举例说 ,我们怎么向孩子们讲述影响收成的原因呢?这取决于土、水、肥、种等等。可是从前是怎样讲的呢?柯里佐夫有一首诗 结尾两句是这样说的 ;

我耕地、播种时默默祈祷 ,
上帝 ,请赐我粮食——我的财宝。

在这里 ,用隐蔽的形式向孩子们灌输了一种思想 :收成取决于上帝 ,而不取决于选种。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另外再举一个例子。乌申斯基编的一本教科书 ,大家认为编得很好 ,现在还有一些教师常常说 :“从乌申斯基的教科书上举一个例子。”应该用这本教科书作范本呼?这本书上有一篇文章 :《奇妙的小房子》 ,文中描写了人体 ,写得不错 ,但谈到身体为什么能动这个问题时 ,就不然了。文章认为人是受灵魂支配的 ,灵魂离去 ,人体就死亡。旧时学校就是这样教学生的。而我们则告诉孩子们大脑、神经系统是如何工作的 ,身体如何受它们的支配而行动。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从前学校灌输的是 :人人为自己 ,上帝为大家。而现在正如列宁说的 ,大家讲的是 :一人为大家 ,大家为一人 ,没有上帝我们也能行。再举一个例子。从前学校里教孩子们的是 :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了世界 ,而现在农村的一些少先队员到我这儿来看图片时 ,他们指着其中的一张说 :

“这是冰河时代”，——他们已经知道了冰河时代，知道地球的历史了。其他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

过去书上对英雄人物的描写是：抓住奔马，救人性命；挽狂澜于既倒，防堤溃于未然，等等。而现在重要的是在集体中埋头苦干，使整个集体和睦相处，愉快劳动。我们现在要突出的不是个人，而是友好的劳动集体。从前有一个人叫米海洛夫斯基，他写了一部著作《英雄与群氓》，书中描写群氓如何追随英雄前进。他在书中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北方有一种“模拟”症，患此症者总是情不自禁地模拟别人的动作，群氓也正是这样步英雄之后尘的。米海洛夫斯基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的观点的，马克思经常讲的是广大群众，讲的是团结一致，讲的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别英雄。他认为个人实际上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现在少先队员在学校里应该干什么呢？当然，他们应该学习，要学会写字，掌握学校所传授的知识，然后还要学会独立工作，不过这只是他们在校工作的一小部分。

为什么少先队员赞成现代的学校呢？因为现代学校不讲资产阶级学校所讲的那些东西。少先队员在学校里要与其他许多儿童打交道，并且碰到许多不正确的现象。如果少先队员把自己与其他的儿童对立起来，把学校里的各种职务都担当了，把自己视为特殊人物，那就不对了。这样一来，往往使其他一些儿童为了享受特权而想加入少先队，而家长们也劝孩子入队，以便今后好找出路。少先队员在学校里不应使自己与别的儿童对立起来，而要尽量把他们组织起来。当然，具体应该如何去做，你们知道得更清楚，我只想指出一点，就是这种对立现象是很有害的东西。教师在这方面可以给予许多帮助。凡是在这方面作了帮助的教师，今后与他工作起来就省劲些，而凡是妨碍这样做的，就要向他进行斗争。好，同志们，我的讲话就要结束了。通过大会讨论，我们将把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弄清楚……

国民教育的十年

列宁最后写的几篇文章中,有一篇《论我国革命》。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许多反对共产党的人说,我们共产党在干一件徒劳无益的事,想在一个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的国家里从事建设。列宁当时指出,说这种话的人不懂得,无产阶级只要夺取了政权,就能大大推动整个生产力的发展,就能把文化提到资产阶级统治下不可能达到的高度。”

现在,当我们对国民教育方面十年来的工作进行总结时,我们看到,列宁的话真是千真万确啊!

我们应当回顾一下工作刚刚开始的前五年的极其艰难的条件。当时我国在文化方面的确极其落后:有些地方的居民(如沃龙涅什省的旧教徒)甚至认为识字课本是魔鬼的读物,而幼儿园则是一种军事学校,把孩子们培养成六亲不认的士兵(伏尔加河流域的农民1919年就是这样看的);有些民族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帝国主义战争带来的经济凋敝,加上国内战争以及民不聊生、破坏严重等等情况,大大影响了文化的发展。

但是,革命的号角唤醒了巨大的创造力。有的工人刚从国内战争的前方回来,放下武器之后,立即拿起了识字读本。在窗户破损、没有取暖的学校里,孩子们穿着各种破烂不堪的衣服,用心学习着;教师们没有工资,照样进行教学工作。现在我们有充分的把握说,我们在文化方面已阔步向前了。

当然,我们希望取得的成绩更大些,希望彻底扫除文盲,每人都能得到一本书,我们想把人类已有的全部知识完全传授给群众,我们想让群众充分接触艺术。

但是,要想做到以上种种,就需要具备物质上的前提条件。我们必须把工农业提到更高的水平,必须提高技术,使男女农民、男女手工业者摆脱落后的小生产的束缚,因为这种小生产使他们没有空闲时间去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水平。群众需要有一定的物质福利条件,日常生活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改变。

在我们对十年来的工作进行总结时,必须对已取得的一定的成绩加以肯定。我们还未实行普及教育,但是我们不久即将实行(学校发展的速度比预期的快,主要原因是居民的主动精神很强)。也只有实行了普及教育,我们才有可能扫除文盲。但是我们并不坐待(也不能坐待)普及教育的实行。我们要进行工作,全力以赴,去扫除成人中间的文盲。七年来,参加扫盲站学习的有500万人,此外还有一些人虽未参加扫盲站,但也在学习识字。只消对最近一次的登记资料加以分析,就不难看出我们在扫盲战线上所取得的实际成绩。

不过,不是扫除了文盲就万事大吉了。还要让学会识字的人读点书。我国报刊发行的成就(如报纸发行量很大,地方报纸蓬勃发展)充分说明,能够读书识字已经成了一种进行教育的有效武器。工农通讯员密切了报纸与居民的关系。资产阶级的报纸是欺骗群众的工具,而我们的报纸却是进行教育的有效武器。它讨论群众关心的问题。农村阅览室网以及日益扩大的红角网,使报纸与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大大帮助了群众去了解形势。

由于群众中产生了许许多多实际问题,由于群众的思想极为活跃,因此他们渴望读书,对书籍的兴趣很浓。向广大群众供应图书,这也许是我们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必须予以注意。这方面的工作正在进行,但是必须加强。

我国建立了一些新型的成人学校,如农民短训班,工人大学。我国的工农速成中学起了重大的作用,它使工农受到了中等教育,而在旧制度下,他们是无缘迈进中学天门的。由于设立了工农速成中学,我国高等学校更加无产阶级化了。政治学校、苏维埃党校继成人学

校和工农速成中学之后,继续进行教育工作。

戏剧、电影和广播把扫盲站开始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

与此同时,新式学校也日益成长。它已与宗教一刀两断,这是不可逆转的了。现在学校里的宗教教学已销声匿迹了。各级学校的数学内容都力图切实地奠定劳动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从前,学校高墙耸立,与实际生活完全隔绝,而现在则与生活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学校告诉学生如何改善周围的生活,如何使生活更加光辉灿烂、富有理性。学技教孩子们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际去做一些事,教他们从事公益劳动。

师生关系发生了变化。教师成了儿童的同志,他们帮助儿童组织起来,不打他们,不处罚他们。从欧洲到我国访问的资产阶级国民学校的教师,对我国儿童享有的自由,对我国师生之间的关系,无不感到惊奇。

儿童共产主义运动和少先队运动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组织起来。学校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学校所培养的是把列宁的事业进行到底的一代人。诚然,并非每个学校都如此;还有一些旧的残余,而且这种残余还不少,但是这种残余正在被清除。

我国学校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有待改进。我们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并且一定能做到。

我们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教育工作者工会坚定不移地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教师日益成长,不断学习,他们投入了我国的生活洪流,为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懈努力。我们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居民对学校日益关心,他们与学校的关系日益密切,经常帮助学校。我们通过各级苏维埃密切了居民和学校的关系。

在非俄罗斯语言的民族中开展工作,这是一项具有特别意义的工作。这些民族占我们国家全体居民的半数以上。在沙皇时期,谁要是提出必须用本族语教学这种主张,那就是大逆不道之举。少数民族备受压迫,处于愚昧无知的境地。苏维埃政权奉行的方针是,对

广泛发展的民族文化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加强帮助和关心,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这就是苏维埃政权的口号。

我们在建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文化方面刚刚起步,不过这开始的步伐却已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在这方面,正如在苏维埃建设中其他方面一样,我们正沿着列宁指引的道路前进!

论综合技术教育

全国工业化和农业改造的问题又一次非常尖锐地提出了培养劳动力以及综合技术教育在这一培养工作中的作用问题。

在教育界,已经平息下去了的对综合技术教育以及应该怎样安排综合技术教育教学工作的争论又开始了。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党提出工业化问题当然不是偶然的。越来越广泛的居民群众都认识到必须放弃旧的耕种方法和作物栽培方法。全国必须工业化只不过是反映了我们非常迫切的要求,以及我们对这种要求的认识。恩格斯在1894年1月25日致亨·施塔尔肯堡的信中说:

“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液体静力学(如托里拆利等)是由于十六和十七世纪调节意大利山洪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发现它能应用于技术上以后,我们才知道一些理性的东西。”

对技术的需要不断把科学推向前进。对技术的需要不仅引起了科学界人士对技术的兴趣,而且也引起了广大群众对技术的兴趣。现在,群众对技术的兴趣非常浓厚,不过我们要善于培养这种兴趣,善于把它纳入正轨。成人对技术的兴趣也能感染少年儿童。

不久前,我碰到一个5岁的小孩子(他的父亲是个工程师),他

对技术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他常常用木铲在石头上铲。

别人对他说：“你怎么啦，沙列奇卡，快别铲了，要不地就弄坏了。”这个孩子毫不在乎地说：“铲子是木头的，可是地是石头的，我怎么能把地弄坏？”

我还看见这个孩子非常惊奇地站在风磨前面问：“这是什么东西？”人们讲给他听了。到了晚上，他已入睡，突然从梦中惊醒，说：“这个风磨怎么会转动呢？”

应该从小就养成对技术的兴趣。这种兴趣本来很早就产生了，但是我们往往千方百计地压制它，扼杀它。学校在这一点上比家庭表现得更严重。

如果我们想认真地进行综合技术教育，那么我们就需要出版父母（男女工人）读物，讲讲怎样引起儿童对技术的兴趣；我们应该审查一下幼儿园的教学大纲，并且看看幼儿园怎样引起儿童对技术的兴趣；我们应该根据这一观点检查一下我国四年制学校和七年制学校的教学大纲，我们也应该采用适当的方式来安全部校外工作。

各种劳动的学习或者可能具有职业教育的性质，或者可能具有综合技术教育的性质。

就拿最普通的学习项目——缝纫——来说吧。学习缝纫可能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可以一连几小时学习如何缝合得均匀或者学习如何缝纽扣孔。这是手艺学习。但是这种学习也可采用另外的方法。可以使这一学习跟材料和工具的学习联系起来，让儿童明白由于材料不同而同一生产过程就需要不同的工具：缝细布用一种针，缝呢子要用另一种针，缝皮子要用锥子，纸不能缝，要粘，木头不能缝，要钉，等等。这就是用综合技术的方法学习缝纫。也可以不只是让一个人去工作，还可集体地工作：两个人，三个人一起有节奏地工作，一会儿慢些，一会儿快些，然后再做其他许多动作，也打拍子，唱着歌。学习机器缝纫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只不过需要指出怎样转动轮子，怎样装梭子，或者也可以把学习机器缝纫跟学习缝纫机和类似的机器联系

起来。由此可见,可以把缝纫当作一种手艺来学习,也可以使学习缝纫跟学习材料、工具和发动机等等联系起来,这就成了综合技术教育。

不用说,对待教学的态度取决于教师的综合技术水平,取决于他能否把最简单的劳动行为跟比较复杂的联系起来,能否生动地分析劳动过程的一切要素,而不是仅仅取决于设备。当只有手工业存在的时候,就不可能有综合技术教育,因为在各种手工业之间有一道墙隔着,各种手工业之间究竟有何共同之处也不清楚,对各种手工业也没有进行过分析。只有机器生产的发展才使我们得以理解、分析手工业的劳动过程,知道其中的共同之处。技术趋向向前发展,那么就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每一劳动过程的实质。但是,为了利用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这一分析结果,完全不必要非到设备最完善的工厂里去不可。可以领儿童去参观最先进的工厂,但是如果事先没有进行一些工作来培养他们对技术的兴趣,使他们养成自觉地对待每一劳动过程、每种机器的技能,那么这种参观所得到的益处就非常少;反之,如果进行了有关的一些准备工作,即使是到一个比较落后的工厂里去参观,也可能对扩大儿童的综合技术眼界有很大好处。

我国当前的技术情况决定了综合技术教育可能达到的深度。但这决不是说,在比较落后的地区就不能进行综合技术教育,因而在这些地区我们就只能束手等待全国工业化后再说,目前暂时只好在少数工业先进的城市进行综合技术教育。抱着这种想法的人忘掉了一个事实,就是综合技术教育不仅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且也是工业化的工具。综合技术教育应该是群众性的,无一例外的。只有在群众的帮助和参预下,全国才能工业化。

这就是列宁的看法。这种看法在他同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通信中谈到全国电气化计划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应该吸引群众,激起他们的主动性。

列宁在1920年1月写给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信中说:“不能补充一个计划吗?不是技术的……而是政治的或国家的计划,即无产

阶级的任务。”

“大概 在 10 年(5 年 ?)内修建 20—30 个(30—50 个 ?)电站 ,使全国布满以 400 俄里(或 200 俄里 ,如果不能搞更大的)为半径的发电中心 ,其中有的用泥炭 ,有的用水力 ,有的用页岩 ,有的用煤 ,有的用石油(把整个俄国大概地、粗略地划分一下)。现在就开始订购必要的机器和样品。10 年(20 年 ?)以后 ,我们就能使俄国‘电力化’。”

“我想 ,这样的‘计划’——再说一遍 ,不是技术的而是国家的计划——计划草案 ,您是能够提出来的。”

“计划应该现在就提出来 ,要通俗易懂 ,一目了然 ,以使用清晰明确的(有充分科学根据的)远景来吸引群众 ;干吧 ,在 10—20 年内我们就会使整个俄国 ,不论工业和农业 ,都实现电力化。……”

“再说一遍 ,必须用 10—20 年的伟大纲领来吸引工人和觉悟的农民群众。”

如何把群众发动起来 ,这是列宁很为关注的问题。他写信给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同志说 :

“格·马· !我有这样一个想法。”

“必须宣传电的知识。如何宣传呢 ?不仅是口头的 ,而且要用实例。”

“这是什么意思呢 ?最重要的是把电的知识普及起来。为此必须现在就制定一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每一幢房屋用电照明的计划。”

“这要很久才能做到 ,因为无论是 2000 万(—4000 万 ?)个灯泡 ,无论是电线或其他器材 ,我们在长时间内都会感到缺乏。”

“但是目前仍然需要一个计划 ,尽管要许多年才能实现。”

“这是第一。”

“第二 ,应当立刻制定一个简略的计划 ,然后 ,第三(这是最主要的) ,应当善于激起群众的竞赛和主动性 ,使他们立即行动起来。”

“为此能不能立即制定这样一个计划(大略的) :

“ (1)所有的乡(10000—15000)在一年内都有电灯照明 ;

“ (2)所有的镇(50 万—100 万 ,大概不超过 75 万)在两年内都有电灯照明 ;

“ (3)首先是农村阅览室和苏维埃(两盏电灯) ;

“ (4)电线杆立刻如此如此准备 ;

“ (5)绝缘体立刻自己准备(陶器厂 ,比如说 ,地方的和小型的 ?)。如此如此准备 ;

“ (6)电线用铜 ? 自己到各县各乡去收集(巧妙地暗示铜钟等物)。

“ (7)关于电的教育如此如此进行。”

“ 能不能把这方面的事情考虑研究一下 ,并发出指示 ?”

这是列宁在 1920 年写的。

我之所以摘引这样长一段话 ,首先是因为这段话最好地说明了列宁对群众的态度 ;其次 ,这段话也说明了列宁为什么这样重视综合技术教育。他在 1920 年末对我的提纲所作的评注就是论述综合技术教育问题的。他在评注中写道 ;

“ 决不能这样来谈综合技术教育 :从抽象的观念出发 ,针对遥远的未来 ,而不考虑当前的、迫切的、糟糕的现实情况。”

应当“ 说明白、我们决不能放弃原则 ,我们一定要立刻尽可能地实施综合技术教育。”接着又说 :“ 把立即过渡到综合技术教育 ,或者确切些说 ,立即实现许多马上就能做到的走向综合技术教育的步骤 ,规定为必须绝对执行的任务。”

接着 ,他发挥了自己的可贵的思想 ,即如何利用我们所有的不多的一些机构 ;同时应该指出 ,在这不多的一些机构中 ,还有国营农场 ,因为列宁是把农业也包括在综合技术教育之内的。

我不打算继续摘引列宁的话了 ,——因为现在每个人都有机会去研究列宁的这一提纲。这一提纲清楚地说明了列宁是怎样理解综合技术教育的。

列宁所关心的不只是“ 劳动力” ,“ 人力” ,他还关心培养新的技

术基础的自觉的建设者,因为这种基础能把我国变成一个富强而有文化的国家。列宁从来不把培养劳动力跟培养新的技术基础的自觉的建设者分隔开来。

综合技术教育争论的焦点就在这里,因此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就特别激烈。

列宁一般地总是把综合技术教育的问题跟新的劳动态度、跟纪律问题等等联系在一起的。

就在1920年,列宁写文章论述了星期六义务劳动,论述了新的自觉纪律。

列宁在《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一文中谈到了社会主义劳动问题:

“树立新的劳动纪律,建立新形式的人与人的社会联系,创立吸引人们参加劳动的新方式和新方法,——这是需要做许多年甚至几十年的工作。”

“这是最能收效最高尚不过的工作。”

“幸好我们已经推翻了资产阶级,平服了资产阶级的反抗,就是说,我们已经夺得了使这种工作有可能进行的基地。”

在这篇文章中,列宁还谈到了社会主义劳动的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劳动。“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造福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种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没有报酬条件的劳动,是根据为公共利益劳动的习惯、根据必须为公共利益劳动的自觉要求(这已成为习惯)来进行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的身体的自然需要。”

我国现在已经有了统一劳动学校。但是如果我们想把它办得符合列宁的希望,我们就不仅要关心授予儿童一定的劳动技巧,而且还要培养儿童能够从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劳动。由于各种奇怪的情

况的凑合,由于我国很穷困,不能给学校各种设备,又不善于教学生学会用别的方法工作,我们就越过了一级而在我国学校里进行共产主义劳动教学就比社会主义劳动教学多些。我们的公益工作就是共产主义教育的一小部分,不过这种公益工作往往变成组织群众集会,变成了上演戏剧等等。其所以变了,是因为没有社会主义劳动作它的基础,缺少技能,缺少爱好工作和认真工作的习惯,缺少真正的劳动锻炼和对工作与技术的兴趣,不善于集体地工作,不会检验自己工作的成果。

正是由于我们教育中还缺少社会主义劳动基础,综合技术教育对我们说来就具有如此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它能使我们懂得怎样从事各种劳动,它不仅能使我们懂得应该从事这一劳动,而且还使我们懂得怎样用最好的方法、最合理地完成这一劳动。

论 中 学(全苏党的国民教育会议提纲)

(一)中学的一般状况

1. 国家的工业化以及工农业的改造,既要求提高全体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也要求培养相应的中等技术人才,这种人才能够从生产上把群众组织起来,领导他们前进,指导他们工作。

旧的中等技术人才是沙皇时代培养的,他们越来越不适合需要,首先是由于他们不能领导现代的群众(他们仍然以主子的态度来对待群众),不能与群众一道工作;其次,由于他们的技术训练是在完

全不同的技术水平上进行的,他们不了解今天的建设任务,也对它不感兴趣,因而很难适应日新月异的生产条件。同时,我国劳动者的素养还很差,集体劳动的技巧刚刚开始培养,一切经济工作都得重新做起,所以中等技术人才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培养工业和农业中等人才的工作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中学。中学应该培养新型的中等技术人才,这种人才一方面要具备相当的教育和社会素养,另一方面要能从实际上和理论上了解自己的专业。

在改造时期,使这种新型的中等技术人才具备较为厚实的普通教育基础,是十分必要的了。

工厂艺徒学校的经验生动地表明,四年制的基础远远不够,由于缺乏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知识,迫使你花费一些时间去学习基本的东西,不然就要严重影响学习的效果。正因为如此,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和共青团都主张,工厂艺徒学校应以七年制为基础。职业学校也是如此。

因此,培养中等人才的基础应该是七年制学校。改善这种学校的现状应是国民教育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2. 就七年制学校现状而言,尽管最近几年无论在工作范围方面,还是在工作内容方面都有了一定的进步,但还远远不能满足改造时期所提出的任务要求。

七年制学校及其毕业生人数还是微不足道(据1927—1928学年的统计,一年级入学的学生念到七年级的仅占7.4%,包括青年农民学校和七年制工厂学校在内)。七年制学校的社会成分也不好,因为大家都知道,被淘汰的学生主要是低工资工人的孩子和贫农的孩子(工人和雇农的孩子在七年级总共只占23.6%)。

七年制学校的方针是:1)用知识和技能武装学生,这种知识和技能是今后进行普通教育学习所不可缺少的;2)教学生学会把知识运用于生活;3)授予学生一般的综合技术的劳动技能,使学生养成有计

划地、合理地安排工作的能力以及集体工作的能力 4) 给儿童打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基础 5) 养成根据共产主义道德原则调节自己行为的习惯——目前的学校在很大程度上还未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最近几年来,七年制学校注意用普通教育的知识和技能武装学生,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今后还应更加注意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在使知识与生活联系起来方面,青年农民学校的工作做得比较好些,至于其他七年制学校,一般说来,要比四年制学校要做得差些。

至于说到一般的综合技术技能以及有计划地、合理地 and 集体地工作的能力,大多数七年制学校都搞得很不好。在这个问题上,与其说是没有校办工场,毋宁说是由于舆论对综合技术教育不重视,因而使之难于与周围的生产单位建立起联系,此外,缺乏能干得力的劳动指导人员也是一个原因。

至于共产主义世界观问题,教学大纲对此要充分加以强调,但是由于七年制学校教学内容过多,教学大纲分量太重,加之教员水平不高,就把这个问题推到次要位置上去,结果共产主义世界观问题在学校里解决得不能令人满意。

教育学生懂得必须以共产主义道德原理为准则的这项工作,在一般七年制学校往往蜕变为采用旧学校那一套教育方法了。这表现为在很多方面采用与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相同的学校自治的形式,表现为不善于在儿童中培养同志式的气氛,不善于激发儿童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

3. 七年制应该是第二(即职业化)圆周阶段的基础,也是部分中等技术学校、工厂艺徒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基础。

二级学校第二圆周阶段、工厂艺徒学校、职业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应该成为给工业和农业输送中等水平劳动力的最重要渠道,同时也是为高等学校输送学生的最重要渠道。但是,这类学校远远没有发挥自己的作用。最不能令人满意的是二级学校职业化圆周阶段的状况——职业学校只有 16% 的学生(据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统计)

受到生产训练,而其余的人则是培养他们从事教师或职员职业。因此人们往往把职业学校主要看作是升入高等学校的一个梯子。就社会成分而言,第二圆周比七年制学校还差,它实际上是职员子弟的学校,生活拮据的工人、贫农和雇农的子弟根本进不去。

中等技术学校授予的专业技能更扎实一些,不过,授予生产技能的只占中等技术学校的48%,医学教育方面的占11%,艺术教育的占11%,其余都是培养师资的。中等技术学校不大注意普通教育,甚至取消它,此外,有些学校还未进行生产实习,办学方针往往不能适应生活的要求。部分中等技术学校只招收年满18岁的学生。这些中等技术学校急于办成十年制的,而不是七年制的。

职业化圆周和中等技术学校之间往往互不协调,而且不能满足该行业对它所需要的那种类型的中等技术人才的要求。

现在我们又以七年制的基础上办起了工厂艺徒学校。这种学校实际上是一种享有优待的学校,它与其他学校不同之处,就是它的学生是领工资的。工厂艺徒学校的境况比其他中等学校强些,不过它的工作还须大力改进。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培养中等职业人才的工作还不能令人满意(如果我们注意到在职业圆周阶段学习的只有1/3的中学生时,就更会感到这一点);中学毕业生的数量和质量都不能满足改造时期日益增长的需要。

(二)改进中等学校的若干措施

1. 随着苏维埃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七年制学校将成为普及的义务学校(1920年召开的党的国民教育会议即已指出此点),并将成为培养专业技术劳动力的教育机构的基础。

有鉴于此,必须:

第一 增加七年制学校学生的数量。办法是建立更多的七年制学校,首先是在工人中心、大的国营农场、公社、集体农庄建立这种学校,从而消除现有学校网点的旧的痕迹,因为现有学校的布局都在中心城市和从前的商业城镇;由于七年制学校的建设与工业和农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必须发动经济机关参预这项工作。在发展七年制一般网点的同时,还需要开办一些补习学校,比如在中等技术学校(特别是工业和农业技校)里设七年制训练班,招收不能上七年制学校的工人子弟、雇农、贫农、集体农庄庄员和公社社员的子弟入学。还要开展七年制的函授教育,由学校 and 中等技术学校组织辅导答疑。

第二,大力提高工人、雇农和贫农子弟在七年制学校的比重。办法是采取专门措施,在物质上给予帮助,如发放助学金,免费供给衣服鞋子、教科书、热早餐等等,广泛发动社会团体进行这种资助。在一般七年制学校为贫农、雇农的子弟,为低工资的工人子弟以及尚未巩固的集体农庄和公社的孩子们设置宿舍。

第三,要使七年制学校成为综合技术学校。为此,青年农民学校(农村学校)不仅必须更好地面向集体农庄建设,而且还要更好地面向工业劳动;为此,最好把这种学校设在各村联合拖拉机站。工厂七年制学校必须与生产保持更紧密的联系,为此就要对各企业下达指示并发动工厂基层组织参加这一工作。最好让企业出面组织儿童参加企业的某些劳动,为学校开办一些工场。其他七年制学校最好在与市政企业、饮食行业、化学工业和建筑业加强联系的基础上,体现其生产性质。

七年制学校的整个教学大纲要从综合技术教育的观点加以修订。据此,高等师范院校要为综合技术学校培养一批新型的教师。要注意使培养师资的工作具有综合技术性质,因而要相应地修订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学大纲,改变高等师范院校的设备,改变其生产实习的内容。开办不久的七年制学校教师劳动讲习班应该加强。

为了进一步加强学校教学大纲与培养学生共产主义世界观这一

任务的联系,一方面应适当减轻七年制学校教学大纲的知识份量,另一方面必须补充如下一些材料,如:五年计划,国家的工业化,集体农庄建设,等等。要特别重视教学大纲中关于世界观的部分,比较详尽具体地向儿童介绍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是阶级斗争,以及宗教起着何种作用,要突出国际主义思想,等等。

由于自治问题、学校社会公益工作问题、禁止体罚问题以及培养自觉纪律问题都已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讨论,所以目前的任务主要是贯彻执行,以便合理地安排和组织全部的工作。

2. 为了保证培养中等技术人才,即培养生产的组织者和群众的指导者,要采取以下的基本措施:

(1)要使第二圆周的职业学校、中等技术学校和工厂艺徒学校联成一气,共同满足各个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

(2)需要劳动力的单位要对劳动力实行特殊的“订购”。培训工作不应只顾眼前,而要考虑到该部门的发展趋势,考虑到升入高等学校以及改行等等情况。

(3)教学大纲中要充分突出培养具有中等专业技能工作人员的各类中等学校所具有的那种广泛的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特点。对第二圆周、中等技术学校和工厂艺徒学校也应如此。

(4)上述各种学校都应和生产保持密切联系,以便学生能在他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参预一定工作,这项工作要计算成绩和报酬。如果是师范教育为主的学校,那学生就应去教多少个文盲识字,当多少天图书推销员,在幼儿园干多少天活,进行多少次参观,等等。中等医学技术学校有自己要干的事,中等农业技术学校和以农业为主的学校也有自己要干的事,工业学校则有另外一些要干的事。

不管是哪种专业,都得具备一定的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熟巧和知识。实习生的劳动,一定要在确有效益的条件下才能付酬。凡此种种,都使我们的中等技术学校和二级学校职业化圆周阶段具有务实的性质。

(5)还要像中等技术学校那样,要逐步实行下述办法:凡在二级学校职业化圆周阶段毕业的青年,以及在工厂艺徒学校毕业的青年,在升入高等学校以前,必须在相应的部门工作两年或三年。在这段时期内,他必须与学校保持联系并根据学校的任务完成某些工作。

(6)必须大力从物质上加强二级学校第二圆周阶段,因为它在物质基础上远远落后于所有其他学校。

(7)要特别重视改善社会成分,特别是二级学校第二圆周阶段的社会成分,可采用与七年制学校相似的办法。

(8)要大力发展业余教育和提倡自学(办职业夜校,中等技术学校函授班,等等)。

为了使改进中等学校状况的一切措施得以贯彻执行,必须进一步明确文化五年计划对培养中等技术人员的要求以及各省和州的要求。

由于现在许多学校在工业技术和农业方面都有新的侧重面,因此这一点尤为必要。

保证上述措施贯彻执行的另一必要条件,就是充分发动社会各界(尤其是共青团和党组织)关心中学的工作。